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Academic Research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主 编：叶金宝

学术研究

(1958 年创刊)

2025 年第 1 期

总第 482 期

出版日期: 1 月 20 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视角

田鹏颖 刘颖晴 1

学术聚焦

· 阐释学研究 ·

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的理论探索

——张江教授访谈录

本刊编辑部 9

汉语文学的文本特征与中国文学阐释学的建构

泓 峻 王园园 18

训诂与阐释：商周铜器铭文研究的视角与佐证

秦晓华 24

哲 学

·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理解 ·

从抽象的一般性走向具体的普遍性的历史空间辩证法

——中国式现代化哲学基础问题的若干思考

刘怀玉 32

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的嬗变及其反思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

白 虎 42

质素、感受质与身体

张浩军 李永辉 48

再论数学史与科学史的关系

朱一文 58

政 法 社会学

资源环境要素市场风险防范的公法进路

——以自愿碳市场为例

秦天宝 姚 远 67

组织化承载与社会性参与：社区自组织建构社区共同体的案例研究

杨 慧 杨 琳 77

从群体共识到集体共情：旅游价值作用下民族村寨族群认同感凝聚的路径研究

曾 韬 罗秋菊 85

经济学 管理学

中国经济赶超过程中的汇率趋势和汇率政策 郑超愚 92

电子商务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及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阿里电商发展指数的实证分析

蔡跃洲 王建国 刘生龙 100

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战略目标及实践推进

于法稳 孙韩小雪 林 珊 109

企业数字化发展、供应链溢出与就业增长

余玲铮 林凤婷 魏下海 116

历史学

反法西斯主义与统一战线(上) 桑 兵 124

“夷”字译名之争:两次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关系的再定位 万 立 138

晚明科道官的年例迁转与政争 余 璐 150

文学 语言学

从《大言赋》《小言赋》看先唐诙谐文学传统 刘跃进 162

汤姆斯英译《花笺记》及其“世界文学”意义生成 陈恩维 171

英文摘要 179

Academic Research

CONTENTS

No.1, 2025

Better Adaptation Betwee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Basic Contradictions	<i>Tian Pengying and Liu Yingqing</i> (1)
From <i>Imposed Hermeneutics</i> to <i>Public Hermeneutics</i> :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ang Jiang	<i>Staff Editors</i> (9)
The Textual Featur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Construct of Chinese Literary Hermeneutics	<i>Hong Jun and Wang Yuanyuan</i> (18)
Philology and Interpretation: The Perspective and Argument about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on Shang and Zhou Dynasty Bronze Artifacts.....	<i>Qin Xiaohua</i> (24)
The Dialectics of Historical Space from Abstract Generality to Concrete Universalit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Liu Huaiyu</i> (32)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t Life Governance Technology and Its Refle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Critique	<i>Bai Hu</i> (42)
Hyle, Qualia and Body	<i>Zhang Haojun and Li Yonghui</i> (48)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History of Science	<i>Zhu Yiwen</i> (58)
Public Law Approach to Risk Prevention i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 Markets: A Case Study of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	<i>Qin Tianbao and Yao Yuan</i> (67)
Organizing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 Case Study on the Mechanisms of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s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Yang Hui and Yang Lin</i> (77)
From Group Consensus to Collective Empathy: A Study on the Path of Ethnic Village Group Identity Cohes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Value	<i>Zeng Tao and Luo Qiuju</i> (85)
The Trend and Policy of RMB Exchange Rate During China's Economic Catch-Up	<i>Zheng Chaoyu</i> (92)
How Does the E-Commerce Affect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libaba's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dex	<i>Cai Yuezhou, Wang Jianguo and Liu Shenglong</i> (100)
The Connotation Features,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Practical Adv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Green Modernization	<i>Yu Fawen, Sun Hanxiaoxue and Lin Shan</i> (109)
Enterprise Digitization Development, Supply Chain Spillover Effect and Employment Growth	<i>Yu Lingzheng, Lin Fengting and Wei Xiahai</i> (116)
Anti-Fascism and United Front (Part One)	<i>Sang Bing</i> (124)
The Translation Dispute Over 夷 and Barbarian: Repositioning Sino-British Rel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s	<i>Wan Li</i> (138)
The Promotion and Its Political Struggles of the Supervising Secretaries and Censors in the late Ming	<i>Yu Lu</i> (150)
Viewing the Tradition of Humorous Literature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from “Da Yan Fu” and “Xiao Yan Fu”	<i>Liu Yuejin</i> (162)
Peter Perring Thomas's <i>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i> and Its Significance as World Literature	<i>Chen Enwei</i> (171)
English Main Abstracts	(17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视角

田鹏颖 刘颖晴

【摘要】“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是一个新命题。对这一命题的认识和理解，关乎人们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及其运动规律的把握，关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必须走进社会基本矛盾深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中，把握“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生成动因和内在关系。“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更加凸显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及其运动规律中的主体性，赋予了其时代性，更加突出表现了社会基本矛盾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意义。

【关键词】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D630；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001-08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①的新观点，在“两对矛盾”“两个更好相适应”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性地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提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遵循？这一“更好相适应”蕴含着怎样的内在关系？其对社会基本矛盾这一“原理”有何意义？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必须深切体会“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理论基础、历史生成、内在关系以及创新意义等，进而坚持好、运用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的原创性理论，更好发挥社会基本矛盾之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及其特殊理论地位

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建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观，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规律，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趋势等，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

基于生产的实践观提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关系图谱。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②在这一简单的却是最基本的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表明“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

作者简介 田鹏颖，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颖晴，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 沈阳，110169）。

①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4 年 7 月 19 日第 1 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31 页。

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人使用一定的工具不断地作用自然并且不断地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这个过程，就是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②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孤立的、个人的和鲁滨逊式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马克思将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而发生的联系，称为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③可以说，不同的阶级基于自身所处的经济地位构建起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的、文化的上层建筑。其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其发展会使原有生产关系变得与之不相适应，进而引发调整生产关系的需求，这种调整又会触动上层建筑变革。而新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形成后，又会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并处在经常不断地发展变革之中，规定着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总体趋势。

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基石性的地位，在理解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社会变革以及指导社会实践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理论伟力。

其一，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本趋势。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是近代思想家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些西方思想家在进化论的框架下叙说社会发展，往往将社会变迁简单类比为生物进化过程，并且强调“竞争”“适者生存”在社会进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以这种片面且机械的视角剖析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忽略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不同民族、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独特性，不仅致使西方国家无视或者遮掩自身的社会基本矛盾，还为其奉行霸权主义提供了看似合理的思想幌子。当然，也有一些西方思想家认为，社会发展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尤其是少数英雄人物的意志推动的，或是由“神”、“客观精神”决定的，使得社会发展的解释陷入形而上学、神秘主义的困境。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及其运动规律告诉我们，社会是发展的，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社会发展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更替，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这一学说将人们从“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的机械唯物论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将人们从“社会发展是超人类力量推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迷雾中解放出来，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其二，生动阐明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具体样态。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对于原理性的东西，必须深入到具体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情境中理解与运用。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的现实，通过“抽象到具体”的表达式，阐明了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马克思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主要特征的小生产逐渐被社会化生产取代，同时，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这使得矛盾愈发鲜明地表现出来。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④从这一论述中可窥见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表现形式，以及这一矛盾运动下的资本主义被“炸毁”的必然结局。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缺陷、把握“两个必然”的根本趋势、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其三，深刻诠释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主体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需依托于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遭受最为沉重的剥削与压迫，深陷社会基本矛盾的核心漩涡之中，天然地具备了最为强烈的革命性特质，是推动社会变革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主体力量。在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实现阶级觉醒，深刻洞察到自身与资产阶级在经济结构、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地位等多方面存在的根本性对立，清醒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使其以高度的自觉投身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伟大斗争之中。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构建新的生产关系。继而，充分发挥政权的引领、组织与保障功能，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大力发展生产力，为逐步迈向共产主义社会构筑物质基础。

走进社会基本矛盾，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为人们提供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为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趋势提供了锁钥，又立足于资本主义“实在”，阐明了其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并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归宿，强调在这一过程中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作用，进而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做了预测性的描绘。

二、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把握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历史生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以解决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制度建设、国家治理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进一步提出战略规划，到2035年达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的目标，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②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定决心与有序规划。党的二十大在回顾历史成就时指出：“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贯通历史和未来，继续瞄准阶段性目标，并强调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同时，提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适应性问题。

从提出和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提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彰显了我们党对国家治理的针对性、实效性、目的性等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以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及其运动规律中找到答案。

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为例，这一规律规定了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从而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就新质生产力而言，其表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等，当然，这些内涵本身亦构成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诉求与内在动力。我们党遵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④通过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推动实现“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⑤以实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从这个意义来说，遵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使得前者的改革有了内在依据与目标导向，更加注重生产关系改革的实效。

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的理论规律与实践逻辑审视，可以看到我们党提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机理。我们党在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改革都有必须相适应的内容，在“适应”中，要规避改革的理想化或急于求成、盲目自满、故步自封的倾向。就国家治理而言，也必须如此。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将国家治理的评价和社会发展的实效联系起来，聚焦国家治理能否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78页。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3-24页。

③《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8页。

④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⑤《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发展、能否更好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使得国家治理更具依据；将国家治理的内容和社会发展的的问题联系起来，使得国家治理的重点和策略精准导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有的放矢地解决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产业升级困境、科技创新中的瓶颈制约、社会民生领域的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将国家治理的模式与社会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创新国家治理模式。如此，在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规定下，“国家治理”的实效性得以充分彰显，使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当代社会发展）这一主题。

三、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把握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内在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①这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与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相结合而提出的科学认识，为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间的关系提供思想基石。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出了关于“两对矛盾”间关系的经典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为“借口”，长期满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的机械决定论思想，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曾僵化了社会基本矛盾“决定和被决定”的原理。但是，这一观点具有特殊的语境，具有高度的哲学抽象性，并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视之为一切社会都要遵循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强调：“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③“一切都是相对的”。^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内在关系的一般形态或理论形态呈现于人们面前，他们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也指出社会基本矛盾要素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相对性。

“两对矛盾”的内在关系在实践中彰显其特殊形态。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如理论预设的那般率先在生产水平较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而是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且生产关系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取得突破并蓬勃兴起。这使得所谓落后的国家在所谓先进的西方国家发动侵略时，最明确地感知旧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束缚。在这种特殊情境下，人们渴盼通过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革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构经济基础。此际，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被置于“支配性”地位。毛泽东同志曾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⑤这种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看法和办法，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越来越彻底地暴露在人们面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通过改革来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

① 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第1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0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①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就是要求从整体上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呈现出作用与反作用的现实过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深刻理论阐释,还是我们党基于社会主义实践总结的宝贵经验,都要求我们把握“两对矛盾”的“作用和反作用”,为当前把握“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内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社会发展状况决定国家治理的变化、发展,社会发展迟早会引起国家治理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是从“作用”的角度加以把握。谈及国家与社会的问题,人们常常想到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决定社会”的唯心史观国家观的超越,提出唯物史观国家观,“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②这可谓是马克思对社会与国家逻辑关系的经典表达,内蕴着“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对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各种国家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对“国家治理”决定于“社会发展”的把握,还应在唯物史观国家观的基础上,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中体悟。从事实来看,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古代那种松散无序、主观随意且效率低下的国家治理模式捉襟见肘,于是,注重效率提升、追求规范有序、秉持标准统一的科学“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在当今社会,在科技的加持下,社会快速发展且风险性日益凸显,国家治理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又形成新的不适应性,这已然成为横亘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挑战,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矛盾。这种矛盾迫切呼唤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展开全方位、深层次的调整与优化,与社会发展形成新的适应;否则,社会将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甚至对社会稳定、国家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发展‘作用’国家治理”这一关系在实践中历史的具体的展开。

国家治理对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具备较为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较为强劲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国家,往往能推动社会发展进程,而消极的或缺失的国家治理,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巨大掣肘与严重阻碍。从历史来看,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独立,满怀憧憬地踏上现代化建设征程。然而,一些国家迟迟不能步入现代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治理远远跟不上发展的需要。这些国家存在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社会治理体系薄弱等问题,难以有效配置资源、维持社会稳定、解决复杂矛盾、满足多元诉求,致使其长期在贫困、落后与不稳定的困境中徘徊挣扎。近年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因深陷“去国家化”“去监管化”等治理误区,而面临经济危机频发、失业率持续攀升、新兴产业发展缓慢等难题。逻辑与历史都告诉我们,国家治理能反作用于社会发展。我们党秉持前瞻性思维与战略性眼光,积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统筹部署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文化、民生、生态文明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目标保驾护航。国家治理“反作用”于社会发展这一关系,贯穿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已经推动并将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国家治理要同社会发展相适应,而绝不能本末倒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时,对于为何变革生产关系而非生产力提出了经典论断,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③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生产力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通过不懈努力所累积获取的文明结晶,它直接关联着现实的人类利益,是人类社会存续与进步的物质基石。而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以生产力为根基构建起来的利益分配关系。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矛盾时,必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3-44页。

然对现有的生产关系进行变革。如若相反,就如同资产阶级在某些历史阶段为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惜采取销毁大量商品、阻碍技术创新推广等手段,从而对既有的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这种行径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最终会导致社会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亦是如此。社会发展本身就是指社会朝着更高级、更完善、更公平正义的方向进步,如果社会出现停滞、无序甚至倒退,那显然不是发展,而是开历史倒车。最关键的是,社会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是人的素质不断提升、人的价值不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逐步推进的过程,社会发展决不能损害人的根本利益,因而其不能被强行扭曲以迎合某种僵化的治理模式。国家治理必须围绕社会发展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促进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否则国家治理就会失去意义。

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是一个动态过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这种“相适应”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而是动态过程,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就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而言,也要把握二者的动态关系。社会发展是持续性的,在发展中,“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并非一帆风顺的,就当今社会而言,我国处于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但是仍存在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未完全理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等问题。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要求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打通束缚社会发展的堵点卡点,进而继续推动社会发展。这是当前的事实,也是前进的逻辑,即“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社会发展”螺旋式上升,逐步迈向“相适应”的更高阶段。

无论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还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其内在关系绝非单向的、机械的简单决定论。它们置身于一个复杂而精妙的动态系统之中,在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中,实现共同发展,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四、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之于社会基本矛盾的重大创新意义

“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不可能脱离用基本矛盾学说理解之、把握之,只有将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的认识和理解贯穿于分析“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这一新的命题中,才能更好体悟其历史生成、内在关系,以及其对基本矛盾学说这一“原理”的创新意义。

(一) 进一步彰显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及其运动规律中的主体性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使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人的主体性更加凸显。

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及其运动规律,具有高度抽象性。从表层看,各要素以及矛盾运动仿佛远离社会主体的具体实践,似乎是一种概念层面的逻辑演进。但深入其本质,就能把握贯穿其中并起着关键作用的社会主体及其实践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强调,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②这表明了历史并非超自然力量的杰作,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无论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是变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容,无一不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中的基本事实,从唯物史观这一整体可加以把握。

然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曾在一段时期内被片面且错误地理解为与社会主体无关的存在。譬如,将那些从具体而生动的人的实践和人类社会中抽象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仅仅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把它们相互交织的矛盾运动描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0页。

绘成独立于人的实践的客观景象。如此，社会基本矛盾规律成为了与社会主体无关的铁律，但是，这种所谓的铁律所能提供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阐释，仅仅在事物的外在表象徘徊，难以揭示出改革实践背后所潜藏的深层次因素与复杂逻辑。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这一原理，创造性地总结出社会主要矛盾，将人民在不同阶段的需求置于矛盾的关键一面，从“现实的人”出发研究社会矛盾问题，对避免“纯粹客体化”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做出了重大贡献。

“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使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主体得以更加深刻得彰显。就国家治理而言，在我们党的语境中，其既包括国家治理体系（上层建筑的范畴），也包括国家治理能力（强调社会主体的历史主动）。就社会发展而言，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纯粹客体运动过程，而是人的自我创造过程，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因而，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理论框架中，可以看到“现实的历史的人”的“感性活动”，可以看到社会基本矛盾被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可以看到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推动各项治理事务，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即社会主体发挥历史主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也可以看到，以现实的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依据、以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为目标的价值追求。总之，“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突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主体性。面向未来，坚持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立场，必将激发人民群众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于改革与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

（二）进一步赋予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及其运动规律新的时代性

“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赋予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鲜明的时代性。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从哲学高度洞察社会发展的理论条件，其生命力在于持续不断的理论创新。而且，怎样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由于未遇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并未给出具体答案。这一任务便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这个问题，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与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注入时代活力，使之更加有的放矢地指导中国社会发展。从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关于突出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作用的观点，到邓小平同志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股份制改造等理论，到江泽民同志强调“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最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再到胡锦涛同志指出“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系列思想观点，就是我们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赋予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新的形式和内容的生动体现。正因党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深刻理解与创新运用，我们才成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在较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

“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成果，赋予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契合时代需求的形式与内容。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即基本性质没有变。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具体表现和解决方式发生了变化。它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在实际工作中，要求协调好国家整体和各地区局部的发展平衡，要求兼顾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要求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处理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工作，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概念”上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和文化）改革的范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系统集成，要求改革贯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等方面，^①是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那一方的进一步展开和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5页。

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得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三）进一步表达社会基本矛盾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意义

如前所述，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及其运动规律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本趋势，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不断展开，推动人类社会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实现自我更新与发展，向着更加文明、进步的方向迈进。恩格斯曾说：“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①如果科学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必将是各种社会形态下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社会发展画卷，甚至是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图式。

不过，一些西方的理论家似乎“看不到”社会基本矛盾之于社会发展的推动意义，他们宣称在某个特定的社会形态或政治制度达成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便抵达了终点，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终结论”就是典型代表。而走进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及其运动规律，就能识破这种观点的荒谬本质，它只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是西方国家为霸权主义披上的合法化外衣，只能导致人们陷入了社会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困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②我们党在正确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将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为最大的政治，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握人的需要层面发生“质”的飞跃），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将“社会发展”在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整体中的地位与角色凸显出来，将“三个更好相适应”落脚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共同指向了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都进一步彰显了社会基本矛盾所指向的发展趋势，彰显了社会基本矛盾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意义。当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社会发展的终点，我们党必将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着人的全面发展、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持续前行。

总之，“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原创性命题。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根柢，因而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马克思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正确认识和科学理解“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丰富内容和内在逻辑，进而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变化，更好推进社会发展。

责任编辑：王 冰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②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第1版。

学术聚焦

· 阐释学研究 ·

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的理论探索

——张江教授访谈录

本刊编辑部

〔中图分类号〕I02; 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009-09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张江教授长期致力于阐释学和文艺理论研究。近十年来，张江教授以“强制阐释”概念凝练当代西方文论的问题特征，以“公共阐释”概念揭示阐释的理想形态，由训诂入手重审汉语中“阐”“诠”“解”“释”等具有阐释学方法论意义的基本概念，构建知识论与价值论相统一的阐释论，为探寻中国阐释学的自主道路贡献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在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的理论探索中，张江教授的阐释学研究兼具批判与建构，既有对西方阐释学理论的辩证吸收，又有对中国阐释传统的深度开显。那么，“强制阐释”的提出是基于怎样的思考？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的发展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从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批判走向了对汉语阐释学概念的考辨？为什么要在阐释学的基础上提出阐释论？这个探索过程体现了怎样的学术思维？带着这些问题，本刊编辑部对张江教授进行了访谈。

一、当代西方文论的问题反思

问：近代以来，我们的文艺理论受西方影响巨大，但从没有人从思维方式上反思过西方当代文论建构的根本缺陷，您从对西方文论阐释方式的反思入手，提出了强制阐释是西方当代文论根本特征的观点，这在文艺理论界是振聋发聩的。回顾强制阐释论的理论提出过程，您对当代西方文论有何新的评价？

张江：本着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关注，我认真阅读了相关教材和著作，有了非常深刻的体验。改革开放以来，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如潮水一般涌到国内，被学界普遍地认知和接受。这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从知识论的意义上讲，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知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发展和进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作用是无可否认的。如果没有 40 多年来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学习和借鉴，我们的文艺理论不会有今天的水平。尽管对西方文艺理论有各种各样的批判，但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思想精华和优秀学术成果。做好“第二个结合”，我们要更加注重对中国古代传统和经验的总结，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世界各民族思想精华的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这要求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建立起对外开放的信念。

另一方面，从思维方式上讲，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文学、文学理论、文化、

文明的认知，是一种颠覆性的解构。颠覆性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课堂、会议、课题，离开了西方文艺理论就没法讲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被冷落在一边。文学是什么，文艺理论是什么，文学到底有什么社会功能，文艺理论有什么指导作用，我们应该坚持一条什么样的理论路线、认识路线，这些问题都被彻底地颠覆了。西方从形式主义开始一直到后现代的文艺理论思潮以至于哲学思潮，占据了我们的全部认知。学习西方是必要的，但是学到这个程度就要警惕了。这让我有了很强烈的问题意识，这也就是写作《强制阐释论》的问题缘起。

问：从强制阐释论的提出，可以看到您的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不仅立足于学术史，更植根于开阔的时代语境，体现了您的现实关怀。请问学术研究如何做到真正有问题意识呢？

张江：所谓的有问题意识，就是当我们置身于一个场域、语境中的时候，要有对于问题的敏感性。首先是要对现实、现象、理论体系、理论进展有自己的挑剔眼光。当我们因新理论、新话语而不断激动的时候，在一片大好形势中更要有问题意识：那些统治着、左右着我们的话语有什么问题吗？它在给我们带来进步意义的同时，是否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颠覆思维方式的重大问题？同时，要对置身于场域、语境中的自己有问题意识。在被西方文艺理论裹挟时，我自己是什么姿态？我对这种裹挟有没有警惕？如果有，警惕在什么地方？有了理论上、思维上自我反思的问题意识，我们才能发现问题，才能在常识当中看见非常识的东西，才能在各种理论裹挟的潮流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问：学术研究不能停留于概念的思辨，更重要的是要有学术史的眼光，您是如何通过对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历程的追溯发现其思维方式上的根本缺陷的？这种追溯是否体现了您在理论建构方面的某种追求？

张江：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认为，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可以划分为以作者为中心、以文本为中心、以读者为中心三个阶段。第一，以作者为中心。19世纪及以前是以作者为中心来研究文学、文本、理论，以文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主要指向。如果要研究巴尔扎克的小说，就必须研究与巴尔扎克相关的历史传统和社会语境。第二，以文本为中心。20世纪初期的俄国形式主义以文本的形式和技巧为中心，是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第一面旗帜。以文本为中心的还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新观点、新概念，有文本细读等各种文艺批评的方法。第三，以读者为中心。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兴起。随着现代科技、现代社会一日千里地迅速发展，各种问题让我们对未来的确定性、人类的确定性努力产生怀疑，于是读者理论才能张扬起来，才会主张“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特别是伴随着后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无尽泛滥，对于科学、本质、信念的知识论的确定性追求被不断地瓦解。读者中心论张扬读者的作用，认为读者赋予文本意义、文本意义由读者决定。这在哲学上意味着什么？真的是让普通读者说了算吗？其实，读者中心论并不是让普通读者说了算，而是理论家以读者的名义让理论家自己说了算。我认为，主张读者中心论的人明白本质、作者意图、文本本义是在的，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的思想力量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否定的，所以他们要完善自己的理论，为自己辩护。

我有一个判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的兴起为标志，西方文艺理论、哲学理论进入了以理论为中心的时代。什么是以理论为中心？就是理论左右实践，理论创造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理论高于实践，实践要由理论检验，而不是实践检验理论。反本质主义和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文艺理论，违背对本质和现象关系的认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这彻底颠倒了人类的基本认识，特别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认识。这种理论鼓吹读者可以对一个文本做无穷的阐释，认为没有作者本意，也没有边界约束。一方面，它让理论泛滥起来，理论成为了最高标准；另一方面，它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且显得理直气壮。但是，反本质主义认为世界都是散乱的现象，没有本质，不能寻求世界的

本质或者规律。然而认为“世界没有本质”，不就是在说世界的本质吗？主张反本质主义，其实就是在主张一种本质主义——“世界没有本质”的本质。许多理论所体现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思维方式。又如，主张“言不尽意”者，言尽意否？主张“言不尽意”者，如何表达其意？如果不能尽意，如何让他人认知？如果把“言不尽意”理解为对语言张力的认可和敬畏，我是赞成的。但我的基本想法是，造字的目的就具有确定性，每一个文字都有它确定的意义。如果一个字造出来后不能把意思稳定下来，造字还有什么用呢？当代西方文论基本上左右了我们40多年来的文艺理论走向，当代西方文论如此地统治我们的认知，颠覆我们的思维方式，这是应该反思的。

二、“强制阐释”的概念提炼

问：中国学界在引入西方文艺理论的同时，也对其展开过具体观点的评价，其中也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但您的反思是从根本的思维方式入手，最终提炼出了“强制阐释”这一标识性概念，可否具体阐述一下您的思维过程与其他学者的根本区别？

张江：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的反思，有一种表达方式是虽然有问题意识，但不做认真的理论反思。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短处，那就对它们一个一个地进行批评。而且很多批评还是在进行遮掩：总的立场和目标是认同西方文艺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再挑一点小毛病。另一种表达方式就不再是逐个地批评，而是要在阐释学的意义上进行概括和总结，得出一个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阐释学的概念。这两种表达方式涉及思维方式的区别。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弊端，就是从商品入手开始研究，从具体到抽象再到理论的具体。对于西方文艺理论，如果只是一个一个地去批评，就没有一般性，就缺乏生产标识性概念的意识。我当时就明确地意识到，要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要有广泛的覆盖能力和解释能力。

为了找到这个概念，我就再去认真地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我看到它们的普遍特征是，站在自己的理论立场上，罔顾事实和本相和基本意义，用自己的理论去强制或强暴各种具体现象，用自己的理论目的去解决文本的意义问题、现象的认知问题、世界的把握问题。比如，弗洛伊德把各种事情都分析为俄狄浦斯情结，站在自己的理论立场上，用理论宰割现象和事实，让现象和事实服从理论。在思考各种理论的过程中，我抽象出了“强制阐释”这个概念，从阐释学意义上讲它们的强制性。

问：一个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必须有明确的内涵，才能真正立得起来，您对“强制阐释”基本特征的概括是非常精辟的，能够让人一下子领悟到这个概念的穿透力，可否阐述一下您是如何琢磨这个概念的？

张江：《强制阐释论》最初只写了强制阐释的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等4个特征。等到《文学评论》要发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还没有给出什么是强制阐释的定义。不是把对象形容一番就可以了，也不是把现场摆出来就可以了，而是要有明确的定义。这是我对自己的问题意识。如果没有明确的定义及其内涵和外延，概念很难站得住脚，号召力就不在了，或者说就没有概念的意义了。

我对“强制阐释”的定义是：“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第一，背离文本话语，当代西方文论是离开文本来讲的话。第二，消解文学指征，讲的不是文学。比如，女权主义要借文学文本来谈政治的、社会的话。第三，更要害的是前在立场和模式。在分析文本、认识文本、对文本进行批评以前，立场就已经定下来了。前在模式有很多种，比如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格雷马斯的矩阵模式，用数学的方法设立了叙事学上著名的“符号矩阵”。第四，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阐释者的意图已经先定下来了，对文本内容的阐释必须符合这个意图。这四句话就标明了“强制阐释”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

问：曾有一种声音质疑，“强制阐释”的提出本身是不是一种强制阐释，请问您如何回应这种质疑？

张江：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是从理论出发而不是从现象和事实出发，是先有前置的立场才对现象进行研究。而我是广泛地、细致地研究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形态，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对现象和事实做了研究和把握，在现象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不是从一个现成的理论里生出一个观点，再拿这个观点去看事实。这和强制阐释在路线上有根本性的区别，是完全不同的。在《强制阐释论》之前，我先在《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发表了《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析——兼及中国文论重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局限进行了辨析，在西方文艺理论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在分析当代西方文论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我抽象出了“强制阐释”这个概念和它的4条特征；然后再从抽象到具体，再去看当代西方文论，证明我提出的这4条特征站得住脚，符合当代西方文论的现象和事实，而不是强加给它的。所以“强制阐释”这个概念我理直气壮地讲了10年，问心无愧。

问：“强制阐释”这一概念提出10年来，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一个标识性概念。您认为提炼标识性概念对于学者的理论自觉有何意义？

张江：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标识性概念，有自己的标识性概念才能有自主的知识体系。一个民族的庞大知识体系的结构以概念为核心，以概念的论证、范畴的增长、范式的革命为标志。正如前面谈到的，“强制阐释”这个概念的提炼过程，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做一般的抽象，从一般的抽象上升为概念，以范畴掌握头绪，由抽象进而实现理论的具体化。所以，“强制阐释”这一概念的提炼过程，对于做学问的问题意识，对于学者抽象自我的努力，应该是会有启发的。当然，对于“强制阐释”这一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赞成还是批判，我都期待大家能再认真地思考和讨论。

三、“公共阐释”的形态开显

问：在提出“强制阐释”之后，您开始深入到对阐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2017年发表了《公共阐释论纲》，2022年发表了《公共阐释论》，“公共阐释”成为您提出的又一个标识性概念。可否回顾一下“公共阐释”酝酿的具体过程？

张江：如果不做强制阐释，应该主张什么样的阐释呢？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提出“公共阐释”以前，我局限于对文本本身的依赖，曾在《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这篇访谈中提到了“本体阐释”的想法。但我同时意识到，第一，哲学上有“本体”概念，对文本做本体阐释这个提法本身就不是哲学的提法；第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已经讲了本体论阐释学，但我说的“本体阐释”和他们又并不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我在那篇访谈以后就没有再提“本体阐释”。

对于强制阐释而言，认为它好或不好是很表面的认识。从阐释的结果看，强制阐释也可以很高级，也可以阐释出非常好的理论和文本结果。从结果来判断是不是强制阐释讲不清楚，所以才要从方法上、立场上讨论是不是强制阐释。更进一步地看，强制阐释可以强制千千万万的现象，得到千千万万的结果，那么，这些结果有真假对错吗？真假对错的标准是什么？“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观点，就是认为阐释的结果不可证实、不可证伪。这就提出了问题：评价阐释的标准是什么？因此，我就要从阐释学的意义上讲清楚阐释是干什么的，要讲清楚阐释的本质、阐释的目的、阐释的动力、阐释的标准、阐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强制阐释论》以后，由阐释的本质和标准而起，要建构一个能够有覆盖力和说服力的阐释学的体系。这就是提出“公共阐释”的问题背景。

问：如您所说，阐释的本质和标准是阐释学体系性建构中的核心问题。那么，在公共阐释的理

论视野中，您如何看待阐释的本质和标准？

张江：从心理学意义上说，阐释是阐释者的自我确证；从社会学意义上说，阐释是为了争取承认而斗争。为什么要阐释？阐释就是阐释者要把对于世界、现象、生活的万千情感、体验、认知表达出来，让别人同意和接受。争取承认就是阐释的本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意这里的措辞，不是群众掌握理论，而是理论掌握群众。马克思要阐释，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堕落、黑暗、异化讲给群众听，然后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追随他的理论去改变世界。这就是理论掌握群众。理论要争取承认，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了不起之处就在于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有的诗人说自己写的诗是给少数人看的，给自己看，给一两个朋友看。那他为什么还要把作品印刷出版、签字售书呢？这还是意识主体为了争取承认的自我确证，是希望别人赞成自己对世界、现象的体验。

讨论阐释能否争取承认，就是讨论阐释的有效性，就是在争取承认的标准下看阐释是否有效，能否实现阐释的目的。进一步的问题是，承认是在什么层次上的承认？达到什么范围和程度是承认？一个人承认没有用，首先要在一个行当里得到多个意识主体的承认。多个独立意识主体组合起来，这就叫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不是社会空间。公共空间是一种自愿的自由的空间，大家对一个问题感兴趣就进来讨论，不感兴趣就可以离开，“百家争鸣”结构的公共空间是最好的例证。我们对一个共同的问题感兴趣，自愿在自由、平等的公共空间进行讨论，期望得到共识，得到别人的承认。承认的形式是什么？思想投票。我如果赞成你，我们就一起再去说服别人。凭什么赞成你？凭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我们把握阐释有效性的根本准则。当然，公共理性承认的东西未必是真理。公共理性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建构和演进，它总体上说是进步的，但也非常复杂。如果把海盗集团作为一个公共空间，他们的理性就不是好的理性，他们的抢劫行为也是经过理性选择的，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和值得的。所以，公共理性是有层次和结构的，公共理性越复杂，接受的人越少。比如，不能打人骂人，对人要有礼貌，这是各个国家普遍承认的；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美国人就未必认可。

问：您在《公共阐释论纲》中将“公共阐释”的概念内涵界定为：“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这是对于概念界定的又一经典范例，大多数学者一般很少如此认真地对待一个概念的内涵，可否请您阐述一下您是如何从这几方面展开这个概念的？

张江：第一，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历史前提，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前见”，用老子的话说是“前识”。没有历史前提，没有对以往经验的共识，就无法阐释。简单来说，至少语言要相通，要遵守共同的语言规则。从语言规则以至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制度，都是历史前提。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各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历史前提。比如，东西方社会生成的思维观念是不同的。中国哲学偏重伦理学，重视应用。中国的礼仪非常重要，生存方式决定了伦理观念具有根本重要性。西方哲学强调爱智慧，喜欢抽象的思维游戏。夏商周的时候中国人就对天文进行观测，然而西方发展出了现代天文学，中国为什么没有呢？西方观测天文是对现象好奇，要弄明白它是什么而不关心它能干什么，中国古代观测天文则是要为统治服务。墨子提出“以类取，以类予”，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三段论”。各民族的智慧不同，没有高低之分，但是，这种社会生成的观念差异决定了我们在阐释观上是有分歧的。

第二，以文本意义为对象，进而以现象为对象，以世界为对象，包括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在阐释学意义上，对象的确定性很重要。对象是清晰的，不能经常地变换对象，不能用别的对象的意义来替换这个对象的意义，不能以别的对象的意义强制说是这个对象的意义。

第三，必须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生产对于对象的理解，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但你只能这样。比

如，语言背后的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需要有足够长的时间才能懂得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翻译外文著作时经常要用括号将外文词语的原文标注出来，海德格尔有时在著作中也要将拉丁文、希腊文的词语原文标出来。

第四，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阐释是有边界约束的。公共阐释是可公度的有效阐释。可公度，就是我说的话你能懂，别人也能懂。如果让别人承认你，首先得让别人懂你，否则就不可公度。

问：公共理性与公共阐释在您的理论体系中似乎是一对孪生的概念，公共理性在“公共阐释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您是如何认识公共理性以及它对公共阐释的意义的？

张江：用康德的话来说，公共理性是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我的理性观是，从人有理性开始，个体理性和公共理性是同步生成的。有人认为公共理性是在个体理性之后生成的，我并不这样看。理性本身就应该是公共的。肉要煮熟了吃才好，这是一种理性认识。这种理性是能够沟通的，在我们人类还是野人的时候就都承认了。如果不这样，人类的共通感就没有了。没有共通感，怎么会有理性呢？共通感就是原始理性、原始思维。因为沟通而生成理性，不沟通就没有理性，就像因为沟通生成语言和文字一样。所以，个体理性和公共理性是同步生成的。

有了公共理性，公共阐释才有实现的可能。具体来说，一个人阐释一个问题，这只是他的私人话语，只是独立意识主体的个人意见。公共阐释是公共理性承认的阐释，是私人话语的公共性实现。私人的话语不是公共阐释，但所有的公共阐释都是由私人话语引起的。那么，私人话语如何变成公共阐释呢？为了使自己的私人话语得到承认，意识主体就要说服别人，也就是要在公共空间中，使私人话语以公开运用理性的方式被其他理性接受。把私人话语上升、过渡为公共理性承认的公共阐释，就实现了私人话语的公共性。

问：相比其他人文学者，您的理论追求有着强烈的科学性特征。对于公共阐释，您不满足于对概念内涵进行质的界定，同时也希望从量的分布来呈现这一概念，这是非常有特色的，借用数学来说明阐释学概念，您是如何做到的？

张江：公共阐释的表现形态是与“强制阐释”“公共阐释”这两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什么样的阐释是有效的？说服别人的有效边界是什么样的？公共理性的接受是什么形态？我的提法叫阐释的正态分布。

所谓正态分布，即一钟形对称曲线，依曲线最高点向下横轴作垂直线，以此线为中心，钟形曲线两边呈对称状态，平滑均匀下降，开口逐渐扩大，无限趋近于横轴，曲线与横轴间面积为1。其中，横轴为现象或文本呈现，中线为公共理性对现象或文本意义的期望或可能接受结果，全部独立阐释的结果分布于曲线面积之内。当阐释者的独立阐释与公共理性期望相差较小，其概率方差抽象为1，此类阐释所占面积将接近全部面积的70%，即70%以上的阐释服从于公共理性的约束，约束于公共理性期望域之内。这就是公共阐释具体的形态展示，或者说是公共理性接受的有效性阐释的正当形态。

我在论述阐释的正态分布的同时，还将阐释的有限和无限问题描述为“阐释 π ”。像 π 在3.1415和3.1416之间一样，阐释是有限的，脱离这个区间的阐释就不再是对此对象的阐释；像 π 的小数位数无限一样，对于文本的理解可以无限地展开。但是，再无限，无限也是在有限当中展开的；再有限，现象的呈现和内在的理解认知也是无限的。用数学上的 π 来描述阐释的有限和无限问题，用正态分布来讨论阐释的公共性问题，虽然可能还很粗糙，但是可以对阐释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对阐释的有效性作一个比较具象的呈现，将形而上的抽象幻想变成具体的形态表达。

问：从“强制阐释”的“破”到“公共阐释”的“立”这一理论建构过程中，您感受比较深的是什么呢？

张江：总的来说，有两方面的感受。首先，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的发展，对问题和路径的思考，不是简单的语言技巧问题，而是有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阐释学的重要交叉背景。同时，“公共阐释”的理论影响还不像“强制阐释”那样大，这也可见批判容易建构难。比如，英国的约翰·汤普森跟我讨论，为什么叫“公共阐释”而不叫“社会阐释”？那么，我就要分析公共和社会品格如何不一样。马克思讲市民社会，用社会来指公共。如果要建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包括对公共理性的界定在内，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公共阐释”的道路非常不容易。

四、中国阐释学的体系建构

问：在进行“公共阐释”理论建构的同时，您对“阐释”这一概念本身进行了深入的考辨，尤其是立足于中国的语言文字，开掘了一系列具有阐释学方法论意义的概念。比如，2023年出版的《阐释学五辨》已经包含了“阐”“诠”、“解”“释”、“理”“性”、“通”“达”、“衍”“生”等5组10个概念，后来您又继续讨论了“公”“共”、“识”“见”、“义”“意”、“表”“演”等4组8个概念。这些概念的考据不是零散的，背后展示了您系统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努力，您对这些概念做训诂考辨和理论阐发的初衷是什么？

张江：写完《公共阐释论纲》之后，我曾感觉自己江郎才尽了，用西方的眼光看阐释学似乎走到尽头了。怎么办？我就琢磨中国人怎么理解“阐”“诠”“解”“释”等概念，我想脱离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阴影”的笼罩，以期有一个中国阐释学话语的概念体系、命题体系、范畴体系，乃至中国阐释学的范式革命。所以我就先写了“五辨”，又写了“四辨”，现在正在撰写《“真”“诚”辨》。我希望完成“十辨”，之后再贯通起来写一个总论。

为什么说要贯通起来？因为这些阐释学的基本概念之间可以相互说明，这套思想在体系上是自洽的。举例来说，“阐”对应表演之“演”。“演”是推演、演绎，“演义”是由“义”演出“意”。阐者，开也，这和新意之“意”、表演之“演”在逻辑上是一贯的。诠者，表也；表者，义也。“诠、表、义”在逻辑上也是自洽的。它们共同都是理性行为，都要在通达的意义上实现其公共性，其标准是公共理性的接受。在“诠”的基础上“阐”，这和由“表”而“演”是对应的。为什么叫“表演”不叫“演表”？为什么有“演化、演进”而没有“表化、表进”？这都说明，汉语概念结构的阐释学话语体系是自洽的，不是我编出来的。汉语的这种语言方式和西方的语言方式不一样，相应的思维方式、逻辑方式、哲学追求也不一样。

问：任何具体理论的创新背后都有更深的思维动机，您在《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1期发表了《关于阐释论的提纲》，展示了您通过阐释论将知识论与价值论沟通起来的宏大抱负，您为什么要在阐释学的基础上提出阐释论？它和中国阐释学体系建构的关联是什么？

张江：我们前面讲独立意识主体的私人的话语怎么转换、上升为公共阐释，实现其公共性，这还是在独立意识主体的单个体的意义和状态下讲阐释。海德格尔说阐释是存在的形态，是此在的展开与实现。如果我们想研究阐释的本体论意义，应该怎样介入它？中国的阐释学不能只停留在独立意识主体关于理解和阐释的具体过程上，应该在整个人类精神科学的形态和方法上去讨论阐释。

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命题。知识论是自然科学的倾向和立场，它给出的认知结果是以知识形态出现的。知识形态是可验证、可重复的。精神科学能够给出这个东西吗？几千年间，有很多反对孔子的人，但这不影响孔子是孔子。精神科学给出的，是主观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价值判断，而不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不可改变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知识。那么，精神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就是生产价值判断的学科，而不是生产知识的学科。如果是从可验证、可重复的意义上讲，它不是一种知识论方式的研究。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为什么会对立？如何解决这种对立？这就给我们提出问题。第一，知识论的知识没有价值吗？没有价值的知识会是知识吗？比如，哥白尼说的地

球围绕太阳转，现在是天文学的基本常识，这不是地道的世界观、宇宙观吗？宇宙观也就是本体观、价值观。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知识怎么会没有价值？没有价值的现象和问题不会进入科学家的法眼。如果对人类生存和进步没有意义，科学家不可能去研究它，这说明知识本身是有价值的。第二，价值能不能成为知识？如果价值不成为知识，价值怎么会流传下来呢？孔子的价值判断“三人行，必有我师”，在今天就是知识。“花是红的”，这是知识；“花是美的”是个价值判断，但现在也已经是知识了。一个人给爱人送花，还需要专门解释“花是美的”吗？这已经是确定性的常识了。个体的私人判断经过公共理性的组合，然后大家就把这种判断变成了知识。

阐释论就是知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知识和价值本来应该是统一的，不应当把它们分开。将知识和价值统一在学理上，阐释就是桥梁。知识阐释成价值，价值阐释成知识，在这个桥梁上知识和价值是一致的。阐释论有两条很重要的主张。第一，在本体论意义上，阐释是精神科学存在的唯一形态，没有其二。轴心时代的理论生产就是阐释，后人对轴心时代的理论再进行新的阐释，后人的阐释构成后来的学术思想和著作。第二，阐释是精神科学生产的唯一方式，没有其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阐释出来的，我们现在说亚里士多德也是在阐释亚里士多德。怀特海说整个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学说的注脚，也就是说西方哲学在阐释柏拉图。

问：回顾您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的理论创新历程，您对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前景有什么展望？

张江：我的整个思考过程，是从批判西方文艺理论入手，提出“强制阐释”和“公共阐释”的概念，再提出阐释论，中间还有一个主线是对中国古代阐释学实践和经验的总结，对汉语中若干阐释学基本概念的辨识。写完《公共阐释论纲》，我觉得自己能够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在想什么事情；写完《关于阐释论的提纲》，在知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上对阐释有一个新的理解，我觉得自己可以摆脱他们的“阴影”。所以，凭借“十辨”的20个阐释学基本概念，以价值论和知识论的统一来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基本框架，应当是有把握的。

五、面向“自我”的学术思维

问：通过您对于学术发展历程的回顾，不仅对当代阐释学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更重要的是，您示范了一种做学问的思维方式，如何概括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张江：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再到阐释论，如果说我有一点学术上的体会的话，我的总结是问题自我、抽象自我、交叉自我、清醒自我，也就是一种面向“自我”的思维方式。

问：您提出的问题、抽象、交叉、清醒这四个关键词，对于青年人如何建构自己的学问无疑是有深刻启发的。当代学者治学似乎越来越专，越来越窄，很少从宏观上反思自己治学的根本目的，更遑论将治学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与不断变化的现实联系起来，让理论真正穿透生活，解释甚至改造世界，请您具体谈谈您这一治学的思维方式特征。

张江：第一，问题自我。问题意识不仅是对于对象的问题意识，更重要的是对于自我的问题意识。要有反思的自觉，有给自己提问题的自觉。我写完《强制阐释论》，立刻就会想，强制阐释有没有真假对错？怎么解决问题？这套话语怎么能自成体系，自我说明，互相建构？我试图提过“本体阐释”，但我马上也认识到问题。我就要问自己：既然强制阐释可能阐释出好东西，那么阐释的本质和标准是什么？因此，阐释的有效性就非常重要。阐释的有效性怎么实现？我要回答自己，就提出了“公共阐释”。公共阐释怎么实现？它要有公共空间，有公共理性，有演化过程，有检验标准。因此，我就要论证阐释的本质、阐释的动力、阐释的标准、阐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这一套话语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洽的体系，体系内部可以相互支撑，相互发生，相互说明。所以，问题意识不仅是去发现他人的问题，更要发现自己的问题。问题自我就是要不断地给自己提问题，不断地挑战自己，要让自己的观点和以前的理论、说法有区别。要自己发光，不要被别人的光笼罩。

第二，抽象自我。要抽象出一个有影响力、覆盖力、解释力的概念，非常不容易。但是，不能因此而放弃，要善于抽象自我。抽象自己，不仅是要呈现出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学术能力和思想能力的训练。要不断地训练自己，不断地把自己学过的东西抽象起来，把它说明好、证明好。如果你听了三个月的课，读了三个月的书，写了三个月的文章，那么你能不能把自己抽象一下：我都听了什么、读了什么、写了什么？这些东西可以用几个词概括起来吗？如果不概括，继续散漫，那么你就不会抽象自己。一定要有抽象自己的意识和自觉，把自己的价值不断地体现出来，不要总是跟着别人跑。你跟着别人跑不是因为别人引导你，而是你主动跟着别人跑，因为你不会抽象自己。我经常抽象自己。我提出“强制阐释”“公共阐释”的概念，就是在抽象自己。我念了七八篇文章，对于这些文章的内容，我也要把它抽象好。抽象出的这个东西，要能覆盖这些文章的主题、主旨，要能适应、符合我对于这些文章的体会，当我把它讲给别人听时要能够说服别人。抽象出的东西要能够承担起这个任务。

第三，交叉自我。我怎么会想到“阐释 π ”和阐释的正态分布呢？我怎么会讨论不确定原理的确定性呢？我觉得我的逻辑训练、工程数学训练还是很好的，对黎曼几何也能有一点体会。所以我才能想到 π 和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想到正态分布和私人话语的公共性实现的关系。我之所以会认为阐释是自我确证，也是因为认认真真地读了心理学的著作。要交叉自我，不要把自己约束、束缚于一条道上。人文学科内部的文史哲要交叉，年轻的学者一定要读哲学的书，掌握基本的逻辑，有起码的哲学训练和逻辑训练。如果研究文艺理论的人每天只是读文艺理论，那就没有什么前途。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要交叉。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要注意科学思维训练，不要蔑视自然科学的方法，要了解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和一般方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前沿成果来开阔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理论敏感性。如果能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得到启发，就更好了。退一步说，即使读不了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书，至少可以读一读社会心理学的书。年轻人一定要鼓足勇气，注意交叉自我，这样才能在前沿交叉中把自己的优势用好。当下要特别关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融合的当代形态。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确实会冲击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在这个大背景下，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更要提高思辨能力和理论水准，把自己训练好、武装好，这样才能把前沿的技术手段用好，否则枉有前沿手段也是没有用的。

第四，清醒自我。清醒自我的一个要求是，要梳理好自己的知识框架。要把自己的知识框架梳理好，明白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知道自己的知识框架还缺少什么。要让自己清醒，去学习自己还不知道的东西。年轻人要具备基本的学科修养，特别是哲学和历史修养，具备广博的、可靠的知识基础和知识框架。清醒自我的另一个要求是，不要写自己不懂的话，这个要求并不低。年轻一代一定要有清醒自我的习惯，要写自己懂的话。回头看看自己写过的文章，每句话都能懂吗？如果换句话能把意思表达好吗？用更平实的话能说明白吗？如果说不明白，那就是在糊弄人。如果所谓做学问总是在说一些糊糊涂涂的话，对得起谁呢？

总之，在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再到阐释论的探索中，我觉得自己不仅是对阐释学入了门，而且可以用汉语、用自己的语言说当代中国阐释学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了问题自我、抽象自我、交叉自我、清醒自我这四句话的意义，所以我愿意把这四句话送给年轻一代的学人。

责任编辑：王法敏

汉语文学的文本特征与中国文学阐释学的建构^{*}

泓 峻 王园园

[摘 要]当代中国的文学阐释学建构,理应包括中国文学的当代阐释学,而建构中国文学的当代阐释学的一条根本路径是面向汉语文学文本。汉语的语言学特征会投射到汉语文学文本当中,成为其民族性的重要表现,汉语文学也有着另外一些稳定的文学特征,这都为面向汉语文学文本建构当代的中国文学阐释学提供了可能。面向汉语文学文本,不仅可以使当代的中国文学阐释学超越古代文学阐释学,也可以使当代的中国文学阐释活动摆脱对西方理论话语的依赖,走出强制阐释的误区。在建构中国文学阐释学的过程中,应该把汉语文学文本作为必不可少的、十分重要的资源对待。

[关键词]文学阐释学 汉语文学 民族身份 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018-06

近年来,阐释学研究在中国十分活跃。随着话题的不断深入,有学者提出了“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的主张。^①沿着这一思路,中国当代阐释学研究把理论探索的触角伸向了中国古代文化,对本土的文本阐释路径、阐释活动所蕴含的独特的精神品格与哲学智慧进行了深入思考,并试图在总结、改造、提升本土阐释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当代阐释学的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文学阐释成为中国古代阐释活动展开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曾经为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许多核心概念与思路。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建构,文学阐释学也不能缺席。而在中国当代阐释学这个框架下思考文学阐释学的问题,存在两个虽然不同却又密切相关的理论路径,一是建立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文学阐释学,即“当代中国的文学阐释学”;二是建立与中国文学,特别是汉语文学相适合的阐释学,即“中国文学的当代阐释学”。“当代中国的文学阐释学”需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不能局限于中国文学文本的阐释,但必须保证面对汉语文学时是有效的;而“中国文学的当代阐释学”不仅需要充分借鉴与吸纳中国古代阐释学的理论成果和阐释路径,而且需要把汉语文学自身的特性作为思考的前提,站在今天的学术高度上,用当代的思维逻辑与科学方法,直面汉语文学文本进行理论建构。因此,在谈论建构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的本土资源时,长期以来形成的丰富的本土文学阐释学理论固然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能够面对汉

^{*} 本文系山东大学中华现代文明建设研究专项重大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关系研究”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泓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园园,山东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山东 威海,264209)。

^① 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语文学文本，从汉语文学文本自身特征出发，去发现与总结适合汉语文学的阐释路径、阐释原则与概念体系。

一、汉语文学的语言学特性是建构中国文学阐释学首先要面对的对象

当我们把文学放在艺术这一概念下进行讨论时，必须意识到使用语言作为媒介的文学与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视觉艺术的美术有本质区别。尽管对声音、色彩与形状在接受与阐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性，但音乐作品与美术作品还是可以直接在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而文学作品只能在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群内直接传播，否则就要被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也是被目的语改造的过程。特定的语言必然为一部文学作品打上深深的文化印记。因此，当我们对汉语文学文本进行阐释时，需要意识到汉语的语言学特征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语言个性是汉语文学民族性的最直接甚至是最重要的表征，汉语文学的其它特征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汉语的语言学特征之上的。

在语法层面，汉语的语言学特征相当突出。语言学界把现存的人类语言划分为孤立语、屈折语、粘着语、复综语四种类型，汉语作为典型的孤立语，不仅与印、欧语言不属于同一种类型，与日语、朝鲜语也不属于同一类型。汉语主要不是通过词形变化来体现词性、时态、主动被动、宾格主格等语法关系；绝大多数汉语词都只有主干，不加前缀与后缀；两个以上音节组成的复合词各个音节相对独立，结构松散，顺序也往往并不固定；词与词组往往没有严格的区分；许多语法关系靠虚词表达；一个句子中的主要成份常常省略。这些语言特点对汉语文学的语义生成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在对汉语文学进行阐释时，“意会”是一种必须引入的解读方式，这并不仅仅是基于文学表达的一般原则。汉语文学中类似“绿肥红瘦”这样的词类活用、“游仙境指迷十二钗”这样的无主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样的省略句、“鸚鵡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梧桐枝”这样的语序十分自由的句子，只有意会的方式才可以获得其所要表达的意义。季羨林说：“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①

汉语文学的表达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对声音层面极为关注。我们今天能够接触到的古典文学作品，都是以书面语形态存在的。但是，对古典汉语文学作品的阐释，不能只依赖书面阅读，许多时候需要把它还原为声音，甚至需要追溯其所产生的时代特定的声音状态，才能真正理解作家的匠心与作品的价值。就汉语诗歌而言，古典诗歌特别是“四声”被发现之后形成的格律诗，如果不明白其中平仄的调配、韵的使用，不能把握一首诗整体的声音结构，只从语义层面去解读一个文本，对一部作品的理解与阐释往往是很不全面的。而平仄的调配、韵的使用等声音层面的因素，体现在汉语文学的各种文体之中。汉语中与“诗”相对的“文”有骈散之分，骈体的句子固然包含许多声音层面的精心组织，即便是散体的句子，也有声音方面的追求：“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诗文不是写给人看的，而首先是要求人们来吟诵的”，“特别讲究文字的音韵之美”。^③汉语写作讲求“练字”，指的是对汉字进行深入揣摩，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而练字就包括对独立音节进行选择、排列、组合。实际上，汉语的音韵之美许多时候包含在由两个以上音节组成的词的内部。在汉语发展过程中，单音节词为主的局面被打破，双音节词与多音节词不断被创造出来。许多双音节词与多音节词在形成的过程中，已经将内在的声音方面的追求固定了

^① 季羨林：《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总序》，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4页。

^② [清]刘大櫟：《论文偶记·十四》，刘大櫟等：《论文偶记 初月楼古文绪论 春觉斋论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6页。

^③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9页。

下来。据统计,汉语同义并列的双音节词,前后两个音节大部分符合先平后仄的顺序,大多数双音节的缩写词如枚马(枚乘与司马相如)、元白(元稹与白居易)、韦柳(韦应物与柳宗元)等,也并非按人物出生时间或重要性来排列词素,主要考虑的是先平后仄的顺序;而在汉语四音节词中,符合平平仄仄顺序的词最多(占随机抽取的400例的178例),符合仄平仄仄(最接近平平仄仄的语感)的词排第二位(400例中的77例),两者之和占到了16种组合样式的64%。^①汉语双音节词的声音之美,最直接表现为双声或叠韵的组合方式。许多常用词,如梗概、宣泄、坎坷、扭捏、冷落等都是双声词,如怂恿、盘旋、荡漾、从容、荒凉、浩渺等则是叠韵词。汉语中有一类双音节词是不可拆分的,叫联绵字。联绵字绝大部分按双声或叠韵的方式组合起来,有些甚至既是双声又是叠韵。这些词的读音不仅作为语言的能指而标示特定的所指,同时也作为一种声音形象活跃在汉语文学作品中,为汉语文学增添光彩。周汝昌提到,类似汉语联绵字这样的建立在语音形象基础上的语言,所传达的绝对“不是器物死的呆相”,从深层上讲,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生命的神采姿致,精神的照射”,其美好神奇很难传达到另外一种文化中去,只有在汉语文化中才能真正领会。^②进行汉语文学的阐释活动,如果读不懂这些,就等于没有真正破解民族审美心理的密码。

汉语的独特性除了表现在语法、声音层面,还表现在汉字上。对拼音文字而言,它仅仅是作为语言能指的语音记录,研究文字主要是想通过文字还原语音,进而索取语义。而汉字在文字类型上属于义音文字,一个书写符号除了通过与特定的语音相联结,借助声音的所指表达意义外,还具有以书写符号的象形、指事、会意等直接传达意义的功能。汉语人名的许多美好寓意就不仅是通过声音传达的,而是同时借助了字形。因此,我们不可用记音的形式将《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写成“贾保玉”,或将“林黛玉”写成“林戴玉”,将“薛宝钗”写成“薛宝差”,因为宝、黛、钗这些字一方面强调了人物尊贵的身份,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人物之间的关系。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对汉字通过字形表义的功能所产生的文学效果十分赞赏。他说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描写山的文字字形中多有山字,描写鱼鸟的文字皆冠以鱼鸟之偏旁,仅从字形上就可以让人体会到山的巍峨,鱼跃鸟翔的气势;郭璞的《江赋》“通篇文字中以水为偏旁者占十之五六”,使得这篇作品“满目滔滔,长江万里,流三江注五湖之象洋溢于纸上”。^③有研究者发现,因失去在音一义之间建立联系而患上“失读症”的病人中,使用汉字的患者还可以在字形与特定的语义之间建立联系,因而保留了一定的书面理解能力,尽管他们可能把“秧”读作“苗”,将“足”读作“脚”;而使用拼音文字的同类患者则完全失去了对书面语的理解能力。^④这表明,使用汉字的人进行书面阅读时获取语义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先将汉字还原为特定的语音,再通过语音索取语义;另一种则是通过汉字的字形表义功能直接索取语义。这提醒我们,当面对汉语文学作品时,汉字这一书写符号也构成一种阐释路径。最近有学者提出的“训诂”阐释学,其中很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汉字的字形获取文本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汉语文学的意义生成与汉语的语法特征、声音结构以及书写系统都有直接关系,语言意识对于我们建构中国文学阐释学是必不可少的。

二、汉语文学特征的稳定性为建构中国文学阐释学提供了条件

即使不追溯口传文学的历史,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可靠文本算起,汉语文学也已经跨越了2000多年。在此其间,无论是文体格局,还是诗、文、词、赋、小说、戏曲等某一文体的具体形态,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总结汉语文学文本的形态特征时,首先要从局部入手,对特定的汉语文学文本进行分析。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具体文本抽离,投向宏观层面时,就会发现汉语文学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

① 参见贺国伟:《汉语词语的产生与定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219-227页。

② 参见周汝昌:《思量中西文化》,《文汇报》1999年5月30日第7版。

③ 转引自申小龙:《文化语言学论纲——申小龙语言文化精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④ 参见尹文刚:《汉字失读的类型与意义》,《心理学报》1990年第3期。

甚至在经历了 20 世纪新旧文学的转换之后，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一些稳定特征，这些特征不仅能够跨越历史，而且能够跨越不同的文体。原因在于，汉语文学除了承载其的汉语的主要语言学特征一直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以及都依托于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中华文化这一母体而生长，还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总是强调“原始以表末”“沿波讨源”，不断地在回溯最初经典中寻找文学的价值依托以及变革文学的灵感。一个古代作家在从事汉语写作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汉语文学的书写传统之中，把之前的经典文本视为自己的写作规范。许多时候，他们要把自己作品文体上的、思想上的根源一直追溯到儒家的“五经”。后世的汉语诗歌一直把《诗经》看作不可逾越的典范，班固甚至认为，与《诗经》中的诗歌在形式上差异巨大的汉代大赋，也不过是“《雅》《颂》之亚也”。^①刘师培在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一书中曾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这也代表了许多古代文章学家的看法。而就文学史的实际情况看，在中国诗、文的发展过程中，汉代的确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汉代的“五言诗”、大赋与抒情小赋、各种实用文体都与先秦的传统，尤其是作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尚书》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另一方面，后世的诗、文、赋都受到汉代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各种文体的名称、分类原则、文章体式，大体上是对汉代的沿用。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仅讲求“文各有体，不能相犯”，而且“不以蹈袭为非”，在写作过程中对传统的文体样式有深度依赖。其结果就是，形态各异、千变万化的汉语文学背后有内在的统一性。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文学的一些整体特征像基因一样延续着，万变不离其宗，穿越漫长的历史，被顽强地保留下来。

比如，中国古代的文本阐释者曾经从《诗经》中发现了赋、比、兴的手法，从《春秋》中发现了春秋五例（也称春秋笔法）。由于这两部儒家经典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这些修辞原则已经融入了后世汉语文学的血脉之中，同时也为中国古代的文学阐释学提供了一些支撑性的概念与范畴。而如果抛开细节上的差异，我们会发现不仅赋、比、兴之间和春秋五例之间在修辞指向与修辞路径上有一致性，而且赋、比、兴与春秋笔法之间也是相通的。赋、比、兴与风、雅、颂作为《诗经》的“六诗”或“六义”被提及，在儒家经典中分别见于《周礼》和《毛诗》。首先对赋、比、兴这一组概念进行系统阐释的，是东汉经学家郑玄。在郑玄看来，赋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是“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②郑玄的解释不仅强调了赋、比、兴的差异，还显现出它们之间共同的修辞指向，即都有在政治上讽劝的目的，只不过赋采取了直陈的方式，而比、兴则采取了隐晦曲折的方式。而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赋的所谓“直陈”也只是相对的，在包括郑玄在内的经学家们看来，赋这种手法在叙事与描写之外也有所寄托。因此，在更抽象的层面，“隐”与“曲”是赋、比、兴在表达时共同的文学指征。春秋五例的主要内涵即所谓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最初是《左传》人物对《春秋》的评价。第一个结合《春秋左氏传》文本对这段话进行系统阐释，并把它上升为贯穿《春秋》与《左传》的历史书写的总体方法的，是晋代经学家杜预。《左传》说《春秋》的目的在于“惩恶而劝善”，具体方法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杜预则把“惩恶而劝善”也视为“春秋五例”之一，并把他说“春秋五例”解释为“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约言示制，推以知例”“曲从义训，以示大训”“直书其事，具文见意”“求名而亡，欲盖而彰”。^③而在讲“直书其事，具文见意”时，他所举的“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也都算不上直书，其真实的意思同样隐藏在字里行间，从而使得文本中仍然暗含另外一种“沉默的声音”。《春秋》庄公二十三年记“秋，丹桓公楹”，“丹楹”就是这种写法。杜预认为，《春秋》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细节，是因为“丹楹”，即用红漆漆家庙的柱子，对诸侯而言是一种越礼的行为，这是一种影射的写法。因此，“隐”与“曲”也是可以涵盖所有

① [汉]班固：《〈两都赋〉序》，[梁]萧统编：《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57页。

② 《周礼·春官·宗伯（下）》，《十三经》第1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430页。

③ 《左传·序》，《十三经》第2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933-934页。

“春秋笔法”的文学指征。尽管无论是赋、比、兴还是春秋笔法，都是经学家在文本阐释中形成的概念，而且，汉儒处处从政治教化的角度理解儒家经典，特别是《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的确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从更抽象的层面看，“隐”与“曲”的表达方式，的确大量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构成其最重要的文本特性。并且，汉儒的解释对后世诗文创作乃至整个汉语书面表达都有影响。这使得汉语文学的各个文本之间产生了一种“家族相似性”。

再如，在分析汉语文本形态与讨论汉语诗学时，“象”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概念，清代的王夫之曾经提出“六经皆象”的主张。汉语文学在说理时，很少进行纯粹的逻辑推演，而是大量借助形象的比喻进行阐发；在叙事时，往往会通过离奇情节或创造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事物，让读者领会所蕴含的寓意；在抒情时，反对过分直接、过于激烈的表达，强调要与情感拉开适当的距离，为了达到这种修辞效果，总是试图在内在的情感与外在的景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对应关系，借景抒情或是让情景交融。在这个过程中，物象、事象、景象作为表达的中介，成为文学书写的重点。而对于汉语文学而言，事象、物象、景象并不是“象”的全部。正如前文所述，能够作为汉语文学形象的还有声音形象与书写形象，其中的声音形象包括利用汉语的音韵条件“以声象义”地表达某些抽象观念或隐秘情绪。就诗歌的韵部而言，江阳韵、中东韵、言前韵、发花韵、人辰韵等发音响亮，遥条韵、由求韵、怀来韵、坡梭韵发音柔和，乜斜韵、一七韵、灰堆韵、姑苏韵发音细腻。对这些特征，历代诗人大多有充分的自觉，许多诗歌很好地利用了诗韵“以声象义”的功能。比如，杜甫《前出塞》一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式的激昂，《登高》一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式的感伤，《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一诗“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式的喜悦，其内容便与诗韵的声音形象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汉语文学这些稳固的传统特质，使我们今天建立面向汉语文学的阐释学成为可能。

三、直面汉语文学文本是当代中国的文学阐释学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

中国古代的文学阐释学传统有其优势，即都是中国古代的文学阐释者在面向汉语文学文本的阐释实践中生成的，与古人的文学创作经验和阅读经验有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一方面，古代的文学阐释者往往有很高的文学欣赏水平，同时也从事诗文甚至是小说、戏剧的创作，对古代作家的创作心态、古代文本的创造规则十分熟悉。另一方面，古代的文学阐释者在进行文本阐释或对文学的一般性规律发表见解时，也更习惯采用文学式的表达。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二十四诗品》，采用以诗论诗的方式。其实，即便是被后人称为“体大而思精”的《文心雕龙》，也主要是采用形象思维的方式。中国古代的诗歌评点、小说评点、文章评点，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之间的亲合性，也主要是通过思维方式的一致性体现出来的。中国古代作家通常不直接说理、言事、抒情，而中国古代文学阐释者也喜欢用形象化的语言，以比喻、象征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文学发现。在面对两个对立的范畴，比如美与善、情与志、心与物、虚与实、动与静时，中国古代的作家更愿意表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一面，拒绝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而中国古代的文学阐释者在面对古与今、诗与画、形与神、体与用、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等文论话题时，也更愿意强调其相互联系与相互渗透的一面，因此产生了尽善尽美、以形写神、虚实结合、阴阳对转、体用合一、一切景语皆情语等与文学阐释有关的理论命题。甚至在面对不同的文体形态时，阐释者也试图把其间的差异略去，寻找其内在的统一性，因此有了六经皆文、六经皆史、六经皆象等命题。

然而，在思维方式上与文学创作太接近，也构成中国古代文学阐释理论的一大缺陷。在文学阐释活动中，如果仅仅停留在体验、感悟阶段，不进行理论的抽象与理性的把握，并用逻辑化的语言把体验与感悟所得表达出来，就很难达到文学阐释的最佳状态。当中国古代的阐释学试图用形象化的文学语言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界定时，其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二十四诗品》试图用24首诗去描述24种文学风格，但读了这部诗论之后，雄浑是什么，冲淡是什么，含蓄是什么，典雅是什么，进一步讲，雄浑、高古、劲健的区别是什么，自然、含蓄、冲淡的区别是什么，仍然让人不得真义。当代研究者面对这些文论著作时，仍然要十分费力地进行再阐释。即便如此，也难以在不同的研究者之间达成统一的意见，

一切都似乎停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状态。即便是面对《文心雕龙》这样被认为已经相当体系化的文论著作，当今的研究者仍然要殚精竭虑地去梳理其文体论、创作论、风格论的内在结构是什么，“神思”是怎样一种创作状态，“隐秀”是指怎样的修辞效果。

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阐释者所使用的许多概念，如果不加以整理，重新进行阐释，赋予其明确内涵，是无法直接作为中国当代的文学阐释学概念使用的。而且，有些古代的文学阐释学概念与阐释学思路，其有效性也仅存在于古代的文学阐释语境中，对于当代的文学阐释者而言，反而是应该加以反思甚至需要剔除的。比如，面对《诗经》这样的文本时，汉儒始终离不开讽劝、教化等概念与政治化、道德化的阐释思路，这既不利于当代学者还原《诗经》中诗歌的“本事”与“本意”，也不利于把《诗经》当作真正的文学作品进行阐释。而近代以来《诗经》研究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针对汉儒阐释的“去蔽”。对于另外几部儒家经典的阐释，情况也大抵如此。去蔽的主要方式，就是站在现代学术的高度，直面文学文本。当代的汉语文学阐释学，必须具备现代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使用现代人文学科的话语方式，有明确的概念体系。在建立概念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启用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活动中形成的概念，并对它们进行改造、重新加以界定；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直面中国文学文本，以当代人的眼光进行总结、抽象、推演，形成当代的概念。20世纪以来，对中国白话文学传统的发现与命名、中国小说“史传传统”的发现与命名、“文字型文学”^①的发现与命名，以及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抒情传统”的发现与命名，都是在大量文本观察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些概念的创生，为当代的文学阐释者以不同于古人的眼光切入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核，重新认识许多文学现象提供了极大启发。

而且，以当代人的学术眼光直面汉语文学文本，总结文学阐释学的概念与思路，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当代的文学阐释学理论体系，也是使中国当代的文学阐释学能够“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重要保证之一。至少，它可以避免在面对中国文学的阐释活动中，用西方概念去表达中国文学经验，削足适履地把中国文学现象装进西方概念的筐中。中国当代的文学阐释学也需要从外来的阐释学理论中吸收有价值的概念、命题与阐释路径，但并不是所有外来的概念、命题与阐释路径对中国文学都是有效的。我们曾经试图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作为两条对立的文学路线去观察中国文学史，也曾经试图将来自西方的文学分类原则，比如表现型文学与再现型文学二分的原则，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二分的原则，文学与非文学二分的原则等用来观察中国文学史，结果都遇到了很多困难。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概念范畴是从西方文学经验总结出来的，与中国文学的文本实际并不符合。而直接从中国文学文本实际出发总结出来的阐释学概念与范畴，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面对中国文学的文本实际发掘文学阐释路径，形成中国当代的文学阐释学概念，让其进入到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并非一件容易的工作，它需要大量的文本阅读经验做支撑，同时需要很强的理论建构能力。最为关键的是，它需要摆脱完全依靠古人讲话，依靠国外理论讲话的学术惰性。而汉语自身稳定的语言特性在文学中的投射，汉语文学中跨越时间、跨越文体的文学特性，则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可能性。

责任编辑：崔承君

^① 著名语言学家郭绍虞先生把以骈文为代表的注重音韵平仄、讲求偶对工整的文学称为“只重在发挥文字之特长”的“文字型”的文学。参见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89页。

训诂与阐释：商周铜器铭文研究的视角与佐证^{*}

秦晓华

[摘要]“训诂阐释学”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对文献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当前学者多从传世文献的角度出发，探讨“训诂阐释学”的理论及方法。本文以商周铜器铭文为研究对象，探讨将“训诂阐释学”与商周铜器铭文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将“训诂阐释学”运用于铜器铭文研究，可以更新铜器铭文的研究方法，挖掘铜器铭文的研究价值，进一步揭示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信息，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训诂 阐释 训诂阐释学 铜器铭文

〔中图分类号〕I0-03；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024-08

近年来，在张江等学者的倡导下，“训诂阐释学”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训诂阐释学”致力于将中国传统训诂学的核心理念、方法与西方阐释学的理论体系相结合，旨在构建一个既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又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学术体系。目前，“训诂阐释学”主要聚焦于理论研究及学术体系的构建。然而，“训诂阐释学”的研究基础仍然是对具体文本的训诂和阐释实践。商周时期的铜器铭文，又称金文，作为重要的出土文献资料，记载了重大历史事件、祭祀仪式、征伐战争、封赏训诂等重要信息，这些资料对于探究古代社会的政治架构、宗教信仰、经济状况、历史地理、语言文化等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前人已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训诂和阐释工作，特别是字词训诂方面的研究。将训诂与阐释相结合的“训诂阐释学”，既是一种本体论，也是一种方法论。本文旨在探讨将“训诂阐释学”应用于铜器铭文研究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带来的学术影响。

一、何为训诂阐释学

在讨论“训诂阐释学”和铜器铭文的结合之前，有必要对训诂学、阐释学，以及训诂阐释学等基本概念作一个说明。什么是训诂？这一概念源自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它涉及对古代文献中文字、音韵、语义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解释。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对此有一个精辟的阐述：“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①由此可见，“训诂”本身就是对文化经典的“解释”，这是中国传统学问中一个很有特色的组成部分。李春青指出：“训诂是基于汉字的独特语义解释方法，是中国古代解经传统的伴生物。”^②训诂学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古籍中的文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出土文献的殷商西周词汇比较研究”（24BYY00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4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汉语史视野下商周金文词汇的发展及其时代价值研究”（GD24XZY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秦晓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

^① 《毛诗正义》上册，《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 页。

^② 李春青：《在训诂学与阐释学之间——对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一点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23 年第 7 期。

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问题。训诂学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任务是对古代文献中的字词进行精确的解释和注解，以期达到对文献本意的准确把握。训诂学者通过对文字的音韵、形态和意义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古代文献的字面意义，还能够深入挖掘文献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这种研究为现代人理解古代文化提供了坚实基础，使得古代的智慧 and 知识得以跨越时空界限，继续在当代社会中发挥其价值和作用。

阐释这个概念可分为两个主要领域：日常生活中的阐释和文本阐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进行即兴的、非正式的阐释，这些阐释往往是基于共同的社会习俗和文化背景，它们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严格的规范约束。在学术领域，文本阐释则显得更为正式和规范，它遵循一定的学术规则和方法论，旨在深入挖掘文本的含义，确保理解的准确性和深度。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即兴阐释还是学术文本的规范阐释，它们都是人类表达、交流和传承思想不可或缺的方式。这些阐释活动与人类的生存紧密相连，它们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之一。当我们直接陈述一件事情或一个观点时，我们仅仅是在传达信息；而当我们阐释对某件事情或某种思想的理解时，我们则是在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这种交流有助于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阐释学起源于西方，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理论体系。阐释学不仅关注文本解读，还涉及理解过程、解释方法和意义构建。它试图揭示文本背后隐藏的深层含义，以及读者在解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阐释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和时代的思想，促进跨文化的沟通和理解。因此，阐释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理解和沟通的重要工具。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学术界开始有组织地引入和阐述西方的解释学理论。这一时期，随着汤一介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宏伟构想，国内学者开始更加有意识地对中国传统的阐释学进行深入探索和系统整理。他们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试图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张江对西方解释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并开创性地从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丰富资源中汲取灵感，探索构建当代形态的中国特色阐释学基本理论的新路径。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中国的解释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体系，不仅在学术界内部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对社会文化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学术理论，也为世界解释学的发展贡献了中国的声音和力量。

什么是训诂阐释学？近年来，张江和其他学者共同提出了建立中国当代阐释学的构想，并发表了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初步构建了一个“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框架，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张江等人探讨了训诂学与阐释学的内在联系，进而提出构建“训诂阐释学”的设想：“所谓训诂阐释学，其基本路线起点于训诂，通达于阐释，构建于学科。即以训诂为起点和方法，以真理性、可靠性、融贯性为准则，坚持由训而阐，由阐而训，反复循环、螺旋上升的正当路径，最终达致根基牢靠、创造新知的尚意之阐。经过长期实践和理论统合，建立起学科特色鲜明，具有广泛应用意义的训诂阐释学。由此而区别于以阐释为起点，回归于训诂的阐释训诂学，以及流行于今的各类阐释之学。”^①张江将训诂学与阐释学结合，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优势互补，形成一门新的学问。徐时仪也赞同将两者进行融合：“训诂阐释的开拓不是在训诂上增加阐释，更不是以阐释取代训诂，而是在二者本然相融基础上生发并吸纳西方解释学来进一步充实拓展。”^②两者之所以能够结合，因其有共性。张跖指出：“无论是中国的训诂学，还是西方的阐释学，究其根本，都是从文本中揭示意义的学问。”^③训诂学为阐释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正如戴震所言：“读书须先识字。”这表明了训诂学在阐释学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训诂学与阐释学并非简单的相加关系，张江提出的“一加一大于二”的观点，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融合。李春青进一步阐述了“训诂

① 张江：《“训诂阐释学”构想》，《学术研究》2022年第12期。

② 徐时仪：《训诂阐释的传承、特点及开拓》，《东南学术》2024年第1期。

③ 张跖：《阐释、训诂与文本的规定性》，《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期。

阐释学”的建构意义，他认为：“建构‘训诂阐释学’根本上就意味着训诂学与阐释学的相互展开——一方面将字义词义的语义学研究提升为文本意义的探究，一方面将意义建构落实在字义词义的生成与演变过程之中。”张江还强调：“阐释学不是训诂学，但包含训诂学，无训诂的阐释学无以为据。训诂学不是阐释学，但必须进入阐释学，无阐释企图的训诂无以达理。”^①李春青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两者的差异，他认为：“二者真正的差异并不在个别与整体，而在于‘语义’与‘意义’。‘语义’是字词的字面意思和引申义，约定俗成，因而是较为固定的；‘意义’是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是生成之物，因此对不同读者就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意义。”^②

二、训诂阐释学与商周铜器铭文研究结合的可能性

训诂阐释学作为一种理论、方法，要和具体的材料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其价值、意义。将训诂阐释学理论运用到商周时期的铜器铭文研究中，我认为可能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训诂到阐释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路径。张江指出：“以历史的眼光看，春秋以来，训诂与义理、阐释与诠释这两条路线，共生共存，此消彼长，相互纠缠，乃至至今。”^③孟琢也有类似的表述：“‘训诂通义理’指运用训诂方法对经典文献进行释义解读，从而深入阐发经典中的义理思想的学术路径。它根植于‘小学’的历史传统，通过乾嘉之学的积极阐扬，成为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④自东周以来，学者们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深入研究，逐步形成了以训诂为基础，进而进行阐释的学术传统。周光庆指出：“《毛诗》在解释体式上，既有‘诂训’二体，可以从文本出发，作语言解释，使整个解释建立在可信可靠的基础上；又有‘传’体，可以从现实出发，作心理解释，使整个解释能阐发出文本所蕴含的义理。而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毛诗诂训传》的作者们还努力使‘诂训’体与‘传’体有机结合，形成新的‘诂训传’解释体式。”^⑤尤其到了宋代，学者更为重视对文本的阐释。朱熹在训诂与阐释的关系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既重训诂更重阐释：“若不从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处；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论，不于身心上著切体认，则又无所益。”^⑥时至今日，训诂与阐释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王宁指出，训诂学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向解释学发展的训诂学”。^⑦这意味着训诂学不仅仅停留在对文字的考释上，而是更加注重对文本深层含义的阐释和理解。从训诂到阐释的转变，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由实证研究向理论思考的演进。这一路径不仅丰富了学术研究的维度，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出土文献的研究方面，金文等出土资料虽然具有特殊性，但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同样不能脱离中国传统学术的轨道，仅仅停留在训诂和实证的层面，而忽视对材料的深入阐释。事实上，在铜器铭文研究的实践中，以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学者为代表，都有意或无意地继承并发扬了从训诂到阐释这一悠久的学术传统。例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特别注重利用铜器铭文来研究历史，深入阐释了铭文在历史研究方面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性。唐兰曾这样评价郭沫若的金文研究：“郭沫若同志把十五年史赵鼎的龔王定为共王，匡卣的豉王定为懿王，是十分重要的发现，开用铭文补周史的先例。”^⑧又如，李学勤先生在考释铜器铭文时，通常先对字词进行释读、疏通文义，随后针对铭文中涉及的历史、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阐释，如《师同鼎试探》《史惠鼎与史学渊源》《论多友鼎的时代及意义》等论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些论文中，李学勤讨论了“土

① 张江：《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难题》，《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② 李春青：《在训诂学与阐释学之间——对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一点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7期。

③ 张江：《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5期。

④ 孟琢：《“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论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学方向》，《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⑤ 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4-185页。

⑥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5页。

⑦ 王宁：《谈训诂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⑧ 唐兰：《永孟铭文解释》，《文物》1972年第1期。

地转让的原因与法律程序”“土地转让的地界与契券”等问题，并通过对卫盂、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师永盂、大簋、格伯簋和散氏盘的研究，将西周时的土地转让方式细分为赏赐、交易和赔偿三类，让我们了解到西周时期的土地转让制度。^①郭沫若、李学勤等人的铜器铭文研究正是从训诂到阐释的传统学问路径的典型体现。

第二，商周铜器铭文的训诂已有相当深厚的积累。文献解读的基础在于对字词的训诂学研究，历代学者在文字考证和铭文解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自宋代以降，铜器铭文的训诂学已积累了逾千年的历史，金文的字词考释成果主要集中在《金文诂林》、《金文诂林补》（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附录》（李孝定）、《金文常用字典》（陈初生）以及《金文大字典》（戴家祥主编）等工具书中。此外，还有专门针对铭文注释的著作，这些作品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铭文资料，作了释文并加以详细注解。其中，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唐兰的《西周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以及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等著作尤为突出。特别是《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该书依据时代和地域收录了 925 篇铭文，汇集了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精华部分，是继《两周金文辞大系》之后收录铜器铭文最为全面的选本。其注释广泛吸收了各家研究成果，反映了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金文研究的最高水平，展示了当时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卓越成就。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为铜器铭文的深入阐释提供了坚实基础，使得研究者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一步挖掘和解读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从而推动金文研究向更高层次迈进。

第三，商周铜器铭文材料有重要的阐释价值。商周铜器上的铭文，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而且在文化、艺术、语言等多个领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首先，金文是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它记录了当时的语言、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为了解和复原古代社会提供了直接证据。其次，金文的书法艺术价值不容忽视，其字体结构严谨、线条流畅，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金文中的文字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对研究汉字的起源、演变和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最后，金文研究有助于增进对古代语言的理解，对于语言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因此，金文阐释的价值在于它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研究视角，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语言研究方面，例如，否定副词“弗”与“勿”在古代文献中频繁出现。依据流传至今的先秦史料，研究者普遍认为，先秦文献中“弗”与“勿”后所接动词通常不带宾语，并基于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一现象是先秦汉语的固有特征，且这一观点被视为无可辩驳。^②仅依靠传世文献得出的结论确实如此，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铜器铭文，情况则会有所不同。在铜器铭文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句式结构，例如在逆钟的铭文中出现的“勿废朕命”，其中“勿”字后面接的动词“废”就带有宾语“朕命”。这个具体的例子足以对那些仅依据先秦传世文献所推导出的结论提出质疑，从而显示出铜器铭文材料在语言方面的独特阐释价值。通过这些铭文，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和用词习惯，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先秦时期语言文化的认识。

在文学研究方面，例如，颂体文学是一种古代文学体裁，主要用于歌颂帝王、英雄或神明的功绩和美德。关于颂体文学产生时间，《文心雕龙·宗经》认为：“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文心雕龙·颂赞》篇分析颂体时，在“原始表末”部分亦是追溯到《诗经》。然而，我们发现西周铜器铭文中大量的嘏辞，“用赐寿寿，万年永宝，用于宗室。”（豆闭簋）、“用翌寿，勾永命，峻在位，作甕在下”（鬲簋）、“万年无疆，堪臣皇王，眉寿永宝”（梁其钟），这些嘏辞和《诗经》在句式、内容方面多有相似之处。因此，连秀丽认为：“从文学角度看，出于宗教祭祀、颂祖目的而铸于器铭上的金文嘏辞歌谣，是当时那个时代主要的文学作品，而它们又与原始祭神祭祖乐曲辞，诗歌的内涵、本质一

^① 李学勤：《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第 90-92 页。原载《光明日报》1983 年 11 月 30 日。

^②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266 页。

样，都是‘美盛德而述形容’，且是‘容告神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论之，它们与《诗经》‘三颂’具有相同的文化内涵，是属于相同的文化类型，彼此之间具有渊源关系，所以说它们共同孕育了后世的颂体文学。”^①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颂体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

第四，前人在商周铜器铭文的训诂阐释上已有实践。尽管“训诂阐释学”是近年才兴起的学术领域，但前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实践已为后来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宋代以来，历代学者通过对商周铭文的细致解读，揭示了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会结构和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商周时期的铭文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通过对这些铭文的研究，学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商周时期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脉络。前人对金文的训诂阐释可以分为文字、篇章和综合三个层面。在文字层面，学者通过对金文中的单字进行深入的考释和理解，揭示其原始含义和演变过程。在篇章层面，学者则关注金文的整体结构和内在逻辑，分析其篇章构成和表达方式。在综合层面，学者将文字和篇章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对金文进行全面的解读和阐释，从而揭示其在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深层意义。

文字层面，例多不赘举。至于篇章层面，由于铭文记录了相当丰富的内容，为学者阐释提供了丰富素材。商代的铜器铭文虽然简短，但记录了族徽、人名或地名等诸多关键信息，这些铭文虽然只有寥寥一到两个字，却为学者提供了理解商代宗法制度和家族组织的直接证据。这些铭文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探究商代社会的结构和组织方式。进入西周，铜器铭文的内容变得更加详尽和丰富。周代的铭文常常百字以上，不仅记录了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互动，还详细记载了周代的礼乐制度和封建制度。例如，西周早期的大盂鼎铭文近300字，详细记载了周康王对盂的训诰与封赏，这些记录反映了周代的封建制度和赏赐制度的具体实施情况。而在西周晚期，毛公鼎的铭文更是多达497字，记录了周宣王对毛公的任命和训诫，这些内容揭示了周代的政治结构和君臣关系的复杂性。这些铭文不仅为研究周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对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学者通过这些铭文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宗法制度到政治结构，从家族组织到礼乐制度。这些铭文不仅丰富了我们古代历史的认识，也为我们理解古代社会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因此，铭文研究对于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学者也从综合层面对商周铜器铭文进行阐释。例如，商周时期的自然神崇拜，我们可以利用铜器铭文，结合相关材料加以阐释。商周时期，“天”和“帝”是主宰万物的一个至上神。在传世文献中，“天”和“帝”没有什么区别，但若将铜器铭文与甲骨文做比较就会发现，它们虽然都是至上神却有明显区别。“天”字虽然在甲骨文有，但是没有用作至上神。商代人只拜“帝”，他们拜的至上神就是“帝”。“帝”是商代人的崇拜对象，万物都是由“帝”主宰、由“帝”所生的，“帝”属于生殖神。但在西周铜器铭文里，“天”是至上神，西周早期的天亡簋就记载了祭天仪式。西周早期的甲骨文中也都是把“天”作为至上神的。这说明，商人把“帝”看作至上神，周人把“天”看作至上神，这两个来源是不一样的。商是游牧部落，游牧部落关心的是什么？是动物的繁衍，所以他们信奉生殖崇拜；而周是农业部落，靠天吃饭，所以崇拜的是自然神“天”。因此周原甲骨文与西周金文里“天”是至上神，周一直把“天”看作是至上神，把自己的王看作是天子，称天子。这些不同的崇拜对象反映了商周两个部落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周代的铜器铭文中“帝”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至于原因，张桂光在《商周“帝”“天”观念考索》结合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指出：“为了利于对殷遗民及殷人影响较深的方国、地区的统治，周人在推行其尊天思想的同时，也还有必要让这些地区原有的对‘帝’的崇拜与新近推行的对‘天’的崇拜暂时并存（比如殷降臣的后裔所作的《史墙盘》，就将帝放在十分显著的位置），甚至接过来加以利用，以宣传天、帝利益和赏罚的一致（如《猷钟》所记‘佳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

^① 连秀丽：《周代吉金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09页。

又成亡竟，我佳嗣配皇天’）的方法去争取受尊帝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们。其后，像周宣王时候的《毛公鼎》的‘肆皇天亡歟，临保我有周’与《师询簋》的‘肆皇帝亡歟，临保我有周’那样，帝与天已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就是说，到西周末即已逐渐发展为天、帝观念的合一，而到春秋战国以后那就更不用说了。”^①

三、训诂阐释学与商周铜器铭文研究结合的必要性

“训诂阐释学”从训诂出发，需要文献训诂资料的支撑，而商周铜器铭文材料则为相关文献的训诂与阐释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训诂阐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运用到商周铜器铭文的研究上，一方面是理论价值的具体体现，张福贵认为：“阐释如何从逻辑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是阐释学存在的最终意义。”^②另一方面，“训诂阐释学”可以更新商周铜器铭文的研究方法，拓宽金文研究的视野。我们认为，训诂阐释学与金文材料结合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为汉字的阐释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训诂阐释学”的起点是训诂学。程颐曾经提出：“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也。”^③张江亦认为：“训诂以文字之形、音、义为标的，为求意、识理、循道，提供基准和前提。”^④训诂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形训，即通过分析文字的形体来进行解释。在传统的小学研究中，形训以《说文》为代表，该书主要是通过分析小篆形体来解释文字的意义。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小篆由于书写习惯的改变、书写工具和材料的差异以及地域上的不同，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字形结构的简化、变形、讹变等方面，使得小篆字形与汉字最初的形态相比，出现了较大差异。因此，基于小篆字形所作的分析和解释，往往存在问题。金文等古文字资料被发现之后，许多学者非常注重利用小篆之前去古未远的古文字形体来解说字形。例如，杨树达在1934年7月23日所写的《释晋》一文，引用了格伯簋、魏三体石经、晋邦𠄎等古文字的形体，并谓“今之研稽文字者，不上考古文而徒奉篆文为科律，欲求得古人文字之真，不亦难哉！”^⑤强调了古文字资料在字形阐释方面的重要性。在对汉字进行阐释的过程中，尽管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古文字的价值，但存在对金文等古文字字形进行随意阐释的现象。唐兰曾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提出了研究古文字的六条戒律，其中第三条是“戒任意猜测”，其曰：“有些人没有认清文字的笔画，有些人没有根据精确的材料，有些人不讲求方法，有些人不顾历史，他们有了主观的见解，随便找些材料来附会，这种研究一定要失败的。”^⑥王宁对这类问题也有相似的论述：“一些阐释文化的论著运用材料不准确，违背了训诂学考证的‘为实’精神，尤其是在普及层面，主观地乱讲汉字、汉语词的理据，毫无典籍依据，附会穿凿、哗众取宠的书文不但存在，有些还在媒体上炒作。”^⑦为了避免文字阐释的随意性、主观性，有必要将训诂阐释学引入金文等古文字字形的阐释中。科学理论的指导可以使汉字阐释变得更加科学、更具有确定性。黄德宽曾经提出建立“汉字阐释学”，他提到：“我们认为从发掘《说文》蕴涵的汉字阐释成果入手，弘扬许慎汉字阐释的理论和思想，探索建立科学的汉字阐释学，以适应当代汉字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是当代文字学研究创新的一条可能路径。”^⑧孟琢指出：“阐释具有方向意义上的确定性。在训诂学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古注—新诠—一定解’之间的反复确证，指向了更为符合汉语言文字客观规律的经典解释。”^⑨这是科学的文字阐释与一般的对文字随

① 张桂光：《商周“帝”“天”观念考索》，《荧辉阁丛稿》，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209-210页。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② 张福贵：《阐释学的方法论价值与阐释路径问题》，《文艺争鸣》2024年第3期。

③ 朱熹辑录程颐语，见[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5页。

④ 张江：《“训诂阐释学”构想》，《学术研究》2022年第12期。

⑤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⑥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273页。

⑦ 王宁：《谈训诂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⑧ 黄德宽：《回归传统与学术创新——“汉字阐释学”论略》，《古汉语研究》2011年第2期。

⑨ 孟琢：《“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论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学方向》，《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意说解之间的重要区别。

其次,阐释学帮助铜器铭文研究克服碎片化的倾向,拓宽金文研究视野。商周铜器铭文材料被发现后,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字词的考释之上,这基本上属于传统的训诂范畴。汉末魏初学者徐干言:“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务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徐氏强调了阐释文献“大义”的重要性。清代训诂大师段玉裁晚年时对自己一生工作所做的评价:“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①在他看来,真正的训诂考核应该是像其师戴震那样,推迹训诂,贯通古今之心志,以达到正人心、厚风俗、明教化的义理层面,而不是只停留在一字一句的语言解释上。对于传统训诂学的缺点,现代学者也有清醒认识。张江指出:“训诂的弱势是,自训诂发生,全力集中并停留于字与词的专门考究,由此而生出释义离散及碎片化倾向。”^②并提到:“仅以训诂为认知终点,以前人旧识限制今人想象与创造,则主张知识主义的人,限制知识进步。”^③另外,铜器铭文资料虽然是商周时期的一手材料,有其优势,但是和传世文献相比,也存在系统性较差等明显缺陷。自宋代以来,各家在著录铜器铭文时,多是按照器类、字数排列铭文。如此排列,操作方便,但弊端也显而易见,最主要的问题是将相关的铭文分散著录,使相关研究容易陷入支离破碎的局面,影响材料价值的发挥。相比之下,阐释学强调系统地对文本进行研究。因此,如果在阐释学理论的指导下,将商周铜器铭文按时代、地域,分期、分域整理,在历史、地理的视野之下让相关铜器铭文相互关照,将更有利于铜器铭文的深入研究,也会发挥其更大的科研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所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即按照时代、地域对金文进行分类整理,系连铜器铭文,开创了金文研究的先河。陈梦家也强调从系统的角度研究铜器铭文,“铜器内部的联系(即铭文的和形制、花纹的)在断代上是最紧要的”,根据铭文内部的联系,“若干独立的西周铜器就一定可以联系起来。由于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串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④另外,阐释学强调文本的多维度解读和理解,这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审视金文材料,挖掘其潜在的意义和价值。李春青指出:“对训诂学来说,‘训诂阐释学’则意味着对传统训诂学的革新,使之具有更为强大的解读经典的能力和更广阔的应用范围。”^⑤通过对金文的多层次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的制度、宗教信仰、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内容。

再次,铜器铭文的训诂与文本阐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关于训诂与阐释的关系,如上文所述,两者是双向互动的。李春青指出:“训诂和文本阐释之间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接续关系,而是一种‘阐释的循环’关系:文本阐释固然需要识字,而识字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文本阐释的制约,二者实际上是一种‘部分’与‘整体’之间那种互为条件的关系。”^⑥张昉也提到:“‘阐释学循环’是西方阐释学史上一以贯之的核心概念。阐释学循环描述的是在对一个特定文本进行解释时,理解者对作品整体的把握必须借助于对作品各部分的理解,而对部分的把握也必须借助于对作品整体的理解。”^⑦了解了训诂与阐释的这种互动关系之后,我们发现铜器铭文的训诂并不仅限于对字词一般语义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训诂也要受到阐释者对文本整体意义理解的影响。下面试举例说明铜器铭文的训诂和文本阐释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西周时期的𠩺簋有句作:“有余佳小子,余亡康晝夜,經擁先王,用配皇天,簣溺朕心,墜(施)于四方。”(《集成》4317。𠩺簋。西周晚期)

① [清]段玉裁:《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经韵楼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3页。

② 张江:《“训诂阐释学”构想》,《学术研究》2022年第12期。

③ 张江:《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5期。

④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56-357页。

⑤ 李春青:《在训诂学与阐释学之间——对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一点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7期。

⑥ 李春青:《在训诂学与阐释学之间——对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一点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7期。

⑦ 张昉:《阐释、训诂与文本的规定性》,《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期。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认为“簠”可读作“广侈”，与《国语·吴语》“广侈吴王之心”（韦昭《注》“侈，大也”）语例相似。^①《铭文选》的解释虽然为我们理解“簠”的意思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不难发现两句的语境是不同的。“广侈吴王之心”完整的语境引述如下：“王不如设戎，约辞行成，以喜其民，以广侈吴王之心。”（《国语·吴语》）𠩺簠中的“簠朕心”是使王者之心宽大与通达，“簠”的结果是正面的；而“广侈吴王之心”则是使吴王之心骄傲自大，“广侈”的结果是负面的，两句语境不同，意思一正一反。很显然，《铭文选》在解释字词时没有注意到其出现的语境，将字词训诂与文义阐释割裂开来。其实，𠩺簠中的“簠朕心”与𠩺簠（《集成》04322）“休宕毕（厥）心”语境相同，均是在赞美先祖对自己的积极影响，意思是使我的内心宽宏与盛美。又如，西周早期的利簠（《集成》04131）铭文由于记述了武王伐商的重要史实，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由于铭文简短，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尤其是“岁鼎克𠩺夙又商”七个字的释读，至今没有一致的结论。按照“训诂阐释学”的方法，“由阐而训”，我们先看该铭的主旨，再看具体字词的释读。该器是史官利所作，制作的起因是利立下了功劳而受到武王赏赐，因此，铭文所记之事与利有关。利是史官，西周时期史官的主要职责包括记录国家大事、编纂历史、保管文献、制定历法、参与礼仪活动等，他们负责详细记载帝王的言行、国家的政令、战争、祭祀等重要事件，以确保历史的准确性和连续性。因此，结合史官的职责，“岁鼎克𠩺夙又（有）商”一定是记载利在灭商战争中所做之事，与其职掌密切相关。按照这个理解方向，“岁”则可训为祭祀，是在战前举行的祭祀，由史官利主持；“鼎”可读为“贞”，其后的“克？𠩺（昏）夙又（有）商”，是贞问的内容与结果，“𠩺（昏）夙又（有）商”则是叙述在短时间内可以占有商国，这个占卜结果对周是有利的，鼓舞了士气。因此，七天之后，武王到管地之后，论功行赏，对在战前主持占卜的史官利进行了赏赐。由此可见，将训诂与阐释割裂开来，就词释词，会陷入断章取义的境地，误解铭文的真义。而将训诂与阐释进行互动，由阐而训，由训而阐，则能深入理解古人所述，把握历史真相。

四、结语

总之，将训诂阐释学应用于商周铜器铭文研究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训诂阐释学为金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而金文的丰富内容又为训诂阐释学提供了实践平台。在金文研究中，训诂阐释学的应用不仅限于文字的解读，还包括对铭文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的挖掘，不但能够提升金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对于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金文的深入研究和阐释，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和文化，还能够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研究视角。

责任编辑：崔承君

^①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78页。

哲 学

·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

从抽象的一般性走向具体的普遍性的历史空间辩证法

——中国式现代化哲学基础问题的若干思考^{*}

刘怀玉

[摘 要] 中国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一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思想，而其渊源则是德国辩证法传统中的抽象与具体的关系理论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底蕴，从本质上讲固然是一个历史观问题，但归根结底也是一个辩证地再现社会现实，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论问题。中国道路作为具体的普遍性概念，表现在历史哲学上是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与具体的历史道路的多样性、跳跃性冲突融合而成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表现在社会哲学上乃是关于社会有机体的部分与整体共时性的矛盾与协调平衡发展的具体总体性或系统辩证法问题；表现在文明形态历史观上则是如何实现不同文明形态间的相互借鉴并由此上升为新的普遍性问题；而贯穿于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扬弃抽象的一般性历史逻辑规定的过程中形成反思性、合目的性意义上的具体普遍性的历史空间辩证法。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具体的普遍性 历史空间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032-10

一、方法论问题：抽象的一般性与具体的普遍性

社会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在一定的地方、地区与民族国家空间中的具体的实践表现或实现形式，是对普遍的一般的本质存在的一种有限的反思性的规定。中国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思想，换言之，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发展普遍规律与每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而我们要想深刻地理解这个理论基础，尚有一条思想道路要追溯与重构，这就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思想。

黑格尔辩证法的最高成就乃是把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起来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认识是从内容到内容向前转动的。首先是这种前进这样规定自身，即它从单纯的规定性开始，而且后继的总是愈加丰富与愈加具体。因这结果包含它的开端，而开端的过程以新的规定性丰富了结果。“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因此不应当把进程看作是从一个他物到一个他物的流动。绝对方法中的概念在它的他有中保持自身；普遍的东西在它的特殊化中、在判断和实在中，保持自身；普遍的东西在以后规定的每一阶段，都提高了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它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丰富、更密实。”^①

^{*} 本文系南京大学文科发展基金“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空间哲学话语分析与建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认知科学范式的相关性研究”（2022&ZD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210023）。

^①〔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49页。

“具体的普遍性”范畴源于黑格尔对“抽象”和“具体”的区分。一方面是内含于丰富的关系中的“具体”，另一方面是贫乏的、片面的、孤立的“抽象”，如此泾渭分明的二分法，成为黑格尔用以描述事物、现象、思想和经验特征的利器。他把具体与抽象的初步区分进一步阐发为具体普遍性与抽象普遍性的理论。抽象的普遍性（das abstrakt Allgemeine）是由若干对象所共有的一种孤立的特征，然而具体的普遍性（das konkrete Allgemeine）则事关事物之全体、大体或本质，这种本质内嵌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世界并构成了这个世界，也即，辩证的总体性。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中强调了这一区别，他把概念描述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就概念的本质而言，其本身并非一种和实在中的各种差异相对立的“抽象的统一”，而是自身已经包含各种差异在内的统一，因此它是一种“具体的总体”。^①

概念具有三种较确切的定性，即普遍的、特殊的与单一的。这三种定性之中的每一种，如果拆开来孤立地看，就会是一种完全片面的抽象的东西。如果还是片面的，它们就还没有出现在概念里，因为它们的观念性的统一才组成概念。因此，“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普遍的”。换言之，概念作为真正的单一体，“就是在它的特殊存在之中自己仅与自己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普遍性”。^②具体的普遍性由三个“环节/要素”构成，即普遍性、特殊性以及个体性。黑格尔将它们称为“环节”，是为了强调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并非界限分明以及三者所具有的逻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相互关系。依其所见，普遍性环节是事物发展之一般原则。特殊性环节由普遍性环节所决定，但同时又是普遍性环节的一个殊异化，因此，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它的否定”。个体性环节是在先前解释过的意义上的具体的个别事物，它存在于世界的确定性之中。因此，个体性是普遍性环节之殊异化的最后一步，同时，也是其现实化的最后一步。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说，“具体的东西在其最充分的规定性上是普遍的，因而包含了它的他者在自身之中。也即，具体之物是有差别的，或者说否定性的普遍物。”^③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这种思辨的（即肯定性而非否定性的）概念式“具体普遍性”唯物主义地改造成研究人类社会普遍规律与具体复杂现实的科学方法。“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④马克思的具体普遍性思想始自他对欧洲哲学史上的形式分析方法与德国辩证综合方法的根本区别。“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⑤

第一条道路也是早期古典经济学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⑥“抽象的一般”，或同一，是一种分析性的或者说形式逻辑的概念，它把作为研究对象的外在的千差万别的事物加以归纳、概括、抽象，把握住这些事物千差万别中间的共同点或者说共同的属性——本质。这种同一，是把仿佛本来没有联系的各个事物所共同拥有的属性加以抽象、概括，而这种同一一旦变作抽象之后，就变成了与这些事物没有关系的纯形式的、纯抽象的概念关系。同一既和所有事物脱离了关系，变成了没有具体内容，甚至没有任何内容的外在于事物的纯主观的抽象模式；同时，又去掉了这些各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把各个事物看成是没有关系的、相互独立的个别的抽象物。所以在此形式分析思维中，同一是与具体事物没有联系、没有内容的纯抽象概念；在这里，同一或普遍或一般与每个事物或个别之间是没有关系的，甚至同一是高于每一个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一方面，同一或者一般高于或外在于个别事物；另一方面，每一个个别事物之间是孤立的、没有联系的。每个个别事物通过外

①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37页。

②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38-139页。

③ Michael James Inwood, *A Hegel Dictionary*, Blackwell, 1992, p.303.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0页。

在于自身并高高在其之上的同一性的一般的形式，然后才与另一个事物发生联系。这是我们平时运作使用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比如，我们研究一个自然物体时，总是要有某种基本理论或基本模型才行，仿佛只有借助于建模或逻辑框架，每个事物之间才发生联系，而忘了这些事物在现实世界中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的。这种思维是一种把感性杂多事实经验蒸发抽象为形式性的、分析性的逻辑规定的思维。

第二条道路就是一种把抽象一般重新还原为多样性统一的辩证综合思维。综合就是在普遍的联系中，在事物与事物之间普遍的联系中，在事物与事物中间矛盾着的或相互转化着的发展的动态联系中把握事物，而事物不是作为个别的事物来理解，而是作为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相互转化的事物来领会的。这些事物既指处于联系中的每一个个别事物，又指处于联系中的个别事物所组成的总体联系的事物。综合就是多种多样的事物所构成的整体，就是在联系中把握每个事物，又是在总体联系中把握这些事物所构成的复杂的事物整体。每个事物已经不作为一个个别事物，而是作为连续整体中的事物的一部分，这里的综合指的不是前面那个所谓个别事物共同的属性与特点，而是相互联系着的事物整体。这种所谓联系中的事物整体，重点不是停留在每一个个别事物上，也不是停留在高于或外在于个别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性、统一性环节，而是对这些事物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关系的整体把握。“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①这就是综合的思维。一言以蔽之，每个事物既作为个别事物而存在，同时也作为联系中的总体事物而存在，这就是综合的辩证思维方法。

总之，从形式的同一的抽象逻辑思维上升到辩证的具体的普遍性思维，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资本论》辩证法的绝妙的公式。“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②

据此，列宁进一步把《资本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方法概括为全部认识论的根本方法，“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③他进而把这种方法明确为在特殊中把握普遍的具体的普遍性辩证法：“‘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的、个体的、个别的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東西和个别的東西的全部丰富性！）”。^④他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 = 折中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局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⑤总之，辩证法应当从掌握事物感性材料，也就是个别开始，然后才提供现实运动的观念形象。这是一个从个别具体上升到一般抽象，然后，再从一般抽象回到现实的事物具体总体的辩证认识过程。

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共相与殊相的关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抽象与具体的关系理论统一起来，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就为理解中国革命道路与尔后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毛泽东主要借助于列宁的《哲学笔记》及苏联教科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把德国哲学语境中的抽象与具体的概念改造成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范畴，把从感性具体上升为抽象一般的分析性认识逻辑改造成为由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把从抽象一般上升到具体普遍的综合认识逻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9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1页。

③《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2页。

④《列宁全集》第55卷，第83页。

⑤《列宁全集》第55卷，第91页。

辑改造成为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在毛泽东看来，抽象与具体或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既具有客观辩证法即本体论意义，也具有主观辩证法即认识论意义。

从客观辩证法上说，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客观事物存在的两个方面与特征。任何事物都是在关系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具有辩证关系。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着普遍性；另一方面，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一定情况下属于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时空中是特殊性的东西，在另外的场合则变为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

从认识的主观的辩证法上说，普遍与特殊是认识的两个方式、两个过程，一是由特殊到一般，一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只有认识个别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事物。教条主义者就是固执于抽象的一般性和形式性规定的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②从这种具体的普遍性的辩证法观点来看，中国革命实践首先是把世界历史发展之“一般”规律用于中国之“具体”的过程。但它不是关于“一般”自身的分析、演绎或推理活动，而是使之“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③相应地，在中国搞工业化也不能机械照搬苏联模式，“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④毛泽东所阐明的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共性与个性的原理，为中国共产党人反对与战胜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定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从而也赋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鲜活的民族特色与丰富的时代内涵。

二、历史哲学问题：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空间转移

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认识论或者具体的普遍性方法，从历史观角度表现为民族国家地方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逻辑及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飞跃性，特别是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统一。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的哲学意义，通常被理解为如何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或者说中国革命与现代化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解决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要破解这个问题，就必须破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思辨的历史哲学式的历史发展普遍规律论的理解。

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框架中，经济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相对立并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的。在这里，社会形态被理解为由若干个系统所组成的有机体结构，即通常所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三分法；而马克思则把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与其历史的阶段性的主导性总体性影响区分开来。马克思所关注的历史现实焦点或突出的特征内涵，并非后来第二国际庸俗化理解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历史区别性意义上的共时性的、然而又是异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1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质性的结构。首先，历史发展的本质，并不是不同历史时代内在的连续性、一般性和共同性联系，反而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①其次，马克思心目中更能科学地再现客观现实的历史观，其并非线性的、平滑的、积累式的启蒙主义进步观（这是一种从抽象形式理性与人性论出发的历史哲学），而是“断裂的”“分叉的”“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观。最后，现代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并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从前人类历史的自然延续与充分发展，而是在一种全新的总体结构中对以往历史的摧毁和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恰恰在于既从当下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出发，“逆向”地研究作为其前提的诸多可能性条件，同时也把“现时代”当成历史发展的产物与结果。

进而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革命意义并不是用一种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概念相类似的“普遍的必然的”一元论决定论逻辑与历史概念对社会历史进行唯物主义改造，而是认为任何一种试图普遍说明一切民族、国家、地区历史的做法均是“超历史”的思辨历史哲学之表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观既是以颠倒方式完成的普遍历史观，更是以差异分裂方式解构普遍历史观的多元历史观。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使命就在于用多种可能的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之实践经验对所谓“大写的”“唯一的”历史逻辑进行解构。相应地，马克思所谓的“唯一严格”的历史科学，不再是历史的普遍性与阶段性理论假设，而是打开了充满着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空间差异性的开阔的动态视野。

诚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了世界历史，使其自身成为囊括全人类、全世界的“一般”或“普照之光”。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当时正在发生着的历史进程，并把这个“一般”当作批判的主要对象。但是，如何把这个“抽象一般”逻辑或规律同千差万别的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难题。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困难不在于抽象概括出历史的一般，而是在考察和整理过去与当代的资料之时，“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因为“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②在晚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批评了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③的做法，主张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发展道路。

列宁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与欧洲中心主义教条，强调了历史规律实现过程的悖反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东西”。^④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与中国革命道路之特殊性不仅具有通常我们所重视的历时性的“跨跃”意义，也有共时性的“结构突破”或“空间转换”意义。上升到一种历史空间辩证法的哲学高度上说，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源头绝不能历史地经验地从某一个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水平里面去找，而是要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或者整个现代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那里去寻找。换言之，落后国家的革命历史道路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多重决定因素与矛盾结构而促成的一种地方性不平衡发展的景象，是本“应该”在发达经济基础之上或者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革命的一种“空间转移”。

“一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走向瓦解和形态变化的唯一的现实道路，是它们的内在的对抗的历史发展。”^⑤黑格尔的具体辩证法只是逻辑地区分了矛盾的不同形态，把矛盾的展开看作一个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④《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16页。

过程，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一个由隐而显的过程。而马克思则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辩证法理解为一个由内在的矛盾到本质与现象的对抗、再到现象的完全自主与颠倒性统治这个逐步遮蔽本质与危机不断发生的过程。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发展导致的社会革命过程并不直接发生于西方社会内部或本土，而是颠倒地发生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区或不发达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问题的对外转移，造成了落后国家的政治问题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同步性与整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落后国家的经济落后性促成其本土的政治问题的“发达”，这就是一种生动具体的不平衡发展的空间辩证法，而不仅仅是历史辩证法。“这种世界历史性的结构不平衡，即落后经济与发达政治问题之客观辩证法与本土的爱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意识，构成了中国革命辩证法的主客观两个方面”。^①正是由于这种全球规模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使中国得以选择了一条在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进行先进的政治社会制度革命的道路，也因此中国以落后的民族国家所走出的一条特殊的现代化道路，同时也具有世界历史的高度与普遍性的本质意义或特征。这就是活生生的民族国家地方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辩证法。换言之，中国式革命与现代化道路就是抽象的普遍性历史发展规律经由特殊的实现形式而转化成了具有具体的普遍性特点的现实社会历史运动。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就是如何解决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不同步、不平衡发展的矛盾问题，实现社会结构的协调平衡发展。

三、社会哲学问题：不平衡发展系统与平衡协调发展系统

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与认识论表现在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上就是一种社会的部分与整体共时性互动的具体总体或有机体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更集中讨论危机论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则应当更加关注作为有机体自我调节发展理论研究的系统辩证法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就其根本思想实质与哲学方法论精髓来说，却是黑格尔的具体总体性辩证法或具体普遍性概念。

黑格尔指出，在“现象”阶段中，主要的发展是关系的理念。“现象”的确切含义是，我们把事物看作显露的、被设定的、通过必然性而得到展现，而不是只把事物看作直接地存在着的。把事物看作“现象”，或谓：不仅把它们看作基于自身，而且看作较大整体的环节。被视为现象的实在，是高于直接的、独立的存在的某物。于是现象就是整体与部分的相互作用的世界，整体和部分是互为条件的。在整体中，没有不是在部分中的东西；在部分中，也没有不是在整体中的东西。整体不是抽象的统一，而是作为一个“差异的多样性”的统一；但这个统一，作为“多样性的东西”在其中彼此相关的东西，是这多样性的东西的“规定性”，它由此而是部分；而部分作为部分，不等于整体本身，而是在整体中等于自身，即部分。因此，整体与部分双方均“不在本身中而在它的另一方面中有其独立性”。^②

由是观之，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就是黑格尔关于部分与总体互为中介、互相转化的辩证思维的产物。一个部分是组成它的更小的部分的整体，一个整体是构成另一个更大整体的部分。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机械摹仿黑格尔的抽象的逻辑范畴体系，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独立社会。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可笑之处就在于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③易言之，社会是多种生产关系构成的统一的总体。而总体的范畴绝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却是主张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中。在研究社会时，不应该“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否则就不能正确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④

① 刘怀玉：《从历史决定论到被过度解释的“多元决定论”——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之当代意义的若干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9期。

② 参见[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160-1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7-40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3页。

马克思不仅有两种现代社会概念,而且有两种把握现代社会的系统认识概念。一方面,以共时性的即知性的或“单一系统知识”的视点来看,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有机构成体系;另一方面,从辩证的、历时性、复杂的矛盾的系统论视点来看,现代社会是“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有机功能体系,即社会自组织、自生成与自转变其发展“必要器官”的历史过程。^①历史本身和历史运动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系统运动,即有机体发展的系统性与系统的矛盾历史性有机统一的辩证法。这也预示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包含的在危机矛盾不平衡中求变革之历史性与在改革中求协调平衡发展的自我生成性的两种系统辩证法内涵。^②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革命与建设方式的探寻历程和持续发展历程,可谓一个从系统性矛盾辩证法到系统性协调发展辩证法的转换过程。通过反思西方社会现代化理论的系统性方法的局限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现代化建设,形成以阶段性历史目标自觉与全面—平衡的有机体系统建设相统一的发展辩证法。系统性矛盾辩证法解决的是社会有机体制如何总体转化重构的问题,即如何“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而系统性发展辩证法解决的是新的社会有机体制“如何组织和生成自己的器官”,以实现持续性协调与发展进步的问题。中国革命抓住了矛盾不平衡性,实现了传统社会的变革与社会主义的社会系统重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抓住了自我发展道路的核心矛盾动力和经济发展中心任务,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建设的持续发展阶段是以矛盾动力论为核心对系统性发展辩证法的探索和运用。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那种资本“让社会一切因素从属于自身”的盲目片面发展的模式,与此相反,通过自觉驾驭资本的创造力与提高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自觉地把“自己还缺乏的”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管理、生态诸系统要素或器官全面生成出来,从而达到为社会主义社会有机总体服务之目的。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愈发提高和驾驭资本的能力愈发成熟,生产力或经济要素就愈益成为系统发展总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自觉发展的系统辩证法形态因此也就彰显出来。

四、认识论问题:社会空间的重构与认知图绘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从本质上讲固然是一个历史观问题,但说到底也属于辩证地再现(而不仅仅是反映)社会现实,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论问题。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面临着经验主义式“微观近视”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备受抽象教条与空疏逻辑困扰,而且后者是更加突出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关于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性的科学抽象认识与每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经验的具体认识结合起来,这不仅需要一种历史辩证法的方法,更需要一种空间辩证法的视野。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历史’已不再是多线论与单线论、普遍论与特殊论的‘非此即彼’的二者择一式命题,也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世界历史体系的等级制,而是资本的统治逻辑不断流动、不断制造地方性差别和对立以及中心和边缘等级制的过程。我们一方面必须恪守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策略底限和开放性视野,另一方面必须坚持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科学方法论,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严格的形式,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严格的批判维度”。^③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把现实理解为并不现成在场,而是充满了矛盾的历史过程,是从特定历史主体角度有层次、有界限再现某个暂时性在场的过程。^④所以马克思主义仅仅靠历史理性科学的严谨性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文学美学方式的辩证想象或者想象的辩证法。“认知图绘”是当今时代全球化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

② 参见刘怀玉、张一方:《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系统辩证法意义》,《东南学术》2022年第3期。

③ 刘怀玉、章慕荣:《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历史”概念与意蕴》,《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④ 参见刘怀玉:《政治文化哲学“转向”之图绘与作为“图绘”的政治文化哲学:一种空间化反思视角》,《河北学刊》2018年第3期。

后现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政治批判与想象解放形式的重要辩证认识论方法。如果在认识论意义上取消了总体性再现现实与规划现实的辩证法，那就等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与辩证法。没有总体性概念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存在的正当性。“没有社会总体性这个概念（以及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就不可能有正当的社会主义政治”。^①

基于理解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统治的现实之需要，出于对未来社会主义运动前景与可能性之憧憬，我们有必要坚持这样一种空间辩证法式的认知图绘方法。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成功跨入更富有制度弹性与技术动力的全球化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抽象的时间统治机制（即加速度），把时间扩展到了全球，于是超越一切地点与空间限制的“同时性”发生的时间（极限速度）把自身悖反性即颠倒性地变成了静止的空间。因此，“我们这里根据时间性试图寻求的一切，必然会首先经过一种空间的基质才得以表达。”^②所有的历史都变成了“空间性”，同质化高速扩展的时间对空间与地方的统治二律背反地依赖于或者表现为一种同质性空间对时间的统治。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必须采用空间的辩证法形式，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工具，现在它将被视为体现了它自身的矛盾。于是辩证法从时间中浮现出来，并使其自身得以实现，它正以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在空间中发挥作用。空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从历史时间产生出来的矛盾，而是把历史留在身后，并把那些旧矛盾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同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当这个矛盾的整体呈现出一种新的意义，指向‘一些其他东西’——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时候，其中的一些矛盾就被削弱了，另外一些则加剧了。”^③正是在此意义上，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具有空间想象力与反思力的历史辩证法认识论，以及一种文化政治或者美学政治。

从空间认识论角度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探索历经了复杂曲折的道路进程。它先后经历资本主义现代化殖民化浪潮冲击，进而突破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生产宰制，谋求生存、建设、发展和创新这样一个由被动裹挟到主动作为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成功地开拓出属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社会主义发展空间，它既是世界现代化普遍发展规律在中国的具体历史地理呈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由特殊的民族国家历史地理意义转变上升为具有世界历史性现代化普遍发展意义的表现。”^④

五、文明形态历史观问题：普遍性规定下的特殊与特殊上升为具体普遍性

中国式现代化通常被人们从历时性角度理解为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阶段与过程的跨越式发展，或者作为落后国家替代性跃进式发展的一个特例，实际上则不然。这就是它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形态问题，而且涉及更为根本的文明形态的历史观问题。这其中也存在着抽象一般性的文明形态论与具体普遍性的文明形态论之区别问题。

中国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21世纪以来才出现的人类历史未有之大变局之一，也是20世纪以来人类百年已有之历史大变局的必然产物。它始自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对西方现代文明形态的“普适性”意义的质疑与民族意识之觉醒。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就表达了这个百年心声：“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⑤这显然就是一种文明相融互鉴、共生并存的历史观。与梁启超的文明形态历史观相类似，俄国民粹派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在1859年所写的《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一文中就表达过类似观点，并对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车

① 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6页。

②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③ [法]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89页。

④ 刘怀玉、张一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若干空间哲学话语分析与重建》，《东南学术》2024年第1期。

⑤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9页。

尼尔雪夫斯基在这篇著作中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发展的更高阶段在形式上与其初始来源是一致的；二是社会生活某些现象在最先进的民族中达到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此现象可以在其他民族中非常迅速发展，跨越中间的逻辑阶段，从低级直接上升到高级。^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文明互鉴”而不是“文明冲突”的历史观对晚年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而查苏利奇的信这个偶然原因导致马克思对俄国问题进行了系统表达：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从而形成一种新生的社会文明形态。“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②

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不同的时代、社会形态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往社会历史的粗暴中断与毁灭性重建，也就是对传统社会中具有原始丰富底蕴的文化无情地加以破坏，只是把其中某些偶然现象或次要的边缘的部分加以放大，最后变成了绝对的、无限的、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唯一的存在。丰富多样的人类历史被肢解成仅仅与资本相关的“普遍和必然的历史”。也就是，它把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的具体历史，转变成为“抽象的”，或曰从“非历史的”转化为“历史的”。比如，它把许多可能的没有共同尺度的具体劳动时间转化为同一时间的抽象劳动。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为它自己确立的前提”。比如，自由劳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决条件，也是“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出于简明叙述必要，我们姑且借鉴印度学者查克拉巴蒂之说法，把这种“资本自身确定的作为其前提的历史”^③称为历史1，这是一种分析性的抽象普遍论或一元论的历史。同时，马克思又把那些“不是作为资本自己建立的前提，不是作为资本自身生命过程的形式”称作历史2，即多元的具体普遍性的历史。这就是说，历史上有许多文明形态不属于资本的生命过程，没有为资本的自我再生产作出贡献，虽然历史2的元素也是资本的“前提”，即资本“将它们视为前提”。

马克思把作为资本主义自我生产的历史前提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1）与作为资本主义“之前”与“之外”存在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历史2）严格区分开来。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出现之前的发展过程，和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尚属于历史上两个不同的时期。在历史1中，资本是前提，其存在是作为一种自行起作用的东西而成为前提。而在历史2中，资本是另一个社会形式解体过程的沉淀物，即另一种再生产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历史1必然要征服或摧毁属于历史2的多种可能性。然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历史2对资本逻辑的隶属是完完全全、服服帖帖的。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发展”：它作为“最发达的和最多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就是依靠这些传统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④换言之，“只是征兆的、却被充分发展”的部分属于历史1，而“未被克服的、继续存留着的遗物”则属于历史2。

我们需要同时考虑以上两种发展模式，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全球化的可能性条件，这些条件是人类归属的多样化、渗透化和冲突化的历史。但资本全球化与资本的普遍化并不相同。“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历史1，即对马克思批判至关重要的普遍和必要的资本逻辑，已经实现。中断和推迟资本自我实现的是各种修改历史1的历史2，因此充当了我们要求历史差异的理由”。^⑤这就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的文明形

① 参见[意]马塞罗·穆斯托：《马克思的晚年岁月》，刘同舫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7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2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0-35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5页。

⑤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rinceton, 2008, pp.63-67.

态历史观，而不是抽象的一般性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

中国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伟大历史实践丰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特殊性相互关系的理论内涵。通常人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道路只是这个规律的特殊的具体的体现，但实际上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并不是脱离特殊的历史道路实践的抽象一般逻辑，而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道路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具体的历史逻辑；中国道路也不仅仅是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性的特殊表现，它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特殊的方式预示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普遍趋势，从而是可以上升为新的普遍规律性的历史特殊性。^① 中华文明之“具体”在同历史辩证法一般原理相结合的进程中，也将自身提升为有着更高历史阶段意义的“一般”。换言之，中国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并不是用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反抗世界文明形态的普遍性，而是逐步突破现代西方文明形态这一虚假“普遍性”假设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反思西方文明形态在运用于中国时的局限性，“通过对中国历史独特性的讨论重构一种能够容纳这一独特性的普遍性”。^② 最终，中国现代化使其自身摆脱落后的局限，而真正融入现代新文明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这正是中国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涵。

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特殊实践经验中内在地包含着普遍性规定。这正是康德所说的从“规定性判断力”到“反思性判断力”的转换过程。“规定性判断力”是知性认识中从普遍概念出发规定特殊对象的判断力，而“反思性判断力”则是从给予的特殊性出发去寻找其可能的普遍性原则。反思性判断力是“自己给自己立法，而不是拿来的……也不是自然规定的。这就是涉及目的性与合目的性的问题”。^③ “规定性”的判断力把一个经验事实的概念归结为普遍规律，而“反思的”判断力则把特殊的事物加以反思，来寻求一个属于历史过程的因而是并不确定的普遍规律。这也是一个走出抽象知性规定，而走向具体历史和实践经验的过程。^④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真正的具体展开……不能听任内在直观的武断主张，或使用一种基于外在反思的推理……这不是指把一个给定的特殊东西归摄到普遍性……毋宁说，在精神作出规定和消除规定的同时，特殊东西已经对自身作出规定”。^⑤ 这就是一种反思的内源性自主性生成的现代化发展观，而不仅仅是决定论的现代化发展观。

总之，这既是一个历史辩证法反思问题，也是一个空间辩证法建构问题。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一个以先进的政治革命带动落后的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过程；一个以经济现代化引领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一个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己任，实现社会系统各环节全面协调的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而从空间辩证法角度来看，这可谓一幅从“革命地理学”到“发展地理学”再到“新文明空间”的动态变奏画面：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空间创造到“重点建设城市”的现代化空间建设，再到“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格局；从实现国家主权与空间的高度独立统一，到利用“三个世界”与“中间地带”以获得独立自主的建设空间，再到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与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引领“全球南方”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现代化一般理论同中国现代化特殊的历史空间发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以及同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责任编辑：罗 苹

① 参见刘怀玉、苏振源：《论中国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辩证法意义》，《宁夏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② 汪晖：《世纪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128-129页。

③ 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25页。

④ 参见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⑤ [德]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页。

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的嬗变及其反思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

白 虎

[摘 要]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的微观化操作，生命政治拓展了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的当代视野，开创了生命政治微观权力模式，但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内在资本权力的作用机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构成了福柯开展生命政治分析的前提，生命的资本化为当代生命政治提供了历史和理论支撑。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生命治理技术实现了从生命资本化到生命政治化的转向。今天，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其形态的变化和发展又催生了新的生命治理技术。总体上，在资本权力主导的治理逻辑中，生命治理技术围绕着生命的资本化、生命的政治化和生命的数字化不断迭代。而对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的反思与批判不能局限于治理技术本身，必须跳出资本主义治理体系，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透析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的隐秘性与虚假性，进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

[关键词]资本主义治理技术 生命政治 资本权力 生命权力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042-06

生命政治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话题，肇始于福柯，经由意大利理论家发扬光大。福柯在身体的解剖政治和人口的生命政治两个维度上分析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谱系。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构成了福柯开展生命政治分析的前提，也为后来者拓展生命政治的理论效应提供了基础。生命政治本质上是生命经济，生命的资本化为当代生命政治提供了历史和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资本权力直接作用于生命，开创了生命政治微观权力模式。数字化时代，资本权力不再满足于在生产和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它通过数字资本实现了对社会的总体吸纳。从生命的资本化到生命的政治化再到生命的数字化，资本权力从未退却，它在资本主义治理技术的自我迭代中不断变换方式实现对生命权力的统摄。

一、生命的资本化：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的开端

生命的资本化是由生命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发的资本权力对生命的统摄所建构的。生命的资本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生命政治化的前提。福柯围绕身体的解剖政治和人口的生命政治拓展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历史视野。如果说马克思是在《资本论》中围绕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来指认资本主义的虚假本质和物化困境的话，那么生命政治则是围绕权力关系，尤其是基于生命权力的运作机制来说明相似问题的。生命政治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治理技术，呈现的是权力自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18ZDA017)、2021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想象理论与现代性困境研究”(2021BZX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白虎，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201620)。

我迭代的隐性操作，其目的是掩盖生命资本化这一本质，建构资本主义治理的合理性。但生命政治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生命资本化，资本权力将生命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在此基础上，生命政治推进了生命治理技术的社会化转向，它以一种更精细化的操作将生命纳入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中，实现了对生命的全方位占有。

首先，生命资本化以资本对生命的直接占有为前提。生命的资本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其本质在于将生命纳入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中。生命政治以生命经济为支撑，在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生命”作为一种生物性意义上的存在，如何成为资本积累的对象和社会治理的对象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福柯基于“生命”这一特殊的对象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治理体系进而建构了当代生命政治学。尽管生命政治指向的是资本主义治理技术和政治形态的变化，但其根本上回应的是资本权力运作机制和资本积累形态的变化，因为生命政治的实质在其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是生命经济，是生命的资本化。其逻辑点在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其角色发生了变化，“生命”成为劳动力的天然承担者，正因如此，“生命”才被赋予了新的价值。维尔诺分析道：“凡是有生命政治存在的地方，就涉及人类存在的潜力维度进入最前沿，进入直接经验……只有，也只能在劳动力的名义下，存在的潜力维度才会显而易见。”^①在这一逻辑基点上，我们才能看到，在生命政治的分析中，生命和人口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资本主义关注的对象。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资本主义统治的秘密都在于资本对生命的占有和统治，它依赖于生命的资本化。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以建构在生命之上的劳动力（生命力）成为商品为前提的，核心在于将生命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中。

其次，生命资本化以生命的自我治理实现资本的自我增殖。生命资本化内含于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中并通过生命的自我增殖呈现出来。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获得了独立的性质，也使人成为独立的个体。当生命作为彻底独立的个体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时，生命获得了一种新的规定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力成为商品，因其自由独立不受束缚的特性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由买卖。在这里，生命政治不再是传统政治哲学架构下的一个概念，它说明了生命的历史入口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息息相关的内在关系。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认为治理术不仅仅是通过外在的禁止或限制来控制个体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内化的方式影响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这种治理术将市场自由和竞争原则贯彻到自己的生活中，将自己的生命活动视为一种生产过程，即一种不断进行自我投资和自我增值的过程。资本主义不断迭代的治理技术通过一种更为微妙和内化的影响方式使得主体在市场原则支配下积极地建构起来，市场逻辑成为判断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这种市场真言化或真理政体使得个体的价值和成功被简化为经济指标。在这种逻辑下，生命个体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and 策略，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竞争的压力。福柯揭示了资本主义治理技术如何通过内化和生产的方式影响个体的行为和思想，使得个体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市场逻辑的执行者和维护者。

最后，生命资本化以“人口”为新的统摄对象。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切都笼罩在资本逻辑下，作为个体的“生命”需要依赖其自身的“生命力”或“劳动力”进入社会化生产，并且通过生命的规训，使生命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市场，最终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转化中实现生命资本化。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治理体系中，为最大化利益，也为符合资本主义市场原则，“人口”成为资本权力统摄的对象。那么，从“生命”到“人口”是如何转变的呢？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讨论了纪律的发展对权力机制的影响。新的治理技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取代了传统资本权力中的“暴力—支配”原则，在温和的治理技术下，资本以更快速的方式积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积累的自我迭代催生了权力机制的迭代，使之转向“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调节时间、肉体 and 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②生命本身是劳动力的承载者，那么围绕生命

① [意] 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8页。

②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77页。

所采取的一系列技术最终会回到资本主义发展最核心的内部，即资本逻辑中。而当资本主义在不断拓展其对社会的整体统治时，人口成为新的对象。人口作为整体性概念，不是个体的相加，而是整个社会生产体系整合作用的结果，权力作用于人口的目标是个体的优化和完善。资本对于劳动力的宰制逐渐从“肉体”的显性惩戒演变为对“生命”的隐性操持。

二、生命的政治化：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的微观操作

如果说劳动力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获得商品这一规定性是生命资本化的前提的话，那么这一过程就是通过资本权力对生命的统摄来进行的。生命的政治化与生命的资本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生命治理谱系的两个面向，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生命政治的根本目的是逐渐建构一种积极肯定的资本主义治理逻辑。从生命的剥夺到生命的规训最后到生命的生产，生命政治作为资本主义治理技术，以一种新的形态承袭了资本逻辑的原则，资本权力不断将生命纳入资本主义治理体系的过程，也是资本权力对生命统摄的过程。

首先，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围绕司法权力实现对生命的剥夺。司法权力构筑了生命治理的基础，一开始围绕着政治权力展开，其目的在于塑造“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①资本在积累过程中强制性地大量的人“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使得他们“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那样，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的分离首先建基于土地私有权的确立，17世纪60年代英国出台的《骑士领废除与补偿法》清算和废除了封君封土制度，土地混合所有权转向土地私人所有权，最终使所有权从政治依附关系中完全解放出来，取得独立于政治关系的经济的形式。马克思说：“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简单地说，就是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附属物”。^③另外，伴随着土地私有权的确立，原有的封建臣民的义务也解除了，所有的一切被扔进了历史博物馆。^④17世纪末，资产阶级以“羊吃人”的操作借由政治之手让劳动者失去了一切依附关系，资本权力实现了对生命权力的第一次统摄。劳动者对自己的生命不再具有主宰的权力，而是将其让渡给资本。

其次，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围绕生命权力实现对生命的规训。资本自我增殖的逻辑自发驱动资本权力对生命的改造。在资本权力对生命实现第一次统摄，将其剥夺并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后，资本权力通过工厂纪律实现对生命权力的第二次统摄，也就是生命的规训。资本对身体（劳动）及覆盖在身体上的劳动力支配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实现资本价值增殖的过程，也是资本权力自我实现的过程。因此，资本权力一方面仍旧诉诸传统的政治权力，通过立法保证劳动者必须让渡自己的劳动；另一方面诉诸不同于传统司法权力的微观权力，即工厂内部的分工、惩罚、纪律和训练，围绕身体的规训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最终实现资本的自我增殖，因为资本家“惟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⑤对于后一种情况来说，资本权力对生命的规训实现了从传统的否定性司法权力向新型微观权力机制的转变，这种权力机制的关键不在于控制和否定，而在于积极肯定性地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中对劳动者的管控就“变成一个决定性的经济活动因素，既是生产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规训权力的一个特殊机制”。^⑥而这样一种适应服务于经济活动的微观权力机制本质上是资本权力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生命的规训就成为正常化的操作。一方面，机器化大生产的发展使分工越来越精细化，身体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⑦另一方面，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4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23页。

③[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97页。

④参见侯建新：《英国近代土地确权立法与实践》，《世界历史》2021年第4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07页。

⑥[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98-19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7页。

提高劳动强度，劳动者需要被训练，即“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①权力的现实形式就在于资本对于生产的权力，也就是资本对于劳动力的宰治，这种权力形式通过工厂制度、机器装置等生命规训的形态呈现出来。

最后，资本权力与生命权力的双向运动推动了生命的政治化转向。在资本权力对生命的规训中，传统宏观性的司法权力已经让渡给了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关的微观权力，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这一微观权力的来源做了解释：“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②因此，无论是生命的规训还是生产，围绕着身体的解剖政治和人口的生命政治所带来的结果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但福柯没有直接围绕政治经济学展开讨论，而是转向了知识（话语）与权力的分析，他试图在现代性批判中寻找新的视角，把马克思那里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转化为权力机制展开分析。无论是规训机制还是后来的调节机制，福柯都把握住了一个核心主题，即现代权力是如何生产并发挥作用的。如果说围绕着生命的规训而展开的技术化操作仍停留在经济活动本身的话，那么人口的生产已经说明资本权力要跳出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一领域，进入社会领域并企图获得社会的领导权。但资本权力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伴随着资本对社会的总体性吸纳，也开始诉诸更普遍的社会权力。因此，生命权力本质上是资本权力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时，为获得更普遍化和总体性的社会权力进行的微观操作。它是在新的视角上对资本权力进行回应，实质上拓展了资本权力的当代视野。

三、生命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的数字化转向

资本权力对生命权力的统摄伴随着生命的规训和生命的生产，从宏观走向了微观，最终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变革，并将资本权力在社会化为普遍权力的进程中推向了极致。而生命权力，从惩罚、规训甚至是生产的机制全都让位于生命的数字化治理，数字资本打破了宏观和微观之间的界限，并在总体性上对生命权力进行了全方位的占有和剥削。因为“数字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更纯’、更为普遍的形式，它没有消除，反而会增加市场制度的不稳定性及种种弊端：不平等与以强凌弱”。^③数字资本主义以数据为依托将数字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数字无孔不入，带来的结果是数字资本权力实现了普遍性的统治。本质上说，生命的数字化就是数字资本权力作用于生命建构出一种新的生命治理技术，最终服务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治理逻辑。

首先，数字资本权力的确立。数字资本权力是基于数据控制和算法管理形成的一种权力形式。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资本家通过掌握大量的数据和先进的算法技术，能够对劳动者及其劳动过程进行更精细的控制和监控，从而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增殖。而在这个过程中，一般数据构成了数字资本权力机制的基础。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一般数据取代了劳动一般，劳动一般的某些形式已经数字化了，即通过数字劳动产生数据，这些数据随后被转化为一一般数据。劳动一般原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概念得到了扩展。作为劳动一般的一种现代形式，一般数据的特殊性在于它直接与数据和信息处理相关，它体现在数字劳动上，即劳动者通过数字平台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包括传统的物质劳动，也包括非物质劳动，如信息处理、内容创造等。在数字劳动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数据的集合，这些数据经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形成了对资本家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这就是一般数据，它成为数字资本权力行使的基础，因为它可以被用来预测市场行为、优化生产流程和加强消费者控制。在一般数据和数字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了数字资本，它是由用户在数字平台上产生的数据构成的，这些数据被少数数字资本家占有，并成为他们获取利润的资源。数字资本家通过对一般数据的控制和利用，形成了一种新的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形态在数字时代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和支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4页。

②[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2页。

③[美]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

配地位。数字资本权力的行使依赖于对一般数据的控制和利用，而这些数据又是由广泛的数字劳动产生的。数字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核心，它使得一般数据的生成和积累成为可能，而这些数据的资本化又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家的权力，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的主体性和社会关系被重构，而资本家则通过新的技术和平台实现了对劳动和数据的更有效控制。

其次，数字资本权力的统治。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媾和推动了数字资本的形成，数字资本借助于一般数据，通过私有化平台实现对社会的统治和占有。数字资本权力在这一过程中生成，凭借数据的独特性拓展了微观权力的作用机制，生命在数字资本面前成为一串数据，并进入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数字构成了控制的数字语言，数字表示存取信息或是弃绝信息。人们不再面对整体一个体这一偶对，个体变成了‘可分体’，整体变成了样品、数据、市场或银行”。^①数字资本的介入使得生命治理采用一种更加隐秘性的治理技术，在算法的中介下，生命成为并屈从于数据，“权力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自由的姿态。它以顺从、友好的形式摒弃了自己的否定性，将自己装扮成自由”。^②在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数字资本将人的身体和精神纳入统治中，传统规训机制和安全机制必须适应数字资本主义的治理技术和逻辑，生命的数字化治理不再依赖于外部的设施和机构，而是在技术和资本逻辑中自我治理和自我规训。生命的数字化拓展了资本主义的生命治理术，以往是差异性的生命服从于一种社会规范，今天是不同的生命按照数据资本进行差异化的主动生产。数字资本主义建立在可计算、可控制、依赖于算法并将其外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化装置的基础上，“可计算的社会成了一个自动化、远程控制的社会”。^③

最后，数字资本对生命的重塑。在数字化时代，数据、数据平台、数字技术等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伴随着数据商品市场各要素的不断完善，数据商品，连同数据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空间场域——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一道成为数字化时代服务于资本积累的数字资本。数字资本积累的前提是平台用户与平台和数字技术的分离，这一分离造成了后者对前者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而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特殊存在形态，具有资本的一般性质，即作为过程的资本和作为关系的资本。“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④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他基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商品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资本的关系维度即资本以物的形态存在但本身承载着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本身仍遵从资本逻辑的控制，延续着资本的剥削关系，并将这一关系在数字技术、互联网平台下转化为一种全景式、隐匿化的形式存在。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字化装置和数据控制，重塑了个体的存在和社会关系。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通过编码和数据化的方式，将个体的存在和行为纳入其治理体系，“在新的数字生命政治中，人越是被简化，就越符合数字资本主义治理的需要，因为生命越是丧失了各种身份和各种真实的拥有，就越是满足于大机器的无限而细微的各种变体所识别”。^⑤个体的行为和选择不再是自由的，而是被预设和控制的。另一方面，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模式下，数据成为控制和剥削的主要手段，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平台可以预测和引导用户的行为，从而实现对个体的控制和剥削。在双重机制下，数字资本主义催生了大量的现代赤裸生命，这些生命在数字化的抽象中不断满足资本主义的剥削需要。

四、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反思

基于以上分析，对当代生命治理技术的反思与批判不只局限在主体哲学内部，它超越了传统的主体哲学，因为生命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以生命经济作为支撑的，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保持着一致性。福柯

① [法] 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97页。

② [德]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20页。

③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论数字资本主义与人类纪》，张义修译，《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④ [德]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22页。

⑤ [意] 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9页。

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导致了规训权力的特殊方式”。^①这种规训权力不仅体现在监狱等机构中，也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工厂到社会，马克思与福柯在不同时空上相遇，《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拓展了今天我们理解生命政治与生命治理技术的视野。而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两者纳入一种新的资本权力分析模式中，从生命的规训到生命的生产再到生命的数字化建构，生命治理技术以一种愈加隐形化的操作回应资本主义的迭代过程和资本逻辑的主导原则。如果我们抛开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摒弃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就会陷入资本主义内部治理的窠臼，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和内在逻辑的批判是一种虚假的批判，无法撼动资本主义合理化大厦的根基。

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谱系与资本主义在逻辑上是共生性的。这意味着今天我们对生命治理技术和生命政治的批判在根本上从来就不是阿甘本所描绘的生命形而上学，它是基于历史的现实的物质基础而产生的。福柯的贡献在于寻找到了一个入口，在生命的入口处发现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秘密。资本与生命构成了马克思与福柯分析资本主义的不同主题，前者围绕商品生产说明资本权力的作用机制，后者围绕生命的治理说明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的作用机制。但正如福柯所言，无论什么样的权力最终都是服务于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在这里，尽管福柯没有开展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内嵌在其权力分析之中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生命权力毫无疑问拓展了资本权力的边界，福柯指出：“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新的宪法和法律并不足以保障它的统治。他们认识到，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技巧……建立了他们从来未曾放弃的社会霸权。”^②在生命政治中，一切围绕正常化展开，这样一来，资本权力就实现了从生命的规训到生命的调节，从工厂纪律到社会治理的转变。资本权力“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③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表面上是财富的积累，本质上是资本权力对一切社会的统治。

对生命政治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反思必然走向资本逻辑批判。在政治经济批判视野下，生命政治的问题域指向了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都聚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这种批判不仅关注经济层面，也关注社会和文化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各种机制控制和调节生命。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展了生命的安全机制。通过数字化生产，生命被纳入数字资本的控制体系，按照资本的逻辑运行。这种控制不仅涉及人口的调节与生产，还涉及生命数据化和平台资本的控制。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中，控制社会正在形成，正如德勒兹所说的：“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④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条件下，生命的问题转化为身体的配置与人口的生产两个问题。通过数字化调节，身体的配置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紧密契合，满足了资本主义数字化生产对生命的一系列需求。人口的调节与生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因为人口的生产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的秘密增殖。数字化转型改变了生命政治的运作方式，但并未改变其本质。资本主义依然围绕个体身体和人口进行调节，以保证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数字时代生命政治构筑了全新的资本主义治理技术，对这一新的生命政治治理术的反思和批判不应只关注治理技术本身，而应该回到生成治理技术内部的资本主义运行逻辑中，也就是资本批判中寻找。因此，对资本主义生命治理技术的反思必须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进行。作为一种总体性批判，它不仅关注宏观层面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也内含微观权力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在各个层面控制和剥削生命。生命政治批判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前沿思潮，在今天以一种微观权力范式回应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总体性批判，它既内嵌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也拓展了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当代效力。

责任编辑：徐博雅

①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 248 页。

② [法]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13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684 页。

④ [法] 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第 191 页。

质素、感受质与身体^{*}

张浩军 李永辉

【摘要】胡塞尔的“质素”概念自提出以来便饱受争议，连胡塞尔本人都对它不甚满意。作为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认识论概念，我们却无法在现象学还原和直观中发现它。作为无形式的质料，它承担着连接意识与世界的功能，我们却很难在意向性理论中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诸多现象学学者，无论是欧陆传统的萨特、梅洛-庞蒂、古尔维奇，还是接受了分析哲学的莫汉蒂、昆汀·史密斯、加拉格尔，都不约而同地对它提出批评。而在分析哲学中，与它类似的另一个概念“感受质”也遭受着相似的批评，两者殊途同归的命运揭示出对任何“像……什么样的”体验的讨论都需要“身体”这一角色的介入。当加拉格尔把质素、感受质和梅洛-庞蒂的身体概念关联起来之后，一个新的生成现象学的认知模型的雏形便出现了。延续加拉格尔的思路，可以看到，尽管“质素—身体图式—感受质”这一模型目前尚不完善，但这一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先验内容与经验内容、身体与意识、感觉与知识之间的鸿沟。

【关键词】质素 感受质 感觉材料 身体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048-10

意向性理论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理论。从胡塞尔本人的思想来看，他对意向性的理解大概有三种：（1）作为对一个对象之简单指称的意向性；（2）作为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Noesis-Noema）关系的意向性；（3）作为构造功能的意向性。^①第一种理解是在《逻辑研究》中提出的，而第二和第三种理解是在《观念 I》中提出的。对于胡塞尔来说，虽然作为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关系的意向性概念只是其意向性分析的一个过渡阶段，也并非对意向性概念最终和最充分的解释，但这一过渡阶段是必要的，其重要意义不容否认。^②可以说，在胡塞尔成功地实施了先验转向并重新界定了意向性的本质特征之后，他对意向活动的结构、意向相关项的结构以及这两种结构之间关系的刻画便成了其现象学描述的主题。

“质素”（hyle）作为“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模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旨在说明作为意向活动之本质要素的意向行为是如何通过激活那些被动地接受来的感觉材料，并赋予它们形式和意义以构造出意向相关项的。胡塞尔的质素理论有两个基本预设：（1）意向活动有两种基本成分或两个基本层次：质素和赋义行为；（2）质素属于意识体验的主体，而非对象的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拒绝使用“感

^{*}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自然化的现象学：理论、实践与方法”（23ZX003）、中国人民大学2024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浩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100872）；李永辉，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 杭州，310058）。

① Cf. J. N. Mohanty, *The Concept of Intentionality*, St. Louis: Warren H. GreenInc, 1972, p.96.

② Cf. J. N. Mohanty, *The Concept of Intentionality*, p.96.

觉予料”(sense data)这个概念,以便与传统的感觉理论划清界限。然而,正是这两个基本的预设,使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陷入了困境,并且招致许多哲学家的批评。当代心灵哲学热衷于分析的“感受质”(qualia)概念与胡塞尔的质素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为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对话和融合提供了契机。

一、胡塞尔的质素理论

质素与感觉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在《逻辑研究》中,为了刻画意向性的本质,胡塞尔使用了“感觉”(Empfindung)这个概念,而且他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并未偏离传统哲学。一方面,他认为“感觉”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意识行为,它只是某些意识行为比如知觉(Wahrnehmen)的内容。因此,作为内容的“感觉”与作为意识行为的“知觉”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能被体验到,而后者只能被反思到。^①另一方面,他在感觉与对象之间做了严格的区分:虽然对象是在“感觉”的基础上通过“立义”构造出来的,但“感觉”本身不是对象,它只为对象提供材料。正是在这两层意义上,胡塞尔强调:“感觉”不是“显象”(Erscheinung),它既不是行为意义上的“显现”(Erscheinen),也不是对象意义上的“显现者”(Erscheinendes)。^②

在《观念I》中,为了刻画意向性的基本结构,也为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将自己与传统哲学家们区别开来,胡塞尔用“Hyle”代替了原先使用的“Empfindung”。前者“被用来标示最宽泛意义上的感觉。它所指称的是这样一些意识内容的总体,这些意识内容通过内在意识的中介而具有‘纯粹材料的特性和功能’”。^③对于胡塞尔来说,“hylé”指的是无形式的内容,它们具有获得形式的潜能。这样的内容有很多,比如,“(1)颜色—材料、触觉—材料和声音—材料;(2)感性的快乐感、疼痛感、痒感等等;(3)‘冲动’(Triebe)领域的感性因素”。^④

依照莫汉蒂的说法,尽管胡塞尔所列出的这些感觉内容并没有告诉我们质素材料究竟是什么东西,但它指出了质素材料的两种一般类型:一种是朝向外部的感觉活动的结果,即胡塞尔所谓的外知觉或“外知觉的展示性内容”,这也是狭义上的感觉;另一种则与身体过程和体验相关联,比如触摸、压迫、温暖、冷以及疼的感觉。胡塞尔也把这样的感觉称为“动感感觉”,他认为在这种感觉中所获得的是动感本身。^⑤虽然质素材料并不是某些我们可以直接意识到的东西,但它们却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成为意识的某些方面。在胡塞尔看来,质素材料本身并无意义,它们是意识的体验性成分,在日常体验中这些成分并不能被直接知觉到,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反思意识到它们。^⑥

那么究竟什么是质素呢?胡塞尔又是如何具体规定它的?分析的现象学家肖恩·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对胡塞尔有关质素概念的论述进行了很好的归纳和总结。接下来,笔者将结合胡塞尔的文本和加拉格尔的解释来具体分析质素概念的内涵。

依照加拉格尔的说法,胡塞尔给出了八条原则来引导我们理解质素概念。

(1)“质素材料是立义—立义内容(Auffassung-Auffassungsinhalt)模型中的内容。”^⑦加拉格尔将这一模型称作意向活动模型(noetic schema)。这一模型的意思是说,质素通过某种具有不同意向特征的意向立义活动而被报告或得到解释。就意向活动来说,它是行为的意向性的来源,它将非意向的质素也就是“僵死的”感觉材料“激活”(beleben),赋予它们形式和统一的意义,从而构造出一个对象来。就

^① Cf. E. Husserl,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irst Book: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F. Kersten, trans.,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82, pp.98-100.

^② Cf. E.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2, J. N. Findlay, trans., D. Moran, corr.,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2001, p.303; 中译本参见[德]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2页。

^③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22页。

^④ E. Husserl,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irst Book: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p.203.

^⑤ Cf. E.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2, p.196.

^⑥ 感觉是可以直接被体验的东西,但质素却只能通过反思获得。这也是感觉与质素的一个区别所在。

^⑦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83.

意向相关项来说，它不是意识体验的实项组成部分，而正是意向活动通过赋予质素形式和意义而构造出来的那个对象，这个对象通常也被称作意向相关物（Intentionales Korrelate）。^① 质素材料和起激活作用的立义都不是知觉对象。毋宁说，它们是构成一个对象之知觉性质的操作基础和必要条件。

（2）“尽管质素是显象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并不一定要被立义所激活或赋予意义。”^② 因此，“存在一些盈余的、不处于意向活动模型中的质素材料。质素材料不只包括那些进入我们的认知过程的质素材料。”加拉格尔认为，胡塞尔的这种观点似乎与当代神经心理学的观点一致，因为当代的神经心理学认为，并非进入生理层面的刺激都能被我们意识到，只有那些与意向投射相关的刺激才可能在意识的层面上得到整合。^③

（3）“质素材料是非一意性向的，但它进入了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中。胡塞尔将它们称为意识的实项成分或要素，它们以某种方式‘呈现’在意识中。”^④ 在胡塞尔看来，意向活动是由质素材料和意向行为两种成分或两个层次构成的。质素材料本身不具有意向性，它并不“指涉某物”，例如，被感觉到的颜色并不指涉任何东西，但它作为体验内容呈现在意识之中。意向行为是意向性的，它指涉某物，通过赋予质素材料形式和意义构造出自己的对象，即意向相关项。质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非理性材料，但是，它们能够通过理性化的方式被通达”。^⑤

（4）“质素材料是只有在反思中才能被抽象地把握到的前反思的体验。”胡塞尔把这种反思称为“质素反思”（hyletic reflection），在这种反思中，质素从它在意向活动模型中的角色里被抽离了出来。质素材料是抽象物。^⑥

（5）“质素材料组成了一个持续变化着的感觉材料（sensed material）流。”^⑦ 胡塞尔区分了“被意指的对象”（the object which is intended）与“如其被意指的对象”（the object as it is intended）。前者通常是指外部世界中的超越的对象，而后者则是指在意向性体验中经受了现象学还原的对象，也即意向相关项，关于它的意向体验随着时间进行在持续变化。因此，作为意向体验之实项成分的质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对胡塞尔花园里的一棵树的颜色的知觉就是“在一个连续多样的颜色感觉中被侧显的”。^⑧

（6）“质素材料始终是一个感觉场或感觉格式塔（Gestalt）中的成员。”^⑨ 在《现象学的心理学》中，胡塞尔指出：“准确地说，属于对象的视觉材料，或者一般地说，属于任何知觉对象的视觉材料，都拥有一个体验的质素统一体，该统一体是一个封闭的感觉场格式塔（Feldgestalt）的统一体。”^⑩ 既然质素材料组成了一个持续变化着的感觉材料流，那么，所有试图以反思的方式将某些特定的质素材料从这个作为统一整体的河流中抽取出来的做法，都必然会打破感觉场格式塔的统一性。

（7）“质素材料被认为总已经在那里存在并始终是可获得的。对于激活它们的意识立义来说，质素材料是预先被给予的。立义是对预先存在的感觉材料的‘激活’。”^⑪ 有时候，厨师早已闻到了烹饪

① Cf. E. Husserl,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irst Book: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p.203.

② E. Husserl,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irst Book: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p.204.

③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84.

④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84.

⑤ Cf. E. Husserl,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irst Book: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p.203, 209.

⑥ Cf.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84.

⑦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85.

⑧ E. Husserl,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irst Book: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p.197.

⑨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85.

⑩ Cf. E. Husserl,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Lectures, Summer Semester, 1925*, J. Scanlon, trans.,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77, p.154.

⑪ E. Husserl,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Lectures, Summer Semester*, p.154.

的芳香，但这种芳香并未在一开始被他所察觉。对他来说，在他意识到这种芳香或者能够对之进行解释之前，这种嗅觉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正在触发他的感觉系统。^①

(8)“质素材料以某种方式与人的身体相关。”^②就质素材料与身体的关系而言，胡塞尔的思想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观念 I》中的观点表明，身体是外在于意识的，它只是纯粹意识与实在世界的一个连接点。^③为了获得纯粹意识，身体必须作为悬置的对象被置于括号之中。因而，质素材料并不属于向意识显现的身体（作为对象的身体），而是意识的实项内容。“质素材料是颜色材料、声音材料、嗅觉材料、疼痛材料等等，它们被纯粹主观地思考，因而不涉及身体器官或任何心理物理之物。”^④在《观念 II》中，胡塞尔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身体现象学，质素与身体的关系也得到了新的理解。质素层次（比如触摸）是直接建立在身体之中的。通过身体，意向成分（比如触摸行为）获得了一种间接的定位，也即位置感觉。对于胡塞尔来说，这种定位意味着身体已经不只是一个物理物体，它还拥有一个心理的层面，以至于当我们提到物理的肉体时，我们是从作为整体的身体中做了一种抽离。为此，他也把身体叫作“主观的客体”（subjektives Objekt）。

二、对胡塞尔质素理论的批评

从本质上来说，胡塞尔所引入的质素概念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发明，相反，它具有非常深厚的哲学史背景。一方面，它带有传统的“感觉论的体验主义”的痕迹；另一方面，它也带有亚里士多德—康德主义的“形质论”（hylomorphic）的残余。^⑤

（一）萨特的批评

萨特完全拒绝了质素概念，他说：胡塞尔“只不过创造了一个杂交的存在，这种存在既遭到了意识的否定，又不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⑥在他看来，只要意识保持着它的透明性，那么任何质料或者类似质料的内容物都不可能在意识中出现。萨特认为只要对象在面对意识，只要意识设定了一个超越的对象，那么在对象这一侧，即世界之中的实在物，它对于意识是不透明的，而在意识那一侧，即我们能够感知的一切，关于对象的内容是透明的。换言之，当我们去“看”世界的时候，世界给予意识的内容完全是清楚分明的，我们不会在意识中“看”到任何不透明物。萨特认为，在本体论上首先存在的是世界，然后才是与世界相互依赖的意识。^⑦

莫汉蒂（J. N. Mohanty）认为，萨特的“意识是虚无的”这一观点包含下述命题：

- a. “意识缺少内容。”
- b. “意识是完全透明的，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透明的。”
- c. “意识不是一个实体，而是纯粹的显现；它就是它所显现为什么的那个东西。”
- d. “整个世界都是外在于意识的。”
- e. “意向性就是超越。”
- f. “意识通过确认对象而否定了它自身，也就是说，意识将对象设定为不同于它自身的东西，并且将其区分为与对象不同的东西。”
- g. “意识既能够将其自身与对象分离开来，又能够将其与自我区分开来。”
- h. “意识缺乏完全的可能性。它是它将是的东西。它永远都先于它自身。”
- i. “意识也设定非实在的东西、缺席的东西和虚构的东西。”^⑧

① Cf.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85.

②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85.

③ Cf. J. N. Mohanty, *The Concept of Intentionality*, p.52.

④ E. Husserl,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Lectures, Summer Semester*, pp.166-167.

⑤ Cf. J. N. Mohanty, *The Concept of Intentionality*, p.74.

⑥ J. P.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Sarah Richmond, trans., New York: Atria Books, 2021, p.17.

⑦ 参见[法]让-保罗·萨特：《自我的超越性——一种现象学描述初探》，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页。

⑧ J. N. Mohanty, *The Concept of Intentionality*, p.135.

萨特认为意向性本身就是超越(e)。超越有两重含义:首先,超越是指对外在于意识的一个存在者的指涉;其次,超越是指意识被推动着去超越存在者(存在者意义上)而指向存在者的意义(存在论意义上)。^①如果意识中的对象不再是那个超越的对象,而只是作为意识内容的对象呢?无疑,这样就会滑落到唯我论当中,世界的实在彻底地依赖于意识的实在。反过来,对象只是超越的对象而不是意识内容的对象,那么意识会被世界所否认,其实在性会因此而消亡。如果说胡塞尔使用质素作为世界与意识之间的过渡,它所拥有的其中一项功能便是区分世界与意识,那么在萨特那里,承担区分世界与意识的功能的应当是意识的超越性(i, h)。萨特希望通过意识的透明性(认识论)来为意识本身和意识中的实在找到一个位置(本体论),并且让世界与意识“重新连接”。因此,让萨特拒绝质素的原因不仅是意识的超越性和质素的功能重叠了,更重要的是另一个原因——意识中看不到质素,意识中充其量只能看到质素的“赋义”。可在萨特那里,质素的赋义即意识中的意义是属于世界的,它是意识通过确认对象而否定自身所产生的(f)。同时,显然世界与质素无关,质素是主观的产物,世界则是自在的客观之物。

因此,虽然萨特对质素的批评立足于他自己的哲学,但他至少指出了关于质素的两个问题:(1)从认识论来说,意识无法直观到质素;(2)从本体论来说,质素既不在世界中,也不在意识中。

(二) 昆汀·史密斯的批评

昆汀·史密斯(Quentin Smith)所指出的问题与萨特非常接近。他认为如果以纯粹现象学来对质素理论进行考察,而不考虑逻辑和对现实的解释性,那么质素就会失去它的理论支撑——对质素层面的直观是不可能的。在史密斯看来,感觉中不仅有作为显现的“什么”(what),还有作为意义的“什么(性)”(whatness),胡塞尔笔下的感觉只关注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从而使得后者摧毁了感觉中无意义的、无法解释的部分。^②

按照胡塞尔的还原方法,当“我”看到某个对象的属性时(比如史密斯举的例子:白纸的白色),“我”不能把这一属性看作属于客观对象,而应把它看作一种纯粹的直观,接着“我”闭上眼睛,在意识中保持住这个直观,这一属性便脱离了原先的对象(现实中的对象)而成为我意识中的内容。但我们能将其称为胡塞尔意义上的“质素复合体”吗?史密斯认为不能,“我”只是通过反思从感觉中把属性抽象出来了而已,如果我们把它还原为与对外界的感觉无关的东西,那么我们事实上只是通过反思意识将它的客观意义替换为了“质素”这个概念的意义。

史密斯的批评难以被反驳。通过对意识的直观发现不了质素,也无法在意识中还原出质素。如果有人声称对质素的直观是可能的,那么他只是把反思意识中的内容当成了感觉意识中的内容——把一个商品的标签贴到了另一个商品上面,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

(三) 基于整体论的批评:古尔维奇与梅洛-庞蒂

古尔维奇(Aron Gurwitsch)和梅洛-庞蒂都认为我们的意识内容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的,在意识层面的内容不可能由无形式的材料所构成。质素的无形式允许任意形式的赋义行为,它不能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知觉内容总是以一定的方式被组织好的。质素根本不必是无形式的,它更应该被看作已经以某种形式被组织好的被给予物。

古尔维奇指出,在我们的内视域(inner horizon)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整体性,修改其中的一部分必然会导致其他部分发生变化,胡塞尔质素理论的问题在于意义变化的同时依然保持材料不变,这是不可能的。^③在古尔维奇看来,胡塞尔的质素理论是一种对感觉材料的恒常性假设(constancy-hypothesis)。

^① Cf. J. N. Mohanty, *The Concept of Intentionality*, p.134.

^② Cf. Q. Smith, “A Phenomenological Examination of Husserl’s Theory of Hyletic Data”, *Philosophy Today*, vol.21, 1977, pp.356-365.

^③ Cf. A. Gurwitsch,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ron Gurwitsch(1901–1973)*. Vol.III,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 Phenomenology of Theme, Thematic Field, and Marginal Consciousness*, Richard M. Zaner, Lester Embree, eds.,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0, pp.265-266.

根据这一假设，我们会对同样的感觉材料采取不同的知觉解释和组织形式。他举了一个真人与假人的例子：我们通过一个窗口看到一个人影，但在看的过程中我们的知觉发生了某种障碍，使得我们有时辨认出是真人，有时辨认出是假人，两种辨认的情况交替出现，没有哪种更优哪种更劣。^①这个例子中的对象没有发生变化，感觉材料依然是那些感觉材料，发生变化的只是对感觉材料的赋义，我们无法得知的是：究竟是什么导致对感觉材料的赋义不一样。但真正的情况应该是：当对同一对象的两种不同的辨认交替出现时，也是两种不同的统觉在出现，它们各自被一些不同的隐含观念所限定，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断定它们来自同样的感觉材料。因此，对感觉材料的恒常性假设是不可靠的。

加拉格尔认为，梅洛-庞蒂从整体论出发对感觉材料的批评同样适用于质素。^②莫汉蒂也持相似的观点：在梅洛-庞蒂那里，感觉已经蕴含了一种意义，它已经在架构之中，没有单纯的感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无意义的质料即质素；尽管梅洛-庞蒂否定了质素作为一种无意义的质料的可能性，但他保留了胡塞尔的赋义和构造观念，并运用他的身体图式这一框架从根本上改造了它们。^③

在加拉格尔看来，梅洛-庞蒂不会同意一种现象上的红色是非客观的，因为感觉性质并不是主观的产物，它们是作为“意向部分”的可感者，从根本上而言属于客观世界，因此意识中并不存在任何所谓的质素材料。^④加拉格尔的观点切中了要害，质素由于是无意义的，故而是非意向性的，我们无法在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中为质素材料找到位置，更无法说明质素到底是如何指向客观世界的。

总的说来，古尔维奇与梅洛-庞蒂的批评有三：（1）意识中没有无意义的内容，所有感性材料都是有意义地分环勾连在一起的；（2）无法在意向性结构中找到质素的位置；（3）质料本身会随着行为的变化而变化。

三、感受质与现象性质

英语中的“qualia”本是一个拉丁词，它源于拉丁词“qualis”的主格中性复数形式，其字面意思是“性质”（qualities），与之对应的英语单数形式是“quale”。那么在现代哲学语境中的感受质（qualia）是什么东西呢？加拉格尔认为它是意识的性质感受或现象性感受，^⑤托马斯·内格尔认为这种体验就是“成为……是什么样的”（what it is like to be）；^⑥或许金在权（Jaegwon Kim）的比喻更为准确，他认为感受质就是维特根斯坦那个“盒子中的甲虫”，我们对私人的、直接可理解的感受质的讨论就像是对那只只有自己能看到的甲虫的讨论一样。^⑦感受质是一种只能从个人体验中才能获得的、直接显现的、非推论的、现象学上的对象的性质。比如颜色，通过语言或者概念来得知一种颜色这一过程是推论的：红色这个语词关联了红色的概念，红色的概念关联了关于红色的记忆。我们没有办法单纯用语言告诉别人一种颜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虽然可以述说我们所看到的某个颜色的物理学性质——它的可见光波的频率是多少，但是在不同人的眼中，也许具备同一物理学性质的颜色不会具备同样的性质。

（一）对感受质的论证

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有两个著名的支持感受质的知识论证：“感受质畸形人论证”和“黑白房间中的玛丽论证”。^⑧弗兰克首先假设存在一个叫弗雷德的人，他的颜色视觉异常强大，他可以把一堆正常人看起来一样的红番茄分成两组。当研究人员把这些番茄的摆放顺序再打乱，弗雷德依然可以把它们分成和之前一样的两组。弗雷德说，这些番茄是两种颜色，分别是红₁和红₂，因此在他眼里，其

① Cf. A. Gurwitsch,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ron Gurwitsch (1901–1973)*. Vol.III,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 Phenomenology of Theme, Thematic Field, and Marginal Consciousness*, pp.261–263.

② Cf.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86.

③ Cf. J. N. Mohanty, *The Concept of Intentionality*, p.140.

④ Cf.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87.

⑤ Cf.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90.

⑥ Cf. T. Nagel,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83, no.4, 1974, pp.435–450.

⑦ Cf. J. Kim, *Philosophy of Min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178.

⑧ Cf. F. Jackson, “Epiphenomenal Qualia”,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32, no.127, 1982, pp.128–130.

他人都是红₁和红₂色盲。我们无法得知弗雷德看到红₁和红₂是怎样的一种体验，也许弗雷德的生理结构跟我们大不一样，但无论如何，他不能说出来红₁和红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我们也看不到红₁和红₂，我们只能看到区分不出两者的红。

如果是因为视觉上的异常才会导致经验无法述说，那正常人的现象经验可以被述说吗？“知名”的科学家玛丽会回答：“不！”玛丽从小生活在一个黑白的房间里，通过黑白的电视看一个黑白的世界，书籍里的图片也是黑白的，但她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她知道一切已发生的、应知的物理信息。她的视觉经验只会由黑和白两种颜色组成，而她拥有一切关于颜色的物理层面的知识，包括物理学、神经科学，诸如此类。当有一天她被从黑白房间里放了出来，她看到了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她会不会学到什么？

弗兰克认为玛丽学到了新的东西，她之前的物理信息有某种不完善性。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弗兰克所指的新东西并不能归属于客观领域，在这一点上，玛丽看到的斑斓色彩和弗雷德看到的红₁和红₂并无什么不同，除非对象的物理属性会随着观测者认知能力的变化而变化，但即便如此，这个新东西依然不能完全处在客观领域内。弗兰克是为了针对物理主义而提出这两个论证的，无论他最终是否达成了他的目的，但他至少在这一点上成功了：在感知过程中存在一个私人的现象层面的内容。

（二）现象性质

不过，关于感受质的如下观点颇受争议：感受质是非关系性的、独立的、中立的心理性质。它像是意识中的一个幽灵，每当我们看、听、吃的时候，它就会飘过来附着在我们所感知的对象上。如果不考虑它的触发条件，那么它与我们的身体、意识和世界无关。丹尼特批评说，尝试把感知过程的一种剩余属性从实际情况中分离出去是感受质的根本错误。^①丹尼特对感受质的这一批评和史密斯对质素材料的批评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纯化意识中的某个内容从而得出一个性质这一行为已经处于反思意识中了，它脱离了具体体验中诸多内容分环勾连的状况。这一行为并不是在感知意识中发生的，性质不应也不能从具体体验中独立出来。

同一个人每次都会对同一种食物有同样的味觉感知吗？相信稍微有点生活经验的人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在经过剧烈劳动之后，之前觉得味道恰到好处的菜肴可能显得不够咸；在四川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一个外地人可能会觉得家乡菜太过清淡。之所以产生这些差异，前者是由于身体状况的不同，后者则涉及理智活动中经验之间的比较。正如梅洛-庞蒂所说：“只有在世界是一个场景而本己身体是不偏不倚的精神能够对其进行认识的一部机械装置的情况下，纯粹感受质才能被给予我们。”^②意识中被给予的内容并不是外在世界的直接投射，轻者附带了身体的信息，重者其本身就彻底被身体改写过。痛觉是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从生物学上讲，一根针所造成的刺痛不过是对痛觉神经的刺激，如果意识是直接感受外界的刺激而没有其他内容的话，那么我们只会感觉到“一个尖锐的物体碰到了我的某个部位”，我们不会对它做出任何反应，而实际上，意识在告诉我们：“‘我’不想要这种感觉，‘我’要逃离这种状况”。部分无痛症患者——例如先天性痛觉缺失症（congenital indifference to pain）——并不是感觉不到疼痛，他们能够知道疼痛的来源和形式以及程度，但他们却不会对此做出反应，他们不会对疼痛厌恶和退缩，这是由于他们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③

如果感受质不被看作是独立存在的，那么它还能是一种性质吗？最初，刘易斯（C. I. Lewis）提出“感受质”一词时就是与感觉材料（sense-data）理论结合使用的，^④它被描述为感觉材料内在的、非表征的

① Cf. D. C. Dennett, “Quining Qualia”,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 Marcel, E. Bisiach,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5.

②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杨大春、张尧均、关德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86-87页。

③ Cf. E. Nagasakoa, Oaklanderb, Dworkinc, “Congenital Insensitivity to Pain: An Updat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 Elsevier Science, 2003, p.213.

④ Cf. C. I. Lewis, *Mind and the World Order: Outline of a Theory of Knowledge*,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29, pp.60-61.

现象性质。似乎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一个小人，这个小人去感觉材料，然后感觉材料呈现出如此这般的样貌。丹尼特将这种情况称之为“笛卡尔的剧场”（Cartesian Theater），剧场中的意向性指向的是演出的舞台，而不是外部世界。^①这个剧场实则是反思意识的剧场，也只有在反思活动中意向性才会指向意识的内容物。出于其意向性的问题，感受质不能被看作感觉材料的性质，而且由于感受质具有身体方面的意义，所以它也不能被看作外界物体的性质。

如果我们认为感受质既不能作为一种性质而存在，也不可以被限制为一种纯粹的现象而存在，那么似乎我们认同丹尼特主张抛弃感受质的观点。但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关注感受质的私人性和现象特征。通过后者去限制感受质自然是有问题的，但通过前者的边界限制感受质却是可能的。

四、质素、感受质与身体

在加拉格尔看来，分析哲学家关于感受质的争论和现象学家关于质素的争论非常相似，胡塞尔的质素概念以某种方式与分析哲学中的感受质问题关联在一起：看红色与看绿色有不同的感受，喝红葡萄酒与喝白葡萄酒有不同的感受，听钢琴与听小提琴有不同的感受。“在不同情况下，似乎存在着属于体验本身的不同性质特征。”^②他认为，质素与感受质之间即使不完全相同，也存在着某些相似性。

（1）它们都被看作前反思体验或一阶（现象性）体验的质料，它们都可以通过反思或内省获得；

（2）它们都包含感觉体验：颜色、声音、味道；

（3）它们在同样的意义上都被认为是非实存的；

（4）它们都是抽象的产物；

（5）它们或者都是一种误解，即把对象性的 / 意向的性质错误地当成了内在的或现象性的性质。^③

加拉格尔认为质素概念与感受质概念并非完全同一的，二者间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质素更像是某种支撑感受质的东西。例如，某种能够使我们体验到红色的红（redness）或巧克力味道的东西。^④质素是一种感觉材料，而感受质是这种感觉材料的现象性质。

在加拉格尔看来，不论是胡塞尔的质素学说，还是反对质素与感受质的各种批评，就体验某个东西“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而言，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忽视了身体的作用。^⑤而只有坚持一种生成现象学（enactive phenomenology）的立场，将身体置于讨论的中心，才能真正完善胡塞尔的质素学说，并为质素和感受质的存在提供一种更加合理的辩护。

通过先验还原，胡塞尔将纯粹意识与身体剥离开来，身体成了一个被悬置的对象。因此，胡塞尔在阐释其质料理论时，并未把躯体感觉体验（somaesthetic experiences）这样的具体体验纳入考虑之中。胡塞尔的批评者如萨特和梅洛-庞蒂坚持认为质素材料是抽象物，它们无法在意识体验中被找到，因而他们“错误地将质素体验与对象的或显现着的感受—性质等同了起来，而这些性质本来属于对象领域，并且只能意向性地在意识中显现”。正是基于这种解读，（质素或感受质）“是什么样的”（*what it is like*）问题就变成了“它”（对象）是什么样的（*what it is like*）问题。^⑥

加拉格尔指出，不论是胡塞尔，还是他的批评者，由于都忽视了躯体感觉的质素体验，所以其质素理论都是片面的，而且也是不完备的。加拉格尔以伴有眼疲劳的头疼体验为例：当一个人用眼过度而感到疲劳时，在他感到头“疼”之前，这种躯体感觉就已经是一种质素体验了。他可能已经体验到正在阅读的文本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房间里的光线似乎也变得越来越暗淡。但是，这些体验并不意味着文本或灯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成为……是什么样的’（*what it is like*）不能被还原为文本或灯光

① Cf. D. C. Dennett, “A History of Qualia”, Publish Online: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7, p.4.

②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90.

③ Cf.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p.89-90.

④ Cf.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89, 93.

⑤ Cf.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93.

⑥ Cf.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94.

的质的属性。”^①而且，当这种质素体验被解释为头疼时，它并没有消失，而就在现时地进行着。因此，质素能够被体验到，它不是一个抽象物。

与梅洛-庞蒂一样，加拉格尔区分了“作为客体的身体”（body-as-object）和“作为主体的身体”（body-as-subject）。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以反思白纸的白的方式去反思这种伴有眼疲劳的头疼体验，并把疼痛的质素与其他体验内容区分开来，那么我们所获得的疼痛只是我们作为客体的身体的疼痛，是作为客体的身体的一种对象性特征，也即我知觉为在我的身体中或者朝向我的身体而发生的那些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抽象物，是客体的一种抽象的属性。然而，质素不是作为客体的身体的对象性特征，而是作为主体的身体的真实的体验，即对体验世界的方式有所影响的那些身体体验，它是一种具身体验。加拉格尔以腿疼为例指出，通常，躯体感觉材料并非孤立自存的，而是与其他质素体验共同构成了一个感觉场或联觉场。^②“拾级上山的结果是这样一种知觉，它是由我的痛苦、我的饥饿、我的栴风沐雨、疲乏、迟缓、举步维艰、满负行囊等感受共同构成的[……]。经过一晚的休整，山路看上去就相当不同了，它不再陡峭，也不再令人生畏。这种改变不是因为道路的物理性质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我的身体的（质素的）状态发生了变化。这些质素的方面是我的知觉的限定条件。”^③

因此，意向性与质素体验或躯体感觉体验之间的交互调节关系意味着，“我能做什么限定了我知觉事物的方式，而我能做什么本身不仅是由我的身体的物理状态限定的，而且也是由我所处的特定状态的‘成为……是什么样子’所限定的。胡塞尔所谓的‘我能’（I can）以及吉普森所谓的我的‘可供性’（affordance），不仅是由知觉运动依赖性（contingencies）所规定的，而且也是由前意向活动的质素—躯体感觉的要素所规定的。”^④颜色的体验并不单纯是对颜色的抽象，而是在纯粹意识中感受到的、现象性的颜色的质。躯体感觉会影响我们对对象的感受。如果我饿了，我可能会觉得眼前苹果树上的苹果的红格外鲜艳，那是一种诱人的红、令人垂涎欲滴的红。一个法官是饥肠辘辘，还是酒足饭饱，有时会影响判决的结果。^⑤

综上，加拉格尔认为，质素体验、躯体感觉和感受质在我们的知觉和认知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为我们的知觉、行动可能性和认知可能性划定了界限。依照“大脑—身体—环境”模型，生成现象学会认为：“对X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所报告的不仅是认知能力（记忆、想象、辨认）的‘知道—如何’（know-how），而且也是对介入世界之不同行动的‘知道—如何’（‘我能’或可供性）。”^⑥生成现象学并不反对质素或感受质这样的“像是什么”（what it is like），而是认为仍然存在着“某种像是什么的东西”（something it is like）。不过，它所关心的不是“某物”（it）是什么样的，而是当我体验X时“我”（I）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不是纯粹意识，而是具身主体。换言之，对生成现象学来说，质素或感受质问题可以表述为：对我来说（for me），对这个与世界打交道的具身主体来说，对X的体验是什么样的。^⑦

五、“质素—身体图式—感受质”模型

沿着加拉格尔的思路，一个以先验形式构造现象经验的模型的雏形随之显现了出来。质素现象学自然是属于先验的部分，感受质（或者感受质的类似物）则是现象内容的本质之物。梅洛-庞蒂式的身体图式像是一种加工图纸，它位于两者之间，既作为我们意识主动加工的根据，也是这一活动本身。由于这三个概念本身并不连贯，甚至它们分别就出自三个不同的背景，所以“质素—身体图式—感受质”这一模型依然十分粗糙，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且仅限于知觉范围内。但以下这一点非常明确：质素、

①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95.

② Cf.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p.94-95.

③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96.

④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p.96-97.

⑤ Cf.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98.

⑥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98.

⑦ Cf. S.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p.98-99.

身体图式、感受质能够相互说明，对于任何知觉例子来说，以三者为基础构建的模型都能提供更全面的解释。如果我们认可质素是一个可能的设想，即便我们不认可加拉格尔对胡塞尔质素概念的解读，仅仅只是站在“形成直观内容之前存在一个有待赋义的对象”（P1）这一极简立场上，那么这也等于承诺了一种康德所说的自发性，它所赋予的“意义”能在现象中被理解（接受性），成为我们行动的理由与理智能力的作用对象。自发性与接受性的结合并非仅在先验与现象之间，而是同时具有先验性质，并通向现象内容。除非采纳极端唯心论，否则这一结合只有在身体——最贴近主观意识的现实存在中才可获得合理解释。

一旦质素与身体的关系得到了澄清，它与身体图式之间的关系也就随之变得清楚了。在梅洛-庞蒂的讨论中，身体图式作为“知道—如何”（know-how）的可供性显现，为行动提供依据和驱动力。这种显现向意识传递意义，而意义既然是意识内容，便可反思、论述并改写。当一块砖头忽然向我飞来，我看到它时，它对我而言便具有了“我要躲闪”的意义，它“激活”了我的身体图式，我的身体正在做躲闪的准备（无论这一动作在物理上是否可能）；但或许我有心寻死，或许我辨识出这是一块棉花做的砖头，此时它对我的意义必然会发生变化。一旦内容进入意识当中，它总会允许理智能力对它进行加工，赋予其意义。意识之中显然有部分内容来自意识之外，且不在现实之中。在一些例子中，它们与身体有关，因此上文的命题 P1 可以进一步表述为 P2：形成直观内容之前存在一个有待赋义的某物，而这一赋义的工作可以由身体图式来完成。

若质素需要先验赋义形式和身体作为空间，那么身体图式则是这一条件的体现。相比知识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a），质素和身体图式的相互说明更接近“实际性”（Faktizität），更能解释现象内容的来源。否定质素存在会令身体图式难以解释经验内容的来源，除非将其视为不可分析的神秘之物。

用“质素—身体图式”的模型来看，即从一个先验的角度出发，把感受质理解为一种不可言喻、不可表征的经验内容是非常恰当的。^①认为感受质与语言概念是推论关系可能会陷入传统的“感觉材料”困境，因为语言无法完整描述现象内容，例如“红色砖头飞来”仅部分传达了意识中的内容。现象意义和概念意义完全异质，但两者连接自如，暗示部分图式可以是经验性的并能够被习得。

戴维森认为概念图式就是真的语句链接而成的网络，他通过批评概念图式来批评经验主义中的图式和内容之分的二元论，^②但他没有考虑到概念图式是一种动态的、弹性的结构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不会把某个特定数值的物理属性的颜色看作“红色”，一旦它的数值稍微变化，它就被看作另一种颜色。在现象层面，概念图式给我们的直观是有组织的内容，它背后需要有一个先验图式（如胡塞尔的先验逻辑），否则无法说明这些经验内容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也同样无法说明意识依据什么来修改概念网络，更无法说明它为何是动态的且是弹性的，除非认为这一切都是“碰巧如此”。经验内容可以被用来描述这个先验图式，但它们不会直接告诉我们这个先验图式本身的样貌。

感受质与“质素—身体图式”的关系表明，不同性质间无法直接关联，但感受质因具备某种形式才能与图式结合。通过引入“质素—身体图式”，对感受质的直观被视为身体对对象的在先理解，此理解先于意识而非理智能力。尽管“质素—身体图式—感受质”这一模型目前尚不完善，对于一些身体意义不明显的知觉例子，它并不具备完全的解释能力，但这一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先验内容与经验内容、身体与意识、感觉与知识之间的鸿沟。诸多知觉例子表明，这一模型能够给我们提供系统化的解释。

责任编辑：罗 苹

^① 参见江怡：《感受质与知识的表达》，《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② 参见[美]唐纳德·戴维森：《真理、意义与方法——戴维森哲学文选》，牟博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55-262页。

再论数学史与科学史的关系^{*}

朱一文

〔摘要〕现代科学史学科的先驱萨顿把数学史视作科学史的骨架和核心，但又指出在实际的研究和教学中，数学史并非科学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萨顿观点的历史和理论根源在于：除了天文学，其他古代科学似乎都与数学无关；17世纪现代科学兴起之后，通过“自然数学化”的过程，更多科学与数学发生了联系。然而，这些看法实际误用了19世纪下半叶才产生的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分野，从而把数学理解为工具、把科学理解为数学的应用。其实，非数学活动中产生的数学知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并非简单地应用数学活动中的知识。萨顿之后，现代科学史研究逐渐转向关心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外史研究，从而在综合性的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站在了靠近历史学这边；现代数学史研究虽历经反辉格解释、实作转向等变化，但终究站在历史学与数学中间。因此，发展路径和取向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数学史研究与科学史研究渐行渐远。其实，以数学知识的多样性为研究视角，以数学实作为分析工具，数学史就不仅与科学史，甚至与其他一般历史都关系密切。从理论上讲，澄清“纯数学与应用数学分野具有普适性”的误解也有助于推进“数学的发展与其实用性的关系”“数学可应用于科学的原因”两个重要议题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数学史 科学史 萨顿 数学实作 非数学活动

〔中图分类号〕O1-0；N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058-09

数学史与科学史关系这一议题实际涉及对整个科学史或者文明史的理解。现代科学史学科的先驱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一方面认为数学史应该是整个科学史的核心，离开了数学史的科学史就失去了支撑其他部分的骨架；另一方面又指出在现实的情况下数学史与其他科学史有本质不同，数学史不是科学史的一部分，而且教授科学史的教师往往忽视数学史。^①萨顿这里谈到了两种情况：说数学史是科学史的骨架和核心，这是从学理上讲的理想状况；而说数学史不是科学史的一部分，这是就实际研究情况而论的。^②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实际研究层面探讨了数学史与科学史的关系。^③格拉坦吉尼斯（Ivor Grattan-Guinness）从多方面分析了科学史研究中缺失数学史的情况和原因，并提出科学史应该关

^{*} 本文系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之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科学通史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粤教高函[2024]30号）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朱一文，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教授（广东 广州，501275）。

① George Sart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36, p.4.

② 由此可见，萨顿充分认识到了数学史与科学史的复杂性，而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简单把数学史视作科学史的一部分。参见 Amir Alexander, “The Skeleton in the Closet. Should Historians of Science Care about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SIS*, vol.102, no.3, 2011, pp.475-480.

③ 2011年，国际科学史界的旗舰刊物 *ISIS* 特设焦点（即 Focus）专题《数学史与科学史》，发表了六篇文章讨论两者关系。

心数学史。^① 加里 (Jeremy Gary) 指出现代数学史研究与现代科学史研究是独立展开的, 而要研究数学家实际怎么做、现代数学的抽象性来源, 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② 曼恩 (Tony Mann) 分析了英国数学史研究的多样性, 进而指出这一多样性不仅对数学史, 而且对科学史有影响, 并且近年来研究科学史中的数学实作 (mathematical practice) 是学界的显著特征。^③ 亚历山大 (Amir Alexander) 指出近年来学界不把数学看作科学的静态骨架, 而是将其视作与科学一样的动态领域, 这一路线既推进了数学的文化研究, 又重建了数学史与科学史的关系。^④ 斋藤文一 (Fumikazu Saito) 也认为数学史研究应该采取科学史的语境化研究进路, 并关注数学实作。^⑤ 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都认为数学史应该是科学史的一部分, 并且研究数学实作是将两者结合的有效研究进路。

十余年来, 笔者在中山大学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数学史》《科学史》课程, 又在研究中积累了对于两者关系的认识, 深感此议题之重要, 但又讨论未尽。笔者认为如数学史与数学哲学的关系一样, 数学实作确实是数学史与科学史结合的途径, 但这一研究路线的实施其实既依赖于对数学史若干误解的澄清, 又依赖于对数学史新研究方法和框架的使用, 而且与若干理论议题密切相关。^⑥ 故撰此文, 从学理和实际研究状况两方面进一步分析数学史与科学史之关系, 以推进学界之研究。

一、既往研究中数学与科学的关系

萨顿所谓数学史与科学史两种情况实际有更深的历史与理论根源。^⑦ 一方面, 萨顿认为所谓的数学史并不是科学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观念, 是在惠威尔意义上 (in the Whewellian sense) 形成的。惠威尔 (William Whewell, 1794—1866) 是 19 世纪英国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由于惠威尔认为数学是演绎而非归纳的, 故在其著作《归纳科学的历史》中直接排除了数学史。^⑧ 该著作所论及的归纳科学, 主要就是希腊时期的力学、流体静力学、天文学以及之后的物理学、炼金术、化学等学科。因此, 格拉坦吉尼斯认为所谓惠威尔意义上, 就是说把科学史理解成各分科史的总和 (the sum of the histories of special sciences), 从而数学史并非科学史不可分割的骨架和核心。^⑨ 在惠威尔思想的基础上, 萨顿和格拉坦吉尼斯都提到了实际科学史研究和教学中缺失数学史的情况, 格拉坦吉尼斯更把原因直接归结到数学教育上。^⑩ 另一方面, 萨顿认为数学史是科学史的骨架与核心, 是就数学是科学的内核而言的, 他认为数学给了科学无法取代的统一性和凝聚性。^⑪ 格拉坦吉尼斯进一步明确说: 在历史中, 思想史是重要的; 在思想史中, 科学是重要的; 在科学中, 物理科学是重要的; 在物理学科中, 数学又是重要的。

① Ivor Grattan-Guinness, “Does History of Science Trea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e Case of Mathematics. History of Science*, vol.28, no.2, 1990, pp.149-173.

② Jeremy Gray,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History of Science Reunited?”, *ISIS*, vol.102, no.3, 2011, pp.511-517.

③ Tony Man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History of Science”, *ISIS*, vol.102, no.3, 2011, pp.518-526.

④ Amir Alexander, “The Skeleton in the Closet. Should Historians of Science Care about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SIS*, vol.102, no.3, 2011, pp.475-480.

⑤ Fumikazu Saito,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Remarks Concerning Contextual Framework”, *Educação Matemática Pesquisa*, vol.14, no.3, 2012, pp.363-385.

⑥ 参见笔者的四篇文章, 分别是朱一文:《再论数学史与数学哲学的关系》,《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11期;《史料与方法: 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新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第3期;“How Do We Understand Mathematical Practices in Non-mathematical Fields? Reflections Inspired by Cases from 12th and 13th Century China”, *Historia Mathematica*, vol.52, 2020, pp.1-25;《关于数学史的三大误解》,《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年第11期。

⑦ 此处所谓的“历史与理论根源”是指: 萨顿的研究一方面受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对数学和科学普遍理解的观念影响, 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刚刚开展的数学史研究和科学史研究的影响。

⑧ William Whewell, *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75, p.53.

⑨ Ivor Grattan-Guinness, “Does History of Science Trea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e Case of Mathematics. History of Science*, vol.28, no.2, 1990, p.153.

⑩ Ivor Grattan-Guinness, “Does History of Science Trea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e Case of Mathematics. History of Science*, vol.28, no.2, 1990, pp.155-158.

⑪ George Sart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36, p.4.

因此,在历史发展中,数学几乎是知识的顶点。^①这就是把现代数学与科学的关系(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和核心)延伸到数学史与科学史的关系上。

由此可见,萨顿的两种数学史与科学史的关系是基于两种对数学与科学关系的理解。当从惠威尔的角度认为数学与其他科学无关时,那么数学史就不是科学史必需的一部分;当从现代数理科学的角度认为数学是其他科学的基础时,那么数学史就是科学史的核心。萨顿的看法无疑受到20世纪初科学发展的影响,由此认为数学应该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即暗示数学化是所有科学发展的方向),数学史亦是科学史的核心,而由于研究和教学中的缺陷才使得实际状况没有达到这一理想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萨顿时期的现代科学史研究刚刚展开,因此其看法受制于当时的时代而未尽完善。萨顿之后,科学史研究蓬勃发展,使得今人获得了对于科学史更深的理解。根据这些研究,如果把17世纪以来的科学称作现代科学,把在此之前的科学称作古代科学,那么两者与数学的关系大体上就对应了萨顿所说的两种情况,即古代科学中主要是天文学与数学有关,而现代科学普遍以数学为基础。人类最早的两个文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和数学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天文学。20世纪50年代,诺伊格鲍尔(Otto Neugebauer, 1899—1990)的《上古时代的精密科学》(1957)着重论述了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与天文学,并将两者合称为精密科学。^②20世纪20年代,希斯(Thomas Heath, 1861—1940)的《希腊数学史》(1921)中指出古希腊的数学指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项内容,并给出它们之间的演变关系。^③这些内容中属于自然科学的也仅有天文学,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的物理学等学科并不使用数学。中国自古以来天算不分家。20世纪30年代,李俨(1892—1963)、钱宝琮(1892—1974)的数学史著作均提及也仅提及天文学内容。^④印度数学早期核心文献《绳法经》(*Śulbasūtras*)是吠陀经典,之后的核心人物[如阿耶波多(Āryabhaṭa, 476—550)、婆罗摩笈多(Brahmagupta, 598—668)等]和文献均与天文学有关。^⑤融合继承东西方文明的伊斯兰科学中与数学有关的部分主要是运用于天文学的三角学与球面几何学。^⑥由此可见,萨顿之后的科学史研究基本揭示出在五个主要古代文明(即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之后的古希腊文明为一组,古代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为另一组)及之后兴起的伊斯兰文明中,数学与天文学都有密切关系。由于这些研究往往采取了“纯数学—应用数学”的分野,因此将天文学视作数学的应用,是以数学为基础的,^⑦而在此以外的其他科学则往往与数学无关。

这一情形与17世纪以来兴起的现代科学有根本性的不同。学界揭示出现代科学经历了所谓“自然数学化”的过程。^⑧自然数学化不仅是把数学应用到科学上去,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预设和

① Ivor Grattan-Guinness, “Does History of Science Trea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e Case of Mathematics. History of Science*, vol.28, no.2, 1990, p.168.

② Otto Neugebauer, *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 2nd editio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9, p.viii.

③ Thomas Heath, *A History of Greek Mathematics*, Volume 1,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1, pp.11-13.

④ 李俨:《中国算学史》,《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1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钱宝琮:《中国算学史》上编,《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1卷。

⑤ 印度数学早期发展与宗教有关,之后进入数理天文学阶段,再之后方才出现纯数学著作。关于印度古代数学文献和印度数学史研究,可参见 Victor Katz, et al., eds., *The Mathematics of Egypt, Mesopotamia, China, India, and Islam. A Sourcebook*,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386-479.

⑥ J. L. Berggren, *Episodes in the Mathematics of Medieval Islam*,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6.

⑦ 按克莱因的说法,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分野其实是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参见[美]莫里斯·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4册,邓东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12-113页。这一时代特征无疑影响到了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以上提到的这些著作普遍采用了“纯数学—应用数学”这一分析框架,例如 George Sart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p.101; Otto Neugebauer, *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 2nd edition, p.103; Thomas Heath, *A History of Greek Mathematics*, Volume 1, p.vii; J. L. Berggren, *Episodes in the Mathematics of Medieval Islam*, p.12.

⑧ 关于自然数学化主题的探讨,可参见郝刘祥:《自然的数学化:关于科学革命编史纲领的探讨》,《科学文化评论》2014年第5期;晋世翔:《“自然数学化”与“新实验运动”》,《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8期。也可参见[荷]H·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由于自然数学化与

世界观的转变。这正如现代科学的开创性人物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在《试金者》(*Il Saggiatore*, 1623) 一书中所认为的: 自然是由数学语言写就的, 它的字母是三角形、圆形和其他几何图形。^① 自然数学化亦被认为是所谓科学革命的主线, 而其顶点就是牛顿 (Isaac Newton, 1642—1727) 的工作, 最终通过万有引力理论把原先分开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合二为一, 从而也实现了物理学的数学化。^② 自然数学化使得数学与科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 由此数学史方逐渐成为萨顿意义上科学史的骨架与核心。此外必须指出的是, 现代数学其实与古代数学有根本的区别, 而自然数学化使用的是现代数学。各古代文明的数学都是以物质工具为基础的实物数学,^③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数学完成了符号化和文本化的进程, 从而顺利地通向了现代数学之路。^④ 有学者认为是否符号化代表了抽象程度的高低,^⑤ 这一看法其实不够准确。从数学哲学的角度看, 不同的数学表征 (物质工具、图像、文字、符号等) 可以抓住不同的数学内容。^⑥ 不同数学表征之间的差别可以用“表征粒度” (representational granularity) 的高低来刻画 (即近似于今日之图像分辨率)。^⑦ 符号无疑具有更好的表征粒度, 因此可以更好地抓住自然数学化意义上的物理实在。

18 世纪的数学家和科学家欧拉 (Leonhard Euler, 1707—1783) 发展了微积分, 并将之运用于科学, 从而使得数学分析成为一个新的独立数学领域, 并且居于数学和科学体系中的核心位置。^⑧ 其后拉格朗日 (Joseph-Louis Lagrange, 1736—1813) 的《分析力学》(*Mécanique analytique*, 1788) 和拉普拉斯 (Pierre-Simon Laplace, 1749—1827) 的《宇宙系浅说》(*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 1796) 都把力学与宇宙学视作数学分析的分支。^⑨ 因此, 这些被数学化的科学领域都成为数学的一部分。这一历史发展集中反映在蒙特卡 (Jean-Étienne Montucla, 1725—1799) 所撰写的《数学史》(*Histoire des Mathématiques*, 1758) 之中。该著作把光学、力学、天文学等被数学化的学科都纳入其中, 实际上相当于从数学的角度撰写了科学史。^⑩ 在此意义上, 数学史与科学史已经合二为一。19 世纪以后, 更多的学科 (如化学、生物学) 被数学化; 与此同时, 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分野开始出现, 那些被数学化的学

科学革命密切相关, 也有学者认为该过程并非 17 世纪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参见 Sophie Roux, “Forms of Mathematization (14th-17th Centuries)”, *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15, no.4, 2010, pp.319-337.

① 伽利略说: “Philosophy is written in this grand book, the universe, which stands continually open to our gaze. But the book cannot be understood unless one first learns to comprehend the language and read the letters in which it is composed. It is written in 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and its characters are triangles, circles, and other geometric figures without which it is humanly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a single word of it; without these, one wanders about a dark labyrinth.” Stillman Drake, trans.,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57, pp.237-238.

② 郝刘祥:《自然的数学化: 关于科学革命编史纲领的探讨》,《科学文化评论》2014 年第 5 期。

③ 关于此议题, 可参见朱一文:《数学的语言: 筹算与文本——以天元术为中心》,《九州学林》2010 年第 4 期。

④ 除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数学完成符号化、文本化, 随后进入现代数学之外, 还有日本和算的例子。在中国宋元数学的基础上, 江户时期日本发展出和算, 而其第一步也是符号化和文本化, 即所谓旁书法。参见李文林:《数学史概论》第 2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第 130 页; 徐泽林译注:《和算选粹》,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第 23 页。

⑤ Salomon Bochner, *The Role of Mathematics in the Rise of Science*, Princeton &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8.

⑥ 关于数学表征与数学内容的关系, 参见 James Robert Brown,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93-97; Zhu Yiwen (朱一文), “How do We Understand Mathematical Practices in Non-mathematical Fields? Reflections Inspired by Cases from 12th and 13th Century China”, *Historia Mathematica*, vol.52, 2020, pp.12-13.

⑦ 关于表征粒度, 参见 Kenneth Manders, “Diagram Contents and Representational Granularity”, Jerry Seligman, Dag Westerståhl, eds., *Logic, Language and Computation*, Volume 1,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1996, pp.389-404.

⑧ Giovanni Ferraro, “Euler and the Structure of Mathematics”, *Historia Mathematica*, vol.50, 2020, pp.2-24.

⑨ [美] 莫里斯·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 2 册, 邓东皋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 第 373-374 页。

⑩ Ivor Grattan-Guinness, ed., *Landmark Writings in Western Mathematics, 1640-1940*, Amsterdam: Elsevier, 2005, pp.292-302. 萨顿称之为从数学角度撰写的科学史。参见 George Sarton, “Montucla (1725-1799): His Life and Works”, *Osiris*, no.1, 1936, pp.519-567.

科往往被视作数学的应用,数学史与科学史的紧密关系范围逐渐扩大。^①这也就是萨顿理解两者关系的历史背景,于是数学史作为科学史的骨架和核心成为历史发展的应有之意。

综上所述,从科学史的宏大叙事来看,数学与科学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逐渐密切的过程,由此数学史与科学史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这就是萨顿对两者关系两种理解的历史和理论根源。但在实际的情况下,数学史研究与科学史研究却往往是分离的。其原因除了萨顿提到的数学太难,或格拉坦吉尼斯认为的历史学家害怕数学、数学教育的不足之外,实际还有对数学应用性的误解。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分野,这直接影响到萨顿及其同时代学者对科学的理解与现代科学史的研究。一旦把数学理解为应用于科学的工具,那么作为工具书的数学史就可独立撰写和研究(如古代数学史与科学史);即便对于已经数学化的科学,数学史与科学史也仅是元素与合集而非互相融合的关系(如现代数学史与科学史),故数学史也就不必是科学史不可分割的骨架和核心。^②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数学史与科学史的理想与现实关系之间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在今天实际的研究和教学中仍然存在。

二、数学史研究与科学史研究的关系

亚历山大认为萨顿之后,当科学史研究开始探索科学的文化根源而非理性结构时,数学史研究就开始被边缘化并最终被排除在科学史之外。^③格拉坦吉尼斯则把数学史研究称之为“少数人学科的经典案例”(a classical example of a ghetto subject):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数学太多了,但对于数学家来说历史太多了。^④这些看法涉及萨顿之后科学史研究与数学史研究的发展,其中蕴含对于“数学”认识的观念变化,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萨顿把科学史(包括数学史)理解为人类历史中唯一累积进步的历史,^⑤这即所谓实证主义的成就史或者辉格史,其缺陷在于忽视了科学史上的失败案例。^⑥之后,以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 1892—1964)为代表的科学思想史路线,用概念分析的方法研究科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弥补了成就史不关注“失败”的缺陷。^⑦1931年,在伦敦举行的第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苏联学者赫森(Boris Hessen, 1893—1936)发表了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开创了以马克思理论研究科学史的先河。默顿(Robert Merton, 1910—2003)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引领了科学社会史的风气,开始关注实证成就史、思想史等较少影响科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提出范式(paradigm)的概念,推进了社会史研究路线;又把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结合起来,揭示了原先科学史研究中本体论承诺的问题,推动了反辉格史、知识建构论等方向的发展。夏平(Steven Shapin)和谢弗(Simon Schaffer)的《利维坦和空气泵》(1985)意图消解影响科学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之界限。20世纪70年代从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共同兴起的实作转向(The Practice Turn)最终波及科学史研究,又推动了物质工具、科学仪器及其实作、

① 阿尔都塞批判了当代哲学家和科学家对数学应用性的误解,指出该理解暗示了数学是一种工具、方法、语言或技术,但其实数学是一种理论物理的存在。因此,他认为数学与自然科学不是应用性关系(relation of application),而是构造性关系(relation of constitution)。参见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0, pp.86-88。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而且印证了数学史与科学史合二为一的判断。

② 这就是加里所说现代数学史研究与现代科学史研究是独立开展的原因。参见 Jeremy Gray,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History of Science Reunited?”, *JSSS*, vol.102, no.3, 2011, pp.511-517。

③ Amir Alexander, “The Skeleton in the Closet. Should Historians of Science Care about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JSSS*, vol.102, no.3, 2011, pp.475-480。

④ Ivor Grattan-Guinness, “Does History of Science Trea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e Case of Mathematics. History of Science*, vol.28, no.2, 1990, p.158。

⑤ [美]G·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陈恒六、仲维光编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45页。

⑥ Jacqueline Stedall,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Introduction。

⑦ 例如,[法]亚历山大·科瓦雷:《牛顿研究》,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前言。

视觉、图像与文本文化等方面研究取向的发展。^①总体而言,萨顿之后的科学史研究逐渐由内史走向外史,以至于在2013年英国曼彻斯特举办的第24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张夏硕(Hasok Chang)提出让科学回归科学史,并指出没有科学的科学史是不完整的,将会被淘汰而并入综合性的历史学之中。^②

萨顿及其之后一段时间内的数学史研究确实都是实证主义的辉格史,其本质是把古代数学定位为现代数学的低级阶段。^③诺伊格鲍尔的《上古时代的精密科学》就是属于这一研究路线的作品。1975年,温古鲁(Sabetai Unguru)撰文批评学界对于古希腊数学的现代代数学解释,^④在数学史界引起极大的争论。之后,数学史研究中的反辉格倾向愈演愈烈,逐渐波及自古以来所有地区和时代的研究领域。美索不达米亚数学史家罗伯森(Eleanor Robson)认为辉格史的本质是采取数学柏拉图主义立场,即历史学家从历史记录中甄别出“柏拉图的数学对象”,并且用今天的数学术语进行描述。在此意义上,数学家是发现数学真理,而数学史家则是发现历史记录中的对应部分。罗伯森进而指出20世纪50年代美索不达米亚数学史研究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旦解释被做出了,即古代文献被用现代符号重写之后,就没有任何可说的了。这个领域(即巴比伦数学史研究)便停滞了几十年。”^⑤古埃及数学史家伊姆豪森(Annette Imhausen)则认为不应该只有一种数学的柏拉图主义立场。^⑥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实作转向也波及数学史领域。林力娜(Karine Chemla)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把数学实作作为研究数学史的有力工具。^⑦泡芙克(Kim Plofker)的印度数学史研究和内兹(Reviel Netz)的古希腊数学史研究也有类似特点。^⑧笔者也以数学实作作为工具研究中国古代筹算以及儒家经典文献中的数学知识。^⑨2021年,论文集《数学史中的反时代性问题:关于数学文本的历史解释论文集》出版,标志着数学史已经从反辉格倾向发展到反时代性。^⑩由此可见,数学史家不再单项地接受数学哲学某一理论的影响,而是去思考“现代数学的解释限度”“是否只有一种数学”等哲学问题。

综上所述,数学史研究与科学史研究两者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步性(如都有反辉格倾向、都受到实作转向的影响等),而并非如亚历山大等学者认为的,在科学史研究转向外史研究时,数学史研究缺席了。其实,两学关系疏远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史研究走向外史的发展使其逐渐丢掉了科学。既然科学史与科学都无关了,又如何能期望它与数学或数学史有关呢?与之相比,数学史研究尽管也有外史

① 关于实作转向,可以参见以下两本书: Theodore R. Schatzki, Karin Knorr Cetina, Eike Von Savigny, eds.,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Léna Soler, Sjoerd Zwart, Michael Lynch, Vincent Israel-Jost, *Science After the Practice Turn in the Philosophy,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2020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第九届欧洲科学史学会年会,其主题即是“科学的视觉、物质和感官文化”(Visual, Material and Sensory Cultures of Sciences),说明这一研究路线已经成为国际科学史界的主流。

② 张夏硕:《让科学回归科学史》,储姗姗、杨帆译,孙小淳校,《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5期。

③ 关于数学史中辉格解释的分析,可以参见朱一文:《史料与方法: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新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第3期。

④ Sabetai Unguru, “On the Need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Greek Mathematics”, *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vol.15, no.1, 1975, pp.67-114.

⑤ Eleanor Robson, *Mathematics in Ancient Iraq: A Social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reface.

⑥ Annette Imhausen, *Mathematics in Ancient Egypt, 3200 BC- AD 395: A Contextual History*, Mainz: 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ät, 2008, p.9.

⑦ Karine Chemla, “Observing Mathematical Practices as a Key to Mining Our Sources and Conducting Conceptual History: Division in Ancient China as a Case Study”, Léna Soler, Sjoerd Zwart, Michael Lynch, Vincent Israel-Jost, *Science After the Practice Turn in the Philosophy,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pp.238-268.

⑧ Kim Plofker, *Mathematics in Indi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Reviel Netz, *A New History of Greek Mathe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⑨ 朱一文:《算学与经学:中国数学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

⑩ 该文集包含了11篇从各古代文明、不同时段出发讨论反时代性问题的数学史论文。参见 Niccolò Guicciardini, *Anachronisms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thematics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笔者认为反辉格主要是指不以现代数学去解释古代数学,而反时代性则是说在数学的发展中总有后人以当时的数学去解释以前的数学。因此,对反时代性的讨论不仅包含了之前关于反辉格的讨论,而且与数学及其历史发展的本质相关,因此超越了先前的反辉格史的研究路径。

倾向,但却从未丢掉数学。因此,格拉坦吉尼斯认为数学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数学太多了,但对于数学家来说历史太多了”,这实际上恰恰体现了数学史研究的独特性——它既不是综合性历史学的一部分,也不是数学的一部分,数学史研究站在了历史学与数学(或外史与内史)中间。然而,缺少了科学的科学史研究既有被归入综合历史学的危险,又可能会因为与科学无关而失去其本质。换言之,在历史学与科学(或外史与内史)之间,科学史研究太靠近历史学(或外史)了。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以往学者融合数学史与科学史的建议:加里、斋藤文一都呼吁以数学实作联系两学,亚历山大认为要把数学看作一个动态过程,斋藤文一则认为要语境化数学史。这些建议或者把科学史往科学(或内史)方向偏一点(以数学实作为联系两者的纽带),或者让数学史往历史学(或外史)方向偏一点(数学社会史),从而达到调整发展步调不一致的两学的目的。

笔者认为,由于以往数学史和科学史研究大多误用了“纯数学—应用数学”的分野,因此要使得两学融合,除了可以以“数学实作”为纽带之外,还可以采取基于数学知识多样性角度的“非数学活动—数学活动”的分析框架,并从数学实作工具和数学问题类型两方面刻画不同的数学知识和传统。^①从现有数学史研究看,我们知道历史上数学的发展存在多种倾向,如古希腊重几何的演绎倾向,中国等东方数学重代数的算法倾向。由此推论,人类许多活动都有助于探索数学知识,但不同活动探索的是数学实在的不同方面。这一观点实际与数学实在论或反实在论都可以并行不悖。^②如果认为存在唯一的宇宙本体实在的数学世界,那么人类的不同活动可以探索这一数学世界的不同侧面;^③而如果认为不存在统一的数学世界,那么无论数学是人为的产物还是存在多个数学世界,我们都可以认为不同活动探索的是多种世界里的多样数学知识。^④以下笔者以中国古代数学史、天文学史、经学史为例,说明如何在这一数学新理解的基础上,以“非数学活动—数学活动”为分析框架,实现数学史与科学史的融合。

既往研究虽然认为诸古代文明的天文学都与数学有关,但基本都认为是把数学应用于天文学。按照对数学的新理解,天文学中发展和用到的数学未必与数学活动中的相同,这一看法在笔者的研究中获得了印证。虽然中国古代数学和天文学都使用算筹,但两者用法和意义不同。在数学活动中,算筹是代表接近于抽象的数(即不带单位的数),而在天文历算中,算筹代表的是以“算”为单位的数。^⑤而且由于天文历算的计算量很大,需要用到的算筹数量远大于数学活动的需求,因此其计算往往不像传统算学那样需要考虑算法的简约。^⑥此外,中国古代数学文献采取的经典数学问题的形式,包含“问”(问题)、“答”(答案)和“术”(算法)三部分。^⑦但中国古代天文学由于涉及王朝正统性等因素,为了保持其知

① 关于该分析框架,参见 Zhu Yiwen, “How Do We Understand Mathematical Practices in Non-mathematical Fields? Reflections Inspired by Cases from 12th and 13th Century China”, *Historia Mathematica*, vol.52, 2020, pp.1-25.

② 数学实在论即柏拉图主义,认为存在一个不随时空转换的数学世界,这是宇宙的本质;反实在论否认存在柏拉图的数学世界,认为其是人为的产物。详细介绍参见[加]安德鲁·欧文编:《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数学哲学》,康仕慧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③ 这就是陈省身(1911—2004)认为的数学与物理学实际是探索同一个大象的两个不同部分。参见张奠宙:《中国近现代数学的发展》,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496-497页。

④ 这就是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2016)所设想的火星数学,参见 Hilary Putna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1: Mathematics, Matter and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61-64.

⑤ 例如《九章算术》卷一方田术曰:“广纵步数相乘得积步。”所谓步数,即“十五步”之数,也即不带量纲的“十五”。参见郭书春汇校:《汇校〈九章算术〉增补版》,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台北:台湾九章出版社,2004年,第9页。《隋书·律历志》记载开皇历上元积年,云:“一百万八千八百四十算。”此处“算”即相当于“年”。参见[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61页。

⑥ 例如,中国历法中上元积年的计算需要用到求解一次同余方程组的方法(即所谓中国剩余定理),南宋秦九韶(1208—1268)以算家的角度增图补草对之进行约化处理,称之为“大衍总术”。秦氏认为历算家“非特置算繁名,初无定法可传,甚是惑误后学,易失古人之术意。”对秦氏算法的分析,参见朱一文:《秦九韶“历家虽用,用而不知”解》,《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秦九韶对大衍术的算图表达——基于〈数书九章〉赵琦美钞本(1616)的分析》,《自然科学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⑦ 例如《九章算术》首问云:“今有田广十五步,纵十六步。问:为田几何?答:一亩。术曰:广纵步数相乘得积步。”参见郭书春汇校:《汇校〈九章算术〉增补版》,第9页。

识的私密性，一般不把数学问题明确写出（如历代天文律历志），因此采取了数学隐题的文本形式。由于数学实作的物质工具和发展数学的文本语境都不尽相同，故中国古代数学与天文学形成了十分接近但又不尽相同的算法传统，并且这两个传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①沿此研究路线，中国数学史与天文学史就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很明显，该路线也可以在其他古代文明中尝试。^②更进一步来说，所谓非数学活动甚至可以不限于科学活动，而扩展到人类开展的任何活动。同样以中国数学史为例，历代学者在注解儒家经典时都会用到数学，以往学界对之几乎没有研究，很大程度上预设儒家就是使用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传统算学的。然而，笔者运用对数学的新理解及其分析框架，揭示出历代儒家发展出了独立的、与传统算学不同的算法传统。儒家算法传统的特征在于不使用算筹，对数和图采取运作性（operational）理解而非结构性（structural）认识，以文字进行计算和推理，采取数学隐题的文本形式且负载于特定的篇章之下。^③笔者进而以算学与经学的视角，重新梳理该算法传统的兴起、发展与衰落之全过程，并揭示这一传统与礼学、易学、西学、考据学之互动，由此完成的中国数学新史实现了中国数学史与经学史的融合。^④

总之，按照对数学的新理解，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诸多非数学活动都不一定是应用数学活动中产生的知识，而是可能产生相对独立的数学知识。非数学活动与数学活动中产生的知识存在着由于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引发的互动。以此为研究路径，不仅可以弥补数学史与科学史的割裂，消解两学中都存在的内史与外史的对立，而且可以同时扩展两学的研究范围，实现两学的真正融合（并非一方为另一方的工具书），从而有助于揭示数学与科学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础。

三、结语：数学史与科学史关系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从全历史的角度重述数学史与科学史的关系。基于现有的研究，古代数学仅与天文学等少数学科有关，在惠威尔的意义上看，科学史是各分科史的合集，因而数学史并非科学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世纪以来，在现代科学兴起的过程中，产生了所谓“自然科学化”的过程，许多自然科学都逐渐被数学化，于是数学史成为科学史的骨架与核心。18世纪，随着欧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等人工作的展开，数学分析成为数学的核心，而力学、宇宙学等都被认为是数学分析的一部分。19世纪下半叶，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分野逐渐形成，那些被数学化的学科逐渐被理解为数学的应用。20世纪初，萨顿开创现代科学史研究，其核心理念认同数学史是科学史的骨架与核心，但在现实研究和教学中，由于科学被理解为数学的应用，作为工具的数学史仍然并非科学史的一部分。一方面，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历经实证成就史、思想史、社会史、科学哲学路线、反辉格史、知识建构论、实作转向等发展阶段，科学史逐渐外史化，失去了其立身根本的科学，即在综合性的历史学和科学、外史和内史之间，科学史研究偏向历史学和外史。另一方面，20世纪的数学史研究也历经了实证成就史、反辉格史、实作转向等变化，尽管也有外史的发展倾向，但在历史学与数学、外史与内史之间，数学史研究始终站在两者中间。因此，丢掉了科学的科学史研究就更不可能与数学史研究相关。基于此，学者们给出的两学融合的方法，或者让科学史走向科学或数学，或者让数学史走向历史学。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对“纯数学—应用数学”分野的误用实际对两学的关系影响深远。因此，笔者提出扩展对数学的理解，即把数学理解为各种活动产生的数学知识的合集，从而包括科学在

① 例如北周甄鸾撰、唐代李淳风等注释的《五经算术》以传统数学解天文学问题，秦九韶以传统算学重构历家求解上元积年的算法。

② 例如美索不达米亚使用60进制，但其相当一部分泥板来自天文学，而古希腊托勒密的天文学也采取60进制原则，那么60进制的产生究竟是与天文学相关，还是数学应用于天文学，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③ Zhu Yiwen, “Another Culture of Computation from 7th Century China”, Karine Chemla, Agathe Keller, Christine Proust, eds., *Cultures of Comput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in the Ancient World: Numbers, Measurements, and Operations in Documents from Mesopotamia, China and South Asia*, Switzerland: Springer, January, 2023, pp.555-602.

④ 朱一文：《算学与经学：中国数学新史》。

内的其他非数学活动中的数学知识就不是对数学活动中数学知识的应用，两类数学知识相对独立而又互动关联。我们可以从数学实作的工具和数学问题的文本形式两方面来刻画不同活动中的数学知识和传统。在此分析框架内，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人类所有活动都可能独立产生数学知识，与数学活动产生的数学知识一道构成数学的多样性。如果这一研究计划彻底实现，那么数学史与科学史（甚至其他历史）都可以实现融合，而数学史会成为真正的骨架与核心。

克洛（Michael J. Crowe）以西方数学史和现代数学史为例，提出关于数学及其历史的十大误解。^① 笔者考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的数学史，又增列“历史上有三次数学危机”“数系的扩展代表着数学的进步”“西方数学是现代数学”等三条误解。^② 从本文的研究来看，认为“纯数学—应用数学的分野具有普适性”也是一大误解。该误解不仅影响到对数学史与科学史关系的理解和研究，而且还影响到数学史和数学哲学领域的另外两个重要理论议题。

其一，由于对数学作工具性的理解，把其他活动中的数学知识理解为纯数学的应用，那么就自然认为数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主要来自其实用性，而失去了实用性的数学知识必然发展受阻。此处典型的说法来自中国数学史家李俨、杜石然对明代数学衰落的评论。他们直接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即宋元数学知识在明代失传）呢？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发展脱离了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脱离了社会生产实践的需要，其内容又都是艰深不易了解，这就构成了这些成果失传的主要原因。”^③ 但其实明代数学衰落的原因与朱元璋晚年废除国家算学教育制度、元末战争与靖难之役、算学与理学的互动、筹算的衰退与珠算的兴起等多个因素有关，而失去实用性只是其中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因素。^④ 事实上，数学知识的传承主要受到学脉和教育制度的影响，而数学知识的发现与创造则主要取决于思想的自由度及不同思想之间的互动。

其二，一些数学哲学家认为“数学最迷人的特性之一是它可应用于经验科学”，进而“从数学对科学是不可或缺的这个相当明显但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出发”，提出解决数学应用性问题（即数学为何可以应用于科学）的“不可或缺论证”。^⑤ 该（蒯因—普特南）论证认为：“我们应该具有所有并且只有那些对我们最佳的科学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实体的本体论承诺，数学实体对我们最佳的科学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应该具有数学实体的本体论承诺。”^⑥ 这一论证的出发点即“数学对科学是不可或缺的”这一事实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数学家构想出来的大量数学理论是没有应用的；^⑦ 另一方面，一些经验科学的发展更依赖于实验，而非数学。^⑧ 根据前文的分析，如果对数学采取多样性的新理解，由于该理解可以与各种版本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并行不悖，那么本体论承诺就不是必须的。另外，数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非前者简单应用于后者。从本文来看，两者的关系及其历史远比我们之前认为的复杂。

责任编辑：罗 苹

① 这十大误解是：1. 数学方法是演绎的；2. 数学提供确定的知识；3. 数学是累积的；4. 数学论断总是正确的；5. 数学结构精确地反映了其历史；6. 数学证明是没有问题的；7. 关于严谨的标准是没有变化的；8. 数学方法从根本上不同于科学方法；9. 数学承认决定性的证伪；10. 数学方法论的选择是经验主义、形式主义、直觉主义和柏拉图主义。参见 Michael J. Crowe, “Ten Misconceptions about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y”, William Aspray, Philip Kitcher, ed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odern Mathema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p.260-270.

② 朱一文：《关于数学史的三大误解》，《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年第11期。

③ 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28-229页。

④ 参见朱一文：《重审元明之际中国数学的转变》，《中国科技史杂志》2023年第2期；《再论明中前期中国数学的转变》，《中国科技史杂志》2024年第4期。

⑤ 关于数学应用性问题与不可或缺论证，参见[加]安德鲁·欧文编：《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数学哲学》，第829-845页。

⑥ [加]安德鲁·欧文编：《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数学哲学》，第836页。

⑦ 这一现象大量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即与纯数学与应用数学分野形成同步。如果认为现在没有应用的数学理论迟早会被应用，那么就是一种无法验证的自我安慰，失去了学术讨论的意义。

⑧ 这些经验科学主要以材料、机械等工程类学科为代表，实验在这些学科中的重要性实际超过了寻找其背后的数学规律。

资源环境要素市场风险防范的公法进路

——以自愿碳市场为例^{*}

秦天宝 姚 远

〔摘 要〕自愿碳市场作为“人造市场”，涉及复杂的行政管理和市场运作，其在资源配置和实现环境目标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些风险主要包括可信度风险、透明度风险和活跃度风险，它们在市场运作中逐步积累。考虑到这些风险的公共属性，完全消除它们既不可行也不必要，而是应当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进行管理。因此，采用风险分配的方法是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策略，而标准化的风险分配模式则是一种适当的选择。这种模式强调，公权力应该居于风险分配的核心位置，通过制定标准来引导市场主体按照这些标准行事，确保市场接受的风险维持在合理范围内，并使风险在不同市场主体间得到合理的分配和管理，进而推动市场的健康发展。在这一框架下，可在供应、需求和监管层面引入具体的制度措施，如建立碳信用额度的界定标准、提高买方行为的规范化引导以及推动数字化流程和标准化条款的交易合同实施，从而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风险防范体系。这种公法模式不仅适用于自愿碳市场，也为其他资源环境市场的风险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可行的路径。

〔关键词〕自愿碳市场 公共风险 风险分配 政府规制 标准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067-10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资源环境要素市场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和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以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

革，推动资源向绿色生产力的集聚。^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将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支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这不仅是我国资源环境领域的一项基础性机制创新，更是激发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

当前，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的构建仍面临诸多挑战。该体系是指在政府设定总量管理目标和科学初始分配配额的基础上，各市场主体依据实际使用或排放量与初始配额的差额进行交易的制度框

^{*} 本文系 202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生态文明领域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研究”（23JJD820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秦天宝，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姚远，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430072）。

① 张昕：《建好碳市场的关键是健全市场交易制度》，《中国生态文明》2023 年第 Z1 期。

②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19 日第 1 版。

架。^①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资源环境要素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在风险防范机制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导致要素市场的扭曲风险加剧。这种扭曲表现为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较低和资源配置的非最优状态,致使各类资源环境要素无法有效集聚向绿色生产力。资源环境要素市场的扭曲风险,主要源自内生性扭曲,即市场自身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导致的非最优配置。^②这些扭曲通常由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因素引发。

面对资源环境市场中内生性市场要素的扭曲风险,亟需构建有效的风险防范公法机制。在此背景下,关键的法律问题是:如何通过建立科学的风险防范机制,解决资源环境市场内生性市场要素的扭曲问题,同时避免政策性扭曲的产生。本文以自愿碳市场为例,在识别自愿碳市场风险的基础上,分析构建风险防范的公法模式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并进一步探索标准化模式下自愿碳市场风险防范制度的构建进路,以期为其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模式。

一、自愿碳市场的风险识别及应对现状

自愿碳市场不仅是一种市场化机制,同时也是一套高度复杂的行政管理体系。自愿碳市场所面临的行政管理、市场运作、风险监管等多重挑战,决定了其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与环境目标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一) 自愿碳市场中的风险生发

传统市场的本质在于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③而自愿碳市场具有市场机制与行政管理的双重属性,有其独特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自愿碳市场的核心资源——可交易的碳信用,实际上是基于法律和政策框架的人为设定的排放限额。^④这种资源本身具有稀缺性,既是市场交易的对象,也是行政管理的产物。^⑤因此,即使是在市场化运作中,自愿碳市场仍然依赖于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如若管理不当,可能导致碳信用滥发,市场失去公信力。在欧美成熟市场中,尽管法律体系相对完善,但是自愿碳市场的完全自由运作依然面临种种障碍。^⑥我国自愿碳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和监管框架尚待完善,这一风险尤为突出。

自愿碳市场的设计初衷是通过市场手段最小化减排成本,进而支持总量控制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然而,碳市场需要应对的是复杂的外部性问题,这要求制度设计既要鼓励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正外部性,又要抑制高碳行业的负外部性。^⑦这一目标通过市场价格信号难以单独实现,需要在政策层面进行精细化的制度设计。自愿碳市场的“建构性市场”特性表明其依赖于法规和政策,但过于依赖行政命令而忽视市场机制可能影响价格发现功能,进而导致碳市场难以实现其预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碳市场作为应对碳排放外部性问题的经济策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一旦遭遇宏观经济波动,其风险尤显突出。在目前自愿碳市场的运作环境中,政策模拟往往忽略了市场机制的复杂交互作用。当价格信号不能有效传达真实的环境和社会价值时,市场陷入价格波动和操纵的风险将大为增加。

自愿碳市场的风险来源还体现在监管和透明度问题上。市场的准入机制、信用核查、交易流程等环节如果缺乏透明和有效的监管,容易滋生信息不对称,阻碍市场的公平竞争和透明操作。如何确保碳信用的实质性减排贡献和避免重复计算,是市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旦监管不到位,市场可能会成为无效的信用交易平台,削弱其在碳减排中的核心作用。

① 郎劲贤、俞昊良等:《关于超计划(定额)累进加价与用水权交易制度竞合的初步思考》,《水利发展研究》2024年第1期。

② 魏鹏飞、魏新月:《要素市场扭曲相关研究综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③ 柯继铭:《论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S5期。

④ 潘晓滨:《碳信用法律属性界定及其对自愿减排市场司法保障的启示》,《当代法学》2024年第2期。

⑤ 刘明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120-121页。

⑥ 吕江、朱玉婷:《〈巴黎协定〉可持续发展机制与中国行动方案——兼析欧盟碳减排实践探索及其经验启示》,《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4期。

⑦ 梅德文:《完善中国碳市场定价机制 破解发展和碳中和的两难》,《阅江学刊》2021年第3期。

（二）自愿碳市场中的风险集结点

在我国构建和运作自愿碳市场的过程中，尽管其有助于推动企业和个体对碳减排做出贡献，但也面临若干重大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影响市场直接参与者的经济利益，更对环境福利和社会信任产生广泛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可信度风险。自愿碳市场中普遍存在的“漂绿”风险和项目业主的诚信问题使得市场面临严重的可信度挑战。在国际碳市场上，Verra 的雨林保育项目被揭露出可能的造假风险，其核算方法被指高估减排效果，这种不当行为严重伤害了市场的公信力，降低了碳信用的需求。^① 自愿碳市场在质量和诚信方面面临的挑战源于市场的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在供应方面，市场上没有统一的信用额度标准，跨市场间的碳标准制定者之间缺乏一致性，导致核证碳信用额的质量难以保证。在需求方面，针对如何使用购买的核证碳信用额，目前缺乏明确的指导和可提出的权利主张类型，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用风险。

二是透明度风险。自愿碳市场中的透明度不足也导致了重复计算和滥用碳信用的发生。由于不同市场和标准之间的规则差异，某些项目可能在多个标准平台上进行重复认证，或是同一碳信用多次用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抵消。类似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简称 CCER）和绿色电力证书的双重计算问题，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同时对整体市场透明度构成威胁。

三是活跃度风险。由于自愿碳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市场规模和流动性都不及成熟的金融市场，^② 普遍缺乏价格透明度，使之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从而产生剧烈价格波动。^③ 此外，由于市场信息披露不全，以及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导致市场的操纵风险以及不良资产累积可能引发潜在的金融危机。^④

自愿碳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其监管尚不完善。部分参与者过度承诺或进行虚假交易，从而使市场价值与实际严重不符，形成不可持续的碳经济泡沫。当这类泡沫破裂时，为追求其利益而进行的投资或碳产品的储备难以变现或处理。^⑤ 这种持续的状况将逐渐削弱自愿碳市场的盈利能力和信用体系，使投资者面临未能实现预期回报的风险，同时还必须承担资产处置和维护的高成本。这可能导致不同层次的企业逐渐失去对自愿碳市场的投资兴趣。^⑥ 承担环保任务的企业可能由于过高的资产风险而难以适应新的政策环境，难以有效地减少碳排放。碳配额和 CCER 的交易不畅可能阻碍碳资产的流通，导致有需求的企业无法及时获得所需碳配额，而缺乏消化能力的企业可能积聚难以处置的碳资产。在更复杂的风险层面，未能有效管理和处置不良碳资产可能导致市场面临更深重的经营危机，绿色交易可能失去其竞争力，成为企业运营的负担，最终削弱市场在调控碳排放方面的作用。因此，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对于保障自愿碳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极为关键。

（三）当前自愿碳市场风险应对的不足

我国自愿碳市场的构建与运作本质上是一个“建构性市场”，公权力通过行政干预来协助市场运作，

① 根据 Verra 的方法论，若某一组织推出雨林保育计划，预计可让一百公顷的雨林免遭开发，就可根据认证公式将其转化为 4 万个二氧化碳碳权，企业可通过购买碳权进行碳抵消。然而，英国《卫报》的研究报告指出，Verra 疑似将雨林被砍伐威胁平均夸大了约 400%，导致高达 94% 的雨林保育碳权不具有实质性减碳成效。在此之后，Gucci、壳牌等纷纷宣布取消了碳抵消业务。Patrick Greenfield, “Revealed: More Than 90% of Rainforest Carbon Offsets by Biggest Certifier Are Worthless, Analysis Show”, *The Guardian*, January 18, 2003.

② 第一财经研究院：《2022 年中国碳市场年报 1 碳看》，第一财经网：<https://www.yicai.com/news/101682252.html>，2023 年 2 月 22 日。

③ 汪鹏、成贝贝等：《碳价格的传导机理及影响研究——以广东碳市场为例》，《生态经济》2017 年第 3 期。

④ 鲁政委、栗晓春等：《“碳中和”愿景下我国 CCER 市场发展研究》，《西南金融》2022 年第 12 期。

⑤ 朱兵强、周旭：《论中国碳市场不良资产的表现与法治应对》，《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 年第 2 期。

⑥ 赵忠秀主编：《低碳发展蓝皮书：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报告（2021~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第 40-52 页。

进而提升市场的透明性与流动性，是必要的。当前，我国已经通过行政主导的制度设计来增强市场的稳定性，包括项目开发的前端管理和市场监督的后端管理。然而，这些措施在风险防范中仍然存在不少挑战。

可信度风险应对的核心在于减排项目的“额外性”判断，即项目必须在已有的环境保护措施基础上提供额外的减排贡献。然而，由于项目实施成本的降低和技术的普及，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额外性降低，已经不再是“真正的”自愿减排项目。^①此时，就需要公权力通过审查和评估来判断项目是否真正提供了额外减排贡献。然而，目前的做法过于依赖行政人员的主观判断和对未来的设想，缺乏系统的、客观的评估标准。^②此外，CCER 项目标准不严、质量不高的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由于缺乏详细和具有约束力的标准，项目执行的可操作空间过大，部分项目利用方法学的漏洞强行制造碳排放额，使得 CCER 异化偏离原来的产品设计目标。在核证标准和方法学的制定上，不同主体的管理力度不一，也会导致资源错配和市场信任的缺失。

我国在解决自愿碳市场中的透明性和重复计算问题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唯一性原则，确保每个减排项目在全国范围内仅能被一次认证并参与交易，从而防止同一减排量在不同市场中重复利用。此外，政府还要求所有市场参与者详细报告其碳排放量和减排成效，并通过第三方机构对这些数据进行核实，以验证数据的真实性。^③为了进一步加强监管，建立了碳排放权的注册和交易平台，对碳信用及其交易进行记录和监控，有助于防止重复交易。尽管有这些努力，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监管体系的严格性和覆盖面仍需加强。由于各地碳交易试点的设计存在差异，使得市场准入和监管标准不统一，碳配额的同质性和可比性受到影响。此外，信息披露的标准化亟待改进，不同市场主体披露的碳排放信息标准不一，导致存在市场透明度和参与者信任度的问题。^④

在活跃度风险防范层面，公权力通过设立登记注册和交易机构并以此为基础对自愿碳市场进行监管，是一种有效举措。但由于市场没有标准化条款的交易合同，场外交易存在法律指导不足的问题，导致交易双方面对诸多法律不确定性，仍旧会引发活跃度风险。例如，由于监管政策变化，项目业主可能无法交付核证碳信用额，这种情况下是否适用不可抗力条款尚不明确。此外，核证碳信用额所有权的转移条件和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往往依赖于具体法律和合同条款的规定。自愿碳市场通常采用“买者自慎”模式，要求买方对项目背景进行详尽调查，但信息不完整可能导致买方权益受损并面临法律风险。一些金融机构可能利用市场不成熟的特点进行价格操纵，^⑤而现有对涉及碳信用交易法律问题的权威指导不足，规避法律风险的手段匮乏，使得市场面临潜在的金融危机风险。

二、分配行政视域下自愿碳市场风险防范模式的构建逻辑

自愿碳市场中的风险具有不同于私人风险的公共属性，完全消除它们既不现实也不必要，应该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加以管理。因此，采用风险分配的方式是一种有效的防范措施，而标准化的风险分配模式则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一）运用风险分配模式进行风险防范的合理性

美国学者彼得·休伯将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分为两类：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公共风险是指那些大规模生产、广泛传播且超出个体理解和控制范围，威胁人类健康和安全的风险。^⑥公共风险与私人风险的

① 鲁政委、栗晓春等：《“碳中和”愿景下我国 CCER 市场发展研究》，《西南金融》2022 年第 12 期。

② 于天飞：《影响中国林业自愿碳市场稳健发展的几个问题分析》，《世界林业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③ 梅德文、葛兴安等：《国际自愿减排市场评述与展望》，《中国财政》2022 年第 15 期。

④ 张叶东：《“双碳”目标背景下碳金融制度建设：现状、问题与建议》，《南方金融》2021 年第 11 期。

⑤ 秦天宝：《双阶理论视域下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及规制研究》，《比较法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⑥ Peter Huber, “Safety and The Second Best: The Hazards of Public Risk Management in the Courts”, *Columbia Law Review*, vol.85, 1985.

最大区别在于其具有两面性。公共风险虽然对特定受害者是不利的，但对社会整体具有一定的益处。正是因为某种特定公共风险的存在，才导致更多的私人风险减少。^①因此，许多公共风险不应被完全消除，而是在合理范围内加以控制。^②

公共风险代表着实际的负担与不利益，因此在法律应对风险的策略中，分配风险显得尤为重要。通常来说，法律应对风险的方式主要有两类：直接减少风险和风险分配。对于公共风险而言，风险分配是一种更为妥当的风险防范方式。风险分配意味着公共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无法完全消除，因而需要将其合理分配给不同个体或群体承担。这一概念强调了公共风险的实体性，表明法律通常允许公共风险的存在，并通过分配机制来确定责任的承担者。通过风险分配，可以有效防范公共风险，明确在方法论层面上责任的归属，同时在实体层面将潜在的伤害和不利益合理地分配给相关方。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减轻个体的负担，也促进了社会整体对公共风险的管理与应对。

自愿碳市场中的风险具有显著的公共属性。自愿碳市场提供了一种市场化的机制来促进碳减排。相较于直接的行政指令或法规管制，这种市场机制允许企业以最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进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传统高污染行业相比，碳市场通过引入新的减排技术和方法，能有效减少实际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环境污染的外部性，也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更清洁和可持续的选择。尽管自愿碳市场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可靠性、透明度和活跃度挑战，但市场设立的本质是为了承认并激励真实有效的减排活动，只要通过更加精确的计量和管理，不仅能减少碳污染，还能推动对自然界碳循环系统更全面的理解和管理。

自愿碳市场的风险分配不当会构成对减排目标和减排效果的直接挑战，其负面效果将由全社会乃至未来世代共同承担。如前所述，自愿碳市场波动削弱了交易的利润空间，并且增加了财务损失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陷入利益博弈的困境，最终选择放弃减排，以避免经济损失。对于那些专注于节能减排的基础行业，市场的不稳定性可能导致企业积压过多难以处理的绿色产品，从而增加运营和维护成本。如果潜在损失超出了预期的收益，则企业可能放弃节能改革，以确保资金安全。此外，由于碳市场内企业经营标准和信用承诺存在不足，基础行业的投融资机构也可能撤销对绿色项目的投资，这将进一步阻碍碳减排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直接参与碳市场交易的企业而言，他们的减排行动旨在通过获取更多的 CCER，以获得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如果这些 CCER 不能及时交易，企业可能放弃减排行为，避免不良资产的累积。这会导致市场缺乏可交易的碳资产，致使符合标准的减排企业无法有效推动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③因此，加强风险管理和提升市场处置能力对于自愿碳市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二）公权力作为风险分配中枢的正当性

公共风险的公共化是指通过政府规制，将风险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在风险社会中，个体通常缺乏应对复杂公共风险所需的信息，或者容易采取不当的应对措施使得公共风险增加。这种情况下，行政机构自然有必要成为控制风险的中枢，通过相关风险规制机构进行集体决策逐渐取代个体选择来决定风险的可接受性。相关的政府规制机构不仅具有研究风险的信息和资源，还拥有法律所授予的权力来决定社会应承担何种风险程度。^④在此模式下，公共风险的制造者将受到严格监管，不仅需要行业准入许可，还必须遵守标准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权力借助市场监督机制介入民事交易法律关系，一定程度上限缩了民事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和交

① 傅蔚冈：《对公共风险的政府规制——阐释与评述》，《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2期。

② [美]Cary Coglianese and Gary E. Marchant：《流沙：科学在风险标准制定中的局限》，金自宁编译：《风险规制与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186-189页。

③ 朱兵强、周旭：《论中国碳市场不良资产的表现与法治应对》，《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年第2期。

④ 傅蔚冈：《对公共风险的政府规制——阐释与评述》，《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2期。

易自由。这种介入和干预需要正当理由。公权力干预的正当性理论浩如烟海,理论内核从维护法秩序稳定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演变到政府提供给付、维护公平正义和进行社会塑造。^①

传统公私分立的二元结构下,行政法仅调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纵向关系,并不介入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横向关系。^②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公益与私益的划分不再泾渭分明。例如,减碳增汇是一项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行政任务;但 CCER 的生成与交易全流程却涉及开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的项目业主、强制碳市场中的重点排放单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其他交易主体、全体社会民众的关系。从横向关系看,项目业主着眼于减排量的取得与流转,强制碳市场中的重点排放单位关心如何按比例使用 CCER 进行交易与清缴,其他交易主体关注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透明,全体社会民众则关心减污降碳的实际成效。从纵向角度看,项目业主要面临行政确认、监管与处罚,重点排放单位也要面临行政监管,其他交易主体通过投诉或举报乃至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社会公众可以在相关立法中提出公众意见。在面对如此复杂的利害网络时,传统行政法点对点或点对面的纵向调整方式已经不敷实践之需,行政介入私人领域成为必然,^③这也是行政能够通过介入和规制 CCER 交易的方式来实现公法目的的根本原因。

分配行政理论萌芽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德国。德国学者施密特·阿斯曼定义的分配行政是终结私人间分配斗争的手段,是囊括了给付性和形成性的一种通盘权衡方式。^④随着公私法的协同愈发受到重视,行政法的角色定位由传统的私人利益守护者转变为以公共性为媒介的私益间分配者。^⑤简而言之,分配行政观念则彻底将行政法理解为一种私益与私益、权利与权利、私人与私人的冲突法。^⑥作为“分配法”的行政法,不仅旨在解决公私冲突,也可以通过介入私法对私主体间的利益进行调整与分配,最终实现资源调控与风险防范的公法目的。

在分配行政视阈下,公权力基于实现《巴黎协定》所确立的升温控制目标以及国内的“双碳”目标的作用与调整范围,就不再局限于基于公共利益考量而对作为行政相对人的项目业主或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权或 CCER 的签发和限制这样纵向点对点的二元法律关系,而应更宽泛地理解为公权力对自愿碳市场相关的不同私主体(包括项目业主、重点排放单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其他交易主体以及全体社会民众)在公平透明的碳市场进行交易的分配规则和冲突规则。自愿碳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联动性以及气候目标的科学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权力通过项目开发审定和减排量交易对 CCER 的签发许可和交易监督,不再仅限于赋予被许可人一定的大气环境容量以交易或抵消,而是借由 CCER 的核证和交易规则在被许可人和自愿碳市场相关私主体之间进行资源调控和风险防范。

公权力在自愿碳市场中的介入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确保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⑦公权力可以通过制定和优化方法学选择标准,来指导项目开发阶段的筛选过程。在减排量交易阶段,政府的介入可以通过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规则和持续的监管来确保市场的稳定性。

(三) 风险分配的标准化模式探索

1. 标准化风险是分配的客体。美国学者庞德认为,标准是法律规定的行为尺度,超出这一尺度就可能导致法律责任的追究,强调了标准在界定行为界限和强制执行中的重要作用。^⑧ 我国的自愿碳市

① [德] 汉斯·J. 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等:《行政法》第 1 卷,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144-145 页。

② 杨解君:《碳排放权的法律多重性——基于分配行政论的思考》,《行政法学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③ 王天华:《分配行政与民事权益——关于公法私法二元论之射程的一个序论性考察》,《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 6 期。

④ 王天华:《分配行政与民事权益——关于公法私法二元论之射程的一个序论性考察》,《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 6 期。

⑤ 赵宏:《行政法学的主观法体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 年,第 295-296 页。

⑥ 黄宇骁:《行政法上的客观法与主观法》,《环球法律评论》2022 年第 1 期。

⑦ 倪受彬:《碳排放权权利属性论——兼谈中国碳市场交易规则的完善》,《政治与法律》2022 年第 1 期。

⑧ [美] 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22-26 页。

场中, 标准化风险的概念亦是关键。设定标准的过程实际是在界定可接受的风险限度, 将抽象的环境责任转化为具体的市场和法律规则。通过政府规制, 让公共风险在一个公众可接受的程度上存在和运行, 从而实现整体的社会福利改进。

标准的制定是设定可允许的风险, 我国的自愿碳市场应通过方法学、规则、条例等形式实现标准化。在获得 CCER 前, 减排项目需经过公权力的核证, 以确保项目符合适用的方法学、规则和条例。这一阶段涉及公权力对方法学筛选, 包括确定 CCER 项目基准线、额外性证明、减排量计算、监测计划制定等方面。实质上是在不同行业间分配潜在 CCER 资源, 确保与产业政策一致, 支持新兴技术发展。由于方法学、规则和条例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其无法完全消除减排项目和核证减排量携带的所有风险, 但是已经对其进行了极大的限缩。

基于标准, 公权力允许通过核查的 CCER 进入流通领域, 而市场则为个体接触风险产品提供了场所和平台。标准所允许的风险就是剩余风险。^①在交易阶段, 剩余风险通过核证减排量在市场参与者间分配。CCER 作为可交易的减排信用, 不仅具备减排价值和经济价值, 还携带着与市场稳定性密切相关的风险。这些风险并非单一由某一主体承担, 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在不同市场主体间进行有效分配。CCER 作为风险载体, 将这些风险转化为市场参与者的经济机会和责任, 促使各方在交易中承担相应的风险负担。可信用度风险通常由项目业主和减排量核证方承担, 这些主体需要确保减排量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以提高市场对其减排成果的信任。透明度风险由市场监管机构负责管控, 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交易规则和信息披露机制, 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活跃度风险主要由市场的流动性提供者和投资者承担, 市场参与者需要承担由市场波动和流动性不足引起的风险。

2. 标准化模式下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在自愿碳市场中, 标准化风险分配模式起源于对自由风险市场的失灵的应对, 它体现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通过这种模式, 风险一旦被标准所接受, 就转化为可分配的对象, 使市场成为参与主体接触和承担风险的平台。此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标准界定可接受的风险限度。当剩余风险造成损害时, 如何分配损失及确定合规行为是否能免责, 涉及复杂的法律和道德考量。标准作为基本的分配工具, 涉及行政机关、企业和个体三方主体, 其中国家权力与市场机制各司其职。

在此模式中, 行政机关是风险规制者或分配者, 项目业主和 CCER 买方是风险制造者, CCER 需求方及社会公众是风险承担者。行政干预自愿碳市场中的风险分配, 部分原因在于, 市场各方主体在风险地位及能力上存在不平等, 且国家承担着对公民的保障义务和环保目标的实现责任。政府的参与作为第三方限制风险制造者的行为, 防止其过度施加风险, 并通过制定安全标准来限制他们可以制造的风险量。这种对风险制造者的限制, 实际上是对风险承担者的一种保护, 防止他们承担超出安全标准的风险。^②

国家权力的主要职能是制定和执行安全标准, 将风险限定在一个可允许的范围内, 并对违规者予以惩戒。市场的职能则在于在不同主体间分配标准所允许的风险, 其中行政机关不直接介入市场流通领域, 而企业和个体通过交换行为来实现风险的分配。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体现在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强制标准进行宏观调控, 而市场则提供微观层面的交易平台, 为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动力和灵活性。

因而, 风险分配的标准化模式在我国自愿碳市场中的构建进路, 表现在通过设定和遵循标准, 风险得以分配并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进行流通和转移。在这一过程中, 核证减排量作为风险的载体, 将环境责任和经济利益转化为可交易的商品。而标准则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确保风险的合理分配, 并为政府、企业及个人提供了一个协同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平台。

三、标准化模式下自愿碳市场风险防范制度的构建进路

在标准化风险分配模式下, 公权力在自愿碳市场中的介入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确保市场健康发展

① 傅蔚冈:《合规行为的效力: 一个超越实证法的分析》,《浙江学刊》2010 年第 4 期。

② 尹德贵:《风险分配的法理论纲》, 苏州大学 2016 年博士学位论文。

的关键。^①具体而言，政府可以从供应、需求和监管三个层面实施具体的政策措施，从而构建一个全面的风险防范体系。

（一）供应层面：制定碳信用额度界定标准和核查共同原则

当前我国自愿碳市场缺乏实现高效交易所需的流动性，部分原因在于碳信用额度的高度差异性。每个碳信用额都有与基础项目相关的独特属性，比如项目类型和实施地区，这些属性影响了信用额度的价格，因为买方对这些附加属性的估值不同。为了提高市场效率，通过共同特征对所有信用额度进行界定是必要的。第一类特征属性与质量有关，核心碳原则中规定的质量标准为核实碳信用额是否代表真正的减排量提供了依据。第二类特征涵盖碳信用的附加属性，通过通用分类法将这些属性标准化，将有助于卖方推销碳信用额度，并帮助买方找到符合其需求的信用额度。

放眼国际，自愿碳市场诚信委员会（ICVCM）是针对自愿碳市场的独立治理机构，委员会已经制定了核心碳原则（CCP），为高度诚信的碳信用额规定了关键原则，并制定了评估框架，其中包括自愿碳市场诚信委员会用于评估碳标准制定者和碳信用额类别是否符合核心碳原则的详细标准。^②2023年12月4日，Verra、GS和ACR等6个主要的独立碳标准制定者在《气候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上联合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将在ICVCM《核心原则》的框架下共同制定市场标准，学习彼此的最佳实践，以增加市场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并扩大影响力。^③同日，17家国际组织支持科学碳目标（SBTi）、ICVCM、自愿碳市场诚信倡议（VCMi）发布的关于建设“全过程”诚信脱碳框架的联合声明，并承诺引导公司使用高诚信度碳信用，提升市场的诚信度。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CFTC）也发布了关于自愿碳信用衍生品合约的制定和挂牌指引，旨在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流动性。12月10日，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7个欧盟国家也发表声明，支持并推动高品质的自愿碳市场的建设。此外，英国政府宣布支持ICVCM《核心原则》并考虑将其纳入国家政策。

我国制定碳信用额度标准需要考虑与国际标准的接轨。我国应当意识到跨市场间标准、规则、方法学、注册登记和信息披露制度等的不一致所造成的诚信度和透明度下降风险，并着力推动基于ICVCM《碳核心原则》和VCMi《宣传实务指引》的共通性市场标准和机制建设，提升对碳信用的质量要求。具体而言，我国亟需制定自愿碳市场中高诚信度碳信用的标准化评价基准，并在市场治理、排放影响认定、可持续发展等三方面提出具体原则。同时，基于上述原则，也开始着手制定基于减排类别和项目的双层评估框架和流程，推动相关主体在实际操作中能够贯彻该原则。通过此模式，对内，碳信用额度界定标准和核查共同原则的完善有利于防范国内自愿碳市场的可信度、透明度和活跃度风险；对外，一旦CCER成功与国际自愿碳市场接轨，将意味着其机制得到认可，有助于提升我国碳信用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吸引更多外资，扩大资金来源，并推动绿色技术的突破，从而促进国家绿色经济的发展。

（二）需求层面：提升买方行为的规范化引导

目前，我国自愿碳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和绿色金融政策的推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开始参与碳信用的购买和交易。然而，市场参与者，尤其是买方，在碳信用的选择、使用及披露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部分买方对碳信用额度的认知较为局限，往往更多关注价格而非碳信用的质量和有效性。碳信用额度的透明度和真实性也仍然存在一定问题，部分企业在自愿购买碳信用额度时，缺乏足够的核查和信息披露，可能导致碳信用被错误使用或存在虚假减排的情况。此外，碳信用市场的标准和规则尚未完全统一，不同的碳标准和评级体系之间存在差异，使得买方难以

^① 倪受彬：《碳排放权权利属性论——兼谈中国碳市场交易规则的完善》，《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2期。

^② ICVCM: *The Core Carbon Principles*, ICVCM Website: <https://icvcm.org/the-core-carbon-principles/>, October 10, 2024.

^③ ACR, REDDT, CAR, GCC, GS and Verra: *Promoting Scale and Integrity in Carbon Markets to Help Operationalize Article 6 an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Climate Action Reserve Website: www.climateactionreserve.org/blog/2023/12/04/cop28-icp/, October 16, 2024.

判断碳信用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因此，我国亟需从政策层面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加强对自愿碳市场买方行为的规范化引导，确保市场的健康运行。

国际上，对于自愿碳市场买方行为的规范化已有一定的探索和实践。2023年6月，VCMi发布了《声明业务守则》第二版，旨在帮助企业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明确如何可靠地使用核证碳信用额，作为其自愿气候承诺的一部分，同时指导如何准确披露碳信用的使用情况。VCMi的守则明确要求参与方在声明使用碳信用额时，必须遵循严格的透明度标准，确保所购碳信用额度与减排目标的真实匹配，避免虚假宣传或过度承诺。^①此外，国际市场中还存在多个指引和倡议，帮助企业规范碳信用的使用。例如，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推出的企业净零标准，旨在为公司设定科学基础的净零目标提供指导，并要求企业在购买碳信用额时，遵循明确的碳核查标准，以确保减排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②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在其“绿色指南”中也明确要求，碳信用的卖方应采用“合格且可靠的科学和核算方法”，确保所声称的减排量能够被适当量化并公开披露。^③这些国际经验为我国自愿碳市场的规范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进一步发展自愿碳市场时，应该吸收国际上关于买方行为规范的先进做法，通过制定相关标准和规则，引导市场参与者采取更为科学和透明的行为。

买方行为的规范不仅有助于提升市场透明度和公信力，更能确保碳信用的合理使用，避免出现“洗绿”现象，推动碳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有效推动我国自愿碳市场的健康发展，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买方行为的规范化引导。首先，我国应结合国际经验，出台具有本土特色的碳信用交易标准和行为规范。例如，可以借鉴VCMi和SBTi等国际标准，明确碳信用额度的核证程序、信息披露要求和使用规则，并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确保市场的透明性和公正性。鼓励企业和机构在购买碳信用额度时，公开披露其使用情况和减排效果。其次，政府应建立一个统一的碳信用交易信息平台，方便买方和卖方实时查询碳信用额度的交易信息及其相关认证。最后，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宣传，提升企业和公众对自愿碳市场的认识，特别是对碳信用的真实性、可靠性及其在气候承诺中的作用。买方的行为规范不仅是市场成功的关键，更是提升全球气候行动诚信度和有效性的重要环节。

（三）监管层面：构建数字化流程和标准化条款交易合同

自愿碳市场的诚信和透明度问题仍是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障碍之一。信息披露的不规范可能会导致信用额度不统一、市场洗钱和错误计算等问题，为了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可靠性，亟需建立一套信息披露规范标准和数字化流程。

数字化流程的建立不仅能够规范信息披露，还可以从技术层面解决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双重计算问题。通过将项目的注册、信用额度的核查和发放数字化，可以实现对项目全过程的定期跟踪。这种方法不仅能降低发放成本、缩短付款期限，还能加快项目开发商的现金流，同时提高抵消额度使用的可信度。区块链技术是实现这一数字化过程的工具选择之一。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和去中心化特点，使其能够有效追踪碳信用项目的碳足迹、记录交易和碳排放数据。因此，碳项目的计算、签发和注销都可以实现完全可追溯。这一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升碳信用项目数据的真实性和安全性。

国际上，《巴黎协定》提出建立各缔约方自愿参与的机制，用于推动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在这一机制下，防止减排量双重计算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建立全球性的减缓成果转移（ITMO）数据库。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国际框架，构建自己的碳信用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建立一个全国的碳信用交易数据库，实现减排成果的全面记录和追踪，确保交易的透明和可信。

^① VCMi: *Claims Code of Practice*, VCMi Website: <https://vcmintegrity.org/wp-content/uploads/2023/11/VCMi-Claims-Code-of-Practice-November-2023.pdf>, October 16, 2024.

^② SBTi: *SBTi Corporate Net-Zero Standard*, SBTi Website: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Net-Zero-Standard.pdf>, October 16, 2024.

^③ FTC: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FTC's Green Guides*, FTC Website: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topics/truth-advertising/green-guides>, October 16, 2024.

目前市场面临的另一个核心挑战是缺乏标准化的交易合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流动性和核证碳信用额的可替换性。核证碳信用额的可替换性是市场运行的基石。市场参与者之间转让核证碳信用额的义务需要建立在信用额可以相互替换的基础上。^①为实现这一目标，市场需要在合同条款上实现标准化。无论核证碳信用额由哪个独立碳标准制定者发放，使用统一的合同条款都能够显著提高信用额的可替换性。

制定标准化合同不仅能够增加市场的可预测性，还能显著提高市场流动性。通过确定核心碳原则和标准属性，交易所可以设计出“参考合约”，以便参与者能够更加方便地进行交易。这样的合约通过结合核心合约和附加属性，为交易所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定价机制。例如，Xpansiv 等交易平台正在开发更加标准化的产品，如全球排放抵消合同。这类合同以具体项目特征为基础，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可靠的信用额交付途径。

此外，制定标准化合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及解决合同争端。鉴于自愿碳市场的特殊性，标准化合同中应明确争端解决的原则和程序。需要考虑是否在合同中引入具体的共同原则、规则或做法，以确保争端解决方法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此外，合同中的责任限制条款需要经过慎重设计，以平衡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独立碳标准制定者的文件中通常包含责任限制条款，这些条款需与市场合同标准化相协调，从而为自愿碳市场提供一个稳健和可操作的法律基础。通过提高核证碳信用额的可替换性和市场的流动性，标准化合同不仅能促进更多企业和投资者参与到自愿碳市场中，还能提高市场的整体效率和透明度。

四、结语

自愿碳市场所面临的风险具体表现为可信度风险、透明度风险和活跃度风险。考虑到自愿碳市场风险的公共性质，建立风险防范模式的逻辑在于通过有效的风险分配机制来实现综合风险管理。此模式突出公权力在风险分配中的核心作用，通过采用标准化策略来引导市场的健康发展。风险分配的标准化模式体现在设定和遵循严格的标准，确保市场接受的风险维持在合理范围内。此外，以核证的减排量为风险承载体，将环境责任和经济利益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在市场中分配。在这一框架内，政府应在供应、需求和监管三个层面实施具体的政策措施。在供应层面，建立明确的碳信用额度界定标准及核查原则；在需求层面，提高购买行为的规范性，引导市场参与者；在监管层面，推动交易流程数字化和交易合同的标准化实施。

自愿碳市场的风险防范公法模式对于整个资源环境要素市场的风险防范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自愿碳市场的标准化风险分配模式展示了如何在行业内推行统一标准，从而增强市场透明度和可操作性。该模式中公权力作为风险分配中枢的角色，体现了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参与者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其他资源环境市场提供了加强政府监管的思路。同时，自愿碳市场中对数字化流程和标准化条款的采用，突显了技术手段在提升市场效率和降低风险方面的潜力，这也为其他市场提供了实施现代科技手段的方案。自愿碳市场的风险防范公法模式不仅限于内部应用，更为整体资源环境要素市场的风险管理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路径。

责任编辑：王 冰

^① ISDA: *Legal Implications of Voluntary Carbon Credits*, ISDA Website: www.isda.org/a/38ngE/Legal-Implications-of-Voluntary-Carbon-Credits.pdf, November 1, 2024.

组织化承载与社会性参与： 社区自组织建构社区共同体的案例研究^{*}

杨 慧 杨 琳

〔摘 要〕现代社区的治理应转向一种更加多元和自主的发展模式，其中社区自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于贵州省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社区自组织通过空间接触催生社区参与、组织化促成社会信任重构、“个人—社区”融入性连带增强社区团结等机制推动了社区共同体的建构。但社区自组织也面临空间承载力不足和制度不完善导致“小众参与”、资源配置失衡阻碍功能发挥、行政力量介入削弱组织自主性、成员特性限制服务效能等发展困境。具有内在韧性和现代适应能力的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结构的形成有赖于相应破解措施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社区自组织 社区共同体 组织化 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077-08

当前，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建设重点从最初重视短期搬迁效果转向更加关注搬迁后居民长期稳定的生活、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区的整体现发展。这种转变要求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建设采用一种更全面、更综合的策略，系统考虑政策支持、资源配置以及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合作。构建以社会互动和共识为基础的社区共同体是现代社区治理的核心要义，更是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国家和地方层面各种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表明，易地搬迁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了实施过程中的资金、组织、户籍、住房等因素外，还涉及大量的后续产业发展、社区融入等问题。^①而适应新环境、融入新家园是其中的关键，建立凝聚社区居民共识和情感连带的社区共同体更是社区建设的核心所在。将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建设成一个社区共同体并以此重构搬迁人口的社会空间，已成为一种主流思路。^②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共同体化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一过程涵盖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居民交往的互助化等多个方面。^③社区共同体建设作为一个持续的、需要系统性推进的实践活动，在新社区建设中尤其强调各行动主体的社会参与。社区自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这种由社区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51-63243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慧，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350）；杨琳，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共马尔康市委办公室（四川 马尔康，624099）。

① 曾小溪、汪三贵：《易地扶贫搬迁情况分析与思考》，《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② 李文钢：《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内部碎片化的表现形式与原因分析——以贵州F社区为例》，《求实》2022年第4期。

③ 姜方炳：《共同体化：城市社区治理的功能性转向——走出社区治理困境的一种可能思路》，《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

居民自发成立、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和服务满足社区居民多样需求的组织形式,在参与社区治理和提供社区服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20年,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以推进社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体现了国家对于包含社区自组织在内的社区社会组织功能的重视。关于社区自组织能否以及如何促进社区共同体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拓展社区自组织和社区治理的研究视角。

贵州省曾集生态脆弱区、民族聚居区、大石山区、革命老区于一体,恶劣的自然条件减弱了贫困群体在原有生存环境中脱贫的可能性。^①在脱贫攻坚新阶段,贵州省易地搬迁192万人,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均得到改善,^②搬迁安置社区建设也取得了很多标志性成果。在参与新社区建设的众多主体中,社区自组织因其服务性突出、参与门槛较低等特点,在促进社区参与、重构社区信任、增强社区融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基于社区内部力量的自主发展模式,为其他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本文基于在贵州省搬迁安置社区的调研成果,探究社区自组织促进社区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和作用机制,识别社区自组织在其中面临的发展困境,提出相应的破解措施,以期回答“在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搬迁群众如何更好地融入社区,真正实现‘身安’‘业安’到‘心安’的转变”这一时代性基层治理问题。

一、社区自组织建构社区共同体的理论路径

关于共同体理论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德国学者斐迪南·滕尼斯,他在《社区与社会》(又译《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 Gemeinschaft 和 Gesellschaft 这样一对概念,通常被翻译为“Community”和“Society”。但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这两个关键概念尚处于未翻译的状态,“Community”和“Society”仍然存在模糊释义的意味。滕尼斯认为,Gemeinschaft 是指“建立在自然情感基础上、紧密、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这种社会联系或者共同生活方式产生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③这个共同体是以血缘、情感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生长起来的。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将 Gemeinschaft 译为“Community”,英译有社区、团体、群落、共同体等多种含义。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等将“Community”译为中文的“社区”,^④将“Community”理解为“社区”这种界线明晰的地域实体是与当时中国实证研究的需要分不开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区”的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解释,但是无论从哪一角度解释,其核心意涵是未改变的,那就是对“共同体”的追求。^⑤对“社区”是“共同体”的本质理解强调的不仅是地理位置的共享,更重要的是成员间的情感认同和社会交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是由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生活的人群组成的,他们通过共享经验、价值观念以及日常互动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和认同感。

早期的社区建设研究较多关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精神共同体”建设理念不足,而“社区精神共同体”建设才是富有人情味的现代社区建设的关键。^⑥农村社区共同体重建不应该局限于依靠加强农村基层政治与行政管理以及经济的集体化或合作化,而应通过公共服务将人们联系起来,在服务的基础上重建农民的社区及社会信任,进而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质即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新构建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这需要重新处理国家、社会、市场与村庄的关系,使四者相互衔接发挥协同作用,同时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强化共同的利益与情感建设,积极培育符合现代社会发

① 李培林、王晓毅:《移民、扶贫与生态文明建设——宁夏生态移民调研报告》,《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② 《2021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全文)》,贵州省人民政府网:https://www.guizhou.gov.cn/home/tt/202109/t20210913_70070896.html,2021年2月24日。

③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页。

④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22页。

⑤ 郑杭生、杨敏等:《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杭州“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8-19页。

⑥ 王冬梅:《从小区到社区——社区“精神共同体”的意义重塑》,《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

展需要的新型社区共同体意识。^①除了调整各主体的关系外,在社区层面进行再组织化,是通过社区共同体营造和在社区层面进行社会整合、弥合社会断裂倾向的一条可行路径。^②

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农村社区自组织的地位、作用和功能逐渐凸显出来,各类自组织实体在农村社区服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③自组织是一种社区自我治理的模式和一种机制、状态,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是社区内部主体协商、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并可以使社区逐步进入“自我维系”状态。^④社区自组织具有自治性、志愿性、服务性特征,并建立在情感性、认同性关系基础上。^⑤自组织与社区成为独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本质上存在对应关系,从整体和发展趋势来看,在社区共同体的建设中,自组织相比于被组织的形式,通常显示出更明显的优势,是实现社区和谐、内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⑥

如图1所示,基于社区自组织自身的优势和特性,搬迁安置社区共同体的理论建构应落脚于“共同纽带”和“社会交往”,共同纽带凸显文化和精神内涵,社会交往强调社区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为搬迁居民提供了相互接触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定期开展活动,调动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进而促进社会交往。个体的相互接触与社区参与促成了初期情感的形成,并加速社会信任的建立,这为组织化提供了可能。组织的建立使得成员能够情感同理与资源共享,组织通过各种活动唤醒文化记忆,重新编织共同纽带。组织中的个人在社区中分别有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网络与网络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个人—社区”的情感融入性连带,获得感与参与感也得到强化,并愿意积极投身到社区共同体建设中。该理论路径关照到了当前社区建设面临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模式中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不足的难题,认为破解“社区”只是一个地域性概念的“共同体困境”,^⑦需要推动包含“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三大基本要素的社区共同体建设,这不仅需要关注社区建设的情感维度,更离不开人的主体性发挥。以“共同纽带”和“社会交往”为主题的社区共同体理论建构,为具有内在韧性和现代适应能力的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结构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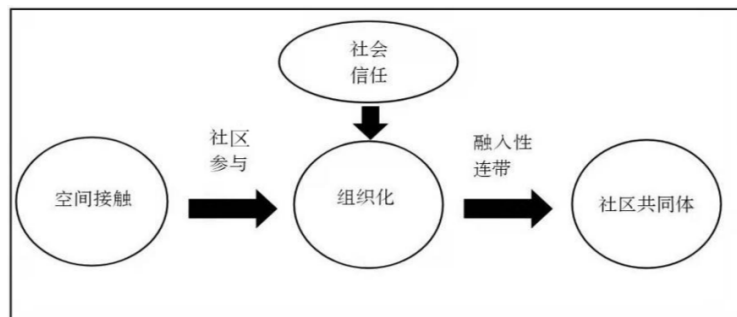


图1 社区自组织建构“共同体”的理论路径

二、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共同体困境”与社区自组织培育

A社区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是贵州易地搬迁重点安置社区,占地面积15.2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3.83万平方米,居民3119户、12296人,主要由沿河、印江、松桃等县的群众搬迁而来,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占比为75%—78%,文化差异较大。2019年,A社区启动易地搬迁安置的后续治理工作。同年,F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作为当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入驻A社区,开办“五彩益家”社工服务站,开展精神慰藉、心理援助、社会参与、社区融入和志愿服务的促进工作,为社区内各群体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帮助居民更快适应搬迁后的生活。在社区自组织的发展方面,社区内现有

① 闫文秀、李善峰:《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何以可能?——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十年反思与展望(2006—2016)》,《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② 赵欣、范斌:《敦亲睦邻:社区公共空间的分类运行机制与共同体构建》,《晋阳学刊》2014年第6期。

③ 王瑞华:《农村社区自组织在社会工作中的功能论析》,《齐鲁学刊》2011年第3期。

④ 陈伟东:《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⑤ 马西恒、刘中起主编:《都市社区治理:以上海建设国际化城市为背景》,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年,第103页。

⑥ 杨贵华:《自组织与社区共同体的自组织机制》,《东南学术》2007年第5期。

⑦ 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东岳论丛》2012年第1期。

一支舞蹈队和F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孵化的“老年志愿服务队”“新市民书法社”和“新市民歌舞队”。为了研究社区自组织建构社区共同体的作用和机制,调研团队采用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并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访谈对象包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3人,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6人,社区自组织负责人19人,社区自组织成员20人,以及其他社区居民10人。

(一) 搬迁安置社区的“共同体困境”

易地搬迁安置是国家主导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逻辑在搬迁安置前期不可避免地会与搬迁居民的生活实践逻辑存在一定的矛盾,如陌生的邻里关系、增加的生活成本、文化割裂的阵痛以及社会调适的张力。^①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增加了居民对于新社区的适应困难,居民之间的陌生感也影响了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例如,虽然A社区举办了多期就业培训,让一部分适龄青年实现了就业,但由于搬迁后粮食性收入骤减甚至趋零,加之日常生活开支增加,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对经济压力普遍感到焦虑。

在易地搬迁安置前,A社区居民生活在传统村落中,乡土社会空间较稳定,生活的同质性和集体意识较强。易地搬迁后,居民从不同村落搬迁到同一安置点,空间差异增强,空间上的压缩与集聚改变了村落的社会地域边界与物理空间形态,^②也改变了居民的社会交往空间,适应传统村落生活方式的搬迁居民很难在新社区中实现社区认同与情感归一,^③社区建设存在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不足的共同体困境。在现实社会中,维系人们交往的纽带是血缘、地缘以及共同土壤下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相比于搬迁前单一形态文化的村落,搬迁后面对多元文化环境的转换,搬迁居民产生了心理困惑与身份认同焦虑,他们对原来的乡村仍然有深厚的感情,很难迅速实现身份转变并适应新社区生活,甚至造成部分居民返乡的想法。一些传统乡村“熟人社会”中的生活记忆和文化烙印被迫移植到新社区,自然引发了居民的身份认同混乱及对社区的认同不足。

(二) 社区公共空间与社区自组织培育

“公共空间”一词源于西方学界,最早出现于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中,后来被用于城市规划和设计学领域。^④公共空间不仅是社区生活的物理中心,也是社会互动和个人归属感形成的关键场所。在公共空间内,基于个体共存、共在所催生的社会互动和公共交往成为了连接不同层面社会关系的纽带。A搬迁安置社区的公共空间主要有一老一小日间照料中心、红白喜事服务中心、四点半课堂、妇女之家、综治中心、乡愁馆、道德讲堂、五彩益家社工服务站、法治广场和感恩文化长廊。整个社区公共空间以法治广场为核心呈环状分布,为居民提供了交往与集群的机会,促进了邻里关系的建立。

提升搬迁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促进社区参与和社区共同体建设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工作,也需要发挥社会、社区和社会工作的联动力量,这是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新格局的关键。不仅要重视外部资源的输入,更要注重社区内生动力的培育。搬迁居民的社区融入主要反映在社区参与上,而社区参与最有效的形式是通过组织参与社区事务。在人际关系相对疏离的搬迁安置社区很难自主形成稳定的自组织,因而五彩益家社工服务站在培育社区自组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F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入驻A社区初期就进行了多轮入户探访和社区走访,明确了社区自组织培育的阶段性目标。其次,五彩益家社工服务站积极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寻找有意愿组建兴趣小组的成员,根据社区需要和居民兴趣分别组建不同“队伍”,为其提供活动场所,开展常态化训练,进而培育组织

① 郑娜娜、许佳君:《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融入——基于陕西省西乡县的田野考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② 田鹏:《“乡土连续统”:农民集中居住区实践样态研究——基于后乡土社会理论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③ 孙其昂、杜培培:《城市空间社会学视域下拆迁安置社区的实地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④ 陈竹、叶珉:《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空间公共性的判定》,《国际城市规划》2009年第3期。

领袖，成立社区自组织。社区自组织发展需要有稳定的内部管理结构，其中组织领袖是组织活动和分工合作的核心，也是社区自组织的灵魂。五彩益家社工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通过参与队伍活动，发掘能够发挥较大组织作用和具有较高决策力的成员，鼓励其作为队伍领袖组织具体活动。在社区自组织发展较成熟时，五彩益家社工服务站与社区管理部门联系，将各种自组织在社区所在派出所备案，使社区自组织合法化。

如上所述，目前A社区已成功孵化三个社区自组织。新市民歌舞队有成员35人，主要在社区内开展歌舞类文艺比赛和“金钱杆”表演。新市民书法社现有成员30人，主要开展书法、美术等研究创作、公益培训和文娱展览活动。老年志愿服务队现有成员40人，主要组织成员在社区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和关爱困境老人、关心下一代服务。这些社区自组织的活动场地主要以五彩益家社工服务站为主，以一老一小日间照料中心、感恩文化长廊为辅。

三、社区自组织建构社区共同体的实践机制

个体通过社区自组织参与社区活动，不但满足了自身情感和兴趣需要，还从中获得了更多价值感，逐渐地将自己融入社区中，实现从“我”到“我们”的延伸，在个体与社区之间建立了联结。这使“社区”由治理制度层面向居民认知层面转化，经由自组织编织的空间媒介，不断重组个人与社会、地点与空间之间的关系。^① 各类公共空间不仅是社区自组织成员聚集的场所，更成为了社区居民赋值“我们”的社区共同体载体。社区居民通过定位个体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参与而赋值在社区自组织中的实践，进而拓展社区关系网络。这种具有持续价值的关系网络逐渐替代了搬迁居民的原生空间，社区参与形式也不断超越原生空间的活动参与。

正如社区自组织建构社区共同体的理论路径所示，“共同地域”“共同纽带”和“社会交往”是构成社区共同体的三大核心要素。“共同地域”对于共同生活在A搬迁安置社区内的居民而言已经存在，社区自组织的作用主要是联结“社会交往”和“共同纽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利用社区公共空间组织活动，为居民提供空间接触的机会并促成组织化发展，社区自组织成员在空间接触中促进了社区参与，加强了社会交往；而社区自组织在成员的社区参与中传承了民族文化并重拾农耕记忆，共识性的情感和文化被重新定义，由“互助美德”“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地方优秀书法艺术”等引领的“个人—社区”的融入性连带进而形成。由此可见，社区自组织通过“共同地域”“共同纽带”“社会交往”的重新连接与循环使得社区共同体得到了发展。

（一）空间接触催生社区参与：际遇与互动

如何使得搬迁群众在相对亲密的社会交往中，实现人际网络的重新编织，强化社区融入与社区认同，是搬迁工作完成后的工作重心。空间接触是集群的基础。空间参与的原初形态是际遇，人们在感官上彼此感知，表现为一种接触性参与。只有在接触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参与和集群，因而空间接触是参与和组织化的基础。而空间接触与空间参与的前提就是新社区的空间再造。空间再造的关键在于建立人与人互相熟悉且彼此信任的、以地域为基础的“类熟人社会”，例如可以将社区活动中心等设置为公共空间，整合不同村落搬迁居民的风俗和集体记忆，构建开放、多元的社区环境。^②

在相对区隔的公寓式安置社区，居民主要借助各类空间进行接触。在组织成员访谈中发现，受访者多次指出“地方”的重要性。这里的“地方”便是“平台”与“空间”。在五彩益家社工服务站等社区公共空间里，社区居民通过接触相互吸引，逐渐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人际联系，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不断增加。这说明社区公共空间与社区参与相伴而生，公共空间是社区参与生发的土壤，而社区参与赋予了公共空间持续的生命力。

^① 张弘莉：《重新发现社区：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以社区自组织为例》，《当代传播》2021年第5期。

^② 郑娜娜、许佳君：《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融入——基于陕西省西乡县的田野考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二）组织化促成社会信任：信息交换与情感同理

人际接触并非能完全形成人际互动，亦未能形成全空间范围内的“人—人”互动。社区公共空间作用的长效发挥需要有相同需求的居民形成集群效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个别老人在活动时哼唱民族歌曲、讨论民族舞蹈，于是提议组建队伍，在社区参与的过程中传承各民族传统文化，“新市民歌舞队”由此成立。“新市民书法社”和“老年志愿服务队”也依循这样的路径相继成立。这些社区自组织不仅为有才艺的居民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更为成员提供了情感寄托。

社区自组织成员间的信息交换也使彼此获得了更多资源，实现了利益共享。例如，成员会把周边招工资讯分享给组织内成员，这些信息会随着组织成员的社交网络传递和散布。一些自组织成员在搬迁社区附近的荒地开垦，种植食用蔬菜，在收获期相互交换。

建立社区共同体的核心在于社区成员共有的联接纽带，以及由此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网络，而构成联接纽带的基础就是社会信任。^①在传统乡土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建立的关系是社会信任的基础，但在搬迁社区，原有宗族、血缘关系被打破，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信任体系尚未建立。^②A社区的几个自组织成立后，组织内外成员通过日常聚集、资讯共享、物品交换变得关系更加紧密，社会信任得以重构，互惠、合作的社区氛围也逐渐形成。

（三）“个人—社区”的融入性连带：“团结”性社会资本建构

社区居民由民族聚居村寨搬迁至公寓式安置小区，地理位置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地缘与业缘关系的破坏导致乡土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淡化。成立社区自组织，加深社会信任，发掘社区共识性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促进个体与社区的融入性连带以建构“团结”性社会资本，是加快社区共同体建设的有力措施。

1. 互助美德的融入性连带。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是“移民”的社区融入过程，来自不同地方的搬迁居民在互惠互助中提升了社区融入感。A安置社区内土家族、侗族和苗族人口较多，这些民族曾世代生活在山区，宗族观念和集体意识较强。“新市民志愿服务队”这类志愿服务性社区自组织实质上在社区参与中唤醒了他们的村落记忆。因此，个人与社区间基于优秀传统美德的融入性连带被重新编织。

2.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入性连带。A社区的自组织除了唤醒居民的集体互助意识外，还扮演着文化传承的重要角色。社区的文化艺术氛围能展现出利他、互助、为居民服务的可能，对提升社区凝聚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③这类社区自组织将搬迁群众推到了一个充满能量、成长和进步的社区场域，帮助大家持续释放自身的优势、能力和天赋。^④

铜仁主要流行金钱杆舞等舞蹈形式和以傩戏为主的本土戏剧。A安置社区具有多个少数民族互嵌性，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底蕴，社区自组织充分考虑组织成员和社区群众对本土舞蹈和戏剧较为熟悉，将它们纳入组织活动中，“新市民歌舞队”长期排练的一种舞蹈便是金钱杆舞。在许多民族舞蹈和戏剧的排练与表演中，乡土记忆在新社区中被重拾，个人与社区间基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入性连带也在一次次的活动中被编织。

3. 地方优秀书法艺术的融入性连带。铜仁印江的书法在明代萌芽，清代名家辈出，为“书法之乡”，长期的教育传统和科举直接推动了印江书法的发展。^⑤A社区“新市民书法社”成立后将大量印江搬迁

① 侯顺斌、金昱彤：《易地搬迁社区重建：问题与重建进路》，《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② 孙远东：《社区重建抑或国家重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公共治理》，《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③ 曹飞廉、万怡等：《社区自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协商机制研究——以两个社区营造实验为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④ 杨贵华、王瑞华：《社会工作与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⑤ 《史海钩沉|中国书法之乡——印江》，铜仁市纪委监委网站：https://www.trjw.gov.cn/html/2021/jingcaigushi_0305/19482.html，2021年3月5日。

居民聚集起来练习书法，并教授其他居民学习，其他县镇的成员也会分享本地书法艺术，在相互切磋中个人与社区的融入性连带被编织。

四、社区自组织的发展问题及破解之道

如上所述，搬迁居民在公共空间接触中参与社区事务，并随着深入参与形成具有稳定人际关系网络的社区自组织。通过自组织内外的情感同理和信息交换，社会信任被重建，并在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优良美德的发扬中，“个人—社区”的融入性连带不断扩展，社区共同体初步建立。但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社区自组织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社区共同体建设的进程。

（一）多因素制约：社区自组织的发展问题

一是空间承载力不足、资源配置失衡、组织制度不完善等导致“小众参与”以及部分功能发挥受到影响。空间承载力指一定空间范围内某些个体或事物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在易地搬迁安置背景下，公共空间的功能发挥有赖于特定资源的合理配置。^①如A社区自组织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五彩益家社工服务站，虽然各自组织的活动时间并不冲突，但社工服务站也会承接其他服务而需要使用场地；舞蹈队成员经常由于外部人员喝了放置在社工服务站内的舞蹈队专属桶装水而与其发生争执。公共空间是资源附着的载体，资源配置与投放的均衡程度影响空间内各个部分功能的有效发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资源集中向空间内部某个部分的过度投放会导致空间内部其他部分和空间因资源缺少导致功能发挥失常，而空间内各部分的竞争也会影响公共空间的健康发展。此外，社区自组织内部制度不完善使得个别组织成员间的矛盾容易衍生成两个小团体之间的矛盾，形成强弱的小团体分化与冲突，甚至通过情感压力排斥异己，以个人喜恶公开阻挠或劝退他人。组织负责人有时也会赋予自己一些特殊权力，以个人偏好来选择和决定新老组织成员的参与。这导致很多社区居民被阻隔在外，“小众参与”的趋势愈发明显，组织新人越来越少。现有自组织之间的资源“争夺”也不利于新组织的产生和社工站更多服务的开展。

二是行政力量介入对社区自组织自主性的削弱。社区自组织的自主程度越高，组织发育越完善，更加有益于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但是A社区的自组织依然火候欠佳。例如自组织举办文艺活动的初衷是发挥老年人优势，带动老年人社区参与，但在行政流程中会被添加诸多要求和规则，配合社区行政活动需要，使得活动变成行政导向而非居民导向，限制组织和组织成员的自主性。

三是成员特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区自组织的服务效能。A社区三个自组织的成员大多为老年人，接受访谈时他们表示，在发挥老年人的优势时也因为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偏弱，活动类型较为传统和单一，很难紧跟时代潮流做出改变，而且成员继替性不强、缺乏专业人员，影响文娱服务质量。例如，社区内另一个商业汇演性质的年轻人舞蹈队，因其新颖和专业的表演动作，更容易被社区活动方邀请。

（二）多渠道推动：社区自组织发展问题的破解之道

针对以上问题，首先需要完善自组织内部管理规则，组织成员共同讨论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有效降低矛盾发生率和排斥行为的出现，调动组织成员自我管理的积极性。还应建立监督机制和联动机制，在组织成员分工合作的基础上既保证组织负责人的相对“权威”，又维护其他成员话语权，以相互制衡、公平决策；当组织无法解决问题时，可外部联动社区社工站等寻求帮助。多方联动的模式既有利于自组织内部问题的解决，也可加深组织内外联系，促进“个人—组织—社区”的有效连接。

在公共空间使用与资源配置方面，社区相关管理部门和机构应充分认识到社区公共空间不只是为社区自组织提供的活动场所，而是全体社区居民的活动空间，其资源配置偏好会导致权利不均衡扩展。结合目前A社区三大自组织的发展状况，对社区自组织的资源投入仍需加大，同时还应考虑组织外部其他居民的社区参与需求与资源配置，减少各组织空间上的资源竞争。让社区居民和自组织成员共同参与

^① 李增元、周平平：《空间再造与资源配置：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新社区建设》，《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决策和社区资源的分配,有益于提升社区成员个人能力和公共意识,促进社区自组织和共同体发展。此外,除了发展初期,相关管理部门应对社区自组织适当放权,减少行政干预。在提升服务效能方面,各类社区自组织可以动员和吸纳不同年龄段的社区居民参与,还可以邀请社区外的专业人士对组织成员开展培训,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中打造搬迁安置社区的文化名片,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五、结语

由威权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转型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如何将社区作为主体性社会的基本单元,建构社区参与机制和共同决策机制,是当前中国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①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②作为国家治理的新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旨在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合作,促进社区资源共享与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构建结构开放、价值包容、多元主体协同的社会治理体系,是中国社区治理转型的有效路径。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范式中,社区自组织的发展更能体现社区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性,^③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重要载体,社区自组织在发掘居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和促进社区资源整合以及协调社区各系统运作方面发挥着区别于政府与市场的独特作用。在自组织调适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责任履行过程既是多元主体分配及落实治理目标、任务的有组织的过程,也是基于关系与信任,通过自行协商与合作进行的自我维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组织变革过程。^④社区成员之间的协商和身份认同是这一过程的核心。为使搬迁安置居民成为社区发展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现阶段的社区治理需要探索将社区建设转向更为深入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的有效途径。社区自组织理论关注的更多是社区内部如何通过自发的方式形成有序结构和有效管理,而经由自组织推动的社区共同体治理实践不仅在社区治理和公共性建设方面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回应了共同体理论强调的核心价值和原则。

总之,传统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更新的需求为社区自组织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空间,以社会参与、资源共享、价值认同为主题的自组织发展构成了社区归属感和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基础,能够凸显搬迁居民主体性的社区自组织促进了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型。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目前社会自组织的效能和作用发挥仍受制于行政干预、资源配置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内在韧性和现代适应能力的安置社区治理结构的形成有赖于相应破解措施的有效实施。

责任编辑:许磊

① 周庆智:《论中国社区治理——从威权式治理到参与式治理的转型》,《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6期。

② 周明、许珂:《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求实》2022年第2期。

③ 杨贵华:《自组织与社区共同体的自组织机制》,《东南学术》2007年第5期。

④ 何继新、栾文婷:《自组织调适视角下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配置及其履责路径》,《理论导刊》2023年第11期。

从群体共识到集体共情：旅游价值作用下 民族村寨族群认同感凝聚的路径研究^{*}

曾 韬 罗秋菊

[摘 要] 旅游价值是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凝聚族群认同感的重要激发因素。本文针对贵州千户苗寨旅游发展实践，应用软式阶梯访谈，递进式探索旅游价值作用下民族村寨族群认同感从唤醒到凝聚的动态路径。研究发现：族群意识的唤醒得益于价值共识、价值保全、价值再生与价值联动的动态激活；旅游价值激活下族群认同感逐渐建构，聚焦于特异积极化、社会归因与主体间整体化的自我范畴化；自我范畴化加强了族群互依，通过将院落结构编织为聚落体系，弱化群内偏差，强化集体有机团结；集体有机团结语境下地方感纽带得以再造，凝聚集体情感并施行为共有家园的守护责任，体现了利益、观念与情感多重嵌套下族群意识再范畴化的命运共同体构建逻辑。研究从学理上解明旅游价值构建族群认同感的理论联结，也为民族乡村族群意识“自下而上”克服群体偏差、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补充。

[关键词] 旅游价值 族群认同感 唤醒 建构 凝聚

〔中图分类号〕C912；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085-07

一、问题的提出

族群认同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当前，族群认同感的建构与提升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民族工作领域，而是需要多领域、多部门、多主体的“协同共治”。^① 对于民族多元发展而言，旅游以鲜活的民族文化为价值载体，促成大范围、多地域的多元民族互动融合新格局，进而在中国多区域、多民族、多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下，通过构筑互动交流的旅游“融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② 因此，旅游地价值再生语境下族群认同感何以凝聚、如何凝聚，已成为促进民族和谐共荣的关键命题。

旅游价值视角下的民族认同凝聚研究，其目的在于解明价值与认同的理论关联。民族认同研究领域“原生论”与“工具论”争论就关涉上述学理问题。原生论强调，族群认同主要来自原生相对稳定且依靠传承延续的因素。^③ 有学者进一步发展出共同建构论，认为族群认同建构的基础是共同先赋要素。^④

^{*} 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文旅新质生产力驱动民族村寨共同体意识凝聚的路径研究”（2024-GMD-033）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族村寨旅游价值构建民族认同感的路径与机制研究”（22YJCZH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曾韬，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65）；罗秋菊，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珠海，519082）。

① 朱碧波、李璐燕：《协同共治：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当代建构》，《探索》2018 年第 2 期。

② 孙九霞、李菲：《“旅游中国”：四十年旅游发展与当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1 期。

③ 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④ 李鑫：《“有我”与“共有”：论侏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逻辑关系》，《学术探索》2024 年第 8 期。

物质要素层面,有学者认为构成族群认同的归属要素包括共同社区、血缘、同胞等。^①抽象要素层面,有学者认为族群共享的公共记忆(历史记忆、传说故事等)通过接触、碰撞与杂糅,建构成整个民族的集体认同。^②工具论则强调认同的场景性和成员的理性选择,提出利益是认同的“指南针”。有学者进一步从互动强化论出发,认为主客互动让内外群间界限发生变化,^③各族在接触、采借与整合过程中得到价值优化,^④实现族群认同感在交流交往交融过程的相互强化。^⑤综上可知,“原生论”和“工具论”的二元预设需结合起来对族群认同形成与发展作出全面解释:认同感既源自原生因素也受外界因素影响,共同地域血缘发展的家族体系延伸成为族群认同“根基性”由来;^⑥同时,族群互动中文化经济等的共创共享,^⑦则成为重塑过去以适应变迁的外在动力,维持与延续族群认同。^⑧正如当前多位学者论证旅游业裹挟资本、人、物、信息的流动,^⑨强化民族饮食等原生文化符号意义,^⑩实现族际文化共享心理交融等多维价值共创,^⑪族群认同便是在以上两种力量间形成与变迁的。^⑫以上研究虽然对“旅游价值如何提升族群认同感”进行了有益探讨,但对提升过程中“旅游价值何以唤醒族群认同感”与“如何凝聚族群认同感”还缺少较清晰论证,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群体凝聚力理论为上述研究缺口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理论基础。群体凝聚力被定义为使群体成员留在群体中的力量。^⑬这种作用力发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间相似性成为人际吸引力的基础。相似性不仅体现在原生属性,还强调人们在价值感知上的共识对群体形成的作用。^⑭二是个体间的吸引强化了彼此依赖,主要表现在群体间存在共享目标并且相互间具有角色关系,提升了群体的范畴化。^⑮群体凝聚力理论解释了人际吸引力是如何产生并维系着成员间凝聚程度的,为旅游价值激发并维持群体共识、最终凝聚认同感提供逻辑基础。但该理论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传统观点认为群体范畴化容易引致种族歧视等群体偏见;^⑯群体凝聚不只源于人际吸引,更应考虑团结感、荣誉感等积极情感关系是如何升华的。^⑰基于此,本文结合国家“乡村振兴”重要战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理念,从群体凝聚力理论的思路出发,以贵州千户苗寨为研究案例,对旅游价值作用下的苗寨居民族群认同感凝聚过程进行探讨,期望深入理解旅游开发唤醒族群一致性认知并逐渐推进群体范畴化的实现路径,并

① 郝亚明:《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共生:理论评述与探讨》,《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② 麻国庆:《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③ 薛照明、覃璇等:《旅游对恩施土家族居民民族认同感的影响——基于个人生活史的视角》,《旅游学刊》2012年第3期。

④ 郭文、杨桂华:《民族旅游村寨仪式实践演变中神圣空间的生产——对翁丁佤寨村民日常生活的观察》,《旅游学刊》2018年第5期。

⑤ 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⑥ 肖玲聪、崔海亮:《从藏族心理认同机制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⑦ 李瑞、郑超等:《民族村寨旅游者主客互动仪式情感体验过程及其唤醒机制研究:以“高山流水”敬酒仪式为例》,《人文地理》2022年第2期。

⑧ 刘吉昌、曾醒:《情感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⑨ 孙九霞:《旅游流动影响下的民族交融与认同凝聚: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再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⑩ 田敏、陈文元:《论民族关键符号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南宁市三月三民歌节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⑪ 温士贤:《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价值内涵、内在动力与践行路径》,《贵州民族研究》2023年第5期。

⑫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⑬ [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⑭ Leon Festinger, “Informal Social Communic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no.57, 1950.

⑮ Michael A. Hogg, “Masculine and Feminine Speech in Dyads and Groups: a Study of Speech Style Gender Salience,”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4, no.2, 1985.

⑯ 管健、荣杨:《共同内群体认同:建构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认同》,《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⑰ 马进:《社会认同是怎样进行的——一种社会认同理论》,《甘肃理论学刊》2014年第1期。

对群体范畴化难以突破群体偏差等理论缺口进行回应,为文旅业凝聚民族地区共有精神家园提供科学的理论路径。

二、研究设计与调研过程

(一) 案例地概况

本文选取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千户苗寨为案例地。千户苗寨苗族人口占比 99.5%,是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苗寨建筑依山而建,千余户吊脚楼随地形起伏变化,层峦叠嶂。苗寨银饰、饮食、歌舞等民风民俗世代相传。2008 年前苗寨地处农业生产社区,所属地区更是国家级贫困县。长久以来其族群文化只是自然自为的存在,居民普遍处于“文化自娱、心态自卑”的状态。^①2008 年以来,雷山县政府努力争取省旅游发展大会在西江苗寨举办,并明确以旅游市场化为导向,全面推动苗寨景区规划建设。通过多年发展,逐渐实现民族文旅高质量转化与延展,先后获得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等荣誉。苗寨本土优秀文化从自我娱乐到主客共赏,居民也对本土文化有更深刻认识与热爱,实现“寨和谐,人自信”的集体认同状态。^②因此从中获取资料具有一定代表性,并能较好地诠释旅游价值作用下的族群认同凝聚路径,较好实现研究目标。

(二) 研究方法与调研过程

本文采用“手段—目的链”方法,探索族群认同感从建构到凝聚的递进过程。“手段—目的链”通过“具体属性—抽象结果—最终目标”提升思路,^③与旅游价值作用下族群意识从唤醒至凝聚的路径契合,为解释研究问题提供了精准方法视角。基于“属性—结果—目标”提升思路^④设计阶梯渐进式访谈提纲,从受访者感知的旅游价值提问,逐步提问抽象的族群意识,最终挖掘受访者内心凝聚的族群认同感内涵。2023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5 日,调研团队前往贵州千户苗寨对社区居民进行深度访谈,利用选择抽样的方式,有目标地选择可以丰富研究框架的样本。每天收集一定数量样本后,马上对文本内容进行整理、转录与初步编码,依据结果继续选择与研究问题关联的样本。累计访谈 45 名样本(按 A01—A45 编号),访谈时间为 20—60 分钟不等,受访者的身份包括非遗传承人、居家老人、餐饮与特产等商店的老板、员工、教师、学生等。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除了深度访谈外,采取多样性数据来源进行三角验证,主要包括:内部资料,包括西江苗寨文化研究院系列报告、千户苗寨官网动态、行业分析报告、书籍等,筛选有效信息 106 条(按 W01—W106 编号);参与式观察,包括参与苗寨的芦笙表演活动、参观民宿开发建设等。

三、资料分析与发现

采用一阶/二阶结构化资料分析方法,^⑤通过一阶分析(忠实受访者原意)和二阶分析(进一步归纳主题),产生严谨质性分析结果,展示文本与新归纳概念之间的联系并形成聚合构念。提炼文化基因体系、有机团结、人神关系构建、民族荣耀等 93 个一阶概念;继而对归类后的一阶概念赋予价值共识、特异积极化、社会归因、促进性互联等 11 个二阶主题;对二阶主题进行整合形成 4 个聚合构念—价值激活、自我范畴化、互依性强化、集体情感共鸣与施行。最终形成由一阶概念、二阶主题和聚合构念组成的动态结构(图 1)。

(一) 旅游价值作用下的族群意识唤醒:价值激活

认知一致性是群体凝聚力的基础,^⑥精巧的吊脚楼、“爱酸喜鱼”饮食风味与“身上史书”美誉的苗服等构成千户苗寨共享的认知符号,进而成为族群意识依托的价值基础。因此,苗寨以特色文旅充当“价

① 李天翼主编:《西江模式: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十年发展报告(200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19 页。

② 李天翼:《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西江千户苗寨的实践观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66 页。

③ 王跃伟、陈航:《基于“手段—目的”链的旅游者满意因素分析——以辽宁赴台旅游者为例》,《旅游学刊》2011 年第 6 期。

④ Eric Frauman and Peter Cunningham, “Using a Means-End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Greenway Use”, *Journal of Park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 vol.19, no.3, 2001.

⑤ Dennis A. Gioia, Kevin G. Corley and Aime L. Hamilton, “Seeking Qualitative Rigor in Inductive Research: Notes on the Gioia Methodology”,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vol.16, no.1, 2013.

⑥ [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第 123 页。

值激发器”，高质量激活居民固有但逐渐式微的文化主体性。综合编码内容与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李天翼教授等观点，^①旅游开发实现的共享物质文化价值激活主要表现 4 个方面。

1. 价值共识。以往苗寨位置偏僻，发展落后，乡村文化只是一种“自然自为”的存在。如多位受访者反映以往

“很少有特色美食，就是日常的炒菜”，与外界谈及本族文化有时会陷入“失语”境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村民逐渐意识到本土文化的传统功能及其生产的旅游价值。“我们这边好吃就是酸汤……你们（游客）真正要吃到我们这边地地道道的这种（口味）啊。”（A03）也有受访者认为“这些传统苗族服饰体现了苗族人民的审美”（A02）。当地居民已共同意识到酸汤、服饰等是西江社会稳定发展的文化根基，更成为向外界展示文化名片的重要窗口。

2. 价值保全。苗寨将鲜明饮食风味、吊脚楼营造等传统文化纳入保护体系，进一步实现高质量的文旅融合发展。如多位受访者表示苗寨成熟构建起以酸味、鱼味、糯味、酒味与地方味为主体的“好客五味”旅游美食基因体系。多年来苗寨“通过政府修建与村民自建等方式打造民族博物馆与农民画家等家庭博物馆”（W16）。在激励制度方面，早在 2009 年苗寨就建立了门票利益共享制度，“门票分红以村民对传统建筑等保护效果进行评估”（W23），发放相应文化保护奖励金。可见千户苗寨在文旅价值保全的路径呈现多样化态势。

3. 价值再生。在持续且丰富旅游实践带动下，苗寨多元文化价值不断被刺激、释放与再生产。苗寨采取“场景置换”与“内涵深化”等创新方式，提炼出既能彰显地方特色，又能供给高质量旅游体验的餐饮模式。苗绣价值再生模式也非常丰富。一是“苗绣+展演”，包含静态和活态。静态有春花苗族刺绣馆及各个文化展示点；活态有寨门迎宾、古歌展演等场景。二是“苗绣+文创产品”，将惯常日用品与苗绣技艺融合。三是“苗绣+体验”，开展刺绣体验教学项目。“我们一针一线地教……体验完可以带走。”（W34）四是“苗绣+旅拍”，“将苗绣、服饰、人物、情感与寨景有机融合”（W65），生产出更高的审美与时尚价值。据此苗寨致力于将饮食文化、服侍风尚等用现代方式精致地阐述，并成为可被感知的认同载体。

4. 价值联动。多元的价值再生促进了价值纵向、横向与空间联动。纵向联动指旅游开发实现传统到现代互联。旅游市场没有兴起前，有传承人表示“银饰技艺养活不了家人”（W45），表明民间技艺生存境况日益窘迫。但随着旅游带动，银饰工艺已通过门店进寨、网红直播带货、研学体验基地等模式焕发出出现代生机，不仅守住了本土文化底色，还彰显了文旅融合特色。横向联动指多项价值要素共同结合与互通。如创新构思的“高山流水”敬酒仪式，在现场将“敬酒文化+美食体验+歌舞文化”融合在一起。空间联动指旅游价值跨越了苗寨边界，带动周边区域参与到价值再生产中。如通过现场体验活动延长银饰产品价值链，将苗寨周边麻料等银匠村开发为银饰学习基地，赋能苗寨周边多维空间进步。

（二）族群认同感的建构：自我范畴化

旅游价值激活了苗寨群体心理建构，居民们逐渐将苗族表征内化给自身，意识到自身特异的个性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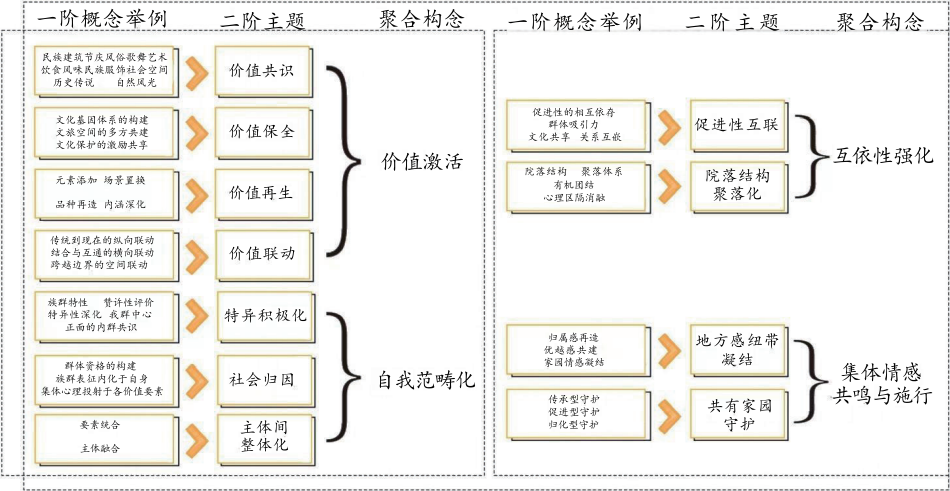


图 1 编码分析结果汇总

① 李天翼：《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西江千户苗寨的实践观察》，第 58-60 页。

所属群体的共性关联越来越强,将先前区隔“我”和“他人”的疏离关系重筑为范围更大的“我们”,^①完成了“共同内”群体的自我范畴化。旅游价值激活居民的自我范畴化主要表现3个方面。

1. 特异积极化。旅游价值作用下居民加深了对本族特性的共同了解,并进行“我群中心化”定位,塑造群体高自尊感,集体建构族群积极意义。如多位受访者认为“我们酸汤味道独特,跟别人的不一样……每天都有很多人(游客)来吃粉,还叫我去他们城市做粉”(A13),“像我们寨子,你到哪里都有饭吃;像其他(他族地方),你去哪家不会叫你吃饭的”(A38)。可见居民对本群特质赋予了积极化评价而形成强烈的正面内群共识。

2. 社会归因。基于不断积极化的内群共识,村民将日益提升的旅游价值归因于群体资格。多位受访者均提及苗绣承载着苗族千年文化,更传递着苗族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又如村民从族群基因透视近年来“村超”等火爆的原因:“传统斗牛就是足球篮球赛的内核”(A13),“苗族一直延续的竞争文化是真正发挥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因素”(A32)。更有受访者将运动比赛比喻为民族团结的友谊桥梁,是苗乡儿女自信团结拼搏精神面貌的体现。

3. 主体间整体化。“主体间”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共同分享经验,达到意义共享。^②积极社会归因深化了苗寨多元主体关联,在价值协同互动中推动了主体间整体化。^③一是传统与现代要素统合。苗寨文化传统与旅游现代化要素共同嵌入到地方基因,不断扩大在地化演进的边界。过去,长桌宴是最隆重的宴席,通常出现在接亲嫁女等情境。随着旅游开发,大部分苗民从最开始“这些节日刚开始只在内部过”(W11)的排外到现在愿意邀请外地人来一起过节。二是主体融合。“主—客”交互、旅游经营者交互、“政—企—社”交互等关系交织的流变,苗寨居民对“人—人”、“人—群体”关系的理解不断深化。旅游开发初期,村民、商户、游客与政府间产生各种利害冲突,但在党委政府耐心疏导下,经过长期的互惠合作,当地集体感得到重塑,抑制了因地缘、家族等不同而可能出现的分裂。多位受访者认同这种团结感可以在“危机和困难时期凝聚社区力量,让苗族人共同面对挑战”(A37)。

(三) 族群意识凝聚力的生成:互依性强化

主体间整体化加强了各群体间的互动与依赖。因合作性互动达成的彼此需求的满足,建立起群体间积极的吸引力,强化了族群认同的心理动力。苗寨族群关系的互依性强化主要表现两个方面。

1. 促进性互联。个体间促进性的互相关联促成双方需求的满足,据此在人际间创造吸引力。^④早年苗寨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农产品供自家食用,留守老人和妇女通过养猪、稻田鱼等维持基本生活”,(W47)银匠等从不脱离农业生产,只在农闲时帮人打制。^⑤因此,当年苗寨熟人社会关系仅属于自然而为的“机械团结”,带有促进性相互依存的“有机团结”关系甚为罕见。旅游开发以来,在政府与西江旅游公司组织下,居民从“一开始大家积极性不高”(A43)发展为全民参与到文旅场景打造中。政府与企业投资建设“表演场”“鼓藏堂”等文旅展示点;西江文化研究院专家参与打造寨门“高山流水”酒礼等活态文化,推动村民将民间农耕文化等变为文旅展示活动,增进苗寨管理者、文化挖掘者与村民的文化共享与关系互嵌。正如受访者感悟:“我们是一个集体,要共同繁荣发展才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A42)

2. 院落结构聚落化。院落是乡村家庭生活与人际关系发生的场所,^⑥苗寨各利益主体在旅游情境中的有机团结,对村寨血缘与地缘的院落结构进行了重新编织,建立起共同情感联系的聚落空间。“长桌

① Thomas Pettigrew,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49, 1998.

② 郭湛:《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③ 明庆忠、韩璐:《旅游价值共创促进民族村寨乡村现代化的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④ 章森榕、杨君:《从群体心理到认同建构——多学科视角下的身份认同研究述评》,《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⑤ 李天翼:《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西江千户苗寨的实践观察》,第66页。

⑥ 史艳荣、谢彦君等:《疏离感与亲和力:乡村旅游体验中的院落情结与人际关系再造》,《旅游学刊》2020年第12期。

宴沿街摆开……还有专程来过节的中外游客，都融入到节日的喜庆氛围中。”（A42）可见旅游开发重构了村寨传统“血缘—地缘”扁平化的院落结构，^①“让我们在更紧密联系中创造价值，感受到被接纳的满足感”，（A45）建造起村寨“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的立体化聚落体系。^②“游客对此（歌舞）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会感到家乡受到了外界认可和关注。”（A37）院落结构的聚落化给居民带来更多深度参与生产与展示本族特色文化的机会。在越发深入的族际交融中，民族同胞在世俗和仪式、传统与当下间建立起积极对话，共同情感进一步内化与凝聚。

（四）族群认同感的凝聚：集体情感共鸣与施行

促进性合作打破了传统院落关系边界，多方共同努力完成文旅符号生产、互动与采撷，旅游开发情境中的有机团结让社区从“自然而为”的群体转变为“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集体。群际间的一体感凝结起地方情感纽带，激励多方主体完成民族文明的延续，凝聚起高度认同感。

1. 地方感纽带凝结。多元领域交织的苗寨聚落空间，凝结起“个体—集体—家园”的地方感纽带，重塑了苗寨早年被空心化消解的多元共情场域。一是归属感再造。曾经苗寨族群意识淡薄，村民大量到外地打工（W103）。文旅赋予苗寨新生，为村民扎根与返归搭建了社群文化蓬勃发展的热土。目前村寨已有99%家庭直接或间接参与苗寨旅游建设，绝大部分外流村民回归本土就业创业。商家、艺术家、手工艺人、表演者等均能在文旅大舞台找寻到属于自己的表演位置与表达方式，“彼此关心和扶持，感到自己与苗寨息息相关”（A06），为这片古老土地注入共同的情感流淌与活力。二是优越感共建。文旅集体共建语境下，“大量经济机会和社区活力提高了幸福感”（A07），村民们为自己所在地方感到自豪，“别人知道我是千户苗寨的人都会很羡慕”（A37）。三是家园情感凝结。族群优越感激发个体对集体感恩情怀，强化与巩固“个体—集体—家园”情感渊源。“大家建设的民宿的橙色灯光在山间洼地中一盏盏亮起，宛如银河，空灵缥缈，有家的感觉”（A41），深切形成了“我们会更加珍视自己的家园，将其作为身份的一部分”（A07）的同根同源思考，最终凝结对共有家园的热爱情感。

2. 共有家园守护。地方感纽带延绵不断地维系苗寨集体家园情感，并进一步过滤与聚焦为共同守护的在地实践，昭示着认同感高度凝聚的“认同施行”与“认同持续”。一是传承型守护。居民对族群文化从“漠然”到“自豪”：“当年过节没有很大感受，参与（旅游开发）后觉得民族传统传到我们这一代也很自豪，一定要发扬苗族的传统文化。”（A03）二是促进型守护。居民会鼓励、提醒与劝导他人保护苗寨文化。“我们会向游客传递苗族木屋历史，（游客）意识到我们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会更重视保护传统文化的责任”（A13）。三是归化型守护。苗寨文化价值再生产过程，也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商业化、伪民俗化等变异趋向。“现在旅拍的苗服都是改良版的，更性感，为了迎合大众”（A41）。然而旅游价值的经济与工具理性并没有摧毁传统价值理性。^③当地保持足够韧性，形成对外来文化归化的再适应，并延展为根植本土的现代文化价值观。正如受访者所言“年轻女孩身着这些（改良的）苗族服饰，展现着民族风情”（A41），代表传统与现代交织下对苗族文化的展演与重构。可见在“守正”与“创新”观念不断磨合下，居民对守护责任形成新理解。“苗服也不是一诞生就这样……现在不过是新一代更迭期”（A41），“传统服饰文化是古典隽永的，更是现代时尚的”（A42）。苗寨多方力量在“传统异化”与“当前归化”共生语境中赋予苗族文化认同新内涵，集体奔赴“共同美好生活”超然目标。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围绕旅游价值作用下族群认同感何以唤醒及如何凝聚核心等问题，以贵州千户苗寨旅游发展实践为案例，通过“手段—目的链”分析方法，系统探索与回应研究问题，提炼旅游价值视角下族群认同凝聚路径的理论框架（图2）。文旅开发成为群体价值共识的向心力，进一步通过价值保全、价值再生与价值联动，激活苗寨居民的自我范畴化，进而将族群特异性进行社会归因，扩大了主体间的吸引力，逐渐释放群体心理动力，凝聚集体情感浓度，最终凝结地方感纽带并贯彻共有家园责任的施行与持续。

① 李汉宗：《血缘、地缘、业缘：新市民的社会关系转型》，《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② 陶玉霞：《乡村旅游根性意涵的社会调试与价值重建研究》，《人文地理》2015年第5期。

③ 孙九霞、罗意林：《非遗在民族文化中的嵌入与流动：“三交”驱动和认同强化》，《文化遗产》2024年第1期。

一是利益、观念与情感的嵌套弱化群内偏差，强化群体转变为集体的凝聚力。苗寨族群认同的形成，经历了旅游价值作用下的应激建构、集体观念共性的改变以及最终的情感互惠。结论呼应了凝聚力理论中共有利益与人际吸引力的观点，证明利益的相对平衡是维系群体共性的基础。^①旅游赋能多元价值共创，能减少族群内利益差异与整合族群内利益关系，创造“共建共商共享”的群体共识场域，形成合作性互依的社会分类观念。本文进一步揭示观念的改变是链接人际吸引与共情的关键因素。通过转换社会分类方式，个体自觉感知族群相似特征，淡化群内的区分因素，深化群际情感。群际情感的深化成为群体凝聚为集体的力量源泉。亲密的群际关系代表更深层次的尊重与信任，不同群体间因血缘、文化或利益而产生的差异感知被逐步淡化，有效避免了群际偏差与隔阂的滋生，进一步滋养更深层次的自我表露与共情理解。因此，族群认同体现为多重嵌套性结构，是共同利益、共同观念与共同情感递进式凝聚的结果。上述结论弥补了凝聚力理论较少关注群体情感共享机制的局限，丰富了学界对族群认同复杂性的理解，也为促进族群和谐共生与共建包容性社会提供有效洞见。

二是旅游价值作用下族群认同感唤醒、建构、强化与施行的凝聚路径，是自我范畴化延展为再范畴化的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凝聚力理论等西方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际吸引力增强后的群体范畴化会提升群体认同感，^②与本文结论中旅游价值作用下居民族群认同感建构过程相呼应。然而也有观点指出范畴化会导致刻板化，夸大内群一致性，加剧群内与群外的斗争。本文案例千户苗寨集体共情的凝聚，对该观点做出了中华民族情境下的回应与解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③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本质属性，深层内涵在于共同体使命下各民族的价值共创系统，各族群利益统合于整体利益中。在文旅深度融合语境下，认同的建构展现出由外向内逐层深化的过程，从集体身份认知的萌芽，经由集体身份认同的巩固，进而深化为地方认同的强烈情感纽带，最终抵达文化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此刻族群内积极特异性融入中华民族共性特征中，通过延展与重塑拍摄边界更广的心理空间，^④完成情感扩散与共融的“再范畴化”。因此，本文从学理上解明族群意识“自下而上”克服因群际与族际差异造成的群体偏差，成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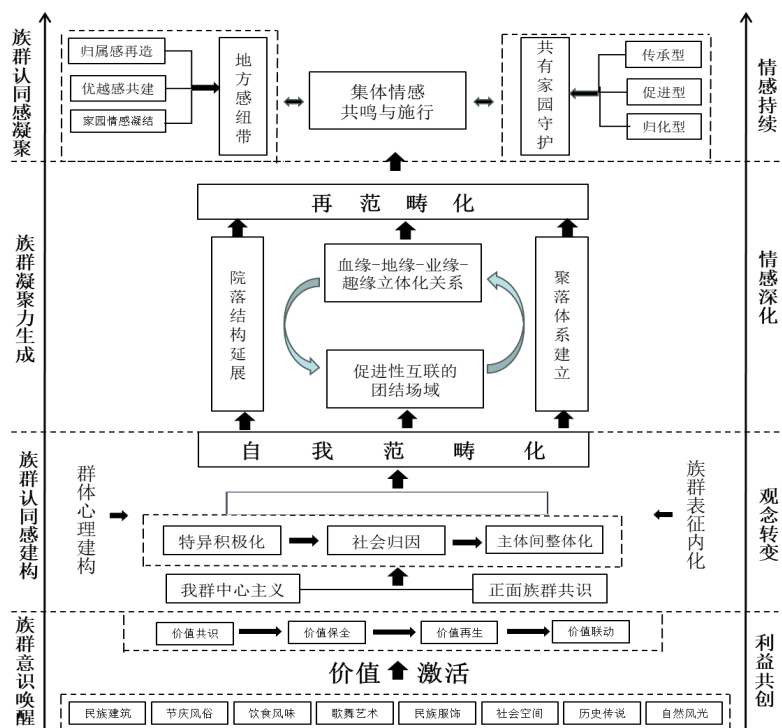


图2 旅游价值作用下族群认同感凝聚的路径

责任编辑：许磊

① 王云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建构——从自然生成到情感互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② Henri Tajfel and Michael Billie, “Familiarity and Categorization in Intergroup Behavi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10, no.2, 1974.

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3-10/28/c_1129945154.htm，2023年10月28日。

④ 管健、刘小睿：《从本民族到共同体：族际共情提升的社会分类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中国经济赶超过程中的汇率趋势和汇率政策

郑超愚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赶超奇迹。以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名义汇率三要素核算中国与美国相对国民收入的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和贬值对中国经济赶超有着重要历史贡献和关键现实作用。人民币汇率的演化历史是与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所预测的 U 型曲线国际规律基本一致的,已经完成向国际标准升值的均衡化调整过程。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趋势主要依存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形态敏感反应国内外经济周期的非同步性。中国汇率政策应该采取均衡取向,在依靠快速经济增长来支持人民币汇率均衡稳定的同时,通过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持续升值来加速经济赶超进程,避免以提高利率来防止人民币贬值或者以贬值人民币来扩大出口需求这样的短视政策选择。

[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 经济赶超核算 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 汇率政策取向

〔中图分类号〕 F124; 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1-0092-08

一、引言

1952 年起,中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实现经济起飞,从此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1953—1978 年,中国工业化率每 10 年约增加 10 多个百分点。1978 年,中国人均 GDP 略高于 200 美元,重工业比重却已达到钱纳里标准结构的人均收入 1500 美元的大国水平,总体经济结构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准工业国。党的十二大的“翻两番”经济发展战略、十三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以及最终集成提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在积极探索中国经济起飞后工业化深化和继续赶超的发展战略选择及其制度基础。^①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有力支撑下,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功推进“三重主题”的协同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的对外开放和从准工业国向发达工业国进步的结构跃迁,这标志着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再次经济起飞。^②1978—2023 年,中国实际 GDP 年均增长约 9%。2024 年,中国实际 GDP 预计约达到 1978 年的 50 倍。以现价美元计,1978 年中国名义 GDP 总量为美国 10%,而 2023 年中国名义 GDP 总量接近美国 2/3。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到 80 年代实现四个现代化再到当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 70 多年的经济建设历史中,中国始终贯彻着通过经济赶超来快速实现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作者简介 郑超愚,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 年,第 31-39 页。

^② 郑超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济学意义》,《理论探索》2024 年第 3 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总结和规划、指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内与国际和平发展条件下巨大规模人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经济现代化已经创造并且将继续创造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和赶超奇迹。^①

改革开放同时开启人民币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从双重汇率到单一汇率、从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的制度改革。1994 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上人民币可兑换，正式采取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在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名义下，中国随后进行的多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主要是调整交易价浮动幅度和完善交易价报价机制，以释放或者克服人民币汇率波动压力，防止单边升值或者贬值的市场一致性预期自我实现。

1978—2023 年，人民币兑换国际支配货币美元（USD）、货币区货币欧元（EUR）和代表性货币篮子特别提款权（SDR）的年均名义汇率如图 1 所示，总体表现为贬值，大致形成 1994 年前大幅度贬值、1995—2013 年显著升值、2014 年后温和贬值的三阶段时间路径。不过，若从 1994 年实行有管理汇率制度算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数据，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从 1994 年的 77.66 上升为 2023 年的 124.7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从 1994 年的 70.56 上升为 2023 年的 116.04。1994 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趋势性升值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总量顺序超越若干发达国家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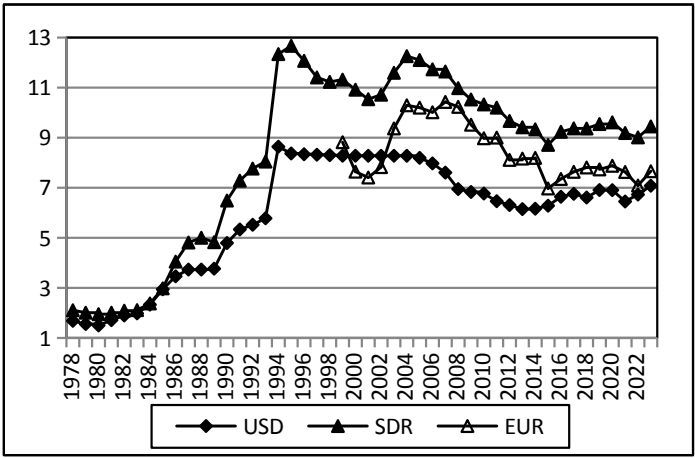


图 1 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时间路径

本文将在统计核算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赶超的历史贡献基础上，依据动态购买力平价（PPP）理论，解释和预测人民币实际汇率从贬值到升值的 U 型曲线时间轨迹，并且提出中国汇率政策均衡取向和稳健操作的政策建议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的理论和实践考量。主要研究内容共分为四部分：首先，按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汇率来分解中国国民收入赶超美国的贡献因素，具体测算中国经济赶超过程中人民币汇率重要而时变的历史作用；其次，在新冠疫情前后时域内重新估计动态 PPP 理论，进一步揭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长远趋势以及新冠疫情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结果；再次，计量分析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对国内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敏感反应，主张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均衡稳定取向，反对通过提高利率来防止人民币贬值或者通过贬值人民币来扩大出口的政策选择；最后，总结和借鉴支配货币的国际化经验，简要分析人民币继续国际化以至逐步成为国际支配货币的前景和路径。

二、中国经济赶超的汇率贡献

以名义 GDP 比率测算中国与美国经济的总量差距，设立中国与美国相对国民收入指标 ρ 。以变量 Y 和 P 分别表示中国实际 GDP 水平和 GDP 平减指数，以变量 Y^{US} 与 P^{US} 分别表示美国实际 GDP 水平和 GDP 平减指数，在直接标价的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 E 的条件下，中美相对国民收入 $\rho = (Y \cdot P) / (Y^{US} \cdot P^{US} \cdot E)$ 。按照上述相对国民收入公式，表 1 报告了 1978—2023 年中国国民收入总量增长历史及与

表 1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成就和国际比较

年份	中国				美国	中美比较
	实际 GDP Y	名义 GDP (¥, 万亿) P·Y	汇率 (¥/\$) E	名义 GDP (\$, 万亿) (Y·P) / E	名义 GDP (\$, 万亿) $Y^{US} \cdot P^{US}$	比较名义 GDP (Y·P) / (Y ^{US} ·P ^{US} ·E)
1978	100.00	0.3679	1.6836	0.2185	2.3516	0.1004
2023	4713.5	126.06	7.0809	17.803	27.356	0.6508

① 刘伟：《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内在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 年第 1 期。

美国的国际比较。

中美相对国民收入 $\rho = (Y \cdot P) / (Y^{US} \cdot P^{US} \cdot E) = (Y / Y^{US}) \cdot (P / P^{US}) \cdot (1 / E)$ ，其增长率形式为 $\Delta \rho / \rho = (g - g^{US}) + (\pi - \pi^{US}) - \Delta E / E$ ；其中， g 、 g^{US} 与 π 、 π^{US} 分别为中国和美国的实际 GDP 增长速度与 GDP 平减指数通货膨胀率， $-\Delta E / E$ 为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率。人民币实际汇率 $e = (E \cdot P^{US}) / P$ ，其升值率为 $(\pi - \pi^{US}) - \Delta E / E$ 。

本文使用增长率公式 $\Delta \rho /$

$\rho = (g - g^{US}) + (\pi - \pi^{US}) - \Delta E / E$ ，将 1979—2023 年中美相对国民收入增长率逐年分解为实际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差异以及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率（见图 2）。

如图 2 所示，1979—2023 年，中国实际 GDP 增长速度包含 1981 年、1990 年、1999 年、2009 年和 2020 年的 5 次明显波谷，经济波动相应经历 1982—1990 年、1991—1999 年、2000—2009 年和 2010—2020 年的 4 次完整波谷一波谷经济周期。表 2 区别 4 次完整经济周期以及前后各 3 年的不完整经济周期，分阶段计算中美经济赶超的年均和累计结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较高增长速度 ω 和较长增长年度 i 的累积影响，表 2 最后一栏 $(1 + \sum_i \omega_i)$ 性质的全程简单加总，必然低估 $\prod_i (1 + \omega_i)$ 性质的实际数值，即 $\prod_i (1 + \omega_i) > (1 + \sum_i \omega_i)$ 。

表 2 中国经济赶超的周期特征

时期		相对国民收入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汇率	
		$\Delta \rho / \rho$		$g - g^{US}$		$\pi - \pi^{US}$		$-\Delta E / E$	
		年均	累计	年均	累计	年均	累计	年均	累计
1979—1981		-1.54	-4.63	5.05	15.14	-5.64	-16.92	-0.95	-2.84
完整经济周期	1982—1990	-3.48	-31.34	6.37	57.37	2.69	24.17	-12.54	-112.87
	1991—1999	6.78	61.03	7.30	65.73	6.67	60.07	-7.20	-64.76
	2000—2009	12.18	121.82	8.43	84.31	1.89	18.85	1.87	18.66
	2010—2020	6.54	71.97	5.21	57.32	1.47	16.21	-0.14	-1.56
2021—2023		-2.05	-6.15	2.15	6.44	-3.20	-9.61	-0.99	-2.98
1979—2023		4.73	212.70	6.36	286.30	2.06	92.76	-3.70	-166.35

1981 年前，虽然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超过美国 5 个百分点，但是美国高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汇率贬值完全抵消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这导致中国经济赶超停滞。2021 年后，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仍超过美国 2 个百分点，美国高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同样完全抵消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在 1982—2020 年的 4 次经济周期，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差距均保持在 5% 以上。然而，由于各周期通货膨胀与名义汇率的特殊动态组合，人民币实际汇率剧烈波动，中国经济赶超的年均增长速度在四次经济周期依次倒退至 -3% 以下、加速至 6% 以上、进一步加速至 12% 以上和减速至 6% 以上，与相对缓和的中美经济增长速度差距形成鲜明对比。

在第一次经济周期，中美通货膨胀率差异温和，主要是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动导致实际汇率大幅度贬值，中国经济赶超进程倒退。在第二次经济周期，中美通货膨胀率差异有所扩大而对冲掉人民币名义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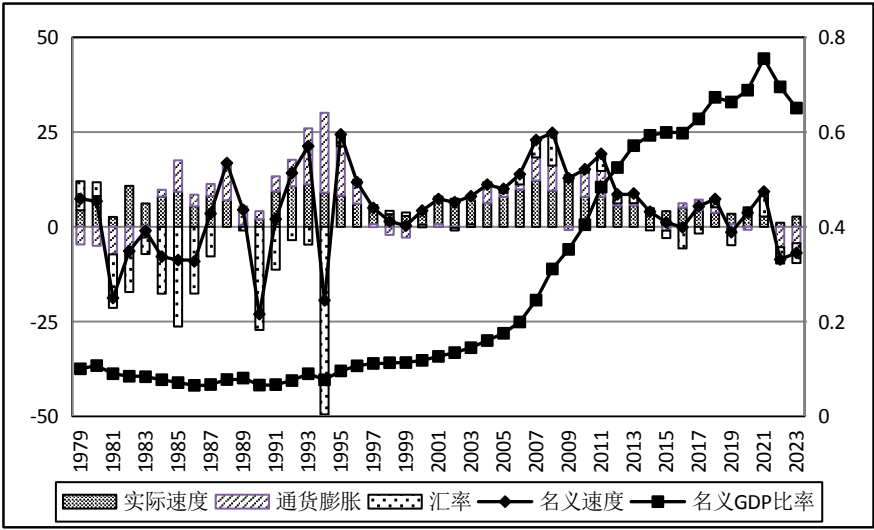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经济赶超的因素核算

率贬值幅度，人民币实际汇率保持稳定，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基本转换为中国经济顺利赶超。在第三次经济周期，中美通货膨胀率差异温和与人民币名义汇率平稳升值，共同推动人民币实际汇率持续快速升值，这与超高速增长叠加，使得中国经济赶超长足进步。在第四次经济周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中美通货膨胀率差异温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度升值。正是由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有力支撑，虽然中美经济增长速度差距低于第一次经济周期 1 个百分点以上，但是中国经济赶超的年均速度超过第一次经济周期 10 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继续成功赶超，将进一步依存于高速增长与实际汇率升值良性循环而正向交互作用。

三、人民币汇率的实际升值趋势

对于由发达国家 W 与发展中国家 D 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设立市场化系数 λ 、开放度系数 θ 、相对价格系数 ρ 和贸易障碍系数 σ ，令 $\theta_D/(\lambda \cdot (1-\theta_D) + \theta_D) = \eta_D$ ，动态 PPP 理论推导发展中国家实际汇率指数 $e = (1+\sigma) \cdot (\rho_W \cdot (1-\theta_W) + \theta_W) / (\rho_D \cdot (1-\eta_D) + \eta_D)$ 。由于相对低下的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贸易部门效率以及国际市场融合程度，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汇率相对传统 PPP 平价水平是长期被低估的。同时，开放程度、贸易部门效率、国际市场融合程度与市场化程度，也构成了发展中国家实际汇率升值与贬值的结构性动因。^①

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指标 Y 与购买力平价人均国民总收入指标 Y^{PPP} ，以二者比率 Y/Y^{PPP} 度量各国实际汇率与传统 PPP 理论平价水平的相对离差。放弃新冠疫情暴发而结构突变的 2020 年特殊年份，以 OLS 分年度估计 2020 年前后 3 年的动态 PPP 理论方程，取得计算方程 $Y_t/Y_t^{PPP} = C(0) + C(1) \cdot \ln Y_t + C(2) / \ln Y_t$ ，如表 3 所示。动态 PPP 方程的 OLS 估计

表 3 动态 PPP 理论的估计方程

方程	$Y_t/Y_t^{PPP} = C(0) + C(1) \cdot \ln Y_t + C(2) / \ln Y_t$					
	2017	2018	2019	2021	2022	2023
C (0)	-6.878303 (-14.12442)	-6.600801 (-12.89178)	-6.398513 (-12.71713)	-6.631841 (-12.53213)	-5.134532 (-9.885936)	-6.471287 (-13.48508)
C (1)	0.501104 (16.99501)	0.482151 (15.70808)	0.464873 (15.55124)	0.477037 (15.25646)	0.372358 (12.33169)	0.449846 (16.17893)
C (2)	25.76857 (13.08935)	24.83441 (11.87266)	24.34895 (11.73769)	25.32290 (11.53235)	20.02346 (9.145829)	25.43577 (12.52087)
R ²	0.805556	0.791759	0.805805	0.796349	0.735151	0.810428
Adj R ²	0.803155	0.789250	0.803316	0.793835	0.731922	0.808058
SE	0.098688	0.101931	0.093441	0.096835	0.094606	0.081951
DW	1.768371	1.818572	1.745730	1.832743	1.954432	2.033956
样本	165 (183)	169 (190)	159 (175)	165 (185)	167 (184)	163 (181)

结果是二次精炼的，基于两次 OLS 估计而连续淘汰 2 个以上标准异常国家后形成精炼样本集，而原始样本量在“样本”一栏括号内标注。

动态 PPP 理论的估计方程 $Y_t/Y_t^{PPP} = C(0) + C(1) \cdot \ln Y_t + C(2) / \ln Y_t$ 具有 U 型曲线性质，2023 年的散点图及其 U 型拟合曲线如图 3 所示。由于系数 λ 、 θ 、 ρ 和 σ 的多重组合，动态 PPP 理论能够容纳实际汇率非线性和非单调的历时演化，超越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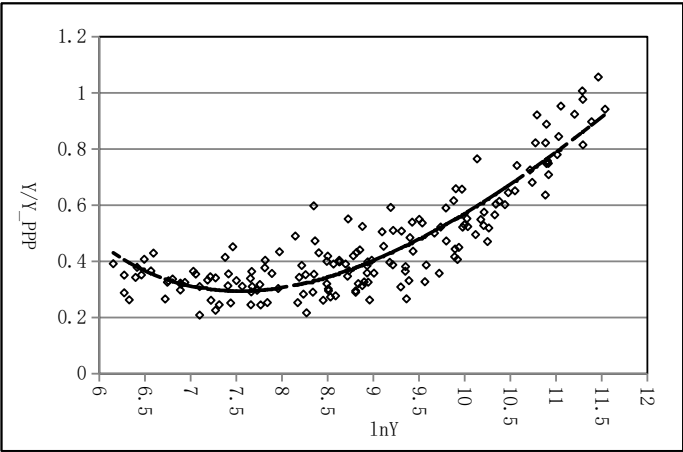


图 3 动态 PPP 理论的拟合曲线

① 郑超愚：《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77-98 页。

BHS 效应（亦称生产率效应）所预测的实际汇率单调升值情形。

对于中国样本，各年度 Y/Y^{PPP} 实际值及人均总收入水平上的相应动态 PPP 理论 Y/Y^{PPP} 拟合值如图 4 所示。 Y/Y^{PPP} 比率的中国实际值与世界趋势值离差，能够指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均衡程度及其可能的升值或者贬值调整压力。中国 Y/Y^{PPP} 比率在 2017 年和 2018 年接近世界标准，从 2019 年起多年连续明显高于世界标准，至 2023 年已经积聚向世界标准均衡化调整的较大贬值压力。

四、中国汇率政策的均衡取向

依据动态 PPP 理论，在向发达国家经济趋同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实际汇率和国民收入的各自演进路径不仅存在速度差异而无法同步，而且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发生进度背反。基于国际截面数据的动态 PPP 方程 U 型拟合曲线，其国别镜像就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别 U 型拟合曲线，能够导致不同货币计价的经济赶超视差现象。

以不变人民币和不变美元分别计价的中国实际 GDP 指数，二者在 1978 年正规化为 1 的自然对数时间路径，如图 5 所示。与不变人民币时间路径相比，中国实际 GDP 指数的不变美元计价时间路径更为曲折，受人民币实际汇率的 U 型路径影响在 1980 年代、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明显下凸，从 2010 年代起才开始走势相似。图 5 将中国实际 GDP 指数的不变美元时间路径向上平行移动，直至与不变人民币时间路径相切的“不变美元//”位置。可见，中国实际 GDP 指数的不变人民币时间路径与不变美元时间路径在 1994 年达到最大垂直距离，与不变美元时间路径的“不变美元//”平行线在 2013 年相切。1978 年以来，以不变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实际 GDP 增长速度在 1994 年前后分别快于和慢于不变美元计价的增长速度，而以不变人民币计价与不变美元计价的中国实际 GDP 水平在 2013 年达到最小相对离差。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越动态 PPP 方程 $Y/Y^{PPP} = \alpha + \beta \cdot \ln Y + \gamma / \ln Y$ 的 U 型拟合曲线底部，满足 $\ln Y > (\gamma / \beta)^{1/2}$ 的实际汇率升值条件，从此人民币实际汇率具有双重升值动力，即国民收入增长与人民币汇率向世界趋势的均衡化调整。中国经济赶超过程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后，不可避免地面临悲观经济增长预期的严重冲击。这可能完全抵消国民收入增长的升值力量，甚至悲观经济增长预期的自我实现和累积循环机制，可能进一步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较长时间和较大幅度贬值。图 6 描绘和预测中国经济赶超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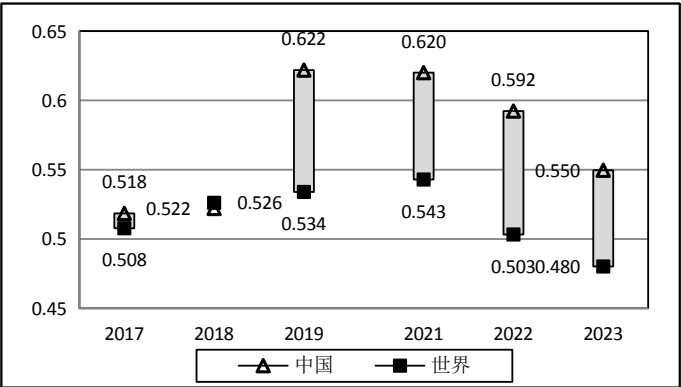


图 4 动态 PPP 汇率的世界趋势和中国离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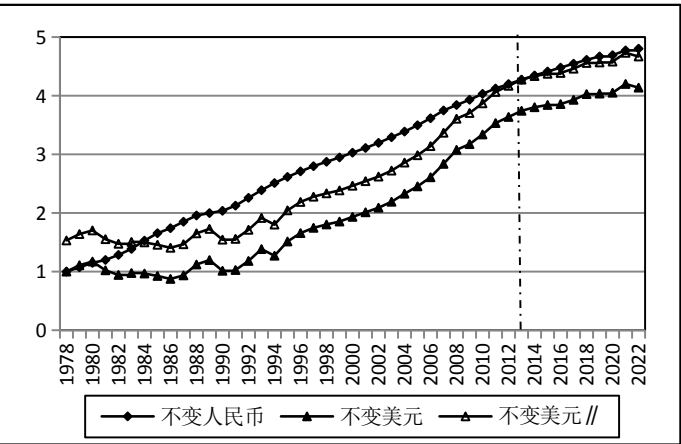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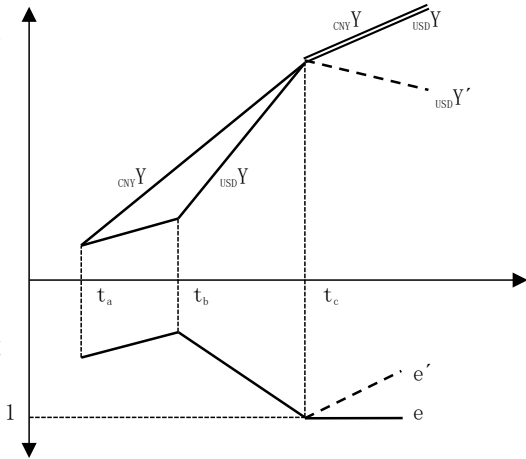


图 6 经济赶超视差与实际汇率倾向

的以往视差现象和未来可能情景，时间 t_a 、 t_b 、 t_c 分别对应人民币实际汇率开始贬值、贬值触底而开始升值、快速升值结束而可能贬值的临界点。图 4 的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世界趋势离差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化调整过程基本完成，未来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升值主要依存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长期趋势以及相应的乐观经济增长预期。

包括人民币汇率在内的中国经济体系的短期均衡状态和长期发展趋势是政策和预期依存的，需要在“乐观增长预期 + 积极需求管理 + 加速发展战略”的宏观经济管理架构支持下，逆转当前经济下行态势，再次实现经济起飞和加速经济赶超。^① 面对货币贬值和出口疲软的现实压力，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均衡位置出发，中国汇率政策仍然应该采取均衡取向，在合理均衡汇率水平上稳健操作。一方面，无论是消费者货币定价模式（LCP），还是生产者货币定价模式（PCP），均难以摆脱支配货币定价（DCP）的碾压式影响，外向型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的出口促进效应极其有限，在贸易保护主义时代也必然招致政治冲突和关税报复；另一方面，在维持低水平长期利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短期利率来阻止汇率贬值，这样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的政策实验违背理论逻辑和对抗市场力量，在世界经济史上只有失败先例。

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短期波动形态敏感反应宏观经济形势。以 OLS 估计 2013—2023 年人民币与美元名义汇率的季度平均水平对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度 Δg 和美国国民收入缺口 GAP^{US} 的季度计量方程。除受到国内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外部作用外，短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同时具有前瞻和惯性的内在调整机制，而国内国际的利率水平及其国别和期限差异无显著影响。

$$\begin{aligned} \ln FX_t = & 0.474101 + 0.237371 \cdot \ln FX_{t+1} + 0.517290 \cdot \ln FX_{t-1} + 0.220264 \cdot \Delta \ln FX_{t-2} \\ & (4.309486) \quad (3.020219) \quad (8.485245) \quad (2.054989) \\ & -0.002310 \cdot \Delta g_{t-4} + 0.006564 \cdot GAP_{t-3}^{US} + [MA(2) = -0.979991] \\ & (-2.943501) \quad (4.840431) \quad (-2213.451) \\ R^2 = & 0.910841, \text{adj} R^2 = 0.891736, SE = 0.013722, DW = 2.320030 \end{aligned}$$

五、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和路径

次贷危机前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观察和研究机构，分析和监测一国经济内部和外部不平衡状况的关键指标是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非政府部门的储蓄缺口和开放部门的贸易赤字，其分析和监测框架可以形象化为图 7 三环嵌套的不平衡界定装置。过度的财政盈余、贸易盈余和储蓄过剩同样是产生严重国际溢出效应的国内经济失衡表现，却未纳入图 7 的不平衡界定范畴。依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 $S-I = (G-T) + (IM-EX)$ ，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必须由非政府部门的过剩储蓄弥补，即图 7 的中心灰色区域应该是国家空集的。美国经济却凭借其国际金融枢纽和美元支配货币的特权地位，长期维持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和储蓄缺口共存的三重不平衡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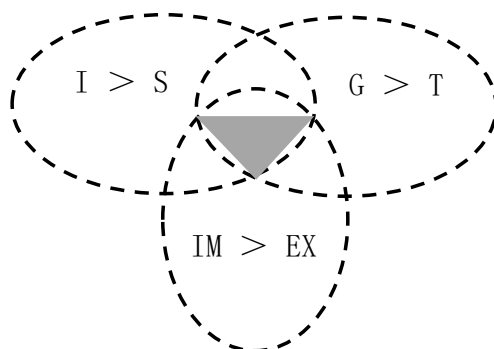


图 7 国民经济体系的非平衡性质

解释次贷危机发生原因和发展过程的国际不平衡假说以及预测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体系调整方向的国际再平衡假说，均被历史事实证伪：国际资本是流入而不是流出美国，美元是升值而不是贬值，并且美国继续保持其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即使各种去中心化的私人数字货币，也主要是锚定美元的。借鉴和参照美元的国际货币经验，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和国际支配货币地位是与中国经济赶超进程相辅相成的。中国未来从国民收入总量到人均国民收入再到人均资本存量对美国的逐渐赶超，将支持人

^① 郑超愚：《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凯恩斯主义路线》，《学术研究》2015 年第 5 期。

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乃至成为国际支配货币。同时，人民币的未来国际支配货币地位，必然要求中国经济体系的内部财政平衡关系和外部贸易平衡关系实现根本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只有出现贸易赤字，人民币才能够大规模投入国际市场，提供国际交易媒介，而只有发生财政赤字，人民币政府债券才能够大规模对外发行，充当国际价值储藏的安全资产。

在人民币尚未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前，利率平价（IRP）条件 $R_t = R_t^* + \Delta X_{t+1}$ 不成立。其中，变量 X 为名义汇率的自然对数，而名义汇率贬值率为 ΔX 。对于由动态 PPP 理论决定的均衡汇率水平 X^* ，汇率均衡化过程采取部分调整方式 $X_t = \kappa \cdot X_t^* + (1 - \kappa) \cdot X_{t-1}$ ，从而 $\Delta X_t = \kappa \cdot (X_t^* - X_{t-1})$ 。在动态 PPP 理论基础上建立动态 IRP 理论，以参数 ζ 表示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实现概率，存在不完全 IRP 条件 $R_t = \zeta \cdot (R_t^* + \Delta X_{t+1}) + (1 - \zeta) \cdot R_{t-1}$ ，由此取得动态 IRP 理论的可计算形式 $R_t = (1 - \zeta) \cdot R_{t-1} + \zeta \cdot R_t^* + (\kappa \zeta) \cdot (X_{t+1}^* - X_t)$ 。

拟合动态 IRP 理论的计量方程 $R_t = C(1) \cdot R_{t-1} + C(2) \cdot R_t^* + C(3) \cdot (X_{t+1}^* - X_t)$ ，在系数约束条件 $C(1) + C(2) = 1$ 下识别和估计资本项目自由化概率 ζ ，进而计算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距今时长 $\tau = 1/\zeta$ 。连续分析、估计和监测概率 ζ 与时长 τ 的高频时间序列，不仅能够跟踪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加速或减速的市场预期和人民币国际化进步或退步的市场信心，而且可以及时有效地反馈国内和国际市场对具体突发事件如何影响中国对外开放姿态的主客观评价。

次贷危机后的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变化，以往积极向上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正在被逆全球化颠覆，甚至习以为常的国际经济理论、模型和规律的经验基础也有所动摇和摧毁。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市场预期调整过程中，货币危机同时是预期依存和预期驱动的。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上行期，许多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无法再耦合美国经济景气而追随上行。它们不仅受制于贸易保护主义，出口发生相对和绝对萎缩，而且资本外流，面临货币贬值压力。^{①②} 就国际经验而言，在国民经济体脆弱性的基础上实施开放经济的进口替代转向、低利率条件下的过度货币扩张以及高债务背景下的大规模财政刺激等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必须更加警惕和努力化解可能由货币危机触发的经济停滞、经济萧条和经济衰退的潜在威胁。

六、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协同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从准工业国向发达工业国的制度转型和结构跃迁，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赶超奇迹。同时，以采取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在合理均衡汇率水平上基本稳定、进一步实现资本项目上可兑换而逐渐成为国际支配货币等为战略核心的人民币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成功推进，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基本稳定和持续升值，也有力支持了中国经济赶超。

按照实际国民收入、通货膨胀和汇率三要素分解外币计价的本国名义国民收入，进而从实际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的国际差距以及名义汇率升值率三要素来进行国民收入的国际比较和解析表明，1981年前和2021年后，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完全抵消高速增长贡献而导致中国经济赶超停滞；在期间的四次完整经济周期中，虽然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先后大幅度贬值、基本稳定、大幅度升值和小幅度升值，实际上主导了中国经济赶超进程前进或者停滞的不同表现。未来中国经济的成功赶超，高度依赖于高速增长与实际汇率升值良性循环而正向交互的作用。

依据动态 PPP 理论，由于相对不成熟和较为低下的市场化、开放化、国际市场融合，人民币实际汇率相对传统 PPP 平价水平是长期被低估的。同时，开放程度、贸易部门效率、国际市场融合程度与市场化程度，也构成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与贬值的结构性动因。动态 PPP 理论能够解释和预测人民币实

① IMF, *External Sectoral Report: External Rebalancing in Turbulent Times*, Washington DC: IMF Publisher, 2023, pp.61-62.

②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Policy Pivot, Rising Threats*, Washington DC: IMF Publisher, 2024, pp.1-40.

际汇率从贬值到升值的历史趋势，其基于 WDI 国际截面数据库的 U 型拟合曲线，与人民币实际汇率非线性和非单调的历时演化规律基本一致，而所计量的近年来中国样本连续高于世界标准的统计离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在积累的人民币贬值压力。

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趋同的过程中，实际汇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的各异演进路径可能导致本币与外币度量结果分离的经济赶超视差现象。与不变人民币计价时间路径相比，中国实际 GDP 指数的不变美元计价时间路径更为曲折，在 2013 年达到最小相对离差前明显下凸。在均衡化调整基本完成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稳定和升值主要依存于快速经济增长趋势以及相应的乐观经济增长预期，而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短期波动形态敏感反应国内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在“乐观增长预期 + 积极需求管理 + 加速发展战略”的宏观经济管理架构支持下，中国汇率政策应该继续采取均衡取向而在合理均衡汇率水平上稳健操作，坚决排除通过贬值货币来促进出口和通过提高利率来升值汇率这样的政策选项。

国际不平衡假说对次贷危机发生原因和发展过程的解释和描述、国际再平衡假说对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体系调整的方向预测，均被历史事实证伪。借鉴和参照美元的国际货币经验，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以及国际支配货币地位是与中国经济赶超进程相辅相成的，而人民币的未来国际支配货币地位，必然要求中国经济体系的内部财政平衡关系和外部贸易平衡关系进行方向性调整，以便利人民币大规模投入国际市场，提供国际交易媒介，也便利人民币国库券大量对外发行，充当国际价值储藏的安全资产。对于汇率决定理论的应用而言，在动态 PPP 理论上建立动态 IRP 理论，进而拟合动态 IRP 理论来识别和估计资本项目自由化概率，从中能够跟踪和监测人民币国际化进步或者退步的国际市场信心以及敏感事件对中国对外开放姿态影响的国际市场评估。

责任编辑：张 超

电子商务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及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阿里电商发展指数的实证分析*

蔡跃洲 王建国 刘生龙

[摘要] 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而电子商务下沉县域则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基于阿里巴巴县域层面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和其他县域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电子商务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发展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分析也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中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可以通过扩大商品销售、提高创业活跃度和促进企业创新来提升县域经济增长。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电子商务的经济增长效应对中部县、内陆县、山区县和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这进一步佐证了电子商务发展可以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 电子商务 互联网平台 县域经济 区域协调

〔中图分类号〕F061.5; F7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 (2025) 01-0100-0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县域是连接乡村和城市的纽带，在推进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相比大中城市，我国县域经济普遍存在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商贸物流欠发达等问题，且不同地区间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发展县域经济特别是提高相对落后地区的县域经济增速，对加快城乡一体化、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进而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008 年前后，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3G/4G/5G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实现大规模商业化推广应用，推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并催生出各种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领域最早的模式创新之一，借助消费互联网平台成为数字技术渗透影响经济社会、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形式。以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为代表的电商平台，依托强大的数据收集、处理、分析能力，配合在线支付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线下商品交易方式，通过推动农产品进城以及工业品下乡，在活跃县域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宏观大数据建模和预测研究”（719914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蔡跃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研究员（北京，100732）；王建国（通讯作者），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北京，102206）；刘生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100084）。

县域电商和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得益于电子商务平台在汇集匹配供需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优势。电子商务平台向县域和农村地区的下沉,能够将各类特色农产品有效纳入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有效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扩大其产销规模。与此同时,相比线下创业,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网店大幅降低了创业成本,有助于提高县域创业活跃度。^① 这些对于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缩小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都有着积极作用。

已有不少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能够刺激居民需求总量,扩大消费种类和范围。^{②③} 电子商务对消费端的积极影响也会传导到供给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国外文献显示,电子商务可以促进经济总量增长和生产率提升。^{④⑤} 早期针对中国电子商务影响的实证研究则大多着眼于对宏观经济整体的影响,并显示出正向作用。^{⑥⑦} 近年来,更多实证研究开始聚焦于对区域增长的影响,但未得出完全一致结论。在省域层面,电子商务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省域间的差异较为明显。^⑧ 在市域层面,虽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电子商务的本地效应却并不显著。^⑨ 由于未能考虑电子商务发展的内生性或者数据颗粒度较粗,这些市域及以上空间层面的研究不足以识别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因果效应。在县域层面,相关实证研究使用 2014 年以来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试点项目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并发现,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⑩⑪⑫} 但该政策无法反映出县域电子商务总体发展水平。此外,电子商务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直接证据依然缺乏。

相较已有文献,本文边际贡献为:第一,使用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指数作为电子商务发展指标,能准确地度量县域电子商务总体发展状况并评估其效应。该指标是从平台买卖双方角度构造的连续变量,比已有文献使用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试点项目这个离散政策变量包含更多有关电子商务发展的信息。同时,使用多种工具变量克服电子商务发展指标的内生性,能准确地识别电子商务的因果效应。第二,丰富和完善电子商务的区域经济发展效应的相关研究。以互联网平台 and 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县域经济为切入点,就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展实证研究,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第三,进一步检验电子商务对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从四大区域、沿海内陆、地势、城乡等多个维度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揭示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

二、理论分析

(一) 电子商务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机制

① 林嵩、谷承应、斯晓夫、严雨珊:《县域创业活动、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23 年第 3 期。

② Xubei Luo, Yue Wang, Xiaobo Zhang,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Growth in Chin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8810, 2019.

③ Victor Couture, Benjamin Faber, Yizhen Gu, Lizhi Liu, “Connecting the Countryside via E-Commerce: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vol.3, no.1, 2021, pp.35-50.

④ Rana Deljavan Anvari, Davoud Norouzi, “The Impact of E-Commerce and R&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me Selected Countries”,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229, 2016, pp.354-362.

⑤ Robert E. Litan, Alice M. Rivlin, “Project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Intern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1, no.2, 2001, pp.313-317.

⑥ 范玉贞、卓德保:《我国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工业技术经济》2010 年第 8 期。

⑦ 王超贤:《电子商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流通经济》2016 年第 11 期。

⑧ 林孔团、于婧:《电子商务对省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

⑨ 张俊英、郭凯歌、唐红涛:《电子商务发展、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财经科学》2019 年第 3 期。

⑩ 王奇、牛耕、赵国昌:《电子商务发展与乡村振兴:中国经验》,《世界经济》2021 年第 12 期。

⑪ Yong Qin, Yingfeng Fang, “The Effects of E-Commerce on Regional Poverty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 E-Commerce Demonstration County Program”,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30, no.3, 2022, pp.161-186.

⑫ Qiuxia Qin, Hongdong Guo, Xinjie Shi, Kevin Chen, “Rural E-Commerce and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31, no.5, 2023, pp.26-60.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双边市场,或者说是数字经济时代双边市场的重要呈现方式。早在21世纪初电子商务兴起之时,学术界便从双边市场视角就互联网平台影响经济社会运行的宏观机制展开过理论分析。在双边市场中,无论是实体平台,还是网络平台,其运行逻辑都是向供给和需求两类用户(双边)适当收取费用,并为其提供交易中介服务,使得双边都能更高效地参与到交易中。^{①②}作为买卖双方汇聚和交易的中介,双边市场平台发展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或者说网络外部性特征(Network Externality)。一方面,平台上卖家(或买家)数量的增加会产生很强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同类用户加入平台,产生“直接网络外部性”;另一方面,卖家(或买家)数量的增加也在向潜在买家(或卖家)展示平台的供给能力(或需求潜力),吸引更多买家(或卖家)进入到平台,产生“间接网络外部性”。^{③④}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在大多数语境中等同于互联网或数字平台,是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形成的双边主体虚拟交易空间。^{⑤⑥}

电子商务平台凭借虚拟性特征,并辅之以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形成覆盖/辐射范围广泛的市场空间,吸引海量卖家和买家入驻平台,最大限度发挥出作为双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凭借庞大的用户规模、连接和数据优势,电子商务平台能够提高供需匹配效率,大幅减少搜寻成本、降低流通交易成本,并最终降低商品交易价格,有利于增加居民消费规模和种类,^{⑦⑧}提高社会福利。^⑨近年来,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等平台通过下沉县域发展农村电商,将各地特色农产品与大城市需求进行高效对接,电子商务激活小众市场的长尾效应也得以充分发挥。^⑩电子商务可通过三个机制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第一,电子商务可以扩大市场需求,破解县域资源利用和配置难题。电子商务平台有助于挖掘众多细分的利基市场,^⑪解决农村需求不足问题。一方面,农村市场需求的激活可以盘活农村闲置土地和旅游资源,助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缓解农产品滞销问题,并激励农户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商品的流出扩大了县域具有比较优势的优质特色产品生产,商品的流入则增强了县域市场竞争,减少了不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第二,电子商务能够提高县域创业活跃度。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开办企业和交易商品只需在成本更低的线上虚拟商铺完成,不依赖于线下实体商店,而且能克服创业环境中的信息、资金等资源不对称问题。^{⑫⑬}因此,电子商务可以降低开办成本,激励县域和农

① Jean-Charles Rochet,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7, no.3, 2006, pp.645-667.

② Mark Armstrong,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7, no.3, 2006, pp.668-691.

③ Michael L. Katz, Carl Shapiro, “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5, no.3, 1985, pp.424-440.

④ Carl Shapiro, Hal R. Varian, *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9, pp.173-184.

⑤ Jean-Charles Rochet,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1, no.4, 2003, pp.990-1029.

⑥ 蔡跃洲、顾雨辰:《互联网平台的技术—经济特征与福利提升及分配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⑦ 罗健萍、刘佳:《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分析》,《价格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5期。

⑧ Jingting Fan, Lixin Tang, Weiming Zhu, Ben Zou, “The Alibaba Effect: Spatial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the Welfare Gains from E-Commer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14, 2018, pp.203-220.

⑨ 蔡跃洲、顾雨辰:《平台经济的社会福利机制及其效果测算——来自外卖平台商户问卷调查的证据》,《经济研究》2023年第5期。

⑩ 韦结余、蔡跃洲:《中国式数字减贫新路径》,《中国发展观察》2023年第5期。

⑪ [美]安德森:《长尾理论》,乔江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61-174页。

⑫ Bihong Huang, Mohamed Shaban, Quanyun Song, Yu Wu,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BI Working Paper 827, 2018.

⑬ 秦芳、谢凯、王剑程:《电子商务发展的创业效应:来自微观家庭数据的证据》,《财贸经济》2023年第2期。

村创业活动。此外,即使不考虑开办成本效应,电子商务所带来的市场需求扩大也有助于跨越开办企业所需门槛,创造新的创业机会,提高创业活跃度。进一步地,新企业进入会通过选择效应、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来推动县域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①第三,电子商务能够促进企业创新。首先,电子商务平台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销售收入,为产品和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and 市场激励。其次,电商平台也可以直接通过展示企业和商品信息、支持供应商学习市场环境、促成买卖双方交流等渠道促进知识溢出,^②进而为创新创造条件和环境。这最终会激励企业创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或产品质量,带动县域经济增长。^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1:电子商务有助于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假说2:电子商务通过扩大产品销售、提升创业活跃度和激励企业创新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二) 电子商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

从收入分配差距角度来看,电子商务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和区域发展的差距。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班纳吉和迪弗洛曾指出,贫穷的本质体现在对信息的获取上,由于缺乏正确的信息来源,低收入人群选择了相信错误的信息。^④而电子商务平台对县域和农村地区的下沉,则将相对落后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与发达地区直接连接在一起,使其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机会。^{⑤⑥}欠发达县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和机会挖掘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规避与发达县的同质化竞争,生产优质特色产品。

从贸易成本角度看,电子商务能够减轻与地理障碍、行政分割相关的贸易成本。^⑦对于地理偏远或者处在行政边界的欠发达县来说,电子商务更能降低这些地区的贸易成本。随着欠发达县的贸易成本下降,其初级特色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和市场需求提升幅度更大,进而更能拉动其经济增长。同时,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尽管农产品加工业和工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在贸易成本下降初期更倾向于集聚在发达县,但是当贸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后,欠发达县将凭借其便宜的土地租金、廉价的劳动力和原产地优势吸引更多的工业企业。^⑧随着工业企业在欠发达县集聚,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也会在当地发展起来。这最终会缩小欠发达县与发达县的发展差距。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3:电子商务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研究设计及数据指标

(一)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

为了准确识别和估计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本文使用标准的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控制地区层面的不变因素、全国层面的宏观冲击以及时空可变特征。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_{it} = \alpha + \beta EC_{i,t-1} + X_{i,t-1}\gamma + \mu_c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Y_{it} 指县域经济增长指标; $EC_{i,t-1}$ 是阿里巴巴电商指数; $X_{i,t-1}$ 指县域层面的控制变量; i 和 t

① Daron Acemoglu, Ufuk Akcigit, Harun Alp, Nicholas Bloom, William Kerr, "Innovation, Reallocation,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8, no.11, 2018, pp.3450-91.

② 吕越、陈泳昌、张昊天、诸竹君:《电商平台与制造业企业创新——兼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驱动路径》,《经济研究》2023年第8期。

③ Philippe Aghion, Peter Howitt,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vol.60, no.2, 1992, pp.323-351.

④ [印度]班纳吉、[法]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8-11页。

⑤ 端利涛、蔡跃洲:《平台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及实现路径——基于价值流转的机制分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⑥ 唐要家、陈燕:《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⑦ 郭峰、熊云军、石庆玲、王靖一:《数字经济与行政边界地区经济发展再考察——来自卫星灯光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2023年第4期。

⑧ Pierre-Philippe Combes, Thierry Mayer, Jacques-Francois Thisse, *Economic Geography: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s and N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87-189.

分别指县和年份； δ_t 是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样本期内各年宏观因素的影响；样本数据年份较短，控制县域固定效应将导致估计量偏误较大，因此只控制县域所处的更高层级城市的固定效应，即 μ_c ，同时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 ε_{it} 是随机扰动项。为了减轻电子商务变量的内生性，将自变量滞后一期。考虑到随机扰动项在时间上可能存在相关性，使用聚类在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二）变量选择及指标处理

1. 被解释变量：县域人均 GDP。选择县域人均实际 GDP 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Y_{it} 的代理变量，用于表征县域经济增长情况。人均 GDP 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为县域年度 GDP 与常住人口之比。以 2000 年为基期，使用各省 GDP 平减指数进行消胀处理后，得到人均实际 GDP。

2. 核心解释变量：电商发展指数。核心解释变量是基于阿里巴巴大数据平台构建的电商发展指数，以反映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该指数包括网商指数 (eri)、网购指数 (oli) 和综合电商发展指数 (aedi)。综合电商发展指数是两个一级指标网商指数和网购指数等权平均和。其中，网商指数是网商密度指数 (零售网商数量 / 人口) 和网商交易水平指数 (全年成交额超过 24 万元人民币的零售网商数量 / 零售网商数量) 的加权平均和，其权重分别是 0.6 和 0.4；网购指数是网购密度指数 (网购消费者数量 / 人口数量) 和网购消费水平指数 (全年网购额超过 1 万元人民币的消费者数量 / 网购消费者数量) 的加权平均和，其权重分别是 0.6 和 0.4。各指数按照线性比例极大化法进行标准化。各指数取值范围在 0 到 100 之间，数值越大，反映当地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越高。

3. 控制变量。本文引入以下控制变量：①固定资产投资，为县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用来反映县域的投资规模；②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县域 GDP 的比重，用来刻画产业结构状况；③财政预算支出，为县级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用来度量政府对县域经济的参与程度；④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用来反映县域可获得的金融资本规模；⑤医疗机构床位数，为医院和卫生院的床位数，用来衡量县域医疗服务水平；⑥中学在校人数，反映县域人力资本水平。

（三）数据来源和说明

阿里巴巴电商指数是由阿里研究院基于阿里巴巴平台 (包括淘宝和天猫) 海量数据构造生成，由阿里研究院以虚拟机方式提供给课题组使用；县域新注册企业、专利数据根据中国工商登记注册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加总到县域层面而成；其他县域数据来自 2013—2018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1 列出了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基准回归结果。列 (1)(2) 结果显示，网商指数 (lneri) 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其中，列 (1) 只加入城市 and 年份固定效应，网商指数的系数为 0.116，在 1% 水平上显著；列 (2) 控制了县域特征，网商指数的系数下降至 0.029。列 (3)(4) 结果显示，网购指数 (lnoli) 的系数远高于列 (1)(2) 中的网商指数系数。列 (5)(6) 结果显示，综合发展指数 (lnaedi) 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且估计系数介于网商和网购指数系数之间。这验证了假说 1，即电子商务向县域下沉有助于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二）工具变量回归

电子商务变量很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造成电子商务的影响系数被高估或低估。内生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电子商务发展能够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但县域经济增长反过来也会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县，其电信基础设施水平会更完善，也更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这会高估电子商务的影响系数；市场可达性弱的县则可能会更有动力采用电子商务技术，这会低估电子商务的影响系数。另一方面，遗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如未观测到的县域营商环境等。优越的县域营商

表 1 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增长的 OLS 回归模型

变量	被解释变量：人均实际 GDP 对数					
	(1)	(2)	(3)	(4)	(5)	(6)
lneri	0.116*** (0.022)	0.029*** (0.010)				
lnoli			1.032*** (0.057)	0.493*** (0.052)		
lnaedi					0.774*** (0.046)	0.311*** (0.034)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496	6442	6496	6442	6496	6442
调整 R ²	0.731	0.894	0.808	0.905	0.784	0.900

注：本表所有回归模型均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由于部分县的网商、网购和综合电商发展指数为 0，对这些指数先加 1 再取对数；***、** 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字是聚类在城市层面的标准差；限于篇幅，省略了控制变量估计系数。下同。

环境会同时促进电子商务和县域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虚假因果关系。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到杭州市或省会城市的距离、^①坡度^②作为电子商务发展的工具变量。首先，这些工具变量与电子商务变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我国电子商务在杭州市或省会城市先发展起来，然后在空间上扩散到其他城市和地区，因而离这些城市越近的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越高。地势越平坦或者坡度越低的地区更有利于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推动当地电子商务发展。其次，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要求。距离杭州市越远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未必更差，而地势也不直接影响县域经济发展。这些变量不随时间变化，我们使用这些变量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由于使用单个工具变量得到的估计值只是局部平均处理效应，我们使用多个工具变量组合进行估计和稳健性分析。

表 2 列出了使用了三种指数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大部分工具变量组合的弱工具变量检验统计量 KPF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值超过经验法则临界值 10，拒绝原假设“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列 (3) 和 (5) 的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的 Hansen 统计量的 p 值都大于 10%，接受原假设“工具变量是外生的”。这说明，工具变量具有强相关性和外生性。从使用网商指数的回归结果来看，除了使用到省会城市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列 (4) 外，其他工具变量模型都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工具变量

表 2 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被解释变量：人均实际 GDP 对数				
	(1)	(2)	(3)	(4)	(5)
(a) lneri	0.302* (0.157)	0.580*** (0.215)	0.487*** (0.147)	0.151 (0.115)	0.350*** (0.121)
样本量	6442	6442	6442	6442	6442
调整 R ²	0.493	0.061	0.239	0.605	0.439
KPF	19.273	12.983	13.501	17.443	12.427
Hansen p 值			0.293		0.158
(b) lnoli	0.616* (0.322)	1.389*** (0.486)	1.015*** (0.310)	0.547 (0.445)	0.929*** (0.313)
样本量	6442	6442	6442	6442	6442
调整 R ²	0.669	0.540	0.627	0.671	0.641
KPF	19.913	8.652	14.360	6.135	10.320
Hansen p 值			0.157		0.236
(c) lnaedi	0.529* (0.270)	1.070*** (0.327)	0.841*** (0.227)	0.359 (0.273)	0.693*** (0.212)
样本量	6442	6442	6442	6442	6442
调整 R ²	0.643	0.519	0.589	0.654	0.620
KPF	23.951	15.347	19.503	14.885	15.329
Hansen p 值			0.205		0.193

注：工具变量回归使用对弱工具变量更稳健的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方法，下同；列 (1)(2)(4) 使用的工具变量分别是到杭州市距离、坡度和到省会城市距离，列 (3) 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到杭州市距离和坡度，列 (5) 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到杭州市距离、到省会城市距离和坡度。

- ① 张勋、杨桐、汪晨、万广华：《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0 年第 11 期。
② 吴一平、杨芳、周彩：《电子商务与财政能力：来自中国淘宝村的证据》，《世界经济》2022 年第 3 期。

的估计系数总体上高于 OLS 估计系数。从使用其他两个指数的回归结果来看，网购指数的系数要明显高于网商指数，而综合发展指数的系数介于网商和网购指数之间。总之，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三）稳健性分析

下面考察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见表 3）。首先，基准回归中被解释变量人均 GDP 的分母是各县辖域常住人口的推测数，存在测量误差问题。由此，使用两个替代的人口指标：户籍人口和根据 2010 年和 2020 年人口普查推算的常住人口。^① 结果显示，使用替代的人口指标后，三个电商指数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其次，鉴于 GDP 存在一定估计误差，使用县级平均灯光亮度替代 GDP 进行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电商指数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与表 1 列（1）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再次，考虑县域数字金融的潜在干扰。数字金融能够为居民提供成本更低、覆盖面更广的金融服务，可以进一步推动农村规模化生产经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为电商化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为此，我们在回归模型中控制 2014—2017 年北京大学普惠金融指数，列（4）结果显示，电商发展指数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基准结果不受数字金融的影响。最后，考虑不同年份省域特征的潜在影响。列（5）结果表明，控制省份一年份固定效应后，电子商务系数也显著为正，据此可以排除随时间变化的省域特征干扰。

表 3 稳健性分析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排除重要变量的干扰	
	人均实际 GDP 对数		人均灯光亮度	人均实际 GDP 对数	
	(1) 分母为户籍人口	(2) 分母为普查推算人口	(3)	(4) 数字金融	(5) 省份固定效应
(a) lneri	0.559*** (0.136)	0.576*** (0.147)	1.082*** (0.354)	1.114*** (0.330)	1.025*** (0.385)
普惠金融指数				0.214*** (0.0596)	
省固定效应					控制
样本量	8770	8627	6422	4930	6445
调整 R ²	0.151	0.022	-0.264	-1.647	0.340
KPF	23.190	20.475	19.124	11.989	8.360
(b) lno1i	1.270*** (0.330)	1.386*** (0.384)	2.199*** (0.712)	1.692*** (0.318)	2.392*** (0.848)
普惠金融指数				-0.152* (0.0771)	
省固定效应					控制
样本量	8770	8627	6422	4930	6445
调整 R ²	0.535	0.426	0.454	0.463	0.754
KPF	21.880	21.962	19.968	38.363	5.391
(c) lnaedi	1.032*** (0.241)	1.091*** (0.266)	1.894*** (0.587)	1.605*** (0.319)	1.871*** (0.511)
普惠金融指数				-0.0532 (0.0640)	
省固定效应					控制
样本量	8770	8627	6422	4930	6445
调整 R ²	0.491	0.401	0.381	0.276	0.743
KPF	27.668	27.636	23.899	31.130	9.986

注：列（1）—（4）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到杭州市的距离，列（5）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坡度；人均灯光亮度是根据夜间灯光亮度均值除以县域常住人口得到。

五、县域增长机制检验与区域协调发展

（一）电商影响县域增长的机制检验

电子商务通过三个渠道作用于县域经济增长，产品销售状况、创业活跃度、企业创新水平分别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新企业数量、专利申请数来衡量。表 4 列（1）—（3）显示，电子商务发展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新注册企业数量和企业专利申请数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这验证了假说 2，即电子商务可以通过扩大产品销售、提高创业活跃度和激励创新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① 我们基于 2010 和 2020 年人口普查年份的县域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使用线性插值方法推算出 2011—2019 年间各年的相应比例，再根据相应年份的户籍人口推算出常住人口。

表 4 电子商务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

变量	(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 创业活跃度	(3) 企业创新
(a) lneri	0.596*** (0.170)	0.523*** (0.124)	1.237*** (0.387)
样本量	7877	9490	9495
调整 R ²	0.626	0.523	0.114
KPF	23.449	23.658	23.674
Hansen p 值		0.574	0.063
(b) lnoli	1.277*** (0.392)	1.630*** (0.576)	3.899*** (1.363)
样本量	7877	9490	9495
调整 R ²	0.751	0.573	0.101
KPF	19.588	6.521	6.773
Hansen p 值		0.230	0.586
(c) lnaedi	0.995*** (0.275)	1.078*** (0.304)	2.630*** (0.807)
样本量	7877	9490	9495
调整 R ²	0.764	0.635	0.225
KPF	28.937	12.246	12.165
Hansen p 值		0.217	0.365

注：被解释变量创业活跃度为新注册企业数量加 1 再取对数，企业创新为专利申请数加 1 再取对数；列（1）的工具变量是坡度，列（2）和（3）的工具变量是到杭州市的距离以及坡度。

（二）县域异质性与区域协调发展

我们按照多个空间维度划分地域，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具体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5 和表 6。表 5 列（1）—（4）显示，电子商务对西部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表 5 列（5）（6）显示，电子商务对内陆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沿海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表 6 结果显示，电子商务对山区县经济增长的影响超过对非山区县的影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超过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这表明，电子商务的发展在促进县域总体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验证了假说 3。

表 5 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I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内陆	沿海
	(1)	(2)	(3)	(4)	(5)	(6)
(a) lneri	1.899 (2.645)	0.657 (0.599)	0.438** (0.216)	-8.173 (352)	0.469*** (0.175)	0.694 (0.615)
样本量	1110	1975	3167	190	4968	1474
调整 R ²	-3.648	0.349	0.223	-107.33	0.270	-0.053
KPF	2.023	10.327	5.388	0.074	14.541	3.980
Hansen p	0.316	0.013	0.575		0.041	0.214
(b) lnoli	-6.933 (20.76)	2.552 (1.773)	1.188*** (0.448)	-1.841 (3.777)	0.851** (0.360)	5.140 (8.986)
样本量	1110	1975	3167	190	4968	1474
调整 R ²	-8.892	0.203	0.619	-0.010	0.664	-3.059
KPF	0.572	2.023	6.248	0.526	13.217	0.288
Hansen p	0.498	0.209	0.375		0.004	0.824
(c) lnaedi	30.671 (3620)	1.396 (1.093)	0.909*** (0.328)	-2.379 (6.951)	0.724*** (0.247)	1.988 (1.916)
样本量	1110	1975	3167	190	4968	1474
调整 R ²	-262.64	0.565	0.582	-0.765	0.631	-0.157
KPF	1.980	9.925	10.626	0.364	22.578	2.377
Hansen p	0.843	0.013	0.557		0.007	0.449

注：列（1）—（6）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到杭州市的距离和坡度。

表 6 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II

	非山区	山区	城镇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
	(1)	(2)	(3)	(4)
(a) lneri	0.545 [*] (0.287)	0.627 ^{**} (0.266)	0.268 ^{***} (0.081)	0.633 ^{***} (0.154)
样本量	2834	3608	6004	7080
调整 R ²	0.304	-0.196	0.160	-0.929
KPF	5.546	5.290	16.637	23.297
Hansen p	0.792	0.988		
(b) lnoli	0.929 ^{**} (0.466)	1.235 ^{***} (0.400)	0.611 ^{***} (0.186)	1.466 ^{***} (0.336)
样本量	2834	3608	6004	7080
调整 R ²	0.623	0.587	0.500	-0.067
KPF	6.064	10.359	14.739	20.963
Hansen p	0.979	0.790		
(c) lnaedi	0.759 ^{**} (0.347)	1.105 ^{***} (0.363)	0.447 ^{***} (0.130)	1.059 ^{***} (0.228)
样本量	2834	3608	6004	7080
调整 R ²	0.592	0.497	0.547	0.072
KPF	11.331	10.434	17.570	26.117
Hansen p	0.851	0.996		

注：列（1）—（2）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到杭州市的距离以及坡度，列（3）—（4）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坡度；山区县指平均海拔在 500 米以上的县，而非山区县指平均海拔在 500 米以下的县。

六、总结

本文基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和县域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电子商务发展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结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可以通过扩大商品销售、提高创业活跃度和促进企业创新来提升县域经济增长。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电子商务的经济增长效应对中部县、内陆县、山区县和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电子商务能够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为更好发挥电子商务的积极作用，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级地方政府可以从基础设施、综合服务体系、创新创业等方面入手，完善县域电商发展的外部环境。第一，进一步完善县域交通、数字基础设施。在既有村村通、道路硬化等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不断提高道路运输能力，为县域电商发展提供高效、安全的物流保障。拓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覆盖的深度广度，在维护好现有 4G 基站及光纤宽带网络基础上，加强对 5G 网络、千兆光网的建设投资，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升级。此外，有条件的地区还应加大对本地化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的投资建设，为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保障。第二，完善县域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体系。继续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大力实施“数商兴农”工程、“快递进村”工程、“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提高农产品的可电商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建立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为电商企业发展和农户参与电商提供园区空间、物流仓储服务、专业化培训、金融信贷和优惠政策支持等，打通“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发挥电子商务平台的供需双边市场性、网络外部性、规模和集聚经济优势，支持农户和电商企业利用直播带货、短视频电商、社交电商、团购等多元和新型模式，扩大县域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和销量，引导产品的标准化和品牌建设，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和电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帮助推动落后地区物流体系建设、产品标准化和品牌化、电商素养提升、弱势群体创业就业。第三，创造更好的电商创新创业外部环境。提供电商人才培训、优惠金融政策以及场地空间等，支持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扩大市场规模，鼓励县域常住人口和返乡就业人员借助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创业，实现当地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为县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责任编辑：张 超

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战略目标及实践推进^{*}

于法稳 孙韩小雪 林 珊

[摘 要]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业绿色现代化体现了农业现代化的时代特点。农业绿色现代化是资源高效利用、生产方式绿色、生产环境健康、生态产品富足的现代化，通过提升生态供给能力、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强化资源高效利用、注重农业减排固碳，实现消费者身体、生产环境系统、生态环境系统及大气生态系统的健康。在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促进全民树立健康引领的发展理念、如何激励农业生产主体行为的绿色转型、如何确保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区域适宜性、如何完善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制度机制等是急需破解的难点所在。为此，应从理念创新、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完善、模式创新以及机制体制创新等方面探索实施路径，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 农业绿色现代化 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健康引领 农业生态产品

[中图分类号] F3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1-0109-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① 为此，应加快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农业强国建设。当前，绿色化、低碳化日益成为农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点领域。^② 基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农业绿色现代化将会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点方向。由此，分析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内涵、目标定位、难点，并提出实现路径及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内涵

农业绿色现代化并非在农业现代化内涵之上简单地赋予绿色要素，而是基于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农业强国的时代要求，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绿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提高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同时实现农业的减排固碳，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一) 农业绿色现代化是资源高效利用的现代化

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有助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③ 对农业生产而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研究”(23ZDA105)、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者资助计划”项目“粮食安全背景下农业的绿色发展研究”(XC2023001)、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基础研究项目“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能力提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于法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韩小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林珊(通讯作者)，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山东 青岛，266071)。

① 于法稳、林珊：《新型生态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目标重塑及路径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 年第 Z1 期。

② 涂圣伟、张义博：《“大国小农”建设现代农业强国：基本特征与实现路径》，《东岳论丛》2023 年第 7 期。

③ 廖虹云：《我国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建设进展和建议》，《中国发展观察》2021 年第 18 期。

耕地资源、水资源是最根本的生态要素，^①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有助于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实现农业节本增效、节约增收，推动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因此，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是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这也是由我国资源状况决定的。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②耕地保护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与要害，^③但我国耕地总量少、质量总体不高，^④而且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耕地面积持续递减的态势在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遏制。^⑤同时，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耕地资源空间匹配度相对较弱，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水质性缺水同在。^⑥在优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用水面临严峻挑战。

（二）农业绿色现代化是生产方式绿色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为此，应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逐步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2022年，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为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因此，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化，是农业绿色现代化的根本内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相伴随，如传统农业对化肥和农药依赖导致的面源污染问题，农业灌溉导致的水资源过量开采问题，以及过度垦荒、林木滥砍滥伐及牧区超载过牧等导致的水土流失及土壤沙化问题。^⑦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失衡、功能退化成为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中的新挑战，迫切需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注重生物农药、有机肥、生物农膜、节水节肥、绿色防控等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⑧加快培育形成绿色低碳、可循环的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业绿色现代化，将农业建设成为美丽中国的重要生态支撑。

（三）农业绿色现代化是生产环境健康的现代化

《“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推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环境治理还处在治存量、遏增量的关口，农业生产环境依然不容乐观。从广义的健康含义来看，要实现农作物的健康生长，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系统必须是健康的，即土壤、水分、空气等生态要素都应该是健康的。因此，农业生产环境健康，是农业绿色现代化的核心内涵。

当前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严峻生态环境形势，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积淀下来的。尤其是对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的过度依赖和较低的利用效率导致了严重的面源污染，使得农业生产环境系统健康水平低下，进而影响农产品的品质。^⑨因此，需要逐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升农业生产环境系统健康水平，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保障。^⑩

（四）农业绿色现代化是生态产品富足的现代化

在新时代，我国农业领域的主要矛盾突出表现为人民对安全优质健康农产品的需求与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⑪当前，生态消费已成为消费市场的新趋势、新时尚。这倒逼农业绿色发展，

① 于法稳：《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智慧农业实现路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4期。

② 陈晨：《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智慧和力量（新知新觉）》，《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9日第9版。

③ 房绍坤、袁晓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法治保障》，《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5期。

④ 罗其友、刘洋、伦闰琪、张烁：《农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布局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年第10期。

⑤ 于法稳、代明慧、林珊：《基于粮食安全底线思维的耕地保护：现状、困境及对策》，《经济纵横》2022年第12期。

⑥ 于法稳：《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动因、核心及对策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5期。

⑦ 李文华、刘某承、闵庆文：《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与展望》，《资源科学》2010年第6期。

⑧ 尹成杰：《加快推进农业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农村工作通讯》2016年第5期。

⑨ 李国祥：《论中国农业发展动能转换》，《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7期。

⑩ 于法稳：《新时代生态农业发展亟需解决哪些问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9期。

⑪ 于法稳、王广梁、林珊：《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及路径选择》，《重庆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推动农产品供给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质”的需求转变,提升农业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①因此,生态产品富足,是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关键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能力快速提升,不仅解决了“吃饱”问题,而且逐步解决了“吃好”问题。但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供给结构、供给质量等方面与消费需求之间的错位问题日渐突出,^②成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为此,国家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性措施,进一步提升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高质量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二、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目标

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战略任务,其目标涵盖生态、生产、生活等各领域,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各领域目标之间又存在着内在逻辑,均要实现相应系统的健康。

(一) 提升生态供给能力,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绿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绿色发展以提升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安全健康的农产品为根本目标,^③保障国人身体健康。当前,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性的关注度与日俱增,由此倒逼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农业绿色发展不仅提升了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而且有效地改善和提升了农业生产环境质量,^④尤其是改善耕地土壤质量。

(二) 促进农业绿色转型,保障生产环境系统健康

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关键之一,是改善农业生产环境质量,提升其健康水平。因此,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提升农业生产环境系统的健康水平。基层调研发现,很多地方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农业生产环境质量不容乐观。2015年农业部出台相关方案之后,化肥、农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施用强度依然处于高位。近年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回收机制,农药包装物引起的二次污染也日益引起重视。在废弃农膜回收资源化利用中,不经济、不节约、不环保、不循环、不低碳等问题还没得到有效解决,白色污染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在蔓延。

(三) 强化资源高效利用,保障生态环境系统健康

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水土资源尤其是优质水土资源被优先配置到了城镇居民生活中,农业生产所面临的水土资源形势日趋严峻。在数量不足、质量风险较大的同时,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新发展阶段,农业绿色发展需要足量、优质的水土资源提供基础。同时,农业生产方式是否妥当,也会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为此,在对水土资源数量、质量进行双重保护的同时,应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注重水土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生产方式转变,提高土地生产率、水资源利用率,这是保障资源持续利用的关键,也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

(四) 注重农业减碳固碳,助力大气生态系统健康

农业既是碳源,也是碳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就要在充分发挥农业碳汇作用的同时,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尤其是水稻种植中的甲烷排放。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研究报告,2018年粮食体系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高达160亿吨,较1990年增加了8%。粮食体系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3%,农场生产、生产上下游排放(主要由供应链、消费和浪费产生)占二氧化碳排放的2/3。^⑤为此,应高度重视农业碳减排,提升农业碳汇能力,更好发挥农业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作用。

① 于法稳、黄鑫、王广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现路径》,《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4期。

② 宋洪远:《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和建议》,《中国农村经济》2016年第10期。

③ 王俊芹、苑甜甜:《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进及政策工具分析》,《河北学刊》2023年第2期。

④ 于法稳、林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阐释及实现路径》,《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⑤ F. N. Tubiello, C. Rosenzweig, G. Conchedda, et 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Food Systems: Building the Evidence Bas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vol.16, no.6, 2021, p.065007.

三、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实践推进

农业绿色现代化将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核心任务。为此，需要科学甄别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中的难点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一）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难点

要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多元目标，发展理念、生产行为、生产技术以及机制体制等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1. 如何促进全民树立健康引领的发展理念。当前，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基层调研也发现，有些地方并没有将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实践决策之中。究其原因，一些地方的基层决策者对新理念缺乏深刻理解，难以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高度谋划发展。同时，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需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全面树立新发展理念。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有效地破解农业绿色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提升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否具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直接影响其决策行为、生产行为。从理论上讲，优美环境体现的是内在之美、内涵所在，即系统健康。^①基于对广义健康含义的理解，在未来“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消费者会更关注食品健康、环境健康等问题。因此，如何促进全民树立健康引领的发展理念，将是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难点之一。

2. 如何激励农业生产主体行为的绿色转型。围绕着农业绿色发展，国家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实施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如农业清洁生产、农业节水工程等，并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推动农业生产主体行为的绿色转型，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国家采取相应政策和行动的同时，农业绿色现代化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既应对农产品安全负责，也应对农业生产环境质量负责，这种认知的转变将推动他们生产行为的绿色转型。实现这种转变需要政府或者职能部门加强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培训，包括新发展理念、绿色生产技术推广、新型管理模式等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如田间培训、实地参观考察学习等，让他们真正认识到培训不是走过场，是为他们服务的。同时，推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行为的绿色转型也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因此，新征程中如何激励农业生产主体行为的绿色转型，将是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又一个难点。

3. 如何确保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区域适宜性。农业绿色生产技术体现出节能、环保、低碳的优点。一方面，它改善农业生产环境质量，提升其健康水平。产前投入品的绿色化、生产过程的清洁化以及产后废弃物的资源化，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物流量，再通过农艺措施、工程措施等，减少土壤中污染物的存量，从根本上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实现农业生产环境质量的改善与健康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它夯实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础，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充足的农业生态产品。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使用，逐步减少了对投入品的依赖，实现农作物的自然生长，从而保证农产品有着更高的安全性与品质。这也是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根本所在。中国地域广袤，从热带、亚热带到温带及寒温带，无论是光热条件、降水条件，抑或是农业耕作制度，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在此情境下，同一种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效应迥异。因此，新征程中如何确保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区域适宜性，将是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第三个难点。

4. 如何完善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机制体制。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走稳走好这条路，需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和行之有效的机制体制作保障。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不仅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也需要系统的长效机制。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当前，在实践层面还没有提出相应的可行方案，尤其是补

^① 于法稳、胡梅梅、王广梁：《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路径及对策研究》，《中国软科学》2022年第7期。

偿标准的确定还没有科学评价方法。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必须完善生态补偿制度，以确保粮食主产区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缓解并逐步解决“粮财倒挂”。围绕着国家粮食安全，以黑土地为重点的资源要素保护、生产环境保护等，也应纳入到生态补偿对象之中。^①为此，需要采取科学的评价方法，对补偿标准进行确定，基于此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综上，如何完善机制体制，将是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第四个难点。

（二）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围绕着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多元目标，以及需要破解的难点问题，应依据现阶段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实际，从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能力、发展质量、发展机制等方面选择有效路径。

1. 以理念创新引领农业绿色现代化的方向。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健康越来越成为居民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消费市场对生态农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基于广义健康的理解，全社会将会普遍关注健康引领的发展理念。尊重生命、健康引领的发展理念，将会成为“十五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内农业绿色发展的根本遵循。^②

2. 以科技创新支撑生产主体行为的绿色转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科技创新，这也是支撑农业绿色发展的根本所在。为此，从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实际出发，着重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不同区域农业生产实际以及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研发适用于区域农业生产特点的技术，确保技术的适宜性、实效性。通过构建普适性与区域性相结合的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体系，有效支撑农业生产主体行为的绿色转型。

3. 以基础设施完善提升农业绿色现代化水平。众所周知，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频发，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基于对极端天气下农业严重受损情况的分析，完善基础设施是提升农业绿色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改革开放后，在很多地方，与完善的灌溉设施相配套的排涝设施都被损坏殆尽，一旦遇到强降雨将会形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当前，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长久安全的物质基础。^③为此，应以提升土地产能水平为准则，高质量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关注高标准农田面积的同时，更应该关注高标准农田的质量。

4. 以关键领域治理提升农业生产环境的健康水平。为改善农业生产环境质量，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尤其是实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农业生产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在实施过程中，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面源污染物的流量有所减少，但依然没有实现根本性减少，存量仍然在持续增加，成为新发展阶段农业绿色发展的瓶颈。为此，应从产前投入品的绿色化、生产过程的清洁化以及产后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为重点，全面推进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尤其是提升耕地土壤健康水平。

5. 以机制体制制度创新保障农业绿色现代化。有效的机制体制制度是保障农业绿色发展、实现预期目标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措施。为此，应着力制度创新，高质量保障农业绿色现代化。一是深化改革，构建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保障农业绿色现代化；二是按照共性与个性相融合的原则，建立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并以纵向生态环境保护补偿与横向生态环境保护补偿互促的机制，确保农业绿色现代化的实现。

四、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政策建议

上述路径为破解农业绿色现代化的难点、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的目标提供了可能，要使得这些路径得以确立并保持其可持续性，还需要相应的政策加以保障。

^① 姚东恒、曹颖、成婧文、雷鸣、廖宇波：《地球关键带框架下的黑土地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资源科学》2023年第9期。

^② 于法稳、林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阐释及实现路径》，《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③ 陈江华、洪炜杰：《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了农地流转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一）促进有机肥生产及使用的政策

有机肥可以有效改善土壤质量，提升农产品品质。但农民使用有机肥的意愿并不强烈，根本原因在于有机肥价格高、所需的劳动力投入多、优质农产品实现不了优价。为此，需要构建鼓励有机肥生产及使用的政策体系。

1. 调整有机肥生产企业用电政策。当前，有机肥生产企业所用电力多数按照工业用电价格，企业用电成本较高，尤其是在电力紧张时或者错峰供电情况下，采用阶梯电价，电力成本会更高。因此，需要对有机肥生产企业用电政策进行调整，将其用电价格调整为农业生产用电价格，降低有机肥生产环节的成本。

2. 出台有机肥运输环节的政策。随着国家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实施，有机肥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增加，有机肥的运输半径也不断扩大，运输成本将会持续上升。这也是有机肥价格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建议交通运输部门可以参考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加快构建区域性“绿色通道”，建立由国家和区域性“绿色通道”共同组成的、覆盖全国的有机肥运输“绿色通道”网络，并在全国范围内对整车合法装载运输有机肥的车辆免收或者减收车辆通行费，以减少运输环节的成本。

3. 完善有机肥使用环节的政策。按照“一控两减三基本”的要求，深入开展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2017年，农业部制定了《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方案》，落实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依托“五区一园”，支持重点县（市、区）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针对农业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完善以绿色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对施用有机肥、配方肥的农业生产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予以补贴扶持。按照不同主体施用有机肥情况，确定补贴标准，逐渐形成有机肥施用的社会氛围。

（二）鼓励种养结合循环型模式的政策

长期以来，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生态联系被割断，引发化肥施用量越来越多、养殖粪污成为面源污染源两大问题，^①影响了农业生产环境质量。为此，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政策措施，推动种养结合循环型模式。

1. 面向实施主体的财政政策。在国家项目资金保障下，地方才有实施种养结合循环型模式的积极性。一般而言，往往是先有财政资金，然后选择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确定实施规模。对试点县继续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的同时，对实施种养结合循环型模式的非试点县，也应该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帮助农业生产主体建立高质量的种养结合循环型模式，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2. 面向服务主体的支持政策。高质量实施种养结合循环型模式，需要建立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除政府职能部门外，社会化服务组织也可以提供相应的技术培训和咨询服务，帮助农业生产主体掌握种养结合循环型模式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为此，对社会化服务组织，也应给予支持政策，如提供一定的财政资金扶持、采取优惠的税收政策。

3. 基于实施规模的土地政策。高质量实施种养结合循环型模式，要在粮食安全底线思维前提下，以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尤其是在粮食与畜牧业生产重点地区，需要优化调整种养比例，改善农业资源利用方式，促进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为此，应完善相应的土地政策，将种养结合循环型模式下耕地土壤质量作为土地流转租金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以激励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农民保育土壤的积极性，提升耕地土壤健康水平，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三）因地制宜实施秸秆还田的政策

从环境保护的视角，实施秸秆禁烧、鼓励秸秆还田政策，对改善大气质量确实发挥了作用，但实践层面的一些问题和困扰逐渐浮现出来，由此围绕着禁烧政策的争议也一直持续不断。秸秆还田政策有必

^① 金书泰、沈贵银、魏珣、韩允奎：《论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和应对》，《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11期。

要进行适时、适区、适度的调整与优化。

1. 鼓励秸秆还田的重点区域政策。无论是秸秆焚烧，还是秸秆还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关键是，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正向效应，将负向影响降到最低。一般而言，粮食主产区农作物秸秆产生量较大，也是秸秆还田的重点区域，需因地制宜选择还田模式，逐步改善土壤质量，为农业绿色发展奠定生态基础。为此，应采取相应的财政支持政策，根据不同区域秸秆还田的模式、成本等，确定科学合理的补贴标准，以激励农业生产主体实施秸秆还田的积极性。

2. 鼓励秸秆还田技术创新的政策。针对不同区域秸秆生产、利用过程中存在的技术薄弱之处，组织优势科研力量对此开展联合攻关，形成农机农艺一体化综合技术解决方案，依靠技术创新，提高科学规范还田技术的覆盖率和到位率。同时，应建立推动农业重大科技创新的奖励政策，进一步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畅通农业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农作物秸秆还田的路径，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3. 鼓励秸秆还田效益评价研究的政策。可以说，在肯定秸秆还田对改善大气质量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负面影响。当前，针对秸秆还田的综合效益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一些研究仅仅局限于一定区域范围内，^{①②}结果不具有普适性。为此，应鼓励学术界围绕着秸秆还田的相关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尤其是不同区域秸秆还田中的关键问题，如秸秆还田的潜力、模式、技术及效益评价，形成系统的秸秆还田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不仅要反映不同区域秸秆还田的个性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出秸秆还田的一般性规律。

（四）落实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

实现农业绿色现代化，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应全面落实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并以有效政策措施提供保障。

1. 健全纵向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无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其他农产品功能区，都提供了丰富的农业生态产品。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供给，这些区域失去了一些发展机会，机会成本相对较高。同时，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将会不断增加机会成本。为此，国家层面应出台相应的生态补偿政策，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依据对不同区域农业生态产品价值的评价结果，科学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以激励这些区域政府与人民从事环境保护和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③

2. 完善横向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无论是流域上下游省份，还是地处不同区域的省份，均应承担起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及生态产品保护补偿的责任。尤其是农业生态产品主销区的省份，应根据消耗的农业生态产品的数量及质量，对提供农业生态产品的省份进行补偿，以促进这些省份更好地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3. 推动农业生态产品供给重点区补偿机制的政策。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应将这些农业生态产品供给重点区纳入国家纵向生态补偿范围内，科学确定补偿范围和标准。在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基础上，探索设立农业生态产品保护补偿专项资金，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补偿方案。

责任编辑：张 超

① 张祎彤、苏柳方、冯晓龙、仇焕广：《成本收益视角下的秸秆还田效益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年第3期。

② 苏柳方、冯晓龙、张祎彤、仇焕广：《秸秆还田：技术模式、成本收益与补贴政策优化》，《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6期。

③ 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何建武、卓贤：《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

企业数字化发展、供应链溢出与就业增长^{*}

余玲铮 林凤婷 魏下海

[摘要]“稳就业、促就业”是保障基本民生和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企业数字化发展为就业增长提供了新契机。本文构建 2011—2021 年的“焦点企业—下游企业（上游企业）”的年度数据集，从供应链关联视角考察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就业增长效应。研究发现，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显著促进下游企业劳动力就业需求，但对上游企业的就业影响不显著。当下游企业规模大、市场势力强、与焦点企业距离较远或处于不同省份时，就业促进效应更大。其作用渠道在于，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通过优化下游企业经营绩效和维持稳定供需关系来促进下游企业增加劳动力需求。此外，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促进了下游企业增加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使得劳动力需求结构升级。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发展 供应链溢出 就业增长

〔中图分类号〕F49；F241；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116-08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既是积极应对当前严峻就业形势的重大部署，也是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近年蓬勃兴起的数字经济催生大量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其在稳就业扩就业中的作用被寄予厚望。企业数字化发展作为数字经济向微观领域纵深拓展的重要形式，是实现数字经济与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落脚点。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要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企业整体运行效率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率。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进程稳步推进。2023 年，埃森哲的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调研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企业计划继续加大数字化投入，并将从单一的技术视角扩展到更多维度。数字化发展不仅是单个企业的战略选择，其产生的溢出效应会沿着供应链对上下游企业产生影响，包括生产经营和雇佣决策等。因此，探究企业数字化发展对就业需求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对于落实“稳就业、促就业”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供应链上企业就业需求的影响，是一个尚待深入探讨且具有时代紧迫性的研究议题。本文对此展开探索，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聚焦企业数字化沿循供应链双向溢出效应这一新的视角展开分析。既有研究较多探讨企业数字化发展沿供应链向上或向下的单向溢出效应，本文构建“焦点企业—上游企业（下游企业）”的年度数据集，研究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向上和向下溢出效应。第二，探索数字化发展通过供应链互联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的微观机制，并提供直接且确凿的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就业优先导向下数字技术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机制与政策路径研究”（22BJL075）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余玲铮，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凤婷，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魏下海（通讯作者），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361021）。

证据。既有文献主要分析企业数字化发展的产业链联动效应、^① 客户传染效应、^② 信息溢出效应等,^③ 本文将其拓展至企业雇佣决策方面,从供应链溢出视角理解企业数字化发展对劳动力雇佣规模及结构的作用。第三,识别焦点企业数字化对具备何种特征的下游企业劳动力就业效应更佳,提炼企业数字化发展赋能就业优先战略的政策路径,为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就业提质扩容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回顾

从既有研究看,关于数字化发展(包括数字技术发展)对就业需求的影响,通常具有“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其中,数字技术发展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导致就业需求缩小。^{④⑤} 同时,数字技术发展改变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催生一大批新就业形态,吸纳被技术替代的劳动者且拓宽劳动者的职业选择,从而产生就业创造效应。^{⑥⑦} 企业微观层面的数字化发展对就业需求影响同样呈现不同结果。一方面,基于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理论,^⑧ 受过高等教育或具备特定技能的劳动力在应对数字技术革新和应用时具有比较优势,更容易获得雇主的青睐;另一方面,基于任务偏向型技术变革理论,^⑨ 技术进步会对从事不同任务岗位的劳动力进行筛选。数字自动化会替代执行常规任务的劳动力,而与非常规任务劳动力形成互补关系,显著促进非常规任务劳动力就业。^⑩

另有一些文献关注到数字化转型的产业链供应链溢出效应。有研究表明,产业链上企业间的数字化协同有助于推动焦点企业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范合君等,2023)。从下游企业看,供应链上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供应商的创新水平(杨金玉等,2022),并通过稳定供需关系等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⑪ 从上游企业看,上游数字化发展促进下游企业管理费用下降、存货周转率提高,提升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⑫

(二) 研究假设

1. 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与上下游企业劳动力需求。数字技术具有快渗透性、高协同性、强外部性特征,是加强供应链上下游关联的关键要素(陶锋等,2023)。焦点企业在供应链网络以“中间人”身份联结上下游企业,形成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功能网络,促进企业间交易。当焦点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时,数字技术应用能有效提升企业在供应链上的协调管理能力。此外,焦点企业生产规模和销售规模会直接影响到其对供应商的产品需求和对客户的要素供给,进而影响上下游企业调整生产投入和劳动雇佣等经营决策。从行业层面看,某个行业出现新的技术进步,会增加该行业的产出,同时能够通过

① 范合君、吴婷、何思锦:《企业数字化的产业链联动效应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3期。

② 杨金玉、彭秋萍、葛震霆:《数字化转型的客户传染效应——供应商创新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8期。

③ 李青原、李昱、章尹赛楠、郑昊天:《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7期。

④ Daron Acemoglu, Pascual Restrepo,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8, no.6, 2020, pp.2188-2244.

⑤ 王永钦、董雯:《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

⑥ 钞小静、孙一鸣、王灿:《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⑦ 戚聿东、刘翠花、丁述磊:《数字经济发展、就业结构优化与就业质量提升》,《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11期。

⑧ Daron Acemoglu, “Technical Change, Ine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0, no.1, 2002, pp.7-72.

⑨ David H. Autor, Frank Levy, Richard J. Murnane,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8, no.4, 2003, pp.1279-1333.

⑩ 何小钢、刘叩明:《机器人、工作任务与就业极化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4期。

⑪ 陶锋、王欣然、徐扬、朱盼:《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5期。

⑫ 杨汝岱、李艳、孟珊珊:《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经济研究》2023年第11期。

降低中间品价格使其他行业受益,进而促进上下游行业扩大生产规模,引起整个行业的就业需求增加。^①从企业层面看,数字化供应链溢出效应主要体现为信息溢出和资源共享。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帮助企业收集原先难以获取的信息,增强供应链信息共享,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决策延迟问题,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溢出效应促进供应链资源共享,供应链参与者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供应链生态系统,^②共享数字红利。

数字化供应链的溢出效应对上下游企业的影响是非对称的,下游企业是最大受益者。一方面,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溢出效应通过供应链向下游企业传导属于供给驱动溢出,向上游企业传导属于需求驱动溢出,供给驱动的研发溢出效应具有长期性的促进作用,而需求驱动的外部性更多是引起短期波动。^{③④}因此,相较于上游企业,下游企业与焦点企业的研发范围更加匹配且具有较高的技术组合相似度,能够更好地吸收和转化溢出效应,^⑤逐步构建数字化感知和整合能力,拓宽经营范围,催生出更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数字化企业会将数字技术赋能生产过程,生产出更具竞争力的数字化产品,下游企业从供应商提供的优质中间品中获得租金溢出,其中蕴含在产品中的数字化要素为其实现数字化发展提供便利。而受投入产出关联的限制,上游企业并不满足获得租金溢出的条件(屠西伟和张平淡,2024)。综上,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使得供应链上企业从中获益,实现生产规模扩大、雇佣人数增加。^⑥但因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溢出效应对企业传导方式存在差异,就业需求效应在上下游企业中出现不对称影响。

H1: 焦点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存在扩大就业需求的供应链溢出效应,但对上下游企业会产生不对称的就业需求效应。

2. 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促进下游企业劳动力就业规模扩大的作用渠道。数字化发展通过供应链传导带动下游企业经营向好,影响下游企业增强劳动力需求动机。首先,数字化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能够实现下游企业降本增效。在数据要素流动的支持下,焦点企业与下游企业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契约关系。双方借助数字平台更快速、准确地共享采购、供销等信息,这帮助下游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和仓储成本。作为供应商,焦点企业受到合作关系中断或者产品供需匹配度下降的销售影响强烈,^⑦容易面临短期内难以找到与自身生产投入相适配的新客户的处境。^⑧因此,在下游企业需要技术升级时,进行数字化发展的焦点企业有意愿与其联合创新,以降低客户企业创新成本。其次,焦点企业进行数字化发展实现对终端需求的识别,向下游企业提供满足终端市场需求的高质量数字化中间品,优化原有的要素配置,提高下游企业生产效率,^⑨推动企业扩大产出规模与雇佣规模。综上,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会通过降本增效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改善企业经营绩效,下游企业更有动机增加劳动力需求。

供应链上的企业维持供需关系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下游企业劳动力雇佣需求变化。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通过降低资金占用率和提高供应链成交额来促进二者维持稳定的供需关系,加强产业链供应链

① 考虑到扩大整个市场消费需求与单个微观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张是两个相关但又不同的概念,分别属于需求侧和供给侧、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有着不同的经济逻辑,本文未围绕数字化转型对消费端影响展开分析。

② 陈剑、刘运辉:《数智化使能运营管理变革:从供应链到供应链生态系统》,《管理世界》2021年第11期。

③ Eric J. Bartelsman, Ricardo J. Caballero, Richard K. Lyons, “Customer- and Supplier-Driven External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no.4, 1994, pp.1075-1084.

④ Paul P. Tallon, “Value Chain Linkages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lignment: A Process-Level View”,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vol.28, no.3, 2011, pp.9-44.

⑤ 屠西伟、张平淡:《企业数字化转型、碳排放与供应链溢出》,《中国工业经济》2024年第4期。

⑥ 韩国高、何春黎:《危机抑或契机:数字化转型的稳就业效应》,《中国人口科学》2023年第5期。

⑦ 蒋殿春、鲁大字:《供应链关系变动、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经济管理》2022年第10期。

⑧ Gizem C. Korpeoglu, Ersin Korpeoglu, Soo-Haeng Cho, “Supply Chain Competition: A Market Game Approach”, *Management Science*, vol.66, no.12, 2020, pp.5648-5664.

⑨ 刘胜、温锡峰、陈秀英:《供应商数字化与下游客户生产效率——供应链溢出效应的视角》,《华东经济管理》2023年第8期。

韧性,实现下游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扩张。第一,焦点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打破与下游企业间的信息阻碍,实时监控分析与客户企业的资金交易和货物运转流程,缓解客户企业的资金占用现象。同时,数字化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能够改善下游企业经营绩效以及优化企业资产配置,从而减少对焦点企业的资金占用。第二,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增加与客户企业的交易量,即提高供应链成交额,维持更加稳定的供求关系。下游企业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与多元化需求,会强化与供应商的合作,构建双向互助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共享数字红利。因此,供应链稳定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企业有意愿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企业劳动雇佣规模(蒋殿春和鲁大字,2022)。

H2: 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能够改善下游企业经营绩效,促进下游企业扩大劳动力需求规模。

H3: 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通过维持供需关系稳定来促进下游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扩大。

二、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关注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上下游企业劳动力就业是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Emp_{ijzt} = \beta_0 + \beta_1 Digi_{jt} + \beta_2 X_{ijt} + \mu_{ij} + \mu_z + \mu_t + \varepsilon_{ijzt} \quad (1)$$

式(1)中,下标*i*、*j*、*f*分别代表上游企业、下游企业、对应的中游焦点企业,*z*代表企业所处的行业,*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Emp_{ijzt} 表示劳动力需求规模取自然数,解释变量 $Digi_{jt}$ 是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指数。 X_{ijt}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μ_{ij} 、 μ_z 、 μ_t 分别为企业、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ε_{ijzt} 是随机误差项。本文将标准误差聚类到焦点企业层面,重点关注估计系数 β_1 ,其代表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上下游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净影响。

(二) 变量构造

1. 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发展($Digi$)。参考现有研究通用做法,本文使用CSMAR数据库中以指标体系法构建的数字化发展指数,该指数是根据战略引领、技术驱动、组织赋能、环境支撑、数字化成果、数字化应用等6个指标加权计算得出。

2. 被解释变量:劳动力需求规模(Emp)。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反映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状况,以在职员工人数对数值作为衡量指标(韩国高和何春黎,2023)。^①

3. 控制变量。借鉴现有文献做法,对可能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变量加以控制,包括企业年龄、固定资产规模、人均资本、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股权集中度、现金比率。此外,还控制了企业、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三)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研究对象是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源自CSMAR。考虑到全国企业进行较大范围的数字化转型和发展主要发生在2010年之后,因此样本选取期间为2011—2021年。由于焦点企业当年可能与多家上游企业发生采购交易以及下游企业存在销售交易关系,参考范合君等(2023),构建F—D1(D2、D3)、U1(U2、U3)一年份的观测值,披露供应链网络结构。剔除原始样本中的金融类及被ST或退市的企业,最终得到2183个观测值。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本文考察数字化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对上下游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的影响。表1第(1)(2)列是对全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发现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程度越高,上下游企业雇佣的职工人数就越多。本文进一步划分企业类型,对上游企业子样本进行回归,第(3)(4)列结果说明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

^① 李磊、王小霞、包群:《机器人的就业效应:机制与中国经验》,《管理世界》2021年第9期。

增加上游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但没有通过 10% 的显著性检验。第(5)(6)列对下游企业子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综上,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带动下游企业增加劳动力需求,但对上游企业劳动力需求影响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下游企业接收供应商提供的附有数字化要素的中间品,并投入到企业生产过程,从中获得溢出红利,实现降低数字化成本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双重目标。同时,下游企业能够吸收和转化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溢出效应,更加具备合作研发的基础,最大限度地共享数字红利,实现劳动力雇佣规模扩大。相比之下,由于供应链溢出效应向上传导的局限性,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上游企业劳动力需求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表 1 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上下游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的影响

因变量: Emp	(1)	(2)	(3)	(4)	(5)	(6)
	全样本		上游企业		下游企业	
Digi	0.0034*** (0.0013)	0.0021** (0.0009)	0.0018 (0.0024)	0.0017 (0.0016)	0.0058*** (0.0018)	0.0032** (0.0012)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N	2183	2183	960	960	1223	122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至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主要变量测度方式。首先,选取企业年末员工人数对数值作为劳动力就业规模的替换变量。其次,本文重新构造其他企业数字化发展指标进行回归。考虑到企业间业务重要性有所差异,参照陶锋等(2023),对数字化发展指数进行加权,使用焦点企业与下游企业发生的成交额占焦点企业销往 Top5 客户货物总额的比例来确定权重。根据吴非等(2021)、赵宸宇等(2021)的做法,^{①②}分别构建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表 2 第(1) — (4) 列结果显示,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带动下游企业增加劳动力需求,本文核心结论稳健可靠。

表 2 替换主要变量测度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因变量: Emp	(1)	(2)	(3)	(4)
	替换劳动力需求测度指标	替换企业数字化发展测度指标		
Digi	0.0032** (0.0012)	0.0035* (0.0018)	0.0159** (0.0080)	0.0241*** (0.008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12	1222	1221	1221

2. 排除样本选择偏误。本文使用 Heckman 两步法来缓解这一问题。参考李青原等(2023)、陶锋等(2023),第一阶段以焦点企业是否数字化发展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外生变量 HHI,采用 Probit 模型回归;第二阶段将得出的 IMR 放入模型(1)进行回归。表 3 第(1)列结果表明 HHI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外生变量合理且有效。第(2)列中 IMR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修正自选择偏差后,研究结论不变。

3. 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第一,数字化的就业促进效应可能源自行业内竞争效应引起的横向传递,也可能是由邻近企业数字化发展带来的。因此,将焦点企业和下游企业处于同一行业或同一城市的样本剔

表 3 排除样本选择偏误和其他因素干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因变量:	(1)	(2)	(3)	(4)	(5)
	Heckman 两步法		排除同一行业内溢出	排除地理邻近带来的溢出	排除供应链创新政策冲击
Emp					
Digi		0.0043*** (0.0014)	0.0026* (0.0014)	0.0042** (0.0016)	0.0024** (0.0012)
HHI	-0.9508** (0.4668)				
IMR		0.0509** (0.02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110	1110	872	1047	1181

①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晓怡:《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1 年第 7 期。

② 赵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财贸经济》2021 年第 7 期。

除，分别进行回归。第二，供应链创新政策推动供应链数字化，驱动企业绩效提升。^①为此剔除供应链数字化实施时间与试点企业交互项为1的企业样本，结果报告在表3第（3）—（5）列，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确认了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将沿着供应链对下游企业就业需求产生促进作用。

四、作用渠道分析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存在的供应链溢出效应能够通过优化下游企业经营绩效以及维持供需关系稳定这两个渠道促进下游企业增加就业需求。相应地，构建如下检验模型：

$$Emp_{jzt} = \alpha_0 + \alpha_1 Digi_{jt} + \alpha_2 M_{jt} + \alpha_3 M_{jt} \times Digi_{jt} + \alpha_4 X_{jt} + \mu_j + \mu_z + \mu_t + \varepsilon_{jzt} \quad (2)$$

式（2）中， Emp_{jzt} 代表下游客户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 M_{jt} 为作用渠道变量，其余部分与式（1）相同，重点关注交互项 $M_{jt} \times Digi_{jt}$ 的系数 α_3 。

本文首先关注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对下游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构建以下三个指标。第一，下游企业总成本费用率，采用企业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之和占营业总成本的比重来衡量（刘胜等，2023）。表4第（1）列结果显示，数字化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能降低下游企业成本费用，优化企业经营。第二，全要素生产率，采用LP法进行测算。从第（2）列结果可知下游企业生产效率明显提高。第三，第（3）列以托宾Q值衡量企业经营绩效，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综上，焦点企业通过数字化发展识别终端需求，改造现有工艺、产品和功能，从而向下游企业供给多样化且优质的中间品和资本品，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实现降本增效与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数字化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积极作用，使下游企业更有动力扩大再生产和增加劳动力投资。

表4第（4）（5）列关注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促进二者供需关系趋于协同，构建以下两个指标来衡量。第一，客户企业资金占用率，数值越小，说明焦点企业应收账款压力相对较小，供需关系更趋协同。参考陶锋等（2023）的做法，采用预付款项净额、应收票据净额及应收账款净额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取对数来衡量。第二，供应链成交额的对数值，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焦点企业与下游企业交易量越多，供需关系更稳定。结果表明，数字化技术应用有助于企业资产合理配置与资金管理，强化企业间信息传递，缓解企业资金占用现象，以及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提高与客户企业的交易量。因此，数字化供应链溢出效应推动企业间的供需关系维持稳定，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和交易规模，进而促进下游企业劳动力需求增加。

表4 作用渠道检验结果

因变量：Emp	优化下游企业绩效			推进供需关系稳定	
	（1）	（2）	（3）	（4）	（5）
Digi × M	-0.0410**（0.0192）	0.0029**（0.0013）	0.0026*（0.0015）	-0.0030**（0.0014）	0.0014*（0.00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23	1184	1210	1099	1223

注：Digi × M 中的变量 M 在第（1）—（5）列分别为“下游企业总成本费用率”“全要素生产率”“托宾Q值”“客户企业资金占用率”“供应链成交额”。

五、异质性分析

（一）下游企业规模

规模较小企业难以满足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研发创新项目的资金需求，可能导致数字化发展供应链溢出的正向效应被截断。而大规模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组织架构相对成熟，且具有资源优势，能够支撑企业享受焦点企业的数字化资源，推进数字化建设，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供应链成交额的提高。同时，大企业通常具有相对完备的供应链体系，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冲击（陶锋等，2023），与焦点企业的供需关系更为稳定。本文根据下游企业总资产中位数划分样本。表5第（1）（2）列表明，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仅显著扩大规模较大下游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规模。

^① 刘海建、胡化广、张树山、孙磊：《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绩效——机制与经验证据》，《经济管理》2023年第5期。

(二) 客户端市场势力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市场势力越强的企业拥有强核心竞争力、高市场地位及品牌效应,在供应链上有更突出的议价能力和溢出效应(刘胜等,2023)。本文根据下游企业存货周转率相较于当年企业所处行业中位数的大小来划分样本。表5第(3)(4)列结果显示,当下游企业市场势力较强时,Digi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当市场势力较弱时,回归系数不显著。可能原因是:市场势力较强的客户是市场需求的代表力量和供应商销售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供应商的焦点企业为获得更多利润,需要向客户企业提供数字化技术支持,与其形成更加稳定的协作关系,由此强化数字化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增加劳动雇佣。

表5 企业特征异质性分析结果

因变量: Emp	(1)	(2)	(3)	(4)
	企业规模大	企业规模小	企业市场势力强	企业市场势力弱
Digi	0.0026** (0.0011)	0.0018 (0.0028)	0.0043** (0.0018)	0.0021 (0.0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92	531	625	598

(三) 下游企业与焦点企业的地理距离

根据地理分布,当二者相距超过100公里,则认为下游企业与焦点企业地理距离较远,否则表示相距较近,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当二者地理距离较远或者处于不同省份时,其劳动力雇佣规模受到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且是正向的。可能原因是:具有较高数字化水平的焦点企业会优先吸引更多劳动力,增加劳动雇佣规模,导致空间关联区域的邻近劳动力市场出现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促进就业效应对距离较近的下游企业并不明显。而对于距离较远的下游企业,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高效地推动供需信息传递,缓解供应商与客户因地理距离和时间成本带来的约束,延长信息传递距离,因此相距较远的下游企业不仅获得数字化发展正向的供应链溢出效应,还将增加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

表6 地理距离异质性分析结果

因变量: Emp	(1)	(2)	(3)	(4)
	地理距离较远	地理距离较近	企业在不同省份	企业在同一省份
Digi	0.0045** (0.0019)	-0.0009 (0.0034)	0.0040** (0.0018)	0.0036 (0.002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76	244	867	353

六、进一步讨论: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与下游企业劳动力结构

实现就业提质扩容要求就业规模增加的同时,就业结构也要进一步优化。参考余典范等(2022),^①本文使用高技能、低技能劳动力就业量的对数值代表企业劳动力就业结构(Emp_H、Emp_L),将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划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大专及以下学历员工划分为低技能劳动力。表7第(1)(2)列未加入控制变量,表明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促进下游企业高技能劳动力及低技能劳动力雇佣,但对高技能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创造效应。第(3)(4)列加入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当被解释变量是高技能劳动力就业量时,Digi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推动下游企业雇佣高技能劳动力。可能原因是:一方面,下游企业为避免与焦点企业存在“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红利”,更倾向把资源聚焦在数字化发展核心环节,这一环节需要更强认知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的技能劳动者,因此企业会提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②另一方面,下游企业向市场提供高质量数字化产品,推动企业拓展产品售后服务、个性化解决方案等服务化业务。这些任务要求问题解决、决策制定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能力,因此,企业更倾向于雇佣从事非常规任务劳动力,增加高技能劳动力岗位。综上,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就业增长。

① 余典范、姜宏、陈磊:《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就业的非线性关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学术月刊》2022年第9期。
② 宁光杰、林子亮:《信息技术应用、企业组织变革与劳动力技能需求变化》,《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

表 7 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与下游企业劳动力结构

	(1)	(2)	(3)	(4)
	Emp_H	Emp_L	Emp_H	Emp_L
Digi	0.0049** (0.0019)	0.0039* (0.0022)	0.0028* (0.0017)	0.0028 (0.0019)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N	890	721	890	721

七、结论与建议

在全面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发展格局下，进行数字化发展的焦点企业作为供应链网络的“中间人”，能够将数字红利沿供应链传递至其他企业，对关联企业的就业需求影响至关重要。本文研究发现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存在促进就业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尤其是对下游企业就业增长产生显著积极影响。当下游企业规模大、市场势力强以及下游企业与焦点企业距离较远或处于不同省份时，就业促进效应更大。作用渠道分析表明，数字化供应链溢出效应通过优化下游企业经营绩效以及稳定供需关系，实现下游企业劳动力需求增加。此外，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促进下游企业增加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优化就业结构。本文从经验证据上确认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就业促进效应具有“随链而动”鲜明特征，丰富拓展了数字化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文献边界。

文章政策启示是明显的：第一，重视焦点企业的数字化带头作用，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供应链溢出效应适当向下游企业倾斜，保障其充分发挥产业链供应链对数字红利的传递作用。同时也要重视数字化发展向上溢出效应，以实现上下游企业最大化发挥数字化发展效果。第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畅通，充分发挥产业链供应链的就业乘数效应。以政策引领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建设方向，最大化发挥其关联效应。企业在数字化发展的进程中尽量保障供应链上企业供需关系的稳定，实现供应链上企业协同发展，促进就业增长效应。第三，根据焦点企业数字化发展影响上下游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异质性效果，应制定差别化激励政策，实现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对于上游企业，政府应当进一步疏通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联结关系，实现数字化促进就业效应向后传导。对于规模较大、客户端市场势力较强以及相距较远的下游企业，政府应“强基培优”，加快数字技术研发进程和提高其应用水平，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和就业规模。对于规模较小、客户端市场势力较弱以及相距较近的下游企业，政府应“补弱固本”，对其提供专项帮扶和定向指导，帮助其获得其他企业数字化发展正向的外溢效应，实现就业增长。第四，促进劳动力发展，适应新的技术和工作方式。通过培训和技能提升计划，帮助劳动者适应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操作，提升劳动者能力与技术匹配度，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责任编辑：张 超

历史学

反法西斯主义与统一战线（上）

桑 兵

〔摘 要〕鉴于法西斯从兴起之日就以共产党为死敌，而无产阶级的分裂使之趁乱夺权，进而疯狂镇压共产党，共产国际很早就重视反法西斯主义并建立包括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法西斯以及法西斯化的专制独裁统治，在其主导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从属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东方战线。尽管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定性经历了从和平阵营对抗法西斯到帝国主义争霸，再到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生死决战的认识变化，但中国的抗日战争始终处于反法西斯主义一方。而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的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共同继承了法西斯反共的衣钵，成为战后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依托。

〔关键词〕反法西斯主义 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K264-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124-14

20 世纪前半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国际国内的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主义息息相关。透过因时因地而异的纷繁表象，全面深入理解战前、战时和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延续，法西斯与反法西斯是一条清晰的主线。围绕这条主线，可以大体把握 20 世纪以来世界局势的基本结构和根本问题，梳理各种矛盾冲突的现象及本质，并对未来走向有所认识。同时，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冲突斗争，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内外关系影响深远，尤其是制约着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战争与中国抗战属性的判断及策略调整。从中国抗日战争的视角考察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斗争历史及其演化，在深入认识 20 世纪以来世界基本态势的基础上，能够为破局的可行之道提供参照。

一、法西斯主义抬头与中国共产党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由战争造成的经济崩溃和严重的社会动荡，在欧洲各国引发了大范围的革命危机。为了解决危机，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是 1917 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根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二是兴起于 1919 年的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的体制架构下，实行独裁统治，以克服代议制民主效率低下的症结，结束动荡的政局，复苏经济，挽救社会危机。两条道路的发展趋向不仅截然相反，而且根本相对，因而一开始就处于激烈的对抗状态。关于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人们主要关注 1930 年代尤其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实则双方从一开始就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对立面。法西斯主义的诞生，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两个迫在眉睫、相互关联的棘手难题：一是镇压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二是通过独裁统治恢复秩序。1922 年意大利法西斯党通过政变上台，引起由日人创办于中国东北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的关注。11 月 10 日其刊登报道称法西斯蒂党“专对社会党为敌，尤仇视共

作者简介 桑兵，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

产派布尔什维克派，一其方法号称‘以火攻火’，简单言之，为专用暴力，为直接行动，对于社会党之行为，无所不用其破坏”，烧工人报馆，破坏工会，干涉工人集会，造成严重冲突。^① 据称共产国际一开始就拨款支持意大利共产党对抗法西斯。

刚成立1年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法西斯抬头带来的潜在危险高度警觉。1922年11月8日，蔡和森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发文指出：“最近意大利法西斯蒂（Fascists）的政变，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状况中，现出一种特别凶恶的变形。这样的变形，乃是由于意大利混乱无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之特别情形造出来的。”法西斯蒂运动是随1914年世界大战而产生的，当时该国农民反对参战，资产阶级为发展经济以掌握全国政权计，主张参战，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在法国资产阶级鼓动下，墨索里尼开始参战，农民被迫屈服。战前意大利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势力还不足以掌握全国政权。由于战争的破坏，意大利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机关愈益紊乱无力，工人阶级主导了形势。处于危殆情形的资产阶级“就把法西斯蒂变成为破坏工人运动的流血招惹队伍。他的口号是：‘以任何代价恢复国家的威权’”。现在一切政权都归于法西斯蒂，“意大利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达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报纸都喜悦的登载一些意大利工人阶级屈伏，共产党社会党退出国会的消息”。但法西斯蒂的成功不是完全由于自身力量，而是由于工人阶级不团结一致。政变的结果可能反而促成意大利工人阶级的联合战线，催生社会革命。^②

关注法西斯主义的还有中共领导层中最早的国际活动家张太雷，1923年6月13日他在《向导》发文，根据法西斯党前党员、议员密塞利在议会中批评法西斯派的几种现象，并请墨索里尼设法回复到平常宪法状态，却在街上被人殴打致重伤的惊人事件，以及政府与社会的相关反应，判断法西斯党今后的动向。认为意大利法西斯党实际上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成分复杂，一班失业军官和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的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法西斯式的爱国主义和野蛮方法，获得社会地位，而资产阶级因法西斯党压迫劳动者，故极力纵容和帮助他们，使其掌握国家机关的权力，以便更好地压迫劳动者。尽管法西斯党执政后否认一切资产阶级的宪法权利，党纲中也有诸多令人不满的内容，但资产阶级仍然容忍，知道法西斯党终将服从资产阶级的法律。其实法西斯党已完全屈服于资产阶级之下，执政后采取的各项政策都是使人民和社会损失以增加资产阶级的利益。法西斯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对这种政策不满，其他举措则引起各方面的失望，于是党内大起冲突。无产阶级被压制后，资产阶级对法西斯的不法行为不能容忍，法西斯党内一派大资产阶级开始整顿，使之将来成为一个很适宜于纯粹大资产阶级专制的政党。^③

稍后，张太雷又在《前锋》创刊号发文，系统概述了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国际环境及其本质，指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都不是一国的产物，而是大战的结果，是世界变动的部分表现。欧洲大战本来是欧洲资产阶级企图毁灭部分生产力来维持即将涨破的资本制度，不料战争延长太久，把欧洲生产力毁坏了大半，动摇了资本制度的基础。欧洲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恢复资本制度，方法是一面加紧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面加强剥削本国劳工，使被压迫民族和阶级冻饿死亡来维持资本制度的生存，资产阶级为了保存其统治权，不惜牺牲全人类和世界文明。西欧劳工受欧洲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有所觉悟，不能忍受资产阶级加倍的剥削来维持即将崩溃的资本制度，革命和罢工运动时有发生。资产阶级不能靠“德漠克拉西”来恢复其制度，决定采取残酷和威吓的手段来屈服劳动阶级，使之死心塌地地担负恢复资本制度的损失。这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采取进攻的形式就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大原由。因为一班大战中失望的小资产阶级以为这种法西斯主义可以提高其地位，而另一方面又因大资产阶级想利用他们压迫反叛的劳工，于是给以种种援助，甚至给以国家机关，法西斯党遂以成形。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用残酷和威吓的手段来强迫降低劳动阶级的生活程度，使劳动阶级丧失奋争改善地位的意志，对外主张帝国主义战争，以此使将亡的资本制度有恢复的机会。法西斯党即资产阶级为实现

① 《意大利政变之说明》，《盛京时报》1922年11月10日第1版。

② 和森：《法西斯蒂与意大利资产阶级专政》，《向导》第9期，1922年11月8日，第69-70页。

③ 大雷：《法西斯党的破裂》，《向导》第29期，1923年6月13日，第218-219页。

法西斯主义而雇用或援助一班失业的小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分子的组织。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政策，完全是为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全社会的政策，证明法西斯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无疑。据此，法西斯之名虽产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却是国际的产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特别发达，根源于战后意大利的特殊情形。除意大利外，资本主义发达的各国几乎都有法西斯组织。这些团体成立时与意大利法西斯党并不相关，性质却完全相同，专以摧毁工人为能事，现在渐有趋于联合之势，只不过其他各国的法西斯组织尚未大权在握。一旦各国的资产阶级需要，他们就能够发展坐大。法西斯主义颇有推广全世界之势，日本、中国亦有法西斯的足迹，法西斯行为也日益加厉。三四个个月前，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逮捕了大约1万名共产党和工人。“法西斯主义是国际资本主义的一种恐怖主义，决不能压倒世界的劳动阶级，使他不起来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或者反使劳动阶级的运动更加激烈”。^①

深入认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瞿秋白，对法西斯主义的冒头自然相当重视。他从劳资战争与革命关系视角考察，认为意大利法西斯党夺得政权，“尤其是资本进攻之政治方面最显著的现象”。“政治上的进攻还不足，更加以暴力的行动，实行资本家的政策。意大利的‘法塞派’不过是此中的一部分——各国都有同样的组织，暂时还没有能像‘法塞派’那样得意罢了”。法西斯党“完全是一班退伍军官、高等下等的流氓光棍，做中坚人物，以盲目的民族主义，侵略主义为宗旨，于罢工时毆杀工人等，声言所谓‘保障国权’”。“此等反动派，含有帝制主义的份子，他们更愿‘逆流’而退，想根本破坏民主主义，公然保障极少数的资本家，实行寡头的专制政体；不但他们显然揭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面具，而且他们非常明悉压迫真民治派的方法：从要求‘真民治’最切的无产阶级入手。他们知道，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的，现时有三个国家：德国，捷克斯拉夫，意大利。意大利的‘法塞派’成功，不过是他们计划之第一步。其关系于资本之进攻，反革命的猖獗，非常重要”。共产党自觉为真“民治派”，而资产阶级纵容法西斯专制以对付“真民治”，在后来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反共宣传中却被集权与民主的对立加以曲解。鉴于法西斯主义的巨大危害，以及共产国际面对革命潮低落及革命之紧迫而立于守势的策略，瞿秋白详细叙述了意大利法西斯党发展的过程，认为工人阶级分裂，社会党对策错误，资产阶级的扶植利用，使其得以坐大，必须实行劳工统一战线，联合社会党，采取各种灵活政策发动工人群众，与法西斯进行斗争，增强战斗力，酝酿摧毁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的革命。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中，共产派较改良派更能代表工人争取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自然占优，从而能够争取包括第二国际影响下的广大工人，反守为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共产党则要通过实际斗争，在无产阶级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注意到法西斯主义向东亚蔓延的危险，撰文斥责“混账的美国人用尽方法，又要把穷凶不法的法西斯党介绍到中国来”，作为殖民侵略的帮凶，并指出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日暮途穷，已经暴露于全世界。^③

面对法西斯的进攻和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处于防御态势的共产国际高度警惕。意大利法西斯政变上台不久，1922年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策略决议中专门列出“国际法西斯主义”一项，认为法西斯主义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进攻密切相关，统治阶级不再相信日益贫困的官吏可以充当它的驯服工具，所以到处建立特别的白卫军，专事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意图，而且越来越被用来对工人阶级改善自己状况的任何尝试进行暴力镇压。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是，不仅建立武装反革命的战斗组织，而且企图通过蛊惑性的社会宣传在群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乃至一部分无产阶级）中间为自己建立基础。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目前存在于欧美许多国家。组织群众抵抗法西斯主义是各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它们应当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头，要坚决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采取秘密的组织方法。疯狂的法西斯组织是资产阶级的最后一张

① 太雷：《法西斯主义之国际性》，《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第77-79页。

② 瞿秋白：《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第44-52页。

③ 独秀：《法西斯党与中国》，《向导》第72期，1924年7月2日，第574页。

王牌，白卫军的公开统治同时会转向反对一般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广大劳动群众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只有在对无产阶级进行露骨专政的情况下，才可能保持其统治。^①

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克拉拉·蔡特金很早就察觉到法西斯主义的巨大危险，不断大声疾呼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向尚未完全形成气候的法西斯主义发起反击，以阻止人类灾难的发生。1923年3月，法、德等国的工人在法兰克福（美因河）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蔡特金出席并作《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危险》的报告，指出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人类有被拖入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呼吁“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政治与工会派别、不同社会与宗教信仰的人们团结起来，为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危险而斗争”。会议根据其报告通过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决议》。6月，蔡特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上作《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报告，进一步论述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及其社会支柱，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世界资产阶级总攻势的最强烈、最集中的典型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破产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国家瓦解的象征。它的生力军是：因战争而贫困和无产阶级化的中产阶级，失业的旧军官以及一切对改良主义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但不是向左转而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念的人们。它还吸引了成千上万失望的无产者”。她再次呼吁各国共产党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中间阶层以孤立法西斯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进攻。全会根据其报告通过了《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决议。不过，这次全会主要是声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一事，其矛头指向的是社会民主党，所以初露端倪的法西斯主义危险并未真正引起全会的重视。^②

二、共产国际与反法西斯主义

从世界革命的视角看，统一战线是处于守势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希望通过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以打破帝国主义对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封锁，同时将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世界的重要举措。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无产阶级已经上升为领导阶级，并通过自己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实际发挥着领导作用，所以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统一战线并非由对抗法西斯主义而发端，共产国际在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始终以统一战线作为重要武器，希望团结各阶级和各民族共同战胜法西斯主义。

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政变夺权，在欧洲资产阶级的新闻里被推尊“是一个光荣的革命”。历史经验表明，使用特定名词是资产阶级掌控舆论的重要话术。瞿秋白认为：“这种反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政治行动有研究其性质的必要。”^③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处于尖锐对立和对抗中，法西斯党首先针对的就是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其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法西斯分子认为民主制无力压制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对他们的上台起到阻挠延宕作用。

法西斯虽然在意大利执掌政权，毕竟体量较小，不足以引发全面性的危机。共产国际始终密切关注法西斯主义的动向，可是起初并没有将法西斯作为头号敌人来对待。苏共党内的路线斗争、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冲突、防止帝国主义各国进攻苏联以及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同样是工作重点所在。尤其是一战结束和德意志革命后，迫于成立新政治形态的必要，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考茨基主张实现社会主义，应依照彻底的民主政治方法，坚决反对采取任何专政的形式。这主要是针对俄国革命的阶级专政进行挑战，并且将个人独裁与阶级专政混为一谈，使列宁遭受猛烈攻击。以此论战为中心，在各国理论界展开了激烈斗争，结果导致社会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对立和抗争日益激化。工人阶级的分裂使得法西斯主义趁机发展。由于与列宁有过纠纷，原为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的蔡特金主张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一度未能得到共产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77-378页。

② 孔寒冰：《克拉拉·蔡特金》，《国际共运史研究》1991年第4期。

③ 太雷：《法西斯主义之国际性》，《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第77页。

国际的认同。后者甚至认为第二国际反对共产国际，不断法西斯化，是当前大敌。

直到1933年纳粹希特勒利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分裂，在德国上台执政，势力快速扩张，全力镇压共产党。第二国际迫于内部压力，赞同与第三国际合作，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法西斯。共产国际方面虽予以响应，但对于和共产党之外的工人群众建立统一战线仍不无保留。1933年2月19日，劳动社会主义国际局发出宣言，称准备联合共产国际与共产党成立统一战线，和德国法西斯反动统治斗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虽认为这与他们的一贯行动相矛盾，怀疑其是鉴于各国工人群众已经自发组织统一战线才表示诚意，仍然号召各国共产党，再试试经过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建立统一战线。相信建立在阶级斗争上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足以抵抗资本家与法西斯蒂的进攻，加速资本主义的没落。可见即使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非党工人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态度仍然将信将疑。^①

尽管如此，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威胁，共产国际不得不更加予以正视和重视。1933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上，库西宁作了《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和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此次全会宣言引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统计指出，最近1年内，在资本国家和殖民地有4.6万名革命者受到虐待与屠杀，16万人受伤与残废，22.8万人被捕。其中在法西斯德国，有2.5万名无产者被杀，13万共产党员与反法西斯的工人在集中营遭受拷打。在法西斯的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匈牙利，西班牙，芬兰，到处都在拷打与屠杀工人。而中国的国民党和日本的法西斯统治党，也在抓捕和屠杀反法西斯人士。共产国际因而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展开斗争，“反对德国，中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法西斯蒂恐怖吧”！^②据苏联党出版社1935年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一书的资料，此前法西斯恐怖在德国、波兰、南斯拉夫、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奥地利、日本、中国等国家共产党的发展造成严重伤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无数党员牺牲，一些国家的地方党组织每三四个月就不得不重新建立。^③

法西斯主义的膨胀与嚣张，不仅压制了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对一般民众乃至资产阶级的生存构成威胁。1929年1月20日，反法西斯主义国际大会发起委员会在巴黎组成，法国的巴比塞为主席，委员会宣布法西斯主义为文明与人道的仇敌，呼吁召集反法西斯主义国际大会。大会于1929年3月9日至10日在柏林召开，中国的“迪生”前往参加。^④稍后，国际反战的阿姆斯特丹运动和巴黎代表大会掀起的反法西斯运动合流，使得反对战争威胁和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得到加强。^⑤在此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欧洲各国掀起反对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运动。

随着纳粹在德国上台执政，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欧洲各国纷纷迎合，将其作为摆脱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救命良方，尤其是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更是将其当作起弊振兴的灵丹妙药。法西斯主义的速效，引起不少后发展国家中专制独裁者的重视，他们纷纷鼓吹采取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虽然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主义已经引起中国的关注，但倾向性的意见是否定。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法西斯主义在欧美愈演愈烈，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些派系组织试图借此集权统一，强化统治。1931年5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会议致开幕词时声称，当今世界的三种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和传统，只有法西斯蒂的政治理论最有能效，且符合大同原则，要用法西斯手段来推行三民主义，实行训政。一时间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文章、译著、报刊大量出现。^⑥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建立反对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告各国工人》，《斗争》（苏区中央局）第22期，1933年8月15日，第1-3页。

② 《反对白色恐怖》（共产国际执委十三次全会宣言，1933年12月），《斗争》（上海中央局）第65期，1934年2月25日，第8页。

③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94页。

④ 迪生译：《告一切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们！！》，《乐群月刊》第1卷第4号，1929年4月1日，“通讯”，第179-190页。

⑤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296页。

⑥ 参见陈卓：《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困境及原因分析》，西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13页。

中国共产党对法西斯主义世界性泛滥的情况高度警觉。正在“围剿”红军和苏区、屠杀工农的蒋介石公然鼓吹法西斯主义，激起中国共产党的反击。瞿秋白撰文公开斥责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的讲话，是以“较有效能的统治权”的名义，不打自招地将训政时期与法西斯主义划等号，以便屠杀工农兵士。^①由于国民党和非国民党的不同派系互相指责对方搞法西斯主义，面对各方的质疑与抨击，蒋介石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几次否认仿行法西斯主义。^②话虽如此，在其纵容下，鼓吹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国民党派系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越来越多地采用法西斯的方法和口号。而法西斯主义利用民族主义进行蛊惑性宣传，掌握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主义在对内对外两条战线上展开，对内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对外则与反对帝国主义相联系。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32年6月23日，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反帝斗争纲领》，第9条即“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纲领称：“在目前帝国主义经济日益崩溃的历史条件下，更采用法西斯蒂主义的统治形式，施行极端的白色恐怖，组织恐怖的队伍，并以全民和职业代表等的思想，遮掩资产阶级直接的彻底的专政。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在全世界阶级斗争两极化日益尖锐的时期，到处抬头，更特别利用社会法西斯蒂——社会民主党及托洛茨基派等以维持反动统治；对于殖民地施行彻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武装干涉，这更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的特征。中国工农群众反对全世界各军国主义国家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反对社会法西斯蒂，反对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军国主义化，法西斯蒂化。”^③可以说，在中国国内，反法西斯主义是与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在反对世界的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对法西斯化的国民党。

193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建立反对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通告各国工人，认为“法西斯蒂的反动一国又一国的发生，法西斯独裁在德国的公开成立，向全世界千百万的工人提出了建立反对资产阶级法西斯蒂进攻的统一战线的必要问题”。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建立统一战线的主要阻力，是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事实上促成了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再三声明过，随时准备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群众建立共同斗争的联合，共产党始终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和非党工人的共同作战的组织者。去年7月20日，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被推翻后，德国共产党首先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总工联建议组织联合罢工来反对法西斯蒂。希特勒掌权后，德国共产党再次向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工联提议共同行动反抗法西斯，均被拒绝。^④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配合第五次反“围剿”和揭露国民党训政的本质，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33年9月1日制定了《关于中国法西斯蒂的提纲》，指出地主资产阶级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统治，“于是法西斯主义便在中国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新的欺骗手段”。中国法西斯主义与西欧各国的法西斯主义有共同点，如白色恐怖、摧残共产主义先锋队、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也有种种特点，如代表封建势力、出卖民族利益、替帝国主义侵略做清道夫，其社会支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最反动的部分。中国目前的路径运动以蒋介石为主动，其御用工具组织为蓝衣社，又名“中国青年同志会”，前身为CC，全部活动完全决定于蒋介石的行动与意志。呼吁广泛开展反法西斯的宣传鼓动工作，使群众明白法西斯是革命最凶恶的仇敌；建立反法西斯的群众组织，在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基础上，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分子；在即将召开的世界反帝大会中开展反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使之成为反帝反法西斯的大会。^⑤

① 秋白：《国民会议上蒋介石说些什么？》，《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10日，第167-168页。

②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3册，1932年11月23日，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第782页。

③ 《反帝斗争纲领》（1932年6月23日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3-334页。

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建立反对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告各国工人》，《斗争》（上海中央局）第45、46期合刊，1933年6月20日，第18-20页。

⑤ 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法西斯蒂的提纲》（1933年9月1日），《斗争》（上海中央局）第53期，1933年9月5日，第7-14页。

根据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的提纲《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中央于1934年4月12日作出决定，认为“由于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增长及其欺骗群众的武断宣传之加强（‘新生活’运动等等），必须加强思想上与行动上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思想方面，必须揭破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法西斯利用民族主义而实行卖国辱国与替帝国主义侵略做清道夫的面目，特别是中国法西斯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派别，是帝国主义手中最忠实的工具和奴仆；明确说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各派政权（南京、广东、北平）实质上都已经是在法西斯主义的专政，国民党整个地法西斯化，其中又形成公开的法西斯一派，正在争取整个国民党蜕变为法西斯党，全面公开地实行法西斯专政。同时要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①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虽然国民党整体而言仍在法西斯化过程中，但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已然成为中国法西斯。

1933年11月28日至12月1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讨论了库西宁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与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定义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1934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日程之一，为季米特洛夫报告“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不过，全会虽然认为法西斯的进攻使得斗争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促使各国共产党能够比较正确地制定反法西斯的政策和进行防止战争危机的斗争，但还是肯定地认为，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甚至在法西斯国家也是如此。^②

会后，受命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报告法西斯主义及其对策的季米特洛夫，质疑笼统地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党无论何处何种条件下都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左翼集团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危险、把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全体领导干部都说成是工人阶级自觉的叛徒等的正确性，因为这显然会阻碍我们接近社会民主党工人，争取他们转向革命道路。并提出要把统一战线策略变成开展对法西斯进攻的群众性斗争的有效因素，必须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凡事包办的态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此外，还提出要改善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集中注意对共产主义运动实行总的政治上的领导。^③这些意见对中国共产党转向实行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季米特洛夫紧紧抓住反法西斯这个主要矛盾，有着亲身经历的他深刻认识到“法西斯的基本任务是摧毁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从肉体上消灭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千百万劳动者处于恐怖、无权和暗无天日的被奴役地位。法西斯是一些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最反动的沙文主义分子的代表”。他们在采取重新瓜分世界的办法来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时，企图把资产阶级世界最反动的力量纠集起来进攻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鉴于工人阶级的分裂给了法西斯可趁之机的惨痛教训，他提出：“当前，关于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问题已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和首要任务。”为了反对法西斯和战争，要与社会民主党联合，同时也要与之斗争。“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共同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威胁，因为建立和巩固统一阵线现在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主要环节”。^④这一判断对于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都至关重要。

① 《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1934年4月12日），《斗争》（苏区中央局）第56期，1934年4月21日，第13-15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1934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332页。

③ 《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333-335页。

④ 季米特洛夫：《为建立统一战线而斗争》（1934年11月7日），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927年—1937年）》第2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59、461、464页。

三、共产国际七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

1935年7月至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无论是对于建立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还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具有决定性作用。正是这次大会将二者结合到一起，使得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之前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环，现在则转变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环节。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爆发，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法西斯制度成为资产阶级应对危机的救命丹，其试图以公开的恐怖专政和疯狂的进攻来击败工人阶级。“共产国际认为，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不仅是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和社会民主党背叛工人阶级的结果，而且也是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表现，因为资产阶级为维持其专政不得不采用恐怖的统治手段和战争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兰德勒叛徒“试图把法西斯主义说成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或流氓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一种似乎不仅超越无产阶级，而且也超越资产阶级的‘超阶级政权’。一些中欧国家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沉痛体验向群众表明，法西斯主义这个工人阶级最凶恶、最残暴的敌人，是极其反动、极端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家公开实行的恐怖专政。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衰落的产物”。在奥地利、西班牙、法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反法西斯的人民运动。^①1935年2月、7月，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等在法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主义示威、总罢工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游行。世界性的反战运动与反法西斯运动合流，使得统一战线得到加强。

1935年7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召开，横贯两边墙壁的大幅标语，用六种文字写着“反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进攻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凸显出大会的主旨。威廉·皮克在开幕词中指出：“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人类面临的问题。”前者要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进步，人民就会自由、幸福与和平。后者则在若干年的凶残压迫和残酷的恐怖之后，是劳苦大众的苦难与贫困，人类巨大的宝贵文化遭到野蛮的破坏，以及各国间出现新的流血战争。苏联社会主义的建成，世界革命和殖民地及附属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资产阶级极端恐惧，他们遂采用法西斯血腥恐怖手段来反对无产阶级。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鼓励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采取同样的方式对付工人阶级。而法西斯要维持其统治，就要发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其攻击的矛头集中到苏联，“一切国家的法西斯都在武装反对以狂风暴雨般之势向前推进的共产主义，而且正在组织反对苏联的战争，因为只要苏联在发展，在强大，而且不断取得胜利，工人运动就不会被打垮”。法西斯准备摧毁资产阶级上升期的民主自由的最后残余，以免无产阶级利用其来准备一场革命。共产党人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所以与法西斯主义殊死斗争。“统一战线运动是共产国际取得更大胜利的一种保证”。^②大会必须制定出策略，使劳动群众与反法西斯及反战的斗争相结合。

次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皮克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照他所说，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是要摧毁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实现共产党为反对资产阶级而同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其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斗争的革命领导。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得出结论：“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必须走统一战线的道路，必须同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这“导致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工人运动中最大的转折”。其目标显然就是：其一，实现全体工人阶级的联合；其二，以共产党为领导，以苏联为中心。中国革命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紧密关联，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采用苏维埃形式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它使战后时期的整个殖民地世界受到深刻的影响，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产生和胜利发展，具有非常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其意义在于“中国苏维埃的成就出色地证明了，依据列宁的殖民地革命学说制定的共

^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284-285页。

^②《威廉·皮克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339-344页。

产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体现了开辟人类社会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强大影响。“中国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在世界史上第一次产生了具有充分权力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在世界史上第一次以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形式来进行。因此，实践证明了在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可能的。在这里，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它可以保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成为第一个殖民地革命的范例，在革命中实现了无产阶级思想上的领导和初级形式的国务上的领导。”以中国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殖民地无产阶级，证明自己能够解决一些伟大的历史性问题，如捍卫国家经济政治的完全独立，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走向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顺利发展，鼓舞着整个殖民地世界的劳动人民去进行革命斗争，中国苏维埃成了他们进行革命解放斗争的典范和旗帜”。^①尤其是相较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条件落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更具意义，意味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可以构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环，使得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大幅度扩展。没有中国革命的典范作用，由共产国际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将不能形成完整链条。

在8月2日的第十四次会议上，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提出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和劳动群众询问怎样才能防止法西斯取得政权及推翻已取得政权的法西斯？共产国际的回答是首先必须着手建立统一战线，在全世界各地确立工人的统一行动。作为一种强大的武器，它能使工人阶级进行有效的自卫，并对法西斯胜利反击。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所属政党和团体的拥护者联合行动，不仅影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也会影响天主教的、无政府主义的以及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甚至影响法西斯蛊惑宣传的受害者。而无产阶级强大的统一战线，也会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所有其他劳动人民产生巨大影响，使之信赖工人阶级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不仅本国的劳动人民，而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也能成为自己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分裂，部分支持与资产阶级合作，支持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压迫制度，就会导致被压迫民族疏远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支持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就意味着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力量变成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后备军之一。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行动要依靠社会主义苏联不断增长的实力，前景十分广阔。所以必须建立统一战线，目的就是反对法西斯，反对资本的进攻和战争的威胁。共产国际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包括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前者主要是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工人阶级的联合，其次则是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后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依据本国情况建立的反帝统一战线，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倡议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②

大会进行过程中《真理报》发表社论，准确地把握住了大会精神，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借以击退法西斯的进攻和防止战争的危险”。而完成这一任务的工作方向，就是社论的标题《到群众中去！》。^③

在随后历次会议的讨论环节，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们纷纷表达了对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拥护，指出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既不能低估法西斯主义，也不能夸大，把不是法西斯的运动当作法西斯

①《皮克作〈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354-360页。

②《季米特洛夫作〈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383-392页。

③《到群众中去！》（1935年8月2日《真理报》社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

主义来对待。反法西斯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反帝斗争，揭露法西斯的蛊惑宣传，加强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低估殖民地革命是社会民主主义偏向的一种残余，共产党人和进步工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与整个殖民地世界被压迫民族之间团结战斗的革命阵线，以保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除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共产党没有其他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斗争。近几年在东三省和热河，共产党员到处发起组织反日统一战线，自己领导的武装与各地涣散的游击队结成联盟，建立联合军政领导机关，统一开展反日斗争。只是目前这一策略还不够彻底，必须认真、彻底和正确执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才能改变政治环境，取得抗日救国斗争的更大成绩。

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也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在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殖民地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其重要性不仅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占全球人类的绝大多数，其中大都是劳动者，而且因为占实际统治地位的，正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广大人民反对的公敌。必须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真正战斗的、全世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以便对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建立的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争取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① 讨论中，多位中共代表还揭露与批判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运动。

在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季米特洛夫就一些代表感到困惑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关系及其做法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指出二者在实际斗争中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交织，相互转化，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工人阶级本身的统一，就不能真正实现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转变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宜的办法，不能公式化地安排程序步骤。社会民主党长期与资产阶级合作，现在因为法西斯专政而失去合法地位，或是受到苏联社会主义胜利的影响，开始反对法西斯和资产阶级的斗争。^②

共产国际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仍然是在世界革命的理念下，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核心，不过有三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调整：一是扣住了法西斯主义这个最主要的战争与暴政威胁，二是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可能的反法西斯力量，三是打破教条主义，让各国共产党根据各自的情况开展相关工作。由于策略的调整，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摆脱了以社会民主党人为敌并与之长期缠斗、使得工人阶级分裂和法西斯坐大的不利局面，将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统统纳入统一战线，扩大和增强了共产党的领导，而各国共产党得以从各自的国情出发，在总的策略原则下制定适合自身情况的具体策略以及确定工作重心。

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一方面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和红军全面转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则使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的抗日斗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大会期间，苏维埃中国的代表王荣曾发文强调指出：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日本法西斯蒂是世界大战的挑衅者，冲击队。他和德国波兰法西斯蒂联合起来，企图用军事冒险来进攻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并作争霸太平洋的大战。他野蛮疯狂地霸占中国领土，正是为着进攻苏联反革命的战争的必要准备。我们要用革命的战争来阻止反革命的战争，来阻止人类的灾祸。中国共产党，中国全国民众正站在这个革命战争的前线上，我们要灵活地把中国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团结成坚强的反帝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阻止反苏联的战争及帝国主义大战，完成我们在世界革命历史上国际的任务。^③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393-414页。

^②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束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424-443页。

^③ 王荣：《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在反帝反国民党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中的作用》（193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450页。

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看，中国的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起，就在事实上属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阵营。全面抗战来临之际，随着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重要环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更是确定无疑地具有反法西斯主义的性质。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出决议：“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为此，必须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①大会召开之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然而，历史往往机缘巧合，红军到达陕北时，几路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中共与会人员陆续辗转抵达陕北，经过遵义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与调整后的国际路线高度合拍，很快就开创了新的局面，引导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四、反法西斯和平阵营

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无论事实上还是认识上都是密不可分的。而在历史进程中，却经历了不同阶段认识的发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说法，不仅时间上延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顺序，内容上也隐含帝国主义重新争霸世界的意味。

1931年3月31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第九次会议讨论曼努伊尔斯基报告时，刘先（少奇）发言说：“世界被划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一方面是世界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和各个国家的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是苏联、世界无产阶级和准备进行坚决斗争的殖民地革命人民。在这一大规模决战中，我们应当给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社会法西斯主义以彻底的打击，争取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②两大阵营的划分，使得战争的危险出现三种可能，即帝国主义之间（日英与美矛盾为主）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决战，以及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战争。

受到共产国际的引导和自己的切身体验，中国共产党起初认为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危险性最大，其次则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中国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九一八事变既可能是反苏战争的开端（东方战线），又可能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战争也日益紧迫。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③满洲事变“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④所以提出“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口号。^⑤此后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批判党内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过分的估量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为太平洋上帝国主义战争将要‘一触即发’，忽视了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主要的根本危险”。^⑥也就是说，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也要反对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二次世

① 《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摘录）》（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35年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34页。

② 《第九次会议（1931年3月31日晚）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8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98页。

④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19页。

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告民众书》（1932年4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89页。

⑥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210页。

界大战，而以前者为主要关注点。

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是主要危险，那么法西斯主义无疑是反共的急先锋。1932年6月23日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帝斗争纲领，明确提出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指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蒂，为法西斯上台扫清通道。法西斯与苏维埃在是否承认阶级斗争，保留抑或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国际主义等问题上尖锐对立。因此，意、德等国的法西斯主义兴起，矛头首先对准共产党，双方产生激烈冲突。欧洲各国纵容法西斯的目的是利用其反共，后来实行绥靖政策也是企图祸水东引。

应对日本侵华步伐的不断加速，完成了长征战略转移的中共中央和红军实现了策略的调整，开始集中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抗击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虽然总体上由对内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转向对外反侵略，斗争重点由阶级矛盾转向民族矛盾，但抗日救亡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注反而由原来的世界革命聚集到中国革命，捍卫苏联之类的口号几乎不被提起。而在争取必要的国际援助的视角下，一、二、四方面军等主力红军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之日，中共中央特意表示：“将向正在革命怒涛中的西班牙民族证明我们是它们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的好朋友，将向法国比国捷克国及全欧洲各国爱好和平的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防御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好朋友，将向英勇抗争至死不屈的亚比西尼亚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意大利侵略的好朋友，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最后我们将向苏联共和国外蒙共和国内蒙民族西北回人证明我们是与他们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世界侵略者的最切近的好朋友。”^①这番表态的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方面也开始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步调一致。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毛泽东一度倾向于和平民主与法西斯两大阵营对立的划分。1936年7月至9月，他和美国记者斯诺谈及抗战的外交问题，后者问：“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张同外国组成一个反帝、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是否可能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样的联盟？”毛泽东的回答是：“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中国若与苏联缔结条约，那必然是因为法西斯日本既是中国也是苏联的敌人。‘共同保卫和平’是现有法苏条约的根本基础。它也可以成为类似的太平洋各国抗日条约的基础。”“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尽管这时的美国实行孤立政策，大发战争财，毛泽东依然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中央认为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但要彻底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其实质“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③随后又提出：“采取一切方法，取得世界和平阵线各国援助，同人民阵线的国家，同苏联建立亲密的合作。善于利用各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以加强抗日的力量。”^④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划分，或多或少改变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以及帝国主义之间争霸的世界格局观。所谓和平阵线虽然没有具体指明，可是根据肯定国民党“在国际问题表示愿意参加到和平阵线方面来，因此使‘日德防共协定’在中国失败，而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将获成功”，

①《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1936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01页。

②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外交问题》（1936年7月、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8、395页。

③《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36年12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41页。

④《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1937年1月3日拟稿），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50页。

以及认为国民党的转变“在国外则更加强和平阵线而打击侵略阵线。加强太平洋的集体安全制度，而使日德防共更形孤立”，并说这是“英国在中国问题上胜利”，^①可以确定侵略阵线是指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均可归入和平阵线。1937年4月15日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肯定国民党“对于国际和平阵线有了进一步的接近”，而日本则“有着世界最侵略最野蛮德意两大法西斯国家的援助”，还会利用法西斯主义的警犬托洛斯基派进行捣乱和破坏。^②

国际国内的矛盾相互交错，政治格局与视野发生重大变动。在反法西斯阵营中，出现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范围更加广大、包括主要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和平阵线，由此连带发生几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其一，从完全非正义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变为正义（和平）与非正义（侵略）的斗争；其二，苏联是由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与被压迫民族组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核心领导，而包括民主国家政府在内的和平阵线，事实上是共同领导，尤其是主要大国的领导；其三，原来属于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被迫民族的关系由敌对变成盟友，共同反对侵略国家。这些变化有的是逐步实现的，并非一步到位。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和平阵线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存在一定的差距。

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战爆发。英法等国虽对中国表示同情，却不赞成立刻实行全国性抗战，而是希望中日妥协。美国则保持静观态度。^③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抗日的外交政策之一，就是“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④毛泽东公开表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联合全民族反对日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同时在世界环境内，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危险，也正在建立民主的统一战线。”^⑤1938年2月，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又说：“在政治方面，我们已有国内的统一，更拥有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和援助。”^⑥

1938年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3天会议，陈绍禹的总结谈及国际形势基本于我国抗战有利，主要表现于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及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同情和援助，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加上“世界三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法、美、英对我国抗战的友谊态度”，而日德意法西斯侵略者则内部冲突，“日寇除德意法西斯蒂的同盟者外，已成为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公敌！”尽管英国的妥协和美国的动摇，还是不利因素。^⑦相比之下，1938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声明的决议称：“中国的胜利则将对一切法西斯侵略者的侵略计划的一个有力的打击。由此看来，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整个进步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整个斗争中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⑧在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前提下，该决议充分肯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主动争取国际援华不够，共产国际对此有所批评，指出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对殖民地反抗有所轻视，实则并非如此。武汉保卫战接近尾声时，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举

①《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1937年4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70-171页。

②《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1937年4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97、199页。

③《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1937年7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2页。

④《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解放》第1卷第16期，1937年9月13日，扉页。

⑤毛泽东：《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解放》第1卷第18期，1937年10月2日，第7页。

⑥毛泽东：《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1938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0页。

⑦陈绍禹（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1938年3月11日），《群众》第1卷第19期，1938年4月23日，第325-326页。

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声明的决议》（1938年6月11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行了扩大的六中全会，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详细论述了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阶段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关于国际援助，肯定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根据国联决议给予了许多帮助，但是国际和平阵线各国情况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中立，资产阶级做战争生意，“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世界的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正在为着欧洲战争危机问题，在西方纠缠不清，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要坚决反对走德意路线的投降主张，“力争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物质援助之增加”。毛泽东还专门谈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关系，指出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在东方日寇侵略东四省西方希特勒登台之后，新的重分世界的战争业已开始了。……一方面日德意组成了侵略阵线，实行大规模的侵略。另方面各民主国家却为保守已得利益而在和平的名义之下准备战争，但至今不愿用实力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实际上帮助了侵略者”。英国的妥协政策将引导法西斯各国实行更大规模的战争。“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惟有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才有出路”。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中美苏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与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① 东方慕尼黑的阴影，使得中国共产党对英法的看法有所保留，和平阵线成了将来的选择，现实则倚重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不过，毛泽东并未完全放弃对和平阵线的寄望，1939年他为《论持久战》的英译本作序时仍表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民主国家如英、美、法有广大民众，包括各个阶层的一切前进人们，都是同情中国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② 如果说这一表述还有国家与人民的分别，那么他在稍后的《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中就十分清晰地以国家划分：

世界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是法西斯国家，另一类则是民主国家，这两类国家的矛盾一天天尖锐化起来。现在西班牙政府军更危险了，德国要求收回旧殖民地，意大利企图夺法国的突尼斯等地，更接近于大国间战争的危机了。现在已经开始了世界大战，过去的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法西斯国家打弱国小国，将来会和强国打的，但是到底哪一天打，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我们希望早打呢，还是如何？现在打起来，固然在某些方面是好的，譬如打击了西方法西斯，就是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但这是间接的，所以能晚打那更好，英、美等民主国家能更多地直接帮助我们。苏联现在也不愿意打，如果再隔几年，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更强大了，成为一个使法西斯闻之裂胆的国家，那末，这对中国，对世界是更有利的。世界一定会打更大规模的战争，但何日爆发，是无法占卜的。^③ 由此可见，直到这时，毛泽东仍然将世界分为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两大类，并且寄希望于英美等民主国家将来更多地直接给予中国帮助。这也就意味着他所预见的大国之间的世界大战，是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而不是帝国主义争霸战。

责任编辑：杨向艳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至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第9、12、23、29-31页。

^② 毛泽东：《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193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45页。

^③ 毛泽东：《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1939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4页。

“夷”字译名之争： 两次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关系的再定位

万立

[摘要] 1860 年代以前，在华英人曾就汉字“夷”字与 barbarian 是否构成对等关系，发生过长达半个世纪的“译名之争”。支持者与反对者分别用中国经典文献诠释“夷”字的古今含义和实际用法，以实现各自的论证目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国主战派以二者的对等关系构建“国耻叙事”，其根本目的是促动英国政府对华使用武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在华英国官员、汉学家旨在破除华夷观，以实现大英帝国与天朝中国之平行的长期追求。汉学爱好者汤姆斯否定二者的对等关系，主张以鸦片战争前的旧制与中国往来，从而维系中英关系的稳固发展。“译名之争”看似围绕于“夷”字与 barbarian 的对译关系，而其症结在于英国要重新定位百年以来的中英关系。

[关键词] 夷 barbarian 汤姆斯 (Peter Perring Thoms) 国耻叙事 华夷观

[中图分类号] K253-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1-0138-12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半个世纪中，在华英人曾就汉字“夷”与英文“barbarian”之间是否构成对译关系，发生过两次集中辩论。刘禾发现英方有意以翻译框定“夷”字与 barbarian (“野蛮人”) 之间的公度性，先是断裂“夷”字与 foreigner 的对译关系，而后又灌入 barbarian 的含义，使得“夷 / barbarian”形成三位一体的衍指符号 (super-sign)。^① 王尔敏全面回顾了 1870 年以前中英两方关于蛮夷称谓的争论。^② 王开玺、巴素 (Dilip K. Basu)、陈松全、陈斌、马腾飞等叙述了英国汉学家、外交官、翻译官及舆论辩论或利用“夷”字的史实。^③ 武树臣、方维规、王宏志、卢春晖等对“夷”字与 barbarian 的关系做了详细分析；郭忠华揭示了清中期在民族关系中从“夷夏大防”向各民族融合发展的观念转变，以及在国际关系领域从“天下共主”向“万国成员”的观念转折。^④

作者简介 万立，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涉外法治研究院研究员 (上海，201620)。

①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38-72 页。

② 王尔敏：《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35-158 页。

③ 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79-285 页。Dilip K. Basu, “Chinese Xenology and the Opium War: Reflections on Sinocentr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3, No. 4, 2014. Song-Chuan Chen,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83-93. Bin Chen,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 Yi in Pre-Opium War Canton: A Study of the Merchant Newspaper The Canton Register”,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62, 2020. Tengfei Ma, “Thomas Francis Wade’s (1818—1895): Translations of Yi 夷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 7, No. 1, 2023.

④ 武树臣：《寻找最初的“夷”：东夷风俗与远古的法》，《中外法学》2013 年第 1 期。方维规：《一个有悖史实的生造“衍指符号”——〈帝国的话语政治〉中“夷 / barbarian”的解读与刘禾商榷》，《文艺研究》2013 年第 2 期；《“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论 19 世纪汉语涉外词汇和概念的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既有研究尚未全面论述的是两次译名之争中，支持者与反对者都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阐述“夷”字的古今含义和实际用法，以实现不同的论证目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主战派在华英人极力论证二者构成对译关系，其根本目的是构建“国耻叙事”，以促动英国政府对华动武。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官员旨在改造中国根深蒂固的华夷观，以实现大英帝国与天朝中国之平行。汉学爱好者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否定二者的对译关系，主张遵循鸦片战争前的旧制与中国往来，以维持中英关系的稳定发展。本文表明，译名之争的本质不在于“夷”字与 barbarian 之间是否构成对译关系，其核心是英人要求中国承认英国是与之平等的国度，并以此重新定位乃至颠倒中英关系。

一、“国耻叙事”与“二重翻译”

关于“夷”字的中西冲突在 19 世纪初期即已出现，这是英国人对以往“夷”字理解的推翻以及企图扭转中英关系的序幕。^① 英人起初多将“夷”字译作 foreigner。如英国汉学家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将 1810 年翻译出版的《大清律例》中所附军机大臣颁给两广总督吴熊光传谕等字寄中的“夷商”，译作 foreign merchants。^② 英国汉学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 1815 年出版的《华英字典》中也将“夷”译作 foreigners，并解释为“外国人的通称”。^③ 但不久后，在华英人就认为“夷”与 barbarian（“野蛮人”）构成对译关系，并要求中方禁用“夷”字称呼英人。^④

19 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广东官员的冲突愈渐频繁。1814 年 10 月初，由于英、美两国在珠江口发生武装冲突，两广总督蒋攸钰下令中止与两国的贸易。与英方关系密切的通事阿耀（李耀，又名李永达）因“冒滥名器”“交通作弊”被南海县官府逮捕。^⑤ 英国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f the Factory at Canton）下令拒绝恢复中英贸易。12 日委员会主席益花臣（John F. Elphinstone）指派三班小斯当东代表商馆与蒋攸钰交涉，并由书记员觅加府（Theophilus Metcalfe）和德庇时（John Davis）陪同。尽管蒋攸钰同意恢复贸易，但英方主张“还有数件事，未先言明之前，不得复办贸易”。^⑥ 于是，蒋攸钰指派粤海关监督祥绍、广州知府杨建、佛山同知福荫长、南海县令龚鲲等协同办理。16 日小斯当东面交益花臣签署的“陈情信”，其中第 2 条提出：“地方官行用文书，谕内用‘蛮’、‘夷’等字，似有轻侮之意。”广州知府杨建复称：“蛮夷二字系外国统称，在南曰蛮，在西曰夷，犹内地民人曰汉人。只系称呼，并无轻侮之意。况奥〔澳〕门系香山县地方，各国夷人往来贸易，遇有交涉事务，不能不由地方官查考，岂可推敲字句，致碍办公，应请毋庸议。”^⑦ 广东布政使曾燠等亦称，“此系夷目等不谙文义，

2013 年第 4 期。王宏志：《说“夷”：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话语》，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春夏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年。卢春晖：《16—19 世纪“夷”字在澳门的翻译与接受》，《澳门理工学报》2023 年第 3 期。郭忠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早期展开——基于“夷”字的概念史研究》，《学术月刊》2024 年第 4 期。

① 如 1832 年 2 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林赛（化名胡夏米）与苏松太道吴其泰对“夷”就有争论。参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第 52-63 页。

②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北京：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 年，第 45a 页。George Thomas Staunton, *Ta Tsing Leu Lee: 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0, p. 518.

③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ies Press, 1815, p. 586.

④ 事实上，barbarian 的意涵也存在符号化转变历程。简单而言，该词起初是希腊人指称所有异族的代词，而后由罗马人赋予蒙昧、落后、野蛮等含义。17—19 世纪，在欧洲大国殖民扩张历程中，barbarian 成为“文野之分”中“野蛮”的对等词汇。Mu-Chou Poo, *Enemies of Civilization: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Egypt, and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p. 38-48. Ian Wood, “The Term ›barbarus‹ in Fifth-,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Gaul”,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Linguistik*, Vol. 41, No. 4, 2011, pp. 49-50.

⑤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北京：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 年，第 20-21 页。

⑥ 游博清：《经营管理与商业竞争力：1786—1816 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台北：元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 208 页。

⑦ “Negotiations for the terminologies to be used between foreign traders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GB 891 SC1/1, Royal Asiatic Society Archives. “Conference of 1814”, *Canton Register*, August 15, 1831, p. 81. 关于广州知府杨建的答复，《粤海关志》所录文字稍有不同。梁廷枏撰，袁钟仁注校：《粤海关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60 页。

应如该府等所禀称，毋庸置疑，并请饬知洋商，明晰开导，示以并非轻侮，以释其疑。”^①

英方认为“蛮”“夷”二字是对英国人的侮辱，是不当的代称；中方则以二字的文义抵挡，即二字只是对非华民的统称。由于“通事阿耀案”是焦点问题，加之其他要求大多得到中方应允，英方便未在该二字上予取予求。后来有人将此次会议成果称作中英“1814年条约”（Treaty of 1814），并认为“考虑到双方的谈判情形，总体而言这是一次英国的外交胜利”。毕竟，英方提出的多数要求得到了中方的同意。^②这一短暂、偶然的交涉暂未掀起太多波澜，但在之后引发了英人关于中英关系再定位的思考。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随着中英关系渐趋紧张，在华英人对“夷”字发起了一场大讨论。1834年9月，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Chief Superintendent of British Trade in China）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来华时，借其职衔被译作 barbarian eye 及相关外交礼仪诘难中方，但未取得成效。^③重要的是，“律劳卑之败”（Napier Fizzle）——律劳卑擅入广州城、违规递函及引发交火等事——激起了在华英人内对于“夷”字内涵的广泛关注。^④

1830年以后，为抨击中国“闭关锁国”政策和鼓吹“自由贸易”原则，^⑤在华头面英商马地臣（James Matheson）率先发起对“夷”字的批判，并构建出一种“国耻叙事”（national insult）。^⑥他认为“（汉族）这个桀骜不驯、贪慕虚荣的民族一直乐于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民视为‘野蛮人’（barbarian）——缺乏关于公民、政治或美德的资格”，英国东印度公司多年来采取一种“息事宁人和屈从顺服的政策”，固然保障了对华贸易的平稳推进，但也“作出了最羞辱和最危险的妥协，默许了中方的主张，侵犯了个人与国家的尊荣……将招致额外的羞辱与勒索”。这意味着英商得以在广州贸易的条件，“是间接承认该条件源自中国皇帝对‘恭顺’的英王及其‘野蛮、放荡的国民’予以‘令人惊异且难以置信的恩赐’”。^⑦

英商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化名胡夏米）也致函巴麦尊（3rd Viscount Palmerston），提出禁止中方使用“所有暗指民族优越地位的侮辱性表达……即所有外国人都是道德沦丧、弗如中华之人，只要这种印象继续延续下去，我们就无法指望取得更好的待遇”。为了证明“夷”等同于 barbarian，林赛引用苏轼的“王者不治夷狄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林赛提出，禁止中国人继续使用“夷”这一令西方人蒙受“奇耻大辱”（gross insult）之语汇的最好办法，是“直接对中国实施武装干涉，以促使其赔偿先前造成的损害并保障（英国人）未来的安全”。^⑧

马地臣和林赛严厉谴责“夷”字，原因不仅在于该字是对英人的羞辱，更在于要求改变先前的“屈从政策”（submissive policy），并促使英国政府对华使用武力。1830年10月，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特选委会主席盼师（William Baynes）携带“番妇”进城时，英国散商认为两广总督李鸿宾的告示所载“夷商”“天朝”等语“实属可恨，我万不肯服此无稽凌辱远人之词”。^⑨1834年12月9日，马地臣、林赛等60余名英国在粤商人联名致函英国政府，要求向清廷展示武力及赔偿。其中，“夷”字的使用即是诱因之一：“广州地方当局发布的敕令，对英王陛下和英国使用傲慢的和侮辱性词汇；陛下被称作中国皇

① 梁廷桢撰，袁钟仁注校：《粤海关志》，第560页；“Conference of 1814”，*Canton Register*, August 15, 1831, p. 81.

② *Canton Register*, August 15, 1831, p. 79.

③ James Matheson, *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British Trade with China*,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6, pp. 78-79.

④ 参见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51-461页。

⑤ 详见万立：《从万国法到国际法——清季国际法翻译与国际法历史主义转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⑥ 关于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对不平等条约形成的“国耻叙事”，参见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王栋、龚志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4-112页。

⑦ James Matheson, *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our Trade with China*, pp. 12, 15, 17.

⑧ Hugh Hamilton Lindsay, *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o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36, pp. 4, 8, 10.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4页。

帝之‘恭顺’的朝贡者，陛下的臣民被说成荒淫无度的野蛮人。”^①

已离开中国的汉学爱好者汤姆斯则认为，马地臣和林赛等人建构的“国耻叙事”是一种英国人“臆想的委屈”（imaginary grievance）。^②对此，汤姆斯以马礼逊和小斯当东的观点佐证“夷”字与 barbarian 不构成对译关系。马礼逊将“夷”字解释为“外国人的统称”（foreigners generally）。^③小斯当东也推崇马礼逊的解释，并认为“夷目”之“目”系“首领”（head/principal person）而非“眼睛”（eye），因此将律劳卑的职衔“商务监督”译作“夷目”恰如其分，其被英国人自己按字面译作 barbarian eye 反倒是一种“滑稽翻译”（caricature translating）——夸大了该字可能蕴含的冒犯和无礼之意。^④

1837年8月1日《广州纪事报》刊载的文章主张回到中国经典寻找“夷”字的真义。该文认为孟子所言“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⑤相较林赛所举“王者不治夷狄论”更具说服力。因为此处的“夷”字不含侮辱、贬低的意思，而是指 foreigner。该文进而指出，“barbarian 是英方译者注入‘夷’字的含义，但由于英国人遭受了许多轻蔑和羞辱，该译法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认可”。^⑥

《广州纪事报》的编辑直接认定“夷”与 barbarian 的对译关系，是在译者操纵之下确立的，即“除二重翻译（double translation）外，‘夷’字任何情形下均不含‘野蛮’之义”。^⑦换言之，只有将“夷”字先在中文内译成“野蛮人”，才能译成英文 barbarian，因此二者的对译关系需要经过语内和语际二重翻译方能确立。汤姆斯也认为马礼逊等译者一改先前对“夷”字的译法是“在指令之下行事，而非根据其惯常的做法”。因为在英国外交部提交议会的蓝皮书中，仅两广总督颁给行商批示的译文，“野蛮人的眼睛”（barbarian eye）就出现不下21次；但“在律劳卑来华前，东印度公司职员必然读过类似文件不下百件”，却无人提出控诉。^⑧因此，这些译者要么“在汉语上没有取得多大进步”，要么“是在指使之下而非自发、自主地翻译”。^⑨对此，汤姆斯引用蒙学经典《明心宝鉴》之《忠孝略》告诫英方在“夷”字的翻译上毋庸“自欺欺人”：“世人要瞒人，分明把心欺。欺心即欺天（Heaven/God），莫道天不知。天在屋檐头，须有听得时。你道不听得，古今放过谁？”^⑩汤姆斯这段引据似在说明林赛听信“汉奸”唆使，颠倒黑白：“盖夷人与汉民言语不通，未能周知内地情事，而汉奸乃得以传递消息，簸弄是非。”^⑪

小斯当东深刻地批判了这一译词，认为其“若用在‘讽刺画’（caricature）中，以嘲笑中国人的无知或荒谬，或许尚为无伤大雅；但当它引发或加剧了英国商人与中国官府之间的嫌隙，并在‘臆想的羞辱’（imagined insults）中点燃了英商的愤怒，使得除了拔刀相向别无救济之法时，无论如何谴责它也不为过”。^⑫汤姆斯认为，林赛的翻译正是小斯当东所说的“滑稽翻译”——林赛未能冷静、公正地看待这

① “The Petition of the Undermentioned British Subjects at Canton, 9 December 1834”,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London: T. R. Harrison, 1840, p. 69.

② 1840年，汤姆斯曾撰文批评律劳卑逾越天朝体制的种种行径，并反对将“夷”字译作 barbarian。P. P. Thoms, “Mis-transl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Documents”, *The Westminster Review*, Vol. XXXIV, 1840, p. 286.

③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A Refutation of the Arguments Contained in the Seven Official Documents Transmitted by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at Hong Kong* (hereinafter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London: P. P. Thoms, 1853, p. 12.

④ George Thomas Staunton, *Remarks on the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Proposed Plans for Improving Them*, London: Edmund Llyod, 1836, pp. 36-38, 53.

⑤ 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2-213页。

⑥ “On the Meaning and Use of the Character 夷 E”, *Canton Register*, August 1, 1837, pp. 128-129.

⑦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Register”, *Canton Register*, August 22, 1837, p. 141.

⑧ 该“批示”的原文及译文见“The Governor of Canton to the Hong Merchants, 18 August 1834”,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840, pp. 23-25. [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 道光十四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6-7页。

⑨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 21.

⑩ 《明心宝鉴》由明人范立本编辑整理而成，以儒释道原理构建世俗且容易践行的伦理体系，作为孩童、百姓的启蒙、教化用书。胡文婷、张西平：《蒙学经典〈明心宝鉴〉的拉丁语译本初探》，《中国翻译》2022年第4期。

⑪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史料旬刊》第10期，北京：故宫博物院，1930年，第363a页。

⑫ George Thomas Staunton, *Remarks on the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Proposed Plans for Improving Them*, p. 38.

一问题缘于其汉文水平有限，系“于无羞辱处自取其辱”（to take offence where no offence was intended），因为中国人无法意识到有冒犯的可能。汤姆斯告诫英方不宜将对中方禁烟的愤懑转嫁到“夷”字上。^①

可见，马地臣、林赛认为“夷”字传递出中方居高临下的睥睨之姿，与 barbarian 对等无疑，并以此构建“国耻叙事”，鼓动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② 汤姆斯认为二人患有“被害妄想症”，因为“夷”字只是地域代词，不含侮辱之义，但在译者的“二重翻译”下与 barbarian 建立对译关系。双方都以儒家经典作为论证依据，但对传统文献做了不同诠释。这一现象在 1852 年前后再度上演，将“夷”字译名之争推向最高潮。^③

二、“中国皇帝对英国女王”：汤姆斯与英官对中国经典解释的歧异

1842 年 8 月中、英两方议定《南京条约》时，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曾提出“‘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中方与会人员侍卫咸龄提出“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夷’字载之于圣经，有何不美”。^④ 1844 年，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Robert Thom）要求宁波道台禁用“英夷”“逆匪”等字样，并改用“英商”“英国人”“洋人”；宁波道台复称，“至彼此久和好，‘英夷’等字样早经不用矣”。^⑤ 但中方在官文、通信中仍反复书写“夷”字，英国驻华官员遂不断提出禁用的要求。

1852 年 7 月 20 日，英国全权代表包令（John Bowring）照会两广总督徐广缙，历数多年来粤省官员滥书“夷”字，并要求加以改正。包令认为：“查‘夷’字上溯千古，原系贵国疆外各部落通称。实系统辖者多俱名为属国，亦教化权令悬殊，俱逊贵国。检阅经文，其义显然。”^⑥ 但不久之前，汤姆斯曾向外相巴麦尊提交《关于将中文“蛮”译作 Barbarian 的意见书——中国人不将欧洲人称作“野蛮人”》，表达了与包令相反的观点，并提请“身处中国、精通汉语之人”加以评判。^⑦ 汤姆斯之所以提交关于“蛮”字的意见书，原因是在他看来，“夷”“蛮”二字是同义词。因此，汤姆斯试图阐明“蛮”字不是 barbarian 的对等译名，从而论证“夷”字不是 barbarian 的对等译名。^⑧

为彻底解决“夷”字问题，在新任外相格兰威尔（2nd Earl Granville）指令下，包令邀集 5 位“汉学专家”（Chinese Scholars）发表相关意见，包括“最高权威”（highest authorities）之一的传教士麦都思（Rev. Walter H. Medhurst）、英国驻广州领事馆汉文秘书巴夏礼（Harry Parkes）、英国驻福州领事馆汉文秘书星查理（Charles A. Sinclair）、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汉文秘书密妥士（John A. T. Meadows）和英国驻厦门领事官汉文秘书柏威林（William H. Pedder）。^⑨ 在包令所谓“这是一个展示语文学知识的绝好机会”的鼓动下，^⑩ 麦都思之子、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正使麦华佗（Walter H.

①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p. 9, 11, 14.

② 关于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舆论鼓吹对华展示武力或发动战争，参见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Hao Gao, “Prelude to the Opium War? British Reactions to the ‘Napier Fizzle’ and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in the Mid Eighteen-Thirties”,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87, No. 237, 2014, pp. 491-509.

③ 法国汉学家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胪列了相关文章。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Tome premier, Paris: Ernest Leroux, 1878, pp. 786-787.

④ 张喜：《抚夷日记》，北平：文殿阁书庄，1936 年，第 69-70 页。

⑤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word 蠻 (mān) with reasons why 蠻 and 夷 ought not to be applied to Foreigners, and how 蠻 may nevertheless be rendered ‘Barbarian’ for want of a better term, 27 May 1852”, FO 17/190, p. 204a.

⑥ 《英使包令致两广总督徐广缙照会》，FO 230/74, pp. 10-11. 转引自王尔敏：《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第 142-143 页。

⑦ P. P. Thoms, “Remarks on rendering the Chinese word Man, ‘Barbarian’, showing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s”, *The North-China Herald*, 27 March 1852, p. 138.

⑧ “Inclousre, 5 December 1851”, FO 17/185, p. 213a. “Strictures on Mr. P. P. Thoms’ remarks on rendering the Chinese word 蠻 man, ‘Barbarian’, 15 March 1852”, FO 17/188, p. 305. “Observations, &c., June 1852”, FO 17/190, p. 191.

⑨ 密妥士主要围绕“蛮”字提供意见，与本文主旨无关。此外，或因抄写错误，汤姆斯误以为密迪乐的意见书由包令出具。“Bowering to Granville, 19 April 1852”, FO 17/188, pp. 303b-304a. “Bowering to Malmesbury, 26 June 1852”, FO 17/190, p. 146a. Thomas T. Meadows, “O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E, u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designate foreigners, 20 June 1853”,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cy*, Shanghai: 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 1854, p. 2.

⑩ “Circular No. 9 of 1852 to Her Britannic Majesty’s Consul in China, 20 April 1852”, FO 233/3, f. 34a.

Medhurst)、上海领事馆副领事罗伯逊(Daniel B. Robertson)和密妥士胞弟、上海领事馆汉文秘书密迪乐(Thomas T. Meadows)主动出具了意见。上述汉学家基本聚焦“夷”字的古义和今义,得出与汤姆斯相反的结论,^①即“夷”是用来指代“处于粗鄙、未及文明的状态,在道德与智力上皆未臻开化”的民族。^②麦华佗、密迪乐、巴夏礼等不仅引用《尚书》《尔雅》《礼记》《春秋》《中庸》《汉书》等典籍,还以《论语注疏》《尔雅注疏》等诠释性文本,补充分析“夷”字的含义,以论证“夷”字等于 barbarian,并揭橥中国 2000 年来形成的“华夷之辨”,即“中华”文明位于“夷狄”之上,并以此构建中国中心的天下体系。^③

麦都思首先提出“夷”字不能依据自己的观念来翻译,而是要展示该字实际用意,并以有力的文献加以佐证。^④基于这一思路,麦华佗援用了包括清代词典《佩文韵府》在内的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并举出 17 个例证,以表明“夷”字的古今含义都与 barbarian 等同。他首先提出,在“天下观”中,“外国”相对于“中国”是未开化的,且在法律上(即便不在事实上)是后者的属国。^⑤基于此,麦华佗的论证核心是“夷”字的古今含义指向落后、愚昧,并以中国中心的“文明等级观”作为价值基础。如《尔雅》将“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作“四海”,《尔雅注疏》谓“海之言晦,晦于礼义也”,因此“夷狄戎蛮”皆不习礼义并落后于中华文明。再如《孟子》所言“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中庸》所言“柔远怀来”,“抚”“柔”皆有控制、驾驭等含义。因此,北宋经学家陈祥道在苏轼之前就提出“先王以治治中国,以不治治夷狄。故于中国疆以周索,则有教以道其志,有政以齐其行;于夷狄疆以戎索,则立之寄、象、鞶、译而已”,^⑥这表明中国统治者对四境的俯视、睥睨之姿。^⑦

不过,汤姆斯认为诸人对“夷”字的释义“用意险恶”,斥责他们“违反其自身提出的翻译原则,即依据自己的观念赋予表示 Foreigner 的‘夷’字以负面含义”。他坚持《康熙字典》和《华英字典》的权威性,并翻译《康熙字典》关于“夷”字释义的主要内容,以表明“夷”字并无好坏之分。还以《诗经》《史记》《周礼》《后汉书》《尚书》等经典论证“夷”字有“平”“易”“大”“安”“伤”等义,但没有“野蛮人”之义。如《后汉书》记载的商王武乙时期东夷的情况(“武乙衰敝,东夷寝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尚书·泰誓》记载的武王在伐纣誓师大会上的誓词(“受有亿兆夷人”),以及西周第九代国王姬燮的年号“夷王”,都表明“夷”字指中国的邻国。^⑧

汤姆斯的结论是“夷”字原先不过是中国四境之族裔的代词,而后逐渐产生“外国人”之义。若不准中国人以“夷”字指称“外国人”,则别无他词可用。具言之,先前中国将居于中国四境且尚未服属中国之异族,分别称作“东夷”“南蛮”“西羌”“北狄”,东南西北是地理方位(territorial),而夷蛮羌狄是天文方位(astronomical),二者是中国一贯表示方位的两种名称。因此,中国自称“中央之国”(Middle Nation),自称“天下”并统御“四海”。这意味着,在外国人的指称问题上,中国人采取一以贯之的做法,英国人不应为此“心焦”。但“英国人对汉语用法一无所知,始终在不公正地谴责中国人的傲慢”。^⑨此外,英官罗伯逊支持汤姆斯的观点,认为“夷”字和 barbarian 分别是中国人和罗马人用

① 上述英官大多认为汤姆斯的观点不值一提,且错将较少用于在华西人的“蛮”字作为讨论重点。

② Thomas T. Meadows, “Answer to Mr. Thoms’ paper on the word 蠻 man, in which he endeavours to sh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25 May 1852”,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y*, p. 7.

③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6页。

④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 39.

⑤ “Remarks touching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夷 E, elicited by Mr. P. P. Thoms’ attempt to she[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30 April 1852”, FO 17/190, pp. 152-153.

⑥ 上述英官引用典籍时不时发生错漏,本文以典籍原文为准。本句麦华佗写作“先王以治治中国,以不治治夷狄,故于中国则有教,以道其志;有政,以齐其行。于夷狄,则立之寄、象、鞶、译而已”。参见顾宏义:《陈祥道、陈旸其人其书》,《历史文献研究》第43辑,扬州:广陵书社,2019年。

⑦ “Remarks touching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夷 E, elicited by Mr. P. P. Thoms’ attempt to she[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30 April 1852”, FO 17/190, pp. 153-155.

⑧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p. 39, 31, 36.

⑨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p. 34, 39, 20, 38.

来区分本国和外国的词汇，并强调中国人并未抱有故意羞辱的意图加以使用，且也缺乏用来指称“外国人”的其他汉语词汇，因此不宜过分苛责。^①

对此，麦华佗、密迪乐、巴夏礼反对仅以词源学的方式处理该问题。密迪乐认为《康熙字典》舛错颇多，并非最权威的词源文献，词汇实际和现时的用法才是确证。为此，他们以《四书章句集注》《四书直解》等诠释性文本和谕令奏章、近时著作、民间见闻辨析“夷”字的含义。在密迪乐看来，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是中国的科举考生必须烂熟于心、最为通用及最受尊崇的著作，可以揭示“夷”字在每个中国人心目中的真实含义。^②巴夏礼也主张依据展示“夷”在不同时代用法的权威文献，而非仅凭一部不甚相关的词典作为唯一参考。^③星查理补充解释称，“词汇因时间和情境而获得新的含义”，马礼逊《华英词典》无法预料之后“夷”字的用法及其引发的语义变化。^④

麦华佗继而以《孟子》所载“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和《论语》所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等表明，“夷”字的背后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华优夷劣”之分。^⑤以《论语正义》所称“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表明夷狄即使有国君，但不明礼义；诸夏即便无君，但仍有礼义。^⑥此即明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所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乱也”，亦即“华夷之辨”。^⑦

在密迪乐看来，“礼”“义”是华优夷劣的两大指标，前者指“通晓社会守则”（knowledge of the social observances），后者指有“权利观或正义观”（a sense of right or justice），二者同为“五德”的组成部分，缺乏二者的民族即为“野蛮人”。巴夏礼以东汉今文经学派代表作《白虎通》所云“夷者，傅夷无礼义”，表明“夷”字原先可能确指外国人，但逐渐具有野蛮人的意味。^⑧如魏源《海国图志》曾云“暹罗人游惰度日，不尚技艺，尤藐视外国人。有商舶至其地，辄待同蛮夷”，这说明“夷”字不仅与 foreigner 不对等，还带有贬义。^⑨此外，星查理认为，先前中国没有 foreigner 概念。^⑩

包令在提交英外交部的结论中指出，上述官员一致认为“汤姆斯的观点缺乏任何建立在对该问题了如指掌的基础之上”，但这次讨论“不仅有助于阐明语文学上的问题，还能解释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看似捉摸不透的观念和政策”。^⑪

1853年3月8日，汤姆斯致信时任外相克拉伦登（4th Earl of Clarendon）称关于“夷”“蛮”的译名讨论“对于国格（national character）而言尤为重要”，并将其观点汇集为《中国皇帝对英国女王：对1853年七份港英政府致送关于中国政府文件内含侮辱用语官文的辩驳》，提交外交部。^⑫此后，英官似

① “Notes on the character 蠻 man and 夷 E,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Foreigners &c., &c., 31 May 1852”, FO 17/190, pp. 223b-224a.

② Thomas T. Meadows, “Answer to Mr. Thoms’ paper on the word 蠻 man, in which he endeavours to sh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25 May 1852”,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y*, pp. 6, 8.

③ “Observations, &c., June 1852”, FO 17/190, p. 192a.

④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word 蠻 (mān) with reasons why 蠻 and 夷 ought not to be applied to Foreigners, and how 蠻 may nevertheless be rendered ‘Barbarian’ for want of a better term, 27 May 1852”, FO 17/190, p. 203.

⑤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 52.

⑥ “Remarks touching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夷 E, elicited by Mr. P. P. Thoms’ attempt to she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30 April 1852”, FO 17/190, p. 156.

⑦ 张居正讲评：《论语别裁》，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⑧ 密迪乐写作“夷者，蹲也，言无礼义”。Thomas T. Meadows, “O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E, u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designate foreigners, 20 June 1853”,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y*, pp. 2-3. “Observations, &c., June 1852”, FO 17/190, p. 192b.

⑨ “Observations, &c., June 1852”, FO 17/190, pp. 194b-195a.

⑩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word 蠻 (mān) with reasons why 蠻 and 夷 ought not to be applied to Foreigners, and how 蠻 may nevertheless be rendered ‘Barbarian’ for want of a better term, 27 May 1852,” FO 17/190, p. 197a.

⑪ “Bowering to Malmesbury, 26 June 1852”, FO 17/190, p. 146.

⑫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a refutation of the arguments contained in the seven official documents transmitted by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at Hong-Kong who maintain that the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ain insulting language, P. P. Thoms to Lord Clarendon, 8 March 1853”, FO 17/207, p. 75.

未有进一步讨论。关于汤姆斯与英官的笔战，英国华威大学学者陈松全将之称作“一个人的战斗”。^①关于“夷”字的原意，汤姆斯和英国在华官员征引的文献大体一致，但后者以诠释性文本补强论证了“夷”字的现时用法，即呈现该字从陈述事实到价值判断的演变过程，摆脱了词源学式的辨析。这固然可以从汉学水平的高低来解释，但双方不同的叙事目的或是根本性因素。

三、“不破不立”：推翻“华夷观”与中英平行之追求

鸦片战争前，英人企图以“一破一立”的方式实现中英两国的平行。所谓“破”就是禁用“夷”字，以推翻华夷观；所谓“立”就是将国名冠以“大英”二字，以取得与“大清”的形式对等。^②但英人很清楚，不破不立。

1830年代后，在华西人开始大量宣扬英国的伟岸形象，主要通过出版人文地理类论著，以直接呈现英国取得的文明成就。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著、马礼逊译《大英国人事略说》，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著《大英国统志》两种，以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刊载的文章，都将英国称颂为与中国匹敌之国度。《大英国人事略说》有云：“英国一处，人民太平安居，亲体、财物皆为法律所护，无人敢侵害。又英人所奉救世主耶稣之教，特谕训以于地神赐太平，且恩意向众生矣。英人经大进格物技艺，文墨诗书之学可令人雅致，礼义圣善之德行也。”^③马治平夸饰英国，旨在扭转华民“偏见”并清除对英人施加的凌辱：“臭论詈骂之揭帖对外国人的诋毁，极大影响了中国民众的心理，我们认为一些对抗可能会产生最有益的抵消效果。”^④

借助营造英国光辉形象的宣传方式，在华西人企图直接灌输英人并非“野蛮人”而是“文明人”的印象，但这种海市蜃楼般的描绘很难引起朝廷和多数官员、民众的艳羡。^⑤因此，在华英人意识到，中国对世界各国的优越感根源于华夷观（或称天朝观），因而要厚植英国之文明形象，就必须加以改造。这使得“夷”字成为推翻华夷观的突破口。在面对汤姆斯的极力自辩时，上述英官直接吐露了“夷”字是推翻华夷观和塑造中英平行关系的重要一环。

彼时香港舆论界广泛质疑汤姆斯的汉语水平和汉学素养。《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质疑汤姆斯“闭门造车”：“作为一名马礼逊博士字典的印刷工（typographer）……何以从工作坊获取大量信息。他没有给出构成他撰写文章资质的证据，即翻译了三封还是三百五十三封公函。”《纪录报海外版与价格消息》（*Overland Register and Price Current*）则直接点出英方反对“夷”字的原因：“难道允许中国辱没全世界吗？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签订和约，而是为了友谊和由衷的尊重。……英国女王绝不允许中国皇帝及其任何臣民将英国臣民称作‘野蛮人’和‘番鬼’!!!”^⑥密迪乐甚至认为，汤姆斯“提出诸多愚不可及的证据，不过是为了养老金的立即获益提供必要机会”。^⑦

在自我正名中，汤姆斯以“秉烛夜读”描述其学习汉语的经历，称早就对汉语——这架“福玻斯的马车”（Phoebus's car）——驾轻就熟，并认为其本人与马礼逊、米怜（William Milne）共同构成了继“汉学家之父”小斯当东之后打破汉语障碍的“汉学三人组”（triad）。即便离华已37年，他依然“鼓起十足的勇气为了正义之事业承受种种诘难”。^⑧在汤姆斯看来，正是他为汉学的付出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

① Song-Chuan Chen,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p. 142.

② 参见庄钦永：《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教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2022年，第1-88页。

③ Charles Marjoribanks: 《大英国人事略说》，trans. Robert Morrison，英华书院藏板，1832年，第5页。

④ “Brief Account of the English Character, 30 October 1831”, The British Library, IOR/G/12/277, pp. 134-135.

⑤ Song-Chuan Chen,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p. 89.

⑥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p. 28, 27.

⑦ Thomas T. Meadows, “Answer to Mr. Thoms’ paper on the word 蠻 man, in which he endeavours to sh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25 May 1852”,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y*, p. 7.

⑧ 汤姆斯自称与马、米二人齐名的底气在于，他以一己之力负责印刷出版《华英字典》6卷本，并翻译出版《花笺记》（明末清初广东地区流行的说唱文学）、《著名丞相董卓之死》（《三国演义》第八、第九回部分内容）及《宋金郎团圆破毡笠》（《今古奇观》第十四回），并著有《论商代的中国青铜器皿》等。汤姆斯还向第一场世界博览会暨1851年万国博览

高度重视对德庇时、林赛和罗伯逊等官员的汉语培训，因此上述评论不应对他这名“印刷工”嗤之以鼻。汤姆斯直言，辨析“夷”字的原因在于让“中英两个大国更好地相互理解彼此”，但30年来上述学员“非但没有长大成人，反而变回孩童”。在他看来，多数英国人对中国这一与英国有200年贸易史的国家知之甚少，而上述英官“自满于其‘短见’和自负”，无法以“公正的心态”学习中国经典和历史，这使得他们的翻译“滑稽”且“随意”。重要的是，他们“似乎都受到盛行于律劳卑勋爵时期的翻译实践的影响或控制。麦华佗博士无疑具有歌利亚（Goliath，《圣经》记载的巨人）的全部胆识……但他认为有必要坚持其观点时，他就译成‘野蛮人’——否则，就译成‘外国’或‘外国人’”。^①

对此，麦华佗袒露了英人尤其关注“夷”字问题的根本原因，即它严重妨害了英国的在华利益。在麦华佗看来，中国政府秉持一种“中国中心观”，自视为最文明的国家，对四境外族享有开化权和至高统辖权。因此，即便普通中国臣民不以“夷人”贬低或侮辱外国人，但中国政府对该词的用法“明显具有文明的低劣和等级的下位等意涵，有违条约规定并承认的国家平等原则”。然而，“中方官员持续不履行条约义务，不给予英国在华官员应有的体面与尊重，这都构成对英方的羞辱”。^②

早在1830年代，英商就呼吁不得以尊严为代价换取商业利益，郭实猎主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直言，中国人“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③曾任郭实猎秘书的戈登（G. J. Gordon）指出，“若这只是一个词源学问题，便无关紧要；但其引申含义在懵懂、无知的头脑里引发了敌意，就变得极为有害……中国人也将（与希腊人、罗马人对待‘野蛮人’一样）如此对待他们自己眼中的‘野蛮人’”。^④马治平总结称：“如同多年来英人在君士坦丁堡被称为‘狗’一样，我们在广州和北京也可能继续被称为‘鬼’。”不变的道理是，民族尊严的折辱总是损及商业利益，这已为我们与中国交往的每一页历史所证实。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⑤

因此，麦华佗呼吁必须改变中国官员的“偏见”（prejudice），并以修约的方式固定下来，从而改善在华英人的处境，否则“诸多障碍将横亘在商业往来的扩张过程之中”。在麦华佗看来，禁书“夷”字这一看似微末的权利，是为了争取国家平等这一重大原则，“不惜任何代价予以践行是防止发生更加严重的误解之最有效的方式”，并有助于“消除牢牢占据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英国人低劣、无礼的形象”。这意味着英方若不采取强硬态度，“任何已挣得的国家尊严都将消弭殆尽，并最终丧失在中英关系中执行在（英国）人民和政府看来是绝对正义、周全和公平的政策方针的能力”。^⑥

巴夏礼也认为，中国政府使用“夷”字是试图控驭一切外国民族，并僭取普世之最高权威，但这在中英关系步入“新纪元”以后，便不合《南京条约》确立的中英“完全平等原则”（perfect equality）。^⑦

会提交其翻译的1684年广州商人致函广东巡抚的赞词，并向英国皇家外科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介绍《本草纲目》20卷内容。参见王燕：《〈花笺记〉：第一部中国“史诗”的西行之旅》，《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郑锦怀：《彼得·佩林·汤姆斯：由印刷工而汉学家——以〈中国求爱诗〉为中心的考察》，《国际汉学》2015年第4期；*A Guide to the Great Exhibi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Co., 1851, p. 172.

①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 64.

② “Remarks touching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夷 E, elicited by Mr. P. P. Thoms’ attempt to she[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30 April 1852”, FO 17/190, pp. 158a-158b.

③ 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页。

④ G. J. Gordon,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6, pp. 79-80.

⑤ Charles Marjoribanks, *Letter to the Right Hon. Charles Grant etc.*, London: J. Hatchard and Son, 1833, pp. 4-5. 19世纪土耳其人常将基督徒称为“基督狗”，以区别于穆斯林教徒。J. C. Hobhouse, *A Journey through Albania and other Provinces of Turkey in Europe and Asia to Constantinople, during the years 1809 and 1810*, Vol. 2, Philadelphia: M. Carey and Son, 1817, p. 73.

⑥ “Remarks touching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夷 E, elicited by Mr. P. P. Thoms’ attempt to she[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30 April 1852”, FO 17/190, p. 158b.

⑦ “Observations, &c., June 1852”, FO 17/190, p. 195b.

密迪乐认为，汤姆斯对中英关系的理解，“已经被时代落下二十年之久”，^①即过去英人甘心由中国官员称作“夷”的时代已一去不复回，如今必须“阻止有预谋的羞辱”，否则“必将损害（英国）重大利益”。因此，密迪乐主张扭转英国的蛮夷形象。在通商五口中了解英国的华民不过寥寥，他们通常认为英国“在道德伦理和智识开化上逊于中国”，并惊诧于英国人“并非如同牲口一般过着群居的生活”。^②

可见，上述英官提出禁用“夷”字，旨在改造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华夷观，从而将自命天朝上国的中国拉入凡尘，作为与英国平等的国家，以便维护、拓展英国在华利益。星查理指出，中国“自视为最古老的国家，并作为文明的引领者。在社会艺术方面，其他国家都被视为在中国之下”。在中国传统的“天命观”中，中国统治者负有“从野蛮中拯救苍生之圣职”。因此，若要打消中国迟迟不肯摈弃的“至尊”（supremacy）观念，就必须要求中方禁用“夷”字于任何涉英事宜，以清除中国人“在美德、伦理和社会等方面卖弄的种种自负”。^③

汤姆斯认为，上述“许多言论和文章纯属偏见”：200年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能在广州发家致富，而未曾嫌怨“夷”字，但在公司散局而无法获取更多利益时，则对“夷”字大加批驳。在华英商原先通过行商与广东当局取得联系，但后来径直向广东巡抚投递公函，单方面破坏百年成例。因此，广东当局“没有必要对像夷狄一样漠视成例的商人采取立法措施，以便在必要时采取权宜之策”，而这正是苏轼的本意。因此，在华英人得不到优待，“其错不在中国人……错在英国人的傲慢，并由此招致了侮辱”。^④

重要的是，在汤姆斯看来，英国是在借“夷”字寻衅媾兵：“每个国家都有自身专属的民族性（nationality）”，英国非但对此不加以认真学习，还在中国未能知悉事件原委全貌时就拔刀相向，发动了一场“使（世界）文明史之一页蒙羞”的战争。倘若英方继续坚持“夷”与 barbarian 的对译关系，并要求中方禁用，无益于中英关系向好发展，反倒将在中英两国之间“筑起一堵相较秦始皇在京郊所筑的更加粗厚的壁垒”，对英国毫无益处可言。正如1834年9月11日两广总督在向英商发布的告谕中所言，“天朝怀远以德，所贵情理服人，不尚威力”，^⑤但英国若坚持“以刀剑服人”，“一个尚武的民族以及蚩尤、战国及三国时期的战争将再临欧洲，如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一般”。^⑥英国汉学家库寿龄（Samuel Couling）则以盖棺定论的口吻将“羞辱”作为鸦片战争的起因之一：“林钦差查获鸦片是战争的导火索，而英人及他国人民多年来在中国寻求正当贸易时所遭受的羞辱、污蔑、压迫及不公，才是战争的起因。”^⑦

称谓从来都是英国人重点关注的对象。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认为：“名称与头衔通常被当作毋庸争辩的虚荣……但倘若希腊人称某人为‘野蛮人’，并视之为仇敌；倘若土耳其人称你为狗，并视你为狗；倘若中国人称你国为朝贡国，并否认你国的所有对等权利，名称与头衔就变得尤为重要。”^⑧罗伯聃精辟地指出，“夷”字是一种“人身攻击”（argumentum ad hominem）。^⑨汤姆斯以北宋思想家邵雍所言“闻人之谤未尝怒”等语，劝诫英国当局毋在称谓上步步紧逼，否则将“激起中国人的民族性和排外情绪”。^⑩

总之，多数英官批驳“夷”字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刻入了“蒙昧”“低劣”“未

①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 57.

② Thomas T. Meadows, “Answer to Mr. Thoms’ paper on the word 蠻 man, in which he endeavours to show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ll Europeans ‘Barbarian’, 25 May 1852”,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y*, pp. 7, 11.

③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word 蠻 (mān) with reasons why 蠻 and 夷 ought not to be applied to Foreigners, and how 蠻 may nevertheless be rendered ‘Barbarian’ for want of a better term, 27 May 1852”, FO 17/190, pp. 197b-201, 204b.

④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p. 40-41.

⑤ [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18页。

⑥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p. 57, 65-66.

⑦ Samuel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17, p. 410.

⑧ John Robert Morrison, *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etc.*, Canton: Albion Press, 1834, p. ix.

⑨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Register”, *Canton Register*, August 15, 1837, p. 137.

⑩ P. P. Thoms, *The Emperor of China vs. The Queen of England*, p. 67. P. P. Thoms, “Mis-transl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Documents”, *The Westminster Review*, Vol.34, 1840, p. 287.

及王化”等贬义，其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因此，他们试图以禁用“夷”字指称英国人，来树立英国的光辉形象，并表明英国与中国的完全平行，早非从前那个俯首称臣的英吉利。汤姆斯固然在“夷”古今含义的阐释上存在不少纰漏，但其敏锐地发现英官坚持中方禁用“夷”字的根本原因，是英国在为其予取予求和使用武力寻找借口。

四、余论

对意蕴丰富之历史语汇的理解，必然需要经过读者的诠释，这意味着人对过去或经典的了解最先基本是一个语言学过程。^① 明清之际，天主教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礼仪之争”，其中有“译名之争”。^② “夷”字也有“译名之争”。在华英官通过中国经典文献、官方文书、权威著述及实际用法证明，“夷”字的古义是指中国四境之族裔不假，但该字的用法决定了其今义，即指未受教化的民族，充斥着低劣、轻蔑及贬低的含义。因此，“夷”字与 barbarian 完全构成对等关系，并非“二重翻译”。平心而论，“夷”字在各朝代的指涉和评价皆有不同，或指相对华夏的异族，无歧视侮辱的意味；或指教化未开的异族，有贬义的意味，无法一概而论。^③ 可以说，“夷”字历经千百年使用后，已成为未及王化民族的代词，以区别于更加文明的华夏。华夷观虽以地域或种族为表达形式，但其文化为体、政治为用的内核，即“夷”践行华夏道统才能得到中国承认，正为英人所反对。^④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马地臣、林赛等主战派利用“夷”字的符号化含义，将“英夷”“夷目”对在华英国官员、商人的使用叙述为一种“国耻”，从而鼓动英国政府对华发动战争。此后，麦华佗、密迪乐、巴夏礼等在华英官支持禁用“夷”字，旨在去除中国官民对英国的成见，并以此表明大英帝国是与天朝中国平行的国家，从而为中英之间的平等关系奠定知识基础。汤姆斯则基于“夷”字的古义，劝说在华英官保持克制，不宜在称谓问题上咄咄逼人，进而损害中英关系的长远发展。

独木难支的汤姆斯在“夷”字译名之争中败下阵来，在华英官的“国耻叙事”和推翻华夷观的意图，最终体现在中英 1858 年《天津条约》确立的“平行原则”中。^⑤ 津约谈判时，英国驻广州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提出，“红毛”“番鬼”“白鬼”“夷”等词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甚至在从未亲眼见过外国人的内地华民”也是采用这些称呼，因而必须改变这一局面。^⑥ 汉文秘书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则称：“中国先前的孤立排外导致她自我定义为‘中央之国’，而对其他强大、富裕之国的一无所知也让她将所有非中国人称作不在文明范畴之内的‘野蛮人’。这一观念大错特错……她自今以后必须遵从西方国家的惯例，与那些她毫无反抗之力的国家打交道。”^⑦

《天津条约》第 51 款明确禁止在各式公文中以“/夷/barbarian”指代大英国官民。此后英人无需大费周章地论证“夷”的古今含义，以要求中方禁用“夷”字，仅须举出条约定便能实现这一目的。1858 年 9 月初津约墨迹尚未全干之际，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Earl of Elgin）发现《邸报》所载上谕仍书“夷”字，遂照会中方：“若谓贵国及各国自视内外化势不同，任以何名何言分办[辨]判别，事较轻微，无关重大。所要在乎违理。盖用‘夷’字，即为背约之理。又两国永保和好，独以平行往来。此次违约一端，即以平行之理，置之不问……贵国专轻此条，实为向有虚示自大比别国之见，坚执未改之证。溯

① 甘怀真：《导论：重新思考东亚王权与世界观——以「天下」与「中国」为关键词》，甘怀真等编：《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 年，第 5-6 页。

②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5 页。

③ 吕佳蓉：《由蛮夷到外国人——由外族称名看中外文化交流》，洪淑苓、黄美娥主编：《第一届文化流动与知识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7 年，第 543、558 页。

④ 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第 69 页。

⑤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刘海岩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63 页。

⑥ “Memorandum on suggested Heads of a new Treaty, 31 December 1857”,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London: Harrison, 1859, p. 58.

⑦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Lay and Twau, Pieu, Kwah, and Mei, Secretaries attached to Commissioners Kweiliang and Hwashana, on June 6, 1858”, FO 17/289, pp. 144b-145a.

查林则徐至叶名琛之日，因固执此理，致忘彼此平行相待之礼。夫最明理者，原是中华，是以最难辞其不行。迄今背礼貽灾不轻，兹愿不使仍然复生。”^① 额尔金认为中国以何种词汇指代他国无关紧要，并承认可能无法“以用别的词汇来向中国人民表述‘外国人’这一概念”，^② 但以“夷”字指代英国官民有违条约所载“平行之理”，因此要求中方革除“虚示自大”的华夷观，将英国作为平等之国看待。此后离任之际的额尔金再三告诫中方，“夫两国平行交易，如人敌体互待，彼此何有抚驭之语”。^③

终于，英国在中国的外政体系中从原先的“朝贡国”变成了“邦交国”“与国”（条约国），^④ 而在英人看来充斥着“文明等级观”的“夷”字逐渐消弭于官方文牍、中外信函及民间言论，而由“洋人”“西人”等取代。^⑤ 此后，“西方”“外洋”逐渐成为“文明”“现代”的化身，“东方”“内地”则沦为“蒙昧”“传统”的宿主。事实上，鸦片战争不久后，魏源认识到西人“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因而提倡“师夷长技”。^⑥ 洋务运动时期，郭嵩焘甚至认为西洋文明已超越华夏文明：“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⑦ 维新时期，王韬提出华夷之分的浮动性，间接承认夷已变夏：“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喜，厚己以薄人哉？”^⑧

问题是，英国人以《天津条约》锁定“夷”字与 barbarian 之间的公度性，是否构成颠覆华夷观的全部动能？中国文化政治中早就存在自我调整和改造的内生动力，孟子所言“用夏变夷”即属其证。^⑨ 华夷观是一种普世适应的文化，“华”与“夷”并非一成不变，“华”与“夷”之间的差异不是种族的，而是文明发展阶段的，即文明与半文明或非文明之间的差异。因此，“夷”的文明程度可以提升至“华”，而“华”也有可能沦落为“夷”。^⑩ 中国历史上异民族王朝入主中原而后逐渐产生华夏认同，乃至断裂了先前的种族和文化关联，便是这一观点的生动例证。^⑪

然而，禁用“夷”字对中国政治文化世界观产生的是一种外部冲击，而非中国政治文化的内生动力。^⑫ 因为英国人绝非意图将英国纳入中华文明圈，也不旨在表明英国“能行中国之道”，否则仍将服属“天朝体系”之下。英国人的真正目的是要中国人承认世上有一个与中国平等的国家，一个不践行华夏礼乐、不接受王者教化，但文明程度不逊于乃至超越中华文明的帝国。因此，英国要扭转中国以华夷观看待英国的先见，要从“朝贡国”“西洋国”变为“与国”，从而获得与中国平等往来、公平议价的地位。但英国此后并未给予中国以平等地位，反而以条约加诸种种不平等待遇，逐渐形成了“新不对等关系”。坚船利炮固然是英国人推翻华夷观的物质保障，而“夷”字译名之争则是中国中心观渐趋瓦解、中外实力此消彼长以及中英位势发生历史性倒置的微缩写照。

责任编辑：杨向艳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四国新档（一）英国档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第713页。“The Earl of Elgin to Commissioners Kweiliang and Hwashana”，*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p. 385.

② “The Earl of Elgin to the Earl of Malmesbury, 20 September 1858”，*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p. 386.

③ 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54页。

④ [日] 岡本隆司：『中国の誕生—東アジアの近代外交と国家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年，第32、61页。

⑤ 郭卫东：《新世界观的形成：东、西、南、北洋的概念流变》，《清史研究》2024年第1期。

⑥ 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889页。

⑦ 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491页。

⑧ 王韬著，楚流等选注：《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7页。

⑨ 王德威：《华夷之变——华语语系研究的新视界》，《中国现代文学》2018年第34期。

⑩ 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2页。

⑪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第11-12页。

⑫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杨立华等译，第44页。

晚明科道官的年例迁转与政争^{*}

余 璐

〔摘 要〕明代科道官的年例迁转，是由吏部拟定人选去向，皇帝钦点决定。万历中期以后，与年例有关的政争频繁发生。这些政争不仅反映了朝堂舆论与神宗意志的激烈对立，而且推动着年例主导权的分散与下移。引发年例政争的先决条件，既有朝堂舆论与皇权对立的政治性因素，又有年例规则灵活可变的制度性因素。神宗对吏部的刻意打压和对朝堂政局的放任，令科道官获得了议拟年例的初步参与权。在随后围绕六科都给事中年例规则的政争中，六科为增加内升京堂的人数，在不同时期给出不同的方案解释，直接影响着吏部的年例推升结果。至明末，科道年例的拟定权不专属于吏部，而是由吏部与科道共同分有，形成六科舆论与朝堂舆论均有影响的分散状态。关注晚明政局中科道年例等非正式惯例，有助于增进晚明党争的相关认识。

〔关键词〕明代 科道 年例 党争 官僚政治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150-12

科道官在明中后期的朝堂政治中举足轻重，升转优越。他们内则推为正四品、正五品小京堂，外则升为正五品至从三品的方面郡守官。明中后期，内重外轻，积势渐成。科道官若能内升京堂，不数年间便可“建牙”“卿贰”；若是外转藩臬，将“栖迟”“浮沉”数十年。^①嘉靖中叶，为平衡科道二衙门在内升京堂上的前程利益，形成俸深科道每年定额定序内外迁转的惯例，时人称之为“年例”“岁例”。万历以后，“年例”一词不再专指俸深科道的内外迁转，而是泛指所有科道官的内外升转，甚至更侧重外转。科道官较重的事权地位、年例制度的模糊不定以及内外之间的迥异前程，使得万历中后期的科道群体愈发关注年例的人选、规则、主导权等议题，由此产生一系列的舆论纷争。

近年来的晚明政治史研究，多集中于党争中的事件、人物、党派乃至政治文化，^②对党争的制度因素、党争与制度间的互动则关注较少。^③前者有助于厘清党争的事实与认知，后者则着重于党争的出现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明代官僚政治变迁中的文官铨选考课惯例研究”(2024ELS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余璐，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上海，200234)。

① 钟羽正：《条举科中事宜以明职守疏》，吴亮辑：《万历疏钞》卷11，《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8页。

② 明末政治史的相关研究学界成果甚多，兹举近年较为典型的研究以作参考。陈永福：《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吕士朋：《崇祯初年钱谦益事件与东林内阁的瓦解》，《明代研究》第16期，2011年；阳正伟：《“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李佳：《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求是学刊》2017年第6期；杨向艳：《沈一贯执政与万历党争——以楚宗、妖书、京察三事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黄阿明：《万历三十八年“郑继芳私书”与辛亥党争》，《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马子木：《明季浙党考》，《文史》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陈旭：《都察院掌院都御史与晚明党争》，《史林》2024年第3期。

③ 关于明末党争中的制度性因素，近年的研究主要有余劲东：《制度规定与行政运作——以明万历辛亥京察为例》，朱诚如、徐凯编：《明清论丛》第16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李小波：《晚明文官会推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20年第5期；黄友灏：《明万历朝阁臣廷推的定制化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

原因与后续影响。实际上,晚明党争在妖书、楚宗、挺击等突发事案之外,尚有围绕京察、科道年例等特定制度发生的朝堂政争。这些政争不仅仅是人事、派系层面的斗争,更有着关乎制度本身的一面,如万历辛亥京察中围绕京察制度“明规矩”与“潜规则”的行政运作,“给正常的政治秩序以极大冲击”。^①科道官的内外年例,本就是在吏部长期推升中逐渐形成的非正式制度,是惯例而非定制。其非正式的惯例特性给了不同立场官员以不同解释的可能,探究相关政争发生的缘由、过程,将有助于深化对晚明党争中制度因素的相关认识。

明末的年例政争,包括年例人选得旨留用、六科都给事中的年例规则、科道二衙门的参与议拟权等三类议题,分别涉及年例的人选、制度规则和权力关系,是考察明末党争与制度间互动关系的极佳观察对象。本文将依次考察这三类政争,探析年例政争屡屡发生的制度因素、官僚文化,以及政争对年例推升制度乃至晚明朝堂权力结构的改变与影响。

一、年例人选的政争

万历中叶,在文官迁转内重外轻的背景下,吏部拟定年例人选也多寓以抑扬褒贬之意。除了六科都给事中尚需挨次推升外,十三道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的年例推升均无资历上的限制,推内推外全视个人的才绩资质。在时人看来,官声政绩皆被舆论推许之人应内升以示嘉奖,而风力不著、有犯清议之人理当外转以示贬黜,年例的内外人选关系着贤否是非的朝堂公论。这一时期,给事中姚文蔚、钟兆斗、钱梦皋三人在征朝、楚宗、妖书等事案中的发言,与首辅沈一贯的立场倾向互相呼应,他们被时人视为沈一贯的私党。万历三十年(1602)左右,三人均曾被拟为年例外转,又都得旨留任,引发朝堂上对阁臣弄权庇私的怀疑与舆论纷争。这是围绕年例的第一次大型舆论政争。

当时的舆论认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钱梦皋、三十三年(1605)钟兆斗的年例留用均出自沈一贯的运作,^②而三十六年(1608)曾被年例外转的姚文蔚内升京堂,又是朱赓的作用。^③两名浙人首辅承担着钱、钟、姚三人年例不行的政治责任。钱梦皋等三人年例不得外转,是神宗遭到蒙蔽、听信阁臣的结果。就现存史料而言,除了钱梦皋在年例外转时曾得到以沈一贯为首三位阁臣的揭帖请留外,^④姚文蔚、钟兆斗的仕途浮沉,都看不到阁臣的显著作用。姚文蔚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首次例推参政,留中不下,三十年遭左都御史温纯弹劾,得旨“策励供职”,^⑤三十一年(1603)上疏自请外补,得旨“自求外补,亦见退让,准与推用”,^⑥但三十二年、三十五年(1607)吏部再次例推姚文蔚为参政,留中不下。三十六年吏部推其为南京太仆寺卿,终于得旨允准。^⑦钟兆斗则是在万历三十三年京察过后被处以年例外推,和京察被黜的钱梦皋一同得旨留用。据沈一贯自述,此次京察奏疏及察后年例的留中不发与阁臣无关,是神宗的“格外之举”。^⑧神宗在当时发下察疏的敕谕中,明确表示要留用被察和年例诸臣,并用“结党”“竖权”“立威”等重词批评部院大臣在京察中的所作所为,^⑨以示警告。此后舆论不断升温,言官以百年察典不得破坏为由,纷纷上疏攻击阁臣,神宗下谕表示自

① 余劭东:《制度规定与行政运作——以明万历辛亥京察为例》,《明清论丛》第16辑。

② 吴亮辑:《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三年乙巳卷,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1302、1303页。

③ 王元翰:《巨奸涂面丧心比私害国疏》,《王谏议全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7页;《明神宗实录》卷451,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丙子,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8534页。

④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十二年四月十四日甲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04页。

⑤ 《明神宗实录》卷378,万历三十年十一月壬戌,第7114页。

⑥ 《明神宗实录》卷389,万历三十一年十月丁酉,第7325页。

⑦ 参见姚文蔚于万历三十六年正月所上疏,其称“吏部又谓叙升者当叙四年前之俸次而升,仍照前推臣参政”。《万历大政类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4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00页。

⑧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甲子,第2239页。

⑨ 《明神宗实录》卷407,万历三十三年三月辛巳,第7590-7591页。

己“于威福予夺之柄，从未有下移”，本年的考察留用及严谕切责都“断自朕心，谁能参预”，^①但最终还是在阁臣请求、舆论压力下同意了钱、钟及其他被察官员养病归家的请求。至少在姚文蔚、钟兆斗二人的年例留用上，神宗的意见和决定占据着主导地位。

至于万历三十一年沈一贯揭留钱梦皋一事，沈自称是受到次辅沈鲤的书信嘱托，^②叶向高给温纯撰写的墓志铭中也有“归德公（沈鲤）亦请宽钱给事”的记载。^③钱梦皋在楚宗、妖书等事中的政见倾向与沈一贯相合，与沈鲤相悖。二沈之间貌合神离，请留钱梦皋是沈鲤君子作风的体现，却也满足了沈一贯庇护同道的隐秘愿望。论迹论心，沈一贯都难脱干系。明人的攻击与批评并非无据，但由钱梦皋疑及钟、姚二人年例留任亦出自阁臣的主使，多是出于臆测。至少在钟、姚、钱三人年例不行的原因上，文献记载与明人舆论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揆之事理人情，明人对沈一贯、朱赓的攻击很难成立。神宗并非毫无主见、听任阁臣专权的皇帝，沈、朱等阁臣也很难“欺上瞒下”地诱导神宗。首先，神宗并非懦主。明代的内阁在结构上附属于皇权，为皇帝提供“助理决策性质的服务”。^④在万历中前期明神宗与阁臣的互动中，多有“此系朕心独断”的圣谕。神宗虽在军国要事上咨询阁臣的意见，甚至听从阁臣判断和举荐，但圣旨仍体现着他综合各方建议、最终决断的个人意志。其次，这一时期的阁臣也非权臣。他们大多以张居正为戒，不敢有一毫擅权结党、包庇私人的形迹。^⑤王锡爵、叶向高等深受神宗信任的阁臣，多是兢兢自守、奉行上意、调停上下的和事佬形象。沈一贯虽被明人视为弄权庇私的权奸，但他深知自己是皇帝在官僚群体面前的挡箭牌，因此谨慎自戢，做足了不私不党、中立无倚的样子。如其为避免结党嫌疑，“待同乡尤薄”，^⑥黄景昉亦称沈一贯“以里闲嫌”，请神宗不用廷推第一的赵参鲁为吏部尚书，这是“直为身谋”“无关盛德”的自保之举。^⑦由此避事远责的自保式行事逻辑，可以推测沈一贯揭留钱梦皋的主要动因，既不是庇护私党，也不是“惟恐次辅之美不彰、次辅之出不早”^⑧那般光明正大，而是与神宗的好恶倾向有关。总之，阁臣对钱、姚、钟三人年例留用的影响力较为有限，明人舆论对阁臣的攻击不尽客观。

万历朝年例人选的异常状态并不始于钱梦皋等人，但引发的政争始于他们。年例推升的异常状态早在万历二十年代就已存在，与行取不下几乎同时出现，^⑨都是神宗对科道官极度不满、有意裁抑的外在表现。万历二十年（1592）的科道年例，神宗不用正推，点用陪推。二十三年（1595）年例奏疏一度留中，经阁臣催请方才发下，次年的年例奏疏则彻底留中不下。^⑩自此以后，年例奏疏留中不下渐成常态。到了万历三十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留用姚、钱、钟三人时，朝堂上才爆发了普遍的不满和

①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己亥，第2228-2229页；《万历大政类编》，万历三十三年五月，《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4册，第345页。

② 沈一贯：《敬事草》卷18《乞休八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80册，第37页。

③ 叶向高：《苍霞续草》卷14《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赠少保亦斋温公偕配赠一品夫人李氏杨氏宋氏神道碑》，《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参见宋立杰：《理身理国：沈一贯研究》，吉林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8-169页。

④ 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

⑤ 参见李佳：《制度与时局——明代阁臣政治角色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5页。

⑥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9《沈四明同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35页。沈德符所列与沈一贯相亲善的浙人官僚包括贺灿然，但贺灿然并不认为自己与沈一贯党同一派。他因乙巳京察中的发言而被黜，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自己在反对留用被察科道、劝谏阁臣、改变形势上的功绩，并将自己的贬黜归结为得罪权奸沈一贯、阻挠奸计上。他在回忆录中还为自己因浙人的籍贯被视为浙党而愤愤不平（贺灿然：《驳漫录评正》，《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0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19-723页）。马子木认为这一时期以沈一贯为首的“浙党”并不成立（马子木：《明季浙党考》，《文史》2022年第1辑）。

⑦ 黄景昉撰，陈士楷、熊德基校注：《国史唯疑》卷10，厦门：鹭江出版社，2017年，第236页。

⑧ 沈一贯：《敬事草》卷18《乞休八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80册，第37页。

⑨ 行取留中始自万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吏部尚书孙丕扬称“数月以来……行取停矣，年例废矣”。年例与行取彻底胶滞不行均在二十四年，两事发生在同一时期，是神宗裁抑科道言官的消极之法。《明神宗实录》卷278，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丁未，第5135页；卷299，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丁卯，第5593页。

⑩ 参见《明神宗实录》卷245，万历二十年二月甲辰，第4565-4566页；卷290，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丙午、丁未，第5369-5370、5371页；卷299，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丁卯，第5593页。

攻击阁臣的舆论纷争。为何此前关于年例的异常状态皆寂寂无闻，而到了万历三十年代才集中爆发？这与三人建言论事深受神宗瞩目、却与亲近东林的西北官员互相齟齬的政治倾向有关，更与当时各立派别、互相攻击的朝堂形势有关。姚文蔚曾谈及自己屡次年例又屡次留中的原因：“假令推参政得下，六七年间，不知已几转，但因君命不下，遂坚执较胜。”^①在他看来，年例政争的关键是神宗和吏部之间“坚执较胜”的朝堂困局。

科道官员的内外年例皆由吏部拟定正推、陪推人选，疏请皇帝点用。自万历十四五年（1586、1587）起，吏部事务“如科道年例、九卿升转”，不再关白内阁。^②万历二十年代，朝堂公论日渐强势，吏部部权与朝堂公论相结合，愈益独立。^③钱、钟、姚三人被处以年例，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以吏部为首朝堂舆论的向背。钱梦皋在三十一年的楚宗、妖书两案中，肆意攻击罗织亲近东林的郭正域、沈鲤等，由此得罪公论。^④钟兆斗在三十二年例转后随即上疏弹劾亲近东林的西北官员代表温纯，可见其政治倾向。他因何得罪公论、被处以例转，现存文献中没有留下太多的史料依据。至于姚文蔚，他在楚宗案中被时人视为杨应文弹劾郭正域奏疏的代笔者，在妖书案中又被视为钱梦皋弹劾郭正域和沈鲤的背后指使者，虽大多是臆测无据，但已见其在时人心中的品性及政治倾向。他曾在二十八年年例外转、三十年遭温纯弹劾，可知其触忤公论尚在楚宗、妖书两案之前。

姚文蔚在万历三十年左右几次表明心迹的上疏中，屡屡提及自己在东征一事中的功劳和因此遭受的嫉妒，“外转而命不下，转科而命即下，皇上睿断隆恩，岂臣所能取必？或者亦重记小臣前日有一言之献？”^⑤东征一事中，他在和议失败、再次陷入战局时，坚持以战退敌的策略。援朝一役最终因丰臣秀吉的突然去世而迅速取胜，主战派的姚文蔚也由此获得神宗的青睐和赏识。在他看来，年例留用且升任都科，是神宗为了褒奖他在东征一事中的建言之功而有意为之的。神宗有意留任内升，吏部却屡屡外推年例，故意与神宗“坚执较胜”，致使舆论纷争。不过，与姚文蔚有着相似经历的尚有南直隶人给事中杨应文。杨应文勘定东事、查兵查饷，也曾“三推参政而命不下，屡次告病而上不允”，被人攻击为“注目京堂者”，^⑥但最终于万历三十二年成功内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与姚文蔚相比，杨应文的年例留中和最终内升都没有引起太大的舆论风波。可见，仅仅是南方人的乡党背景、东征援朝之役的建言功劳，都不足以成为触忤公论的真正缘由。姚文蔚年例留用内升所引起的舆论风波，尚有他的个人原因。

东征功劳几乎是姚文蔚与西北官员互相攻击时的自辩护身符。万历三十年，陕西人南企仲、赵邦清、李应策相继被劾，西北官员代表左都御史温纯似有不安，上疏弹劾于永清和姚文蔚，疏中提及二人在外散布“秦人欲挤首相”^⑦的谣言。姚文蔚在自辩疏中将自己与东征之功相绑定，指责温纯攻击自己是对神宗英断的东征一事心怀不满。姚此论明显是吹索诛心、恶意罗织，他被朝堂舆论所不满，本是情

① 《万历大政类编》，万历三十六年正月，《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4册，第400页。

② 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18《王麟洲太常》，《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401-402页。吏部推用大臣关白内阁始于正德年间（薛应旂：《宪章录》卷45，《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52册，第460页），至万历中叶吏部愈益独立，阁臣避事远嫌，遂有王锡爵此说。万历三十年代朱赓亦曾有“自臣起家以来，庭无铨司之迹，绝不闻何日推某官，何部举某人，往往于邸报见之”的表述（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二十日辛巳（巳），第2437页）。

③ 参见林丽月：《阁部冲突与明万历朝的党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2年第10期。按，这一时期朝堂公论日益强势，甚至到了神宗点用陪推便“举朝狂哄、出言悖乱、无人臣礼”的地步（沈长卿：《沈氏日旦》卷2，《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31册，第360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388，万历三十一年九月己巳，第7309页；卷390，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庚辰，第7363页；卷391，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午，第7368页。参见杨向艳：《沈一贯执政与万历党争——以楚宗、妖书、京察三事为中心的考察》，第56、136、235-239页。

⑤ 《万历大政类编》，万历三十年十月，《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4册，第329页。

⑥ 《明神宗实录》卷385，万历三十一年六月壬子，第7248-7249页。

⑦ 温纯：《温恭毅集》卷6《恳乞圣明亟定国是以一众志以保治安疏》，《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79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302页。

理之中。万历三十五年，姚文蔚又上疏提出重振主权、涤荡朋党的策略：“盖以理度之，皇上独断，必不能尽如党人之意，党人不悦，必有阻难之谋，此主权振与不振一大关也。……夫天下合一大朋以抗主上，权一落而不可收矣。……臣总为忠于皇上，岂有左右袒也？”^① 他所说的“天下合一大朋以抗主上”，既迎合了神宗对官僚群体的不满，也向神宗表示自己不与党人同谋的忠心。他对神宗的迎合顺从，与当时朝堂舆论对神宗的劝谏规范形成鲜明对比。这封奏疏将姚文蔚划出了“天下合一大朋”的官僚群体、朝堂舆论之外。结合他东征建言主战、散布“秦人欲挤首相”谣言、攻击温纯的种种行为，可知其向往神宗专制、且多言挑激的独特个性。无论姚文蔚是否为楚宗、妖书案中杨应文、钱梦皋等人发言的幕后指使者，他过度迎合神宗的政治立场、浮躁多言的处事风格，都将其推向朝堂公论的对立面。

年例人选引发的朝堂政争，始于钱、钟、姚三人迎合神宗、触忤公论的极端言论，终于神宗与朝堂公论间的“坚执较胜”。这一时期朝堂公论所遵奉的是兼听并观、看重是非曲直、顺从公论的理想皇帝，而非有着私心私情、渴望按照个人意志乾纲独断的君主权威。在公论看来，钱、姚等人迎合神宗、肆意抨击北人官僚，理当外转以示裁抑。但在神宗看来，钱、姚等人在东征、楚宗等事上敢于发言、推动问题的解决，并非卖直沽名之人，理当留任内升以示奖劝。神宗的年例决定权与朝堂公论的强势话语权形成激烈对立。钱、姚等人的年例去向成为政争焦点，与这一时期朝堂公论的持续高涨有关。

二、年例规则的争论

这一时期，公论等舆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日益增加，不仅体现在年例人选的舆论纷争上，也体现在六科衙门都对给事中年例规则的灵活解释上。万历年间，六科都给事中需遵循一内一外、挨次迁转的年例惯例。万历中叶随着神宗长期怠政、章奏留中，科道官们不得迁转，资俸愈积愈深。俸深御史尚能“需次京卿”，“年深外转者不一二见”，^② 都给事中则不得不按照资俸次序外转为方面官。六科都给事中身居要地的迁转优势不复存在。^③ 对此，六科之内多有不平之音，“六垣之长，近多淹滞，劳攘风波之地，前后或十余岁，复就外藩。是论官资，在铨部台班之上；而论升授，且夷之各部署之下”。^④ 为了保持本衙门的迁转优势，让尽可能多的同僚获得更好的仕途前程，六科往往因需制宜对都给事中的年例规则进行灵活解释，形成六科公论，从而与年例主持者吏部、围观的河南道等形成舆论冲突，引发朝堂争论。

万历三十五年，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应当升转出科。对于其去向，吏部与吏科有着不同的方案和看法。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吏部的方案是“以推为序”，以推升过后的资俸次序为依据，宋一韩应当外升；吏科的方案是“以俸为序”，以原本的资俸次序为依据，宋一韩应当内升：

吏科以宋一韩既为首俸，则萧近高当外，而吏部以萧近高新任，则当为明年首推，相持者久之。盖吏部以推为序，则先年首邵庶，而次有年，今年首治则，而次一韩，以文蔚、治则合在正闰之内。吏科以俸为序，则邵庶既内，而有年当外，有年既外，而一韩当内，文蔚与治则自为别闰，不在正升之例〔列〕。^⑤

闰升是在正升之外额外添设的内升名目，多由管工程、出使海外、勘录边功等劳苦差事的科道官获得。正升是“专论资俸，填实缺，用陪推”，闰升则是“随时迁转，不待实缺，不用陪推”，^⑥ 可以不待京堂出缺便添注内升。如表1所示，夏子阳因出使琉球的海外差而闰升京堂，不占本年一内一外的年例名额，吏部与吏科对此均无异议。除他之外，三十五年在任的都给事中还有三十四年（1606）年底

① 《万历大政类编》，万历三十年十月、三十五年八月，《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4册，第328-330、391页。

② 《各科议单·户科姚》，周永春辑：《殿争录》卷4，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第40b页。

③ 《各科议单·户科姚》《各科议单·户科官》《各科议单·刑科姜》，周永春辑：《殿争录》卷4，第39a-41b、44a-46b、77a-80b页。

④ 《各科议单·户科姚》，周永春辑：《殿争录》卷4，第40b页。

⑤ 《明神宗实录》卷441，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甲戌，第8381页。

⑥ 翁宪祥：《详述掌印科臣迁转缘由仰祈圣鉴并乞敕下会同各科从长酌议务求归一以便遵守永杜争端事》，周永春辑：《殿争录》卷4，第23a、b页。

“留管大计”^①的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以及本年七月才升任都科的萧近高、孙善继。在吏部看来，三十五年春季年例的推升延至六月尚未确定，萧、孙二人升任都给事中是在七月，“则当备明年二月一内一外之推，不得扯解今年二月之推”。^②因此，三十五年在任的六科都给事中俸序第一是陈治则，应内升，俸序第二是宋一韩，应外转。陈治则是吏科，“例不外补”，本应内升京堂。但陈治则认为自己俸序在三十四年内外年例的邵庶之下、梁有年之上，应作为三十四年的闰升名额进行推升；宋一韩是三十五年的第一俸，应内升，萧近高是三十五年的第二俸，应外转。由此与吏部相持不下。

吏部与吏科方案的核心分歧在于陈治则的内升属性，吏部将其视作三十五年的正升名额，吏科则将其视作三十四年的闰升名额。相较而言，吏科方案比吏部方案多了一名内升员额，这一方案也得到了利益相关者刑科都给事中萧近高的支持。萧近高“转言铨司力求外补”，吏部侍郎杨时乔表示“查萧近高年月资序虽不宜补外”，但还是决定听其外补，“一以成其克让之美，一以全此并转之局”。^③三十五年的年例纷争最终以吏科方案为结局，此次纷争中吏部对吏科自拟方案、侵夺部权的做法非常不满，但最终还是按照吏科的方案拟定年例人选。其中刑科都给事中萧近高配合吏科方案的谦让态度，起着重要作用。这是作为衙门的六科对于吏部的一次胜利。

表 1 邵庶等人年例推升方案及实情表

姓名	入都科时间	科属	吏部方案	吏科方案	实际出科
邵庶	三十三年复除	礼科	三十四年内升	三十四年内（正）升	三十六年内升
陈治则	三十四年一月	吏科	三十五年内升	三十四年内（闰）升	三十七年拜疏去
梁有年	三十四年一月	刑科	三十四年外升	三十四年外升	三十五年外升
夏子阳	三十四年一月	工科	使琉球还，内（闰）升	同吏部，内（闰）升	三十五年内升
宋一韩	三十四年五月	兵科	三十五年外升	三十五年内升	三十七年拟内升，未果
萧近高	三十五年七月	刑科	三十六年	三十五年外升	三十六年外升
孙善继	三十五年七月	工科	三十六年	暂无	三十七年拜疏去

资料来源：杨时乔：《新刻杨端洁公文集》卷 2《科臣内外升转未定乞允恬让以全旧制以息竞端疏》《申明科臣推转资格仰祈裁定以便遵行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39 册；汤北京：《灵麓阁集》卷 4《支辞易聘成法难移谨据疏理析以守旧章事》，《四库存目丛书补编》第 98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

六科都给事中的年例推升本无明确的制度规定，具体操作也拥有灵活的通融空间，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正是利用这点迫使吏部接受他的方案。其方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以俸为序”而非“以推为序”，尊重原本的资俸顺序；二是吏科都给事中管察闰升，不占用正升名额。然而，在此后都给事中的年例推升中陈治则的方案原则并未被沿用。吏部、吏科根据不同的推升需要，给年例规则以不同的解读与应用。

万历三十七年（1609），因工科都给事中孙善继被劾离职，六科现任都给事中的俸序再次发生变化。俸序第一的孙善继本应内升，其次的礼科都给事中胡忻本应外升，再次的户科都给事中孟成已应当内升，这是旧俸序，也是三十五年吏科坚持的“以俸为序”原则。孙善继离职后的六科都给事中，胡忻序在第一，应当内升，孟成已序在第二，应当外升，这是新俸序，也是三十五年吏部坚持的“以推为序”原则。孟成已以新俸序表示自己应当外转，^④而胡忻以旧俸序表示自己才应外转，认为孟成已是“拘目前之新局，非稽年来之定序也”。^⑤二人都以乞求外转来展现自己的谦让退逊，最终胡忻内升、孟成

① 杨时乔：《新刻杨端洁公文集》卷 2《申明科臣推转资格仰祈裁定以便遵行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39 册，第 670 页。

② 杨时乔：《新刻杨端洁公文集》卷 2《科臣内外升转未定乞允恬让以全旧制以息竞端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39 册，第 672 页。

③ 杨时乔：《新刻杨端洁公文集》卷 2《科臣内外升转未定乞允恬让以全旧制以息竞端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39 册，第 672 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 458，万历三十七年五月癸巳，第 8640-8641 页。

⑤ 胡忻：《欲焚草》卷 3《乞外转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31 册，第 652 页。

已外转。从结果来看,在此次年例之争中,“以推为序”的吏部原则占据上风,“以俸为序”的吏科原则遭到舍弃。

胡忻内升一事中,包括吏科在内的六科,都选择性忽略此前陈治则内升的“以俸为序”原则。万历四十一年(1613),给事中朱一桂上疏攻诋东林,重提此事。在他看来,亲近东林的胡忻依靠同样亲近东林的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藉首垣力”方得内升。但曹于汴表示胡忻内升是遵循“据见任者计俸序迁”^①的衙门旧规,胡忻亦称“职在科,阅七年所,资俸序在第三,循例内转,有何换越?乃朱一桂谓职外转序定、换夺常少,职之当外与否,自有省规,职亦无容辨”。^②胡忻所谓的“序在第三”,是排除孙善继后,序在宋一韩、萧近高之后的“第三”,其实是三十五年“以推为序”的吏部原则。可见,胡忻在内升京堂之后抛弃了最初乞求外升的矫情作态,放弃了“以俸为序”的说法。曹于汴、胡忻都将“以推为序”“见任序迁”视为六科衙门的迁转旧规。由陈治则原则在短短几年内即被遗忘抛弃的遭遇,可知无论是“以推为序”还是“以俸为序”,都不过是为了让更多人内升京堂的说辞,并非明文写定的制度规则。

都给事中的年例推升原则,往往因人、因时、因需而有所不同。这种灵活且实用的解释方式为此后更大的纷争埋下祸根。万历三十五年陈治则内升是吏部与吏科间的方案之争,三十七年是胡忻与孟成已间的谦让之争,到了四十一年,受到此前辛亥京察余波的影响,年例规则的政争发生在河南道御史汤北京与吏部、六科之间,牵涉三衙门,波及半朝堂。此次政争的起因是南京提学御史熊廷弼因事被勘,吏部会同都察院将新任浙江巡按吕图南改推为南京提学,接替熊廷弼。时人怀疑此事牵涉党争,是“台臣用事者恶熊廷弼则驱逐廷弼,喜吕图南则改图南,喜怒惟行其意,用舍独操其权”。^③周永春上疏反对,引发吏部与河南道间的互相攻击。河南道御史汤北京便在奏疏中带出周永春陪推京堂一事,以此攻击吏部“破成例以植私门”。^④

本年吏部推升吏科都给事中翁宪祥为太常寺少卿,以第三俸礼科都给事中周永春陪推,作为下次正推内升的候选人。与此同时,第二俸的工科都给事中周曰庠因曾管城工,应当闰升。按照吏部的方案,翁宪祥、周曰庠、周永春三位都给事中都能内升京堂,迎合了六科内部多多内升的隐秘需求。对此,河南道御史汤北京却有不同意见,他以万历三十五年陈治则管察闰升为据,指出本年内升京堂的吏科都给事中翁宪祥曾管考察,应当作闰内升、不用陪推,亦不计入本年的年例正升之中。在他看来,周曰庠才是本年年例推升的第一俸,应内升,周永春是第二俸,应外升。其理由为:一是陈治则“所言则省中见行事例也,且时乔未常不终用其言”;^⑤二是除了陈治则尚有许多吏科管察闰升无陪的事例,如陈治则之前的项应祥、侯庆远皆“计升无陪”,之后的曹于汴亦曾管计,俸序第一,闰升无陪;三是科道二衙门年例事属一体,俸深御史“凡管计则闰升无陪,不管则正升有陪”,^⑥六科都给事中也应如此。

面对汤北京的诘难,吏部、六科也意识到此前年例推升事例的游移与矛盾。他们一开始还试图将陈治则和翁宪祥两例统合在一个原则之下,称吏科次俸管察闰升,首俸管察正升。^⑦但很快在汤北京所列

① 曹于汴:《为烦言侵诬就事分割仰乞圣断事》,周念祖辑:《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3,《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5册,第309页。

② 胡忻:《为微臣无端被指披沥控冤仰乞圣鉴事》,周念祖辑:《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3,《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5册,第322页。

③ 赵兴邦:《为直陈大臣小臣是非之概以备圣明取裁事》,周念祖辑:《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6,《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5册,第536页。

④ 汤北京:《灵麓阁集》卷4《为科臣饰辨渐离本指冢臣擅柄渐乱成规谨据疏剖析以仰祈圣断事》,《四库存目丛书补编》第98册,第560页。

⑤ 汤北京:《灵麓阁集》卷4《为科臣恃势撒泼尚口横诋谨据疏剖析以终听公评仰祈圣断事》,《四库存目丛书补编》第98册,第565页。

⑥ 汤北京:《灵麓阁集》卷4《为支辞易聘成法难移谨据疏理析以守旧章事》,《四库存目丛书补编》第98册,第562页。

⑦ 赵煥:《为敬陈科臣推转旧格仰祈圣裁以息烦嚣以便遵守事》,周永春辑:《殿争录》卷2,第50a、b页;翁宪祥:《为钦奉圣旨事》,周永春辑:《殿争录》卷3,第69a、b页。

举的项、侯、曹等事例前败下阵来，最终一面视陈治则“以一人介两年间”^①为非法操作，另一面又极力弥缝项、侯、曹等人为特殊背景下的权宜之举。吏科都给事中翁宪祥为此召集六科所有给事中进行会议。在召集手本中，翁宪祥暗示陈治则之例“难据以为准”。随后的各科会议议单中，礼科都给事中周永春、工科左给事中李瑾、户科商周祚、刑科郭尚宾等人都声称陈治则所言不足为法。至于项、侯、曹等人以首俸管计无陪，吏部解释以“想当年无陪必有缘故，说者谓彼时六科不备，出于权宜，亦是变体”，^②周永春一一查考，发现侯、曹二人内升京堂时，都给事中或是已推，或是该外，无人可陪，^③项是第二俸，理当闰升无陪。^④在六科、吏部的阐释下，汤北京所举事例几乎成了人人不同、事事有因的特例。最终翁宪祥也不得不承认吏科都给事中内升京堂无论是正升有陪还是闰升无陪，实际上是事例不一、灵活可变的。

在吏科都给事中翁宪祥回复神宗的奏疏中，明确指出都给事中年例规则不载典章、灵活可变的惯例特征：“夫六科掌印升转规则，自来若有定而又常无定，非朝夕故也。……故吏科掌印，皆照旧转内，其余一内一外，单论俸次，相间而行，实无题准明例可据。此外各项升迁事宜，查典故诸书，皆所不载。……但见故事相沿，口说递传，以至今日。故有常规，又有变局。……大抵衙门中事，常规、变局，原自参差。……若在臣等衙门通前彻后查考，则旧事、近例，本由两持。倘遽欲专伸一说，是又辩驳之媒而聚讼之隙矣。……况科中事体，只因自向不深讲求，未有定规，每滋口语，烦渎圣听。”^⑤六科都给事中一内一外、挨次间升的年例惯例是“故事相沿”，因此实际推升中“有常规，又有变局”，若专主一说，必有与之相悖的事例。陈治则之争、汤北京之难，都是“欲专伸一说”，才招致舆论纷争。翁宪祥请求神宗下旨令六科会议出都给事中升转的一定之规，可以“永杜纷纭”。最终，经六科会议、神宗同意，都给事中迁转废除了一内一外、挨次间升的年例惯例，比照年深御史“多优以京秩”，^⑥彻底实现此前陈治则、胡忻等人多升京堂的隐秘愿望。

纵观万历三十五年、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几次年例纷争，皆因规则模糊不清而起，终因规则被废而消失不再。几次纷争的不同方案，其实是各个吏科都给事中增加内升、灵活解释的结果。吏科都给事中挟六科衙门官员的集体舆论威力，回击吏部、河南道等衙门的异议。吏部面对吏科的强势介入，从执持不下到勉强接受，最终共同应对外议。可以看到，年例规则解释权由吏部主导到吏科介入，再由吏科到六科舆论，逐步下移：吏部对科道年例的议拟权逐渐减弱，而六科对本衙门年例的解释权、话语权却愈来愈强。年例的主导权已潜移默化至科道等衙门中。

三、年例议拟权的分散与下移

在年例人选的政争中，朝堂舆论质疑神宗留用钱、姚等人的决定。在年例规则的政争中，吏科凭藉六科公论的加持，回击吏部、河南道的质疑。年例人选的纷议发生在决策阶段，而规则的相关政争则提早至拟议阶段。政争的发生时间逐步提前，年例议拟权也在政争中分散下移至科道二衙门。

科道二衙门参与年例推升的议拟过程，与公论兴起、吏部势弱有关。万历前中叶朝堂公论的兴起，建立在吏部独立强势而内阁退逊避让的基础上。吏部与朝堂公论的结合，很快引起神宗的注意。万历二十六年（1598），神宗借张位被劾一事发泄他对吏部此前专权结党的不满。本年四月神宗连发三旨，要求甄别吏部司官，并命令此后吏部司官由部院会推、皇帝钦点。此次甄别的27名司官中，仅5

①《吏科移各科会议手本》，周永春辑：《殿争录》卷4，第31a页。

②《吏部推转都给事揭》，周永春辑：《殿争录》卷3，第22a页。

③周永春：《为台臣疏词甚遁谨平心纠正以付公论事》，周永春辑：《殿争录》卷5，第73a-75a页。

④项应祥应为闰升，是经孙居相指出的（孙居相：《两台疏草》，《论科臣内推成例疏》，《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2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周永春查考《掖垣人鉴》，改称项应祥以次俸管计，闰升无陪（周永春：《为台臣支词强辩情计甚窘谨再一折正以听圣裁事》，周永春辑：《殿争录》卷6，第26a-29a页）。

⑤翁宪祥：《详述掌印科臣迁转缘由仰祈圣鉴并乞敕下会同各科从长酌议务求归一以便遵守永杜争端事》，周永春辑：《殿争录》卷4，第22b-23a、25a、26b、27b页。

⑥翁宪祥：《为钦奉圣旨事》，周永春辑：《殿争录》卷5，第71b页。

人留用，其他人或是调任，或是褫职，吏部司官因之“一网几尽”。会推钦点之制削弱了吏部对本部司官人选的拟用权。神宗此举，是对吏部人事、部权的全方位打击。^①经此打击，吏部的机构性权威遭到削弱，科道二衙门有了介入年例推升的机会。

据曾任吏部司官的顾宪成回忆：“大僚会推，夫固谓从来已远，非创也。因而滥觞于铨属，俾各衙门俱得而越主之，则自丁酉始耳。又因而滥觞于年例，俾两衙门俱得而预参之，则自己亥始耳。”^②所谓“大僚会推”“滥觞于铨属”，指的是万历二十六年吏部司官会推钦点之制。“丁酉”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应是顾宪成记忆偶误。科道年例“俾两衙门俱得而预参之”，科道二衙门参与年例的议拟过程，始自“己亥”，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吏部司官会推钦点之制推出后仅仅一年。顾宪成的年份记忆是否准确姑置不论，但这一变化出现在二十六年吏部部权遭到打击之后，确是符合常理、有迹可循的。万历三十六年御史史事表示“掌科道者得闻年例，亦自近年始”，^③可见此例尚新。在此前一年吏科陈治则的年例政争中，吏部侍郎杨时乔是这样描述年例的推升程序：“臣以旧例遇推升科臣，系文选司行文吏科，查资俸履历前来。凡左右各给事中年例，则会同酌议而行。至都给事中，则凡内外补，皆本部照序拟疏，未有该科径自拟正拟闰者；即有之，亦须会同酌议，初非本部所能泥者。”^④杨时乔称此吏科与闻之例为“旧例”，可知此例已推行有年。顾宪成所述“会推”“预参”之法，应是左右给事中年例由吏部、吏科“会同酌议而行”。都给事中仍由吏部根据俸序拟定，即便吏科有不同意见，也要和吏部“会同酌议”。如刑科都给事中杨应文按照俸序本应外补，但屡推年例又屡次留中，最终在万历三十二年由“吏科会同文选司会议”，以边功闰升京堂。可以推测，科道二衙门与闻年例，大概率出现于万历二十七至三十一年间。明末孙承泽回顾年例之制，称“内外升，原径从部定，移取非例也”。^⑤所谓“移取”，即杨时乔所述“文选司行文吏科，查资俸履历前来”。年例从“部定”到“移取”，是吏部部权削弱背景下科道二衙门参与年例议拟过程的重要表现。

年例议拟吏部主持、科道参与的“会同酌议”之法，在万历三十六年经过圣旨承认，成为正式定制。经过三十五年吏科陈治则的年例之争，三十六年吏部侍郎杨时乔以“吏科无，河南道会未取到”^⑥为由，消极应对。对此，朝堂上出现两种声音：一是建议吏部不必移取，更不必会议；二是坚持科道二衙门应当与闻年例。最终，神宗下旨“年例系祖宗旧制，所宜遵行。以后院科官着从公议拟协赞，其斟酌主持自是你部职掌，不得侵越”，^⑦在制度层面承认科道二衙门与闻年例的权力，并确定吏部主持、科道议拟的各自职责。此后，科道二衙门在年例人选上的话语权日渐增加。万历三十七年都给事中胡忻内升京堂，便被怀疑是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的作用。

相较于六科都给事中年例规则游移不定，俸深御史皆得内升，故而少有纷争。但在万历三十六年圣旨颁布后，河南道御史汤兆京为年例议拟权，再次与吏部发生冲突。万历四十一年吏部曾就本年的御史年例咨询左都御史孙玮，孙玮一心求去，表示“决不敢与闻”。^⑧于是吏部径自推升两名御史作为年例外转的人选。对此，河南道御史汤兆京以“臣衙门不与闻”愤起相争。在他看来，“御史年例之升，俱由臣衙门裁定，以闻之吏部，而再加酌量”，^⑨年例人选要经过都察院“裁定”。汤兆京还以万历三十六年

① 参见余璐：《明中后期吏部司官分省与官僚政治》，《历史研究》2022年第6期。

② 顾宪成：《顾端文公集》卷3《上孙太宰立亭先生书》，《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844册，第51页。

③ 史事：《年例议论纷纭恳乞圣明定为画一以昭公典事》，董其昌辑：《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类卷3，《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70册，第111页。

④ 杨时乔：《新刻杨端洁公文集》卷2《申明科臣推转资格仰祈裁定以便遵行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9册，第670-671页。

⑤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4，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52页。

⑥ 史事：《年例议论纷纭恳乞圣明定为画一以昭公典事》，董其昌辑：《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类卷3，《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70册，第110页。

⑦ 周永春辑：《丝纶录》卷1，《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74册，第570页。

⑧ 赵煥：《为职掌甚明强争愈伏乞声明裁定以便遵守事》，周永春辑：《殿争录》卷3，第60b页。

⑨ 汤兆京：《灵麓阁集》卷4《为科臣饰辩渐离本指冢臣擅柄渐乱成规谨据疏剖析以仰祈圣断事》，《四库存目丛书补编》第98册，第560页。

“议拟协赞”的圣旨为证，不过他所引用的圣旨“院科官”误作“部院科道”，被周永春攻击为擅改圣旨。为了证明拥有年例议拟权的不仅仅有都察院，还包括河南道，汤兆京多方举证，如吏科与河南道作为首科、首道的政治地位，“见行事例，每遇大事，吏科与河南道并行也”；^①再如万历三十五年杨时乔所说“吏科无，河南道会未取到”一语，表示年例一事“吏部不可不知会河南道”。^②

吏部尚书赵焕对此发难，坚持年例不必听取科道二衙门意见的“旧制”。他一面表示河南道御史职权过重，若年例令都察院与闻，则都察院“未有不闻于河南道者也”，^③若御史年例的人选开送自河南道，那么吏部尚书就只是“河南道御史承行之吏耳”。^④另一面又解释自己征询孙玮的意见是因为信任孙玮的人品识鉴，“非谓年例必当请教也”。赵焕声称自己从御史到金都御史、吏部侍郎，“目击年例无虑二三十次，其举事惟文选郎中与尚书知之，即侍郎亦不闻也”。^⑤赵焕于万历初年任御史，万历十三年（1585）至十四年间任金都御史，万历十五年至十七年任吏部侍郎，均在“移取”“会议”出现之前。很显然，赵焕基于自身经历的认知，在三十六年明旨面前毫无说服力。最终，此事以左都御史孙玮、吏部尚书赵焕双双乞休，汤兆京亦拜疏而去为结局。

万历四十一年河南道的年例议拟权之争，反映了三十六年议拟协赞之旨下权力分散、互相扯皮的混乱局面。河南道御史汤兆京敢于争取年例议拟权，吏部尚书赵焕也时刻担心都察院“既闻，未有不闻于河南道者也”，说明这一时期河南道的实权地位，并非大臣上司所能约束管制。在话语强势的科道小官与权威受到挑战的尚书大臣间，神宗更倾向于维护大臣。他曾两次下旨慰留赵焕，称“年例主持系吏部职掌，河南道岂得与闻”，^⑥“年例推转，乃卿职掌”，^⑦明确表示年例的主导权属于吏部，河南道御史并没有与闻年例的权力。

此后，伴随朝堂政争由机构间的权力之争转变为特定人群间的意见之争，吏部重又掌握年例的主导权。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十三年科道年例，吏部拟定人选，吏科、都察院均未与闻。四十三年春季年例后，吏科都给事中李瑾以三十六年“议拟协赞”圣旨和四十一年不再挨次内外的新例为据，反对吏部不与吏科会议就外升兵科都给事中张国儒。^⑧至四十三年秋季年例，吏科、都察院依旧不得与闻，而朝堂上反对声音愈发寥寥，“吏科韩光裕、御史徐养量稍言之，然势孤，竟不能争也”。^⑨这一时期，党争愈演愈烈，得势者把控朝局和重要衙门的话语权，失势者全然丧失影响力，因此“势孤，竟不能争”。由此视角向前追溯，万历四十一年年例主导权之争的关键，并非河南道议拟权的制度之争，而是御史汤兆京议拟权的人事之争。赵焕全然否定河南道乃至都察院与闻年例的议拟权，根本原因是他对汤兆京个人的偏见与不满。

天启年间，东林、阉党递相执政，党争的需要压过一切。党争得势者往往通过吏部控制年例、打击政敌。在这一时期的年例推升中，吏部占据主导权，科道二衙门的影响减弱。天启四年（1624），吏部尚书赵南星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孙玮在御史年例上发生争执，^⑩最终吏部占据上风。阉党执政之初，熹

① 汤兆京：《河南道御史汤揭》，周永春辑：《殿争录》卷5，第17b页。

② 汤兆京：《灵麓阁集》卷4《为臣疏疏旨原据外传邸报谨将原报揭送吏科以备公同查核恳乞圣明一体裁断事》，《四库存目丛书补编》第98册，第576页。

③ 赵焕：《为官爵可罢职掌难隳谨据例再陈仰祈圣明裁定事》，周永春辑：《殿争录》卷4，第11b页。

④ 赵焕：《为袁旼不谙成规按柄有罪乞赐亟斥以重台纲事》，周永春辑：《殿争录》卷2，第40a页。

⑤ 赵焕：《为职掌甚明强争愈力伏乞声明裁定以便遵守事》，周永春辑：《殿争录》卷3，第60a页。

⑥ 《明神宗实录》卷510，万历四十一年七月丁丑，第9661页。

⑦ 《明神宗实录》卷512，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庚辰，第9684页。

⑧ 《万历大政类编》，万历四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4册，第518-519页。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29，万历四十三年二月辛卯，第9956页。文选郎中胡来朝则宣称“例推之日过瑾寓问可用之人，瑾不肯吐”。参见胡来朝：《科转原系酌升参驳是否公论》，《吾征录》中，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第18a页。

⑨ 《明史》卷330《郑继之传》，《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29册，第666页。

⑩ 黄尊素：《黄忠端公集·说略》卷6，《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5册，第79-80页。

宗圣旨便规定“例转科道，都察院不得与闻”，^① 否决万历三十六年圣旨，为吏部收揽权柄。当时人描述科道年例，是“逆珰为政，吏部承行”。^② 自万历末年反东林阵营执政以来，吏部逐渐丧失其部权独立性，沦为各党争的工具。这一时期它在科道年例上的绝对主导权，并不来自其机构权力，而是借重于激烈党争中胜出的得势者。

崇祯年间，党争稍歇，东林重掌政权，科道二衙门迅速恢复年例议拟权，对吏部构成制衡。崇祯三年（1630），吏部尚书王永光因与吏科都给事中陈良训议论年例意见不合，便将其处以年例外转，舆论哄然不平。文震孟上疏称年例会推等大事，“吏部不自主，必会同吏科、河南道”，^③ 声明首科首道的议拟权。此后，科道二衙门对年例人选的话语权不断增加。如兵科给事中凌义渠因受吏科都给事中的衔恨，被处以年例外转。^④ 明末人李清回忆“旧例，六垣例转，皆听吏科都为政，五科都唯唯而已，左右散以下皆不得闻”。^⑤

随着党争的白热化，公论成为各方势力竞相争取标榜的资源与工具。朝堂公论、六科公论在年例推升中的影响愈发显著，甚至被视作年例人选的重要参照标准。万历四十三年都给事中张国儒年例外转时，反对吏部的吏科都给事中李瑾诉诸“酌升内外”“议拟协赞”的圣旨明例，而文选郎中胡来朝以及支持吏部的孙光裕则诉诸公论，表示“所当辨者，年例之人”，“酌升其不得比于序升”，“舍有议之人而不言，非议拟之公，舍有议之人而别用，亦非主持之正”。^⑥ 在当时公论即众论、众论即党论的党争背景下，作为舆论工具与话语依据的公论，究竟有多大程度代表公意，难免令人心生疑惑。

崇祯年间，公论更深地参与到年例人选的产生过程中。崇祯八九年（1635—1636）间，兵科左给事中宋权被年例外转，他在疏中提及年例人选需由六科公议产生，“年例旧规，虽主自吏部，而送自吏垣，且参之六垣之公议，无敢私者”，^⑦ 联系李清所说“吏科都为政，五科都唯唯而已”，可知六科公议是六科都给事中的公同会议。虽然实际操作中吏科占据主导，五科都给事中发表同意意见，但六科公议已成为年例人选产生的必要环节。至崇祯十六年（1643），文选郎中吴昌时主持年例多推数人，引发朝堂纷议。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上疏抗辩，称年例之柄“虽自选司出，而考核生平、裁酌人地，必与垣省长共计，采合盈廷公乡可否，求无诬谬”。^⑧ 此时是明亡前夕，吏部在与吏科、河南道商议的同时，还需要采纳“盈廷公乡可否”，即朝堂上的公论与乡评，方能确定人选。可见至明末，不仅年例人选的议拟权由吏部与科道二衙门共同分有，而且朝堂公论、六科公论也已成为年例推升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总之，年例议拟权的不断分散与下移，是晚明年例政争的总体趋势。这一趋势始于吏部机构性权威的失落，因科道二衙门介入、党争波及而不断加强，最终伴随朝堂公论的发展壮大而成定局。万历末年及天启年间党争激烈，年例议拟主导权一度重归吏部，这种出于党争需要的“集权”策略，并不能有效提振吏部的机构性权威。随后的崇祯年间，年例议拟权再次分散为吏部与科道共同分有、互相制衡的状态，甚至公论也成为年例推升过程的一个必备环节。

四、结论

明末朝堂中，科道年例的相关政争频繁发生且牵涉广泛。伴随这些政争的，是年例主导权的分散与下移。以皇权、部院为主体的政治机构越来越难以凝聚共识，而以意见是非为内容的朝堂公论日益高涨，成为官僚群体竞相利用的舆论工具。这一局面充分反映明末人心犹存而政权解体、不同于其他朝代的政

① 《记政录·甲乙记政录》，天启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6册，第584页。

② 许誉卿：《三垣疏稿》卷2《论劾之冤宜雪等事疏》，《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页。

③ 文秉：《烈皇小识》卷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54页。

④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11《凌忠清传》，《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0册，第595页。

⑤ 李清：《三垣笔记·笔记中·崇祯》，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0页。

⑥ 孙光裕：《潇湘先生廉善堂集》卷3《谨申清议疏》，《明别集丛刊》第5辑第7册，第247页；胡来朝：《科转原系酌升参驳是否公论》《例转原合明旨都垣强执序升》，《吾征录》中，第17b、18b页。

⑦ 宋权：《文康公遗集》卷下《纠冢臣第三疏》，《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17册，第35页。

⑧ 吴蕃昌：《先忠节公（吴麟征）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1册，第148页。

治困局，也说明非正式惯例之于晚明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晚明年例主导权分散与下移的一面，是皇权、部院政治权威的失落。在万历三十年代钱梦皋、钟兆斗、姚文蔚年例留用的政争中，神宗对年例结果的最终决定权遭到朝堂公论的挑战。而在万历三十五年、四十一年六科都给事中年例规则的政争中，吏部的年例议拟权也遭到吏科和河南道的强势介入。晚明年例主导权分散与下移的另一面，则是朝堂公论、六科公论的势盛。万历中前期，朝堂公论逐渐成长为可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钱、钟、姚三人年例留用而最终颠仆，足见公论的强势话语权。而在都给事中年例规则的相关政争中，六科公论不仅冲击着吏部的阐释权，也是挨次内外这一迁转规则是存是废的最终决定者。至万历末年，党争得势者更是以“公论”为标准，评判年例人选的当升与否。至此，所谓的舆论，亦即明人口中的“公论”，虽不一定是“公正无私”的，但一定是“公共”或“公众”的。^①崇祯年间，人们认为年例人选由首科、首道与吏部会议产生，但也一定要“采合盈廷公乡可否”。即此可见，此时的舆论已具有以下挟上、将诉求正当化的能力，是影响年例人选的一极重要力量。

神宗对吏部的打压，吏部的有意戢敛，都给了科道二衙门参与年例、激起政争以可乘之隙。皇权、部院失去由上而下的行政一致性，是明末政权解体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朝堂“公论”、六科“公论”逐渐壮大，成为官僚群体表达诉求、进行政治斗争的舆论工具。官僚群体的诉求和欲望，都能通过“公论”施加影响，他们的意愿亦藉“公论”得以伸张。这是在封建忠君思想、社会风气之外，明亡之际人心犹存的政治性原因。

造成万历朝年例政争频繁发生的因素，除了公论日渐强势的朝堂局势，尚有年例制度本身不载典章、灵活可变的惯例特性。学界此前即已留意到党争中的制度因素，但缺乏系统研究。^②都给事中年例挨次内外是一项逐渐形成、长期沿用的惯例，并没有如何挨次的具体规定，这就给了六科灵活解释的机会和空间。六科在争取年例多多内升的过程中，逐渐掌握本衙门年例人选孰内孰外的议拟权，与吏部的年例主导权形成冲突。最终，挨次内外的年例规则虽然被废，但影响年例最终人选的主导权，分散在吏部、科、道等三衙门乃至朝堂舆论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年例规则的不定以及对年例规则解释权的争夺，是年例政争屡屡发生的主要原因。

晚明的朝堂政治中，类似年例的非正式惯例尚有很多，如阁臣廷推、点正不点陪，都是被时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定制”乃至“祖制”。这些惯例虽没有典章制度上的依据，但是在长期沿用中得到文官群体的共同支持，从而具有一定的舆论正当性。这种制度上“非正式性”与公论中“正当性”具有既相悖又共存的双重特征，反映了晚明皇权主导下朝堂政治与文官集体意志间的结构性冲突。晚明时人如李应昇曾指出当时的朝堂上“人各以意为法，而法不法，即守不守”，郭正域亦指出朝堂政争其实是“各执其意，各束于例”，于是“如市如讼矣”。^③科道年例的相关政争最能体现这一点，皇帝、各衙门机构对于惯例的态度和理解各有不同，朝堂纷争即由此发生。而这些惯例所引发的朝堂政争以及伴随政争而来的权力关系变化，又更进一步地影响并塑造着晚明政局。

责任编辑：杨向艳

^① 关于“公”这一概念的丰富含义及历史演变，可参见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刘泽华等：《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关于万历中叶东林与公论的关系可参见马子木：《晚明言路政策的调整与言路秩序的再造》，《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② 如余劲东指出，万历中后期的官员往往利用京察制度中“法无禁止”的制度空隙，以实现自身的诉求，从而引发朝政混乱。再如黄友灏通过考察阁臣廷推的“定制化”过程，指出这一过程“改变了明中后期皇帝、内阁、吏部与科道的权力关系，是影响当时政治局势的重要制度因素”。参见余劲东：《制度规定与行政运作——以明万历辛亥京察为例》，《明清论丛》第16辑；黄友灏：《明万历朝阁臣廷推的定制化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

^③ 李应昇：《落落斋遗集》卷2《遵旨再行申饬以一法守以肃台纲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0册，第61页；郭正域：《合并黄离草》卷18《邹吏部奏疏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册，第84页。

从《大言赋》《小言赋》看先唐诙谐文学传统

刘跃进

【摘要】《古文苑》卷二所收《大言赋》《小言赋》，开创了中国先唐诙谐文学传统。先唐诙谐文学在古代文体分类上归属于“杂文”或“杂赋”，诙谐文学又可以具体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表达自己难言的隐忧，如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等；二是通过文字宣泄表现文学的娱乐功能，如《大言赋》《小言赋》等。魏晋时期的《头责子羽文》便以诙谐语言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人情冷暖，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而北朝时期的诙谐文学则主要是文字游戏。这种娱乐文学是否全无价值，也不可一概而论。从这类作品看，中国文学除了言志、缘情、叙事传统外，还有一种娱乐功能，为历代文人所喜好。充分挖掘这些文学特质，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意蕴和独特风貌。

【关键词】宋玉 大言赋 小言赋 诙谐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5)01-0162-09

一、先唐诙谐文学之祖

《大言赋》《小言赋》并见《古文苑》卷二，描写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等人相互攀比，《大言赋》比谁的大话说得好；《小言赋》反之，看谁能把事物说得越小越好。先看《大言赋》：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戮一世，流血冲天，车不可以厉。”至唐勒，曰：“壮士愤兮绝天维，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锯牙云，唏甚大，吐舌万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饮枯河海；跋越九州，无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长。据地跼天，迫不得仰”。^①

楚襄王用利剑作比喻，杀戮一世，流血冲天；唐勒用共工怒触不周山为例，天塌地陷；景差形容皋陶大笑，口水淹没天地。而宋玉的夸张比喻则迎合君王的心意，吞并四海，跨越九州，俯仰宇宙之间。结果，如《小言赋》开篇所说：“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然而楚襄王并不满足，认为“此赋（《大言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小大备。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道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然则上坐者未足明赏，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于是，诸位弄臣又争先恐后极言万物之小者：

景差曰：“载氛埃兮乘剽尘，体轻蚊翼，形微蚤鳞，聿遑浮踊，凌云纵身。经由针孔，出入罗巾，

作者简介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河南 开封，475001）。

①〔战国〕宋玉：《大言赋》，〔宋〕章樵注：《古文苑》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7页。下引《大言赋》《小言赋》及章樵注，并见此版。

飘妙翩绵，乍见乍泯。”唐勒曰：“析飞糠以为舆，剖粃糟以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巢蚋蛄以顾盼，附蟻蠓而遨游。宁隐微以无准，原存亡而不忧。”又曰：“馆於蝇须，宴於毫端；烹虱脰，切虬肝；会九族而同啖，犹委余而不殫。”宋玉曰：“无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无象，言之无名。蒙蒙灭景，昧昧遗形。超于太虚之域，出于未兆之庭。纤于蠹末之微蔑，陋于茸毛之方生。视之则眇眇，望之则冥冥。离朱为之叹闷，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为精？”王曰：“善。”赐以云梦之田。

景差形容其小，小如微尘，轻如蝇翼；唐勒夸张其小，可以用米粒作车船，在蚊子的眼眶上筑巢，在蝇须上休息，在须尖上吃饭，即便九族人来聚，也绰绰有余。而宋玉索性抛开所有的拘束，形容“微物潜生”，比之无象，言之无名，肉眼无法看到，神明不能察情，小之又小，无影无形。

在《大言赋》题下，章樵注曰：“楚之诸臣，当君危国削之际，不知诚惧，方且虚词以相角，诙谐以希赏，亦可悲矣。”章樵对这两篇作品的政治价值是持否定意见的，但他指出这两篇作品的诙谐特色，还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大言赋》《小言赋》乃先唐诙谐文学之祖。

两篇小赋并见《古文苑》，真伪殊难判断，问题涉及《古文苑》的年代。《通志》著录：“《古文苑》十卷。”《郡斋读书志》所附录《读书附志》：“右《古文苑》，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龕中得唐人所藏文章一编，莫知谁氏录也，皆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自石鼓文而下，曰赋，曰诗，曰歌，曰曲，曰敕，曰书，曰对，曰颂，曰箴，曰铭，曰赞，曰记，曰碑，曰杂文，皆周、秦、汉人之作也。《容斋随笔》尝引之，然讹舛谬缺，不敢是正。淳熙中韩元吉之记已言之。”^①《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五有著录，并题解云：“《古文苑》九卷，不知何人集。皆汉以来遗文、史传及《文选》所无者。世传孙洙巨源于佛寺经龕中得之，唐人所藏也。韩无咎类次为九卷，刻之婺州。《中兴书目》有孔道《文苑》，非此书。孔道晋人。本书百卷，惟存十九卷尔。又梁孝王忘忧馆诸士之赋，据题尚欠《文鹿》《酒》《几》三赋，家有《秦汉遗文》七赋，皆在常州，有板木。”^②所收自东周迄于南齐八十五位文人的264篇作品，虽不见于史传、《文选》，但所录汉魏诗文似多据《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删节的本子。如开卷第一篇《石鼓文》，即与今本相近。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它不可能是唐代著作，而是南宋时期的作品。再根据《木兰诗》《诅楚文》《峰山刻石文》的辑录以及宋元时期的著录文献，可以推断该书应当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之间，编者很可能是金石学家王厚之，他依据孙洙《杂文章》而编，并托名孙洙，^③所采辑的文章应当是北宋以前的人所作，其中不少可能是魏晋六朝时期的作品，如后世颇多争议的《木兰诗》就赖此书得以保存。由此来看，该书在保存上古、中古文学史料方面确有值得重视的价值。原因很简单，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专集能流传至今的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大部分都以单篇散见于类书或选集中，到明代才有人辑成专集。

南宋淳熙六年（1179）婺州刻《古文苑》九卷，应是最早的刻本。韩元吉有文记述其事：“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编。莫知谁氏录也，皆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为九卷，可类观。”落款是“淳熙六年六月颍川韩元吉记”。^④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章樵注释韩元吉九卷本，重编为二十一卷，更为流行。我主编的《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收录了宋端平三年（1236）常州军刻、淳佑七年（1247）盛如杞重修本《古文苑》二十卷末一卷，也比较珍贵。卷首有绍定壬辰（1232）章樵《古文苑序》，次同年吴

①[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14页。

②[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8页。

③参见王晓鹏：《孙洙年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编：《长安学术》第9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16年。作者另有《〈古文苑〉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④[宋]章樵注：《古文苑》二十一卷，清道光二十四年守山阁丛书本卷首。

渊《注古文苑后序》，次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序、《古文苑目录》。卷一是文，如《石鼓文》《诅楚文》等；卷二至卷七是赋，卷八至卷九是诗歌，卷十至卷二十是杂文；卷二十一为附录，收入十几篇残缺不全的文章。文体共有二十类，其中赋、诗、箴三类所收篇数较多，其余各类则很少，有些类如敕、启、状、述、记等只收一篇文章。卷末有嘉熙丁酉（1237）江师心跋，次淳佑丁未（1247）盛如杞跋。章樵的注释，根据唐宋类书所引，补遗刊误，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有些地方颇有问题。《四库全书总目》评此书云：“樵序称有首尾残阙者，姑从旧编。复取史册所遗，以补其数，厘为二十卷。又有杂赋十四首、颂三首，以其文多不全，别为一卷，附于书末，共为二十一卷，则已非经彙之旧本矣。中间王融二诗题为谢朓，盖因附见朓集而误。又《文木赋》出《西京杂记》，乃吴均所为，见段成式《酉阳杂俎》，亦不能辨别，则编录未为精核。至于《柏梁》一诗，顾炎武《日知录》据所注姓名，驳其依托。钱曾《读书敏求记》谓旧本但称官位。自樵增注，妄以其人实之，因启后人之疑。又如宋玉《钓赋》，‘蜎渊’误作‘元洲’；曹夫人书，‘官绵’误作‘官锦’，皆传写之讹，而注复详为之解。王应麟《困学纪闻》亦辨之。则注释亦不能无失。然唐以前散佚之文，间赖是书以传，故前人多著于录，亦过而存之之意与？”^① 尽管如此，章樵确实也做了很多文献整理工作，包括增加篇目、编订目次，考订作者篇名及写作背景，并注音释义，校订版本异同，还在典章制度、名物地理等方面，辑录资料，略有疏证，极便阅读。譬如关于《大言赋》和《小言赋》，章樵的注释就比较详明。章樵本问世后，屡经翻刻，越到后来错漏越多。清乾隆中钱熙祚用韩元吉九卷本校勘一次，又遍检类书，查对出处，分篇注明。除本文舛误没有他书可以核校者以外，其余都一一加以补正，成《校勘记》一卷，附所刻《守山阁丛书》本《古文苑》之后。

基于上述认知，《古文苑》即便是北宋人伪编，其价值亦如此前类书一样，具有校勘和辑佚的作用。据此，署名宋玉的《大言赋》和《小言赋》可以视为先唐文学作品，应无问题。

二、先唐诙谐文学的文体归属

诙谐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先秦史传、诸子书以及诗文中记载了大量的诙谐故事。司马迁选择淳于髡、优孟、优旃等历史人物“游心骇耳”之言行，在《史记》中专辟《滑稽列传》，为他们立传，并表达出一种欣赏的态度。司马迁说：“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所谓“解纷”，就是通过巧妙的诙谐故事，解决疑难问题，化解矛盾，平息是非，这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譬如《史记》记载的“优孟哭马”就是典型一例：“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啖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槨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致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槨，枿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优孟曰：‘请为王以六畜葬之。以垄灶为槨，铜历为棺，赍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久闻也。”^②

从口头到文字，从历史到现实，诙谐文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种文学，当然离不开言志缘情，但也不一定受此框束。从现存作品看，先唐诙谐文学大致有两类：表达自己难言的隐忧，或者表达自己内心的欢乐。前者以东方朔《答客难》为代表，而后者则以《大言赋》《小言赋》为代表。两类作品，在古代文体分类上多归为“杂文”“杂赋”一类。

《文选》中收录的东方朔《答客难》，以主客问答方式联结成篇，抒发其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苦闷。不过，东方朔的表达与众不同，他不是直截了当地宣泄自己的情绪，而是通过调侃的语气来表达

^① [宋]章樵注：《古文苑》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2册，第573-574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00页。

自己的感受，读罢会让读者含泪微笑，五味杂陈。后来文人迭相效仿，如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蔡邕的《释悔》、郭璞的《客傲》，以至韩愈的《进学解》等，都可以说是《答客难》的拟作，可见这篇赋影响之大。《文心雕龙》把东方朔的《答客难》归在“杂文”类，是表达不遇之感的作品。

至于像《大言赋》《小言赋》这类作品，多是应酬之作，在文字表达上争强好胜，取悦于人。在文体归类上，也多归于“杂文”类，只是内容比较庞杂。譬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杂赋”类有《隐书》十八篇，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刘向《别录》说：“《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论。”《文心雕龙·谐谑》篇说：“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刘勰引用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史记·滑稽列传》中第一位淳于髡，第二个例子是楚襄王宴集，宋玉等人奉和。这些例子，“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谐即皆意，这样的作品可以给人带来欢乐，未必都有讽谏之意。而“谑者，隐也。遯辞以隐意，谑譬以指事”。我在《道教在六朝的流传与江南民歌隐语》中谈到，《玉台新咏》卷十开篇《古绝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就是一道隐语诗。《乐府古题要录》认为：“山重山为出，言夫不在也。刀头有环，问夫何时当还也。破镜飞上天，月半当还也。”严羽《沧浪诗话》也称：“此僻辞隐语也。”在诗歌中运用这种双关隐语，在东晋南朝以前实属罕见，而到了东晋南朝以后就已经非常习见，而且到了几乎用滥的程度。历来的研究者都认为这是运用谐音的手法来抒写相思之情，如“芙蓉”谐“夫容”、“藕”谐“偶”、“莲”谐“怜”、“怀丝”谐“怀思”等。^①

其实，扩而言之，类似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还可以举出许多。不只是诗文，就连碑文亦复如此。如《古逸丛书》影旧钞卷子本《雕玉集》引《语林》记载，曹操和杨修读《曹娥碑》，“背上别有八字，其辞云‘黄绢幼妇，外孙荪白’”，杨修解释为“绝妙好辞”。《周易参同契》《越绝书》等书，都将自己的名字隐括其中，叫读者猜想。《古文苑》卷八收录孔融《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也是这样的作品。这首诗两句一组，二十二句，相拆成文，离合而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这种文字游戏，后来多有模仿者。《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杂文部”在孔融《离合诗》后又有西晋潘岳，刘宋何长瑜、刘宋孝武帝刘骏、刘宋谢惠连、谢灵运，南齐石道慧、王融，梁代萧绎、萧巡，陈代沈炯等离合诗。

由此生发开去，又有所谓回文诗、建除诗、六甲诗、十二属诗、六府诗、五杂组诗、四气诗、四色诗、谜字诗、数字诗、地名诗、药名诗、姓名诗、鸟名诗、歌曲名诗、宫殿名诗、车名诗、船名诗、树名诗、草名诗、八音诗之类的游戏诗，多见于上引《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杂文部”。如刘宋鲍照的《数名诗》：“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坐，组帐扬春风。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九族咸瞻迟，宾友仰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官一朝通。”^②《李白集》也有《三五七言诗》：“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白居易有《一字至七字诗》：“诗，绮美，瑰奇。明月夜，落花时。能助欢笑，亦伤别离。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宋代吴文英词《唐多令·惜别》“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也属于这类作品。中国古典诗歌，很多情况下盛行于日常生活之中，歌舞宴席之上，酒酣耳热之余。从思想内容上说，这类作品可能无足称道，但就诗歌的情趣而言，也确实有一定意思。诗歌创作，固然应当与社会人生保持密切联系，但也不妨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情趣。诚如《文心雕龙·谐谑》所说，“文辞之有谐谑，譬九流之有小说乎？”由此看来，中国文学有言志、缘情的传统，也特别重视文学的娱乐功能。

三、《头责子羽文》：一篇嘻戏之作

西晋初年，张敏《头责子羽文》就是这样一篇嘻戏之作。《世说新语·排调》仅引用了其中的

^① 刘跃进：《道教在六朝的流传与江南民歌隐语》，《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②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08页。下引《艺文类聚》，并见此版。

几句话：“《头责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颺、颍川荀寓、范阳张华、士卿刘许、义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饕吃无官商，或赧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欢哗少智谔，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齏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文章描写温颺、荀寓、张华、刘许、邹湛和郑诩等六人登朝后，志得意满，而对于“身处陋巷，屡沽而无善价”的朋友秦生却漠视不理。秦生是张敏的姊夫，见此情形，愤而写下《头责子羽文》，对上述六人冷嘲热讽，颇为辛辣。《世说新语·排调》仅仅引用了上述片段。《头责子羽文》全篇见《张敏集》，刘孝标注据以引录。该文又见《艺文类聚》卷十七，文字略有出入，当来自同一源头。先读其文：

余友有秦生者，虽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时好呢，有太原温长仁颺、颍川荀景伯寓、范阳张茂先华、士卿刘文生许、南阳邹润甫湛、河南郑思渊诩，数年之中继踵登朝。而此贤身处陋巷，屡沽而无善价，亢志自若，终不衰堕，为之慨然。又怪诸贤既已在位，曾无伐木嚶鸣之声，甚违王贡弹冠之义。故因秦生容貌之盛，为头责之文以戏之，并以嘲六子焉。虽似谐谑，实有兴也。其文曰：

维泰始元年，头责子羽曰：“吾托子为头，万有余日矣。大块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为子植发肤、置鼻耳、安眉须、插牙齿，眸子摘光，双颧隆起。每至出入之间，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踈蹠。或称君侯，或言将军，捧手倾侧，伫立崎岖。如此者，故我形之足伟也。子冠冕不戴，金银不佩，钗以当笄，帻以代帽，旨味弗尝，食粟茹菜，隈摧园间，粪壤汙黑，岁莫年过，曾不自悔。子厌我于形容，我贱子乎意态。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视子如仇，居常不乐，两者俱忧，何其鄙哉！子欲为人宝也，则当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义王家，永见封殖。子欲为名高也，则当如许由、子臧、卞随、务光，洗耳逃禄，千岁流芳。子欲为游说也，则当如陈轸、蒯通、陆生、邓公，转祸为福，令辞从容。子欲为进趣也，则当如贾生之求试，终军之请使，砥砺锋颖，以干王事。子欲为恬淡也，则当如老聃之守一，庄周之自逸，廓然离欲，志陵云日。欲为隐遁也，则当如荣期之带索，渔父之澹澹，栖迟神丘，垂饵巨壑。此一介之所以显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块然穷贱，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观子之志，退不为于处士，进无望于三事，而徒玩日劳形，习为常人之所喜，不亦过乎！”于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对曰：“凡所教敕，谨闻命矣。以受性拘系，不闲礼义，设以天幸，为子所寄。今欲使吾为忠也，即当如伍胥、屈平。欲使吾为信也，则当杀身以成名。欲使吾为介节邪，则当赴水火以全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头曰：“子所谓天刑地网，刚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则褰裳赴流。吾欲告尔以养性，诲尔以优游，而与虬虱同情，不听我谋，悲哉！俱寓人体，而独为子头！且拟人其伦，喻子侪偶。子不如太原温颺、颍川荀寓、范阳张华、士卿刘许、南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饕吃无官商，或赧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欢哗少智谔，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齏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夫舐痔得车，沈渊得珠，岂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烂，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为权图，譬犹凿池抱瓮，难以求富。嗟乎子羽！何异槛中之熊，深窞之虎，石间饥蟹，窠中之鼠。事力虽勤，见功甚苦。宜其拳局翦蹙，至老无所希也。支离其形，犹能不困，非命也夫！岂与夫子同处也。”^①

第一段为序言，作者张敏交待写作背景：温颺、荀寓、张华、刘许、邹湛和郑诩均为新朝高官或当朝名士。按，太原温颺，字长仁。贾充得势时，着意攀附，与庾纯、张华、向秀、和峤、任恺、杨珧、王恂、华廙等为贾氏所亲近。《晋书·任恺传》说，当时“朋党纷然”，欲专名势。颍川荀寓，字景伯。刘孝标注引《荀氏谱》曰：“字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又引《世语》曰：“寓少与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晋，至尚书。”范阳张华，字茂先，为当时文坛领袖人物。上郡刘

^① 徐震堦：《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19-421页。

许，字文生。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曰：“刘许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骠骑将军。许，惠帝时为宗正卿。”刘许与张华同为范阳人，故曰士卿，互其辞也。宗正卿，或曰士卿。南阳邹湛，字润甫；河南郑冲，字思渊。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曰：“湛字润甫，新野人。以文义达，仕至侍中。郑冲字思渊，荥阳开封人，为卫尉卿。祖泰，扬州刺史。父褒，司空。”上述六人，凭借他们的名望和权力，只要顺水推舟，就有足够的能力接济或者帮助处于困顿境地的秦子羽。可是他们做什么了呢？从作品看，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维泰始元年”以下为正文，是以秦子羽头颅的口吻向子羽发难。泰始元年（265），为晋武帝代魏称帝时的年号。子羽，即序言中所说的“秦生”，姓秦名子羽，是作者张敏的姐夫。张敏假托秦子羽的头颅，代表五官问责秦子羽说：“吾托子为头，万有余日矣。”以此推算，秦子羽当时三十余岁。五官都端正，别人尊敬有加，“或称君侯，或言将军，奉手倾侧，伫立崎岖”，说明外形“足伟”。可是秦子羽本人呢，既无冠冕，也无金银，“旨味弗尝，食粟茹菜，隈摧园间，粪壤汗黑”，难道不后悔吗？长此以往，“譬犹凿池抱瓮，难以求富”，“何异槛中之熊，深穿之虎，石间饥蟹，窠中之鼠。事力虽勤，见功甚苦”。子羽身边熟悉的那些大人物呢？或长袖善舞如张华，或如含胶饴如邹湛，没有谁肯出面提携：“曾无伐木嘤鸣之声，甚违王贡弹冠之义。”不仅如此，文章还讽刺他们“或饕吃无宫商，或赍陋希言语……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夫舐痔得车，沈渊得珠，岂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烂，手足沾濡哉？”面对如此责难，子羽说，即便如此，又能怎样？五官离不开头脑，如果“支离其形，犹能不困，非命也夫！岂与夫子同处也”，最后也只能认命。文章的构思非常巧妙。秦生的头颅从“人宝”“名高”“游说”“进趣”“恬淡”“隐遁”等方面责问秦生一无所是。文章的主旨近似于任昉的《广绝交论》，不过，任昉锋芒毕露，而此文则诙谐有趣。

与此相类，西晋鲁褒《钱神论》、南齐孔稚圭《北山移文》，皆属诙谐之文。王运熙《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指出，对于这类文字，不宜过度解读。^①

四、诙谐：北朝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一般人看来，诙谐往往流于鄙俗，两者的界限不是很分明。《魏书·胡叟传》记载说，胡叟“好属文，既善为典雅之词，又工为鄙俗之句”。^②可见，这类作品在北朝亦不在少数。譬如北魏名臣成淹之子成霄，就常有这类创作，并驰名当时。《魏书·成淹传》附传：“霄，字景鸾。亦学涉，好为文咏，但词彩不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闾巷浅识，颂讽成群，乃至大行于世。”^③在当时，这类作品自有其市场。

颜之推来自江南，他认为，做学问有高低之别，写文章也有巧拙之分。他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说：“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詖痴符。”然后，他以并州“一士族”为例，说明没有自知之明的无奈：“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詖擎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酺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④这里说到的士族，恐怕就是成霄及其好友姜质这样的人。姜质，天水人。史称“志性疏诞，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其《庭山赋》描写张伦住宅的豪华，见《洛阳伽蓝记》卷二“正始寺”条：

夫偏重者，爱昔先民之由朴由纯，然则纯朴之体，与造化而梁津。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无为以明心，托自然以图志。辄以山水为富，不以章甫为贵。任性浮沉，若淡兮无味。今司农张氏，

^① 王运熙：《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1-66页。

^② [北齐]魏收：《魏书·胡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49页。

^③ [北齐]魏收：《魏书·成淹传》附传，第1755页。

^④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7页。

实踵其人，巨量焕于物表，夭矫洞达其真，青松未胜其洁，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新。既不专流宕，又不偏华尚，卜居动静之间，不以山水为忘，庭起半丘半壑，听以目达心想。进不入声荣，退不为隐放。尔乃决石通泉，拔岭岩前，斜与危云等并，旁与曲栋相连。下天津之高雾，纳沧海之远烟，纤列之状一如古，崩剥之势似千年。若乃绝岭悬坡，蹭蹬蹉跎，泉水纤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复危多。五寻百拔，十步千过，则知巫山弗及，未审蓬莱如何。其中烟花露草，或倾或倒，霜干风枝，半耸半垂，玉叶金茎，散满阶坪。然目之绮，裂鼻之馨，既共阳春等茂，复与白雪齐清。或言神明之骨，阴阳之精，天地未觉生此，异人焉识其名？羽徒纷泊，色杂苍黄，绿头紫颊，好翠连芳，白鹄生于异县，丹足出自他乡。皆远来以臻此，藉水木以翱翔。不忆春于沙漠，遂忘秋于高阳。非斯人之感至，何候鸟之迷方？岂下俗之所务，实神怪之异趣。能造者其必诗，敢往者无不赋。或就饶风之地，或入多云之处。□菊岭与梅岑，随春秋之所悟。远为神仙所赏，近为朝士所知，求解脱于服佩，预参次于山陲。子英游鱼于玉质，王乔系鹄于松枝，方丈不足以妙□，咏歌此处态多奇。嗣宗闻之动魄，叔夜听此惊魂。恨不能钻地一出，醉此山门。别有王孙公子，逊遁容仪，思山念水，命驾相随，逢岑爱曲，值石陵欹。庭为仁智之田，故能种此石山。森罗兮草木，长育兮风烟。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卧兮于其侧，春夏兮共游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兮何所忆？^①

《河南志》“秘书监郑道昭宅”条也记载了姜质的这篇作品，题名《庭山赋》。^②从现存作品看，似乎未见所谓鄙俗浅识。文中形容张伦其人：“巨量焕于物表，夭矫洞达其真，青松未胜其洁，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新。”巨量，渊懿之量。夭矫，自得之貌。形容其住宅：“下天津之高雾，纳沧海之远烟，纤列之状一如古，崩剥之势似千年。若乃绝岭悬坡，蹭蹬蹉跎，泉水纤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复危多。五寻百拔，十步千过，则知巫山弗及，未审蓬莱如何”云云，还是很有气势的。《管锥编·全后魏文》论此赋，评价不高，认为“质赋甚拙，惟‘庭起半丘半壑，听以目达心想’，‘五寻百拔，十步迂过’，数语差为迥出。其余多粗笨可笑，如‘能造者其必诗，敢往者无不赋’，‘嗣宗闻之动魄，叔夜听此惊魂。恨不能钻地一出，醉此山门’。至若‘泉水纤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复危多’，下句只缀字未安，上句以‘浪峭’形容泉水之‘纤徐’，命意欠通矣”。^③

《初学记》卷二十九、《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卷九十五以及《太平御览》卷八八九至卷九一三的“兽部”多这类文字。南方如袁淑编有《俳谐集》，收录《孙山公九锡文》（写驴）、《大兰王九锡文》（写猪）、《驴山公九锡文》（写驴），北方如贾岱著有《大狗赋》（写狗），卢元明著有《剧鼠赋》（写鼠）。《剧鼠赋》见《初学记》卷二十九兽部“鼠”类：

跖实排虚，巢居穴处，惟饮噬于山泽，悉潜决于林御。故寝庙有处，茂草别所，矧乃微虫，乖群异侶，干纪而进，于情难许。《尔雅》所载，厥类多种。详其容质，并不足重。或处野而隔阴山，或同穴而邻蟠冢，或饮河以求饱腹，或噙烟而游森耸。然今者之所论，出于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为可贱。毛骨莫充于玩赏，脂肉不登于俎膳。故淮南轻举，遂呕肠而莫追；东阿体拘，徒称仙而被遣。其为状也，惛憒咀吁，睢离睽睢，须似麦穗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类槐叶初生，尾若酒杯馀沥。乃有老者，羸骸疥癩，偏多奸计，众中无敌。托社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闭，巧能推觅。或寻绳而下，或自地高踰。登机缘柜，荡扉动帘。切切终朝，轰轰竟夕。是以诗人为辞，实云其硕。盗干汤之珍俎，倾留髡之香泽，伤绣领之斜制，毁罗衣之重裘。曹舒由是献规，张汤为之被谪。亦有闲居之士，倦游之客，绝庆吊以养真素，屏左右而寻《诗》《易》。庭院肃清，房枕虚寂，尔乃群鼠乘间，东西擗擗，或床上捋髭，或户间出额，貌甚舒暇，情无畏惕。又领其党与，

① [北魏] 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90-94页。

② [清] 徐松辑：《河南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4页。

③ 钱锺书：《管锥编》（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2008年，第2331页。

欣欣奕奕，敬覆箱奩，腾践茵席，共相侮慢，特无宜适。嗟天壤之含弘，产此物其何益。^①

按《魏书·卢玄传》附传，元明，字幼章，范阳涿人，“涉历群书，兼有文义，风采闲润，进退可观。永安初，长兼尚书令、临淮王彧钦爱之。及彧开府，引为兼属，仍领部曲。出帝登阼，以郎任行礼，封城阳县子，迁中书侍郎。”^②《隋书·经籍志》著录《卢元明集》十七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六卷。《管锥编·全后魏文》论此赋，乃游戏之作，“不求典雅，直摹物色，戛戛工于造语。《先唐文》卷一朱彦时《黑儿赋》、刘思真《丑妇赋》颇堪连类，惜其不全”。^③

钱锺书提到的朱彦时《黑儿赋》，最早收录在《初学记》卷十九“人部”：“世有非常人，实惟彼玄士。禀兹至缁色，内外皆相似。卧如骊牛驱，立如乌牛跼，忿如鸚鹄斗，乐似鸬鹚喜。”这篇作品原本很长，编者按曰：“词汎不具载。”题目曰赋，实则诗。在当时，诗赋的界限常常混淆。与此相类似，《初学记》卷十九“人部”所载刘思真《丑妇赋》，也是一首诙谐的五言诗：

人皆得令室，我命独何咎。不遇姜任德，正值丑恶妇。才质陋且俭，姿容剧嫫母。

鹿头猕猴面，椎额复出口。折额厌楼鼻，两眼幽如臼。肤如老桑皮，耳如侧两手。

头如研米槌，发如掘扫帚。恶观丑仪容，不媚如铺首。暗钝拙梳髻，刻画又更丑。

妆颊如狗舐，额上独偏厚。朱唇如踏血，画眉如鼠负。傅粉堆颐下，面中不遍有。

领如盐豉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长有垢。脚靴可容箸，熟视令人呕。

《初学记》卷二十九、《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太平御览》卷八九九引《馼牛赋》《吊驴文》都是这类鄙俗文字。如《初学记》引臧彦《馼牛赋》：“乃有超群独出，駢毛文角，玷班凝白，鲜纤娟曲。”《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馼牛赋》，作者臧道颜，文字稍多：“若乃豪宗戚胤，公侯王后，乘轻御肥，貂蝉耀首。翟翟华翟，铄铄云母。良特擢足于双岛，名駸叠迹于左右。如贵游踊跃于绝伦，观者嗤妍其好丑。遂慕骏馼以相高，精彼奇选之希有。仪体既美，特资高足。名参飞兔，价齐驥驎。”《太平御览》卷八九九引作臧彦《馼牛赋》，又有数字不同于上引：“殊相允备，名不虚假。伟质魁梧，骨奇形雅。竦若惊鹿，馼若奔马。”^④又如《初学记》卷二十九引臧道颜《吊驴文》：“夫徵祥契于有感，景行表于事迹。故铨才授任，必求之卓越；考能核用，亦存乎望实。以貌定名，则称谓而擢；声色位号，则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驰驱，体质强直，禀性沉雅，聪敏宽详，高音远畅，真驴氏之名驹也。”

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写作风尚。《洛阳伽蓝记》卷二“秦太上君寺”条记载所谓“怀砖之义”曰：“太傅李延寔者，庄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临去奉辞。帝谓寔曰：‘怀砖之俗，世号难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寔答曰：‘臣年迫桑榆，气同朝露，人间稍远，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闲退，陛下渭阳兴念，宠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锦万里，谨奉明敕，不敢失坠。’时黄门侍郎杨宽在帝侧，不晓怀砖之义，私问舍人温子升。子升曰：‘吾闻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问其宾客从至青州者云：齐土之民，风俗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怀砖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还家，以砖击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师谣语曰：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怀砖之义起在于此也。’颍川荀济，风流名士，高鉴妙识，独出当世。清河崔叔仁称齐士大夫，曰：‘齐人外矫仁义，内怀鄙吝；轻同羽毛，利等锥刀。好驰虚誉，阿附成名，威势所在，侧肩竞入，求其荣利，甜然浓泗。譬于四方，慕势最甚。’号齐士子为慕势诸郎。临淄官徒布在京邑，闻怀砖慕势，咸共耻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为意。问其故，孝忠曰：‘营丘风俗，太公余化，稷下儒林，礼义所出。今虽凌迟，足为天下楷模。荀济人非许郭，不识东家，虽复莠言自口，未宜荣辱也。’”^⑤

①[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20页。下引《初学记》，并见此版。

②[北齐]魏收：《魏书·卢玄传》附传，第1060页。

③钱锺书：《管锥编》（四），第2322页。

④[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992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第84页。

可见当时这类世俗之说，多出市井传言，实为偶然，硕学之士并不知其所以然，故流传之言，亦成为所谓“今典”，不易索解，诚如前引颜之推所言，“拙文研思，终归蚩鄙”，终不为世家大族所认可。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二十引高昂《杂诗》三首：“豕子地握槊，星宿天围碁。开瓮瓮张口，卷席床剥皮。”“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歌壁亚肚，河冻水生皮。”蒋一葵在引这三首诗时说：“高敖曹（高昂字敖曹）酷好为诗，尝作《杂诗》三首，云：……使人往往传以为笑。”^①所以引发人们嘲笑，因为基本是大白话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又辑录了高昂的另外三首诗，也是这类作品。如《征行诗》（《太平广记》二百引《谈薮》）：“垄种千口牛，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又《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太平广记》二百引《谈薮》）：“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回首绝望便萧条，悲来雪涕还自抑。”这首诗，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未选，理由是“后二句不振，故不选”，而我恰认为最后二句颇有唐人风味。又《赠弟季式诗》（《太平广记》二百引《谈薮》）：“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②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十一评此诗：“健异不恒。‘走马’二句尤异。大较是不称意，而翻羨外郡也。”^③按：季氏，高昂弟。公元532年三月，高欢率三万军队，在韩陵山（今河南安阳东北）大败尔朱光二十万军队。四月，高欢前部至洛阳河桥，尽杀尔朱氏党羽，立平阳王修为帝，是为孝武皇帝，改元太昌元年，史称出帝。七月，高欢入晋阳，尔朱兆北走。^④高昂有《赠弟季式诗》即作于这个时期。高季氏时为济州刺史。《八代谈薮》又载：“北齐高祖尝宴群臣，酒酣，各令歌，武卫斛律丰乐歌曰：‘朝亦饮酒醉，暮以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帝曰：‘丰乐不谄，是好人也。’斛律丰乐时年为武卫将军。”^⑤这些诗歌，大约就是武夫的创作。对此，王士禛《阮亭选古诗·五言诗凡例》评价较高，他说：“北朝魏、齐之间，颜介最为高唱。高敖曹短章，不减斛律金。二君可敌南朝沈庆之、曹景宗。”^⑥北魏道武帝太平真君九年（448），寇谦之卒，《广弘明集》载甄鸾《笑道论》引《化胡歌》七首，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有《尹喜哀叹》五首、《太上皇老君哀歌》七首、《老君十六变词》，对寇谦之多有讽刺。可见，不仅世俗多此类诙谐文字，方外亦然。这也是北朝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旧唐书·中宗纪》载，神龙元年“九月壬午，亲祀明堂，大赦天下。禁《化胡经》及婚娶之家父母亡停丧成礼”。^⑦似乎唐代以后，对这类鄙俗文字有所制约，但诙谐文学依然广为流传，不仅敦煌石室中保存了大量的这类诙谐作品，如王梵志诗歌、敦煌变文以及数量不菲的敦煌文章等，就是唐宋古文大家也多染指此类创作（如韩愈《毛颖传》）。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时论已多，不再赘述。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明]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32页。按：这组诗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似乎失收。

②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57-2258页。

③ [清] 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048页。

④ 北齐温子升《韩陵山寺碑》记载了这次战役的盛况，但不及《北齐书·神武纪》详细：“高季式以七骑追奔，度野马岗，与兆遇。高昂望之不见，哭曰：‘丧吾弟矣！’夜久，季式还，血满袖。”（[唐]李百药：《北齐书·神武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页）《史通·模拟》曰：“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夫不言夺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4页）由此看，这段传神描写，或本王劭《齐志》。

⑤ [隋] 阳芥撰，黄大宏校笺：《八代诗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0页。

⑥ [清] 王士禛：《阮亭选古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42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195页。

⑦ [后晋] 刘昫等：《旧唐书·中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0页。

汤姆斯英译《花笺记》及其“世界文学”意义生成

陈恩维

[摘要] 1824 年, 汤姆斯将广东木鱼书《花笺记》首次译为英文。他将原作的文体由木鱼书调整为西方人所熟悉的叙事诗, 题材由才子佳人小说调整为英国流行的求爱小说 (Courtship Novel), 并对其中的景物描写进行了浪漫主义重构, 使之大体符合当时英国文学的审美标准。经由汤姆斯的翻译操控, 《花笺记》成功跨越文化边界进入了新的文化场域, 不仅影响了歌德“世界文学”观念与创作模式的形成, 而且在嗣后的多语种翻译中不断经历意义增殖和文本旅行, 最终成为一部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经典。

[关键词] 汤姆斯 《花笺记》 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 I057; I1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5) 01-0171-08

广东木鱼书《花笺记》于明末成书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 清康熙初年经广东秀才钟戴苍评点, 尊为“第八才子书”, 其文学地位有所上升。1824 年, 服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的印刷工汤姆斯 (Peter Perring Thoms, 1781—1855), 首次将其英译为《中国求爱诗》(*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① 并于伦敦出版。汤姆斯并无深厚的中、英文学素养, 但其译本不仅引起了西方评论家的广泛关注, 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多语种译本。作为一部地方性文学作品, 《花笺记》何以能够借助翻译一跃而成为为数不多的走出国门的“世界文学”作品? 当前, 学界主要从语言转换入手对其译本进行翻译水平的评估, 鲜少注意到其翻译策略与 19 世纪英国文学的内在联系。本文不揣浅陋, 欲进一步分析汤姆斯在翻译过程中所进行的诸多文化调适策略, 阐释《花笺记》世界性意义的生成过程与原因, 从而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与传播提供历史镜鉴。

一、文体调整: 从木鱼书到叙事诗

木鱼书, 又名木鱼歌, 其得名一说是因说唱时用竹板敲击伴奏如敲木鱼; 一说是因其内容多警世良言、故事, 与唐僧敲木鱼念经、劝人为善相同。作为一种口头艺术, 木鱼书本无唱本, 全凭盲人口头说唱, 后来才发展出可供阅读的唱本。木鱼书《花笺记》既带有鲜明的口头传唱特征, 也可以用于案头阅读。那么, 汤姆斯是如何将其介绍并翻译给英国读者的呢?

首先, 汤姆斯选择性地将其当作单纯的诗歌读本来处理。汤姆斯注意到了“《西厢记》和《花笺记》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指出, 《西厢记》作为戏曲作品, 有人物对白, 可以出现轮唱、合唱等形式, 每个诗节有固定的曲牌和套数, 曲牌内部的韵律相对自由; 而“《花笺记》是用粤语创作的口语体诗歌……它的形式是这样的: 每四行构成一个诗节, 每行七言; 但是《花笺记》给我们提供了多种押韵方式的样

作者简介 陈恩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 广州 510420)。

① Peter Perring Thoms, *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 London: Published by Parbury, Allen, and Kingsbury, China: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24. 以下凡出自本书的引文, 均只随文标注出处页码, 不再另注。

本。这些不同的押韵方式，可能通过一段中字数的不同而被读者注意到。”（Preface, VII）可见，汤姆斯是从读者的角度理解木鱼书的口语特征和诗体形式。此外，他所说的“一段中字数的不同”，并非指“不同的押韵方式”，而是指木鱼书中的衬字现象。衬字并非为了押韵，而是为了使原本字数有限的诗句便于口语传述和抒发感情。因此，木鱼书虽然采取了诗体形式，但用字、平仄和押韵规则相对格律诗更自由，其效果重在“听”而非“看”。汤姆斯虽然对《花笺记》的说唱文学性质有所了解，但在翻译时选择性忽略了其唱本特点，只是将其当作一个诗歌读本来处理。原因在于，“中国人的诗歌在此之前几乎无人问津。……所以我在此尝试把一部 18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文学作品《花笺记》译成英语，以改变这种现状。”（Preface, I）

其次，汤姆斯译本通过中、英诗歌的比较，来呈现中国诗歌的形式与声律特征。他具体介绍了中国诗歌的格律：“中国诗歌由多个诗节组成，每个诗节有四个或八个诗句，每句为五言或者七言，而且隔行押韵。在五言诗或七言诗中，还存在着隔字押韵的规律：也就是如果诗句中第二个字是平声，第三个字一定为仄声，其中仄声包括上、去、入三种形式；第四个字为平声，这和同一句中的第二个字一样。这种隔字押韵的规律在整首诗中通行，这样第一句和第三句中字与字之间的押韵规律相同，第二句和第四句中字与字之间的押韵规律相同。”（Preface, VIII）其实，他介绍的是中国诗歌的平仄而非押韵。汤姆斯还将中文诗歌的平仄与英语诗歌中的抑扬格进行比较：“孔子所编纂的《诗经》中的诗（odes）通常篇幅较短，一行四言，类似于我们诗歌中的抑扬格（iambic verse）；其中一些诗也有超出四言达到五言的情况，这些中国式的诗句类似我们的对偶句（couplets）。”（Preface, IV）事实上，英文诗歌中讲究轻重音的抑扬格与汉诗中调谐音调的平仄并不是一回事。汤姆斯还介绍了中文诗歌的对仗。他指出：“在有八个诗句的律诗中，为了使之隔行押韵，中国人通常让诗的四个中间句保持意义和形式上的高度一致。”（Preface, IX）中国律诗的对仗对于诗句的内容与音韵形式有明确而严格的要求；英诗中也有对偶，但有的内容上相对、形式上不相对，有的形式上相对、内容上不相对，形式和内容兼而有之的对偶并不多见，所以以英诗对偶对译汉诗对仗的难度非常大。从翻译实践看，汤姆斯虽然在标题中指出《花笺记》是韵文，又以行行对译的方式再现中国诗歌形式，但并没有采取韵译的方式来对译原文。汤姆斯的中、英文学修养不深厚，难以对译出中国诗歌的声韵特点，因此他所采取的办法是明智的；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汤姆斯对中国诗歌声律特点的比较说明和简化处理虽然不很准确，但可以一定程度地帮助人们理解中国诗歌的特点。

再次，汤姆斯译本借助对意象、隐喻和暗示的注释，来传达中国诗歌的审美韵味。汤姆斯在译者序中引用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一段有关中国诗歌的评论：“中国诗歌之美与对其理解的困难产生于几乎同样的原因——也就是中国诗歌对意象、隐喻和暗示的运用，以及有时在诗中出现的个体化的表述。”（Preface, XI）鉴于此，汤姆斯借助注释加强了对诗歌意象、隐喻和暗示的翻译，并点明一些独特含义。如点明布谷鸟是“春天的使者”（P15）、鸳鸯是“一对忠诚的鸟，……它们被认为是象征夫妻的忠诚，因为他们在一方死后不再成双成对”（P4）。“采莲船”意象“是一个‘诗意的暗示’”（P15）。对于“天上碧桃休望思”一句，译者加注释指出：“这是一个比喻。据说，王母娘娘在西天种了一棵桃树，能结美丽的康乃馨颜色的果实。”（P23）以上对意象、隐喻和暗示的注释，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中文诗句的含义，但却没有准确传达出中国诗歌的言外之意与韵外之致。雷慕莎指出：汤姆斯先生的译本，几乎都替换了原文中的隐喻表达方式。事实上，这种做法破坏了许多段落的诗意色彩，但如果想让大家都能理解，就只能这样做。译者若能成功理解它们，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他想将这些知识传达给他的读者，就只能通过长篇的注释。^①

最后，汤姆斯借用“叙事诗”的体例，来帮助西方读者理解《花笺记》的歌体小说特征。他认为

^① Abel-Rémusat, “Hua-Tsian: 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 *Journal des savans*, Feb 1826, pp.67-68.

《花笺记》的内容与“史诗”接近，但是其中“缺少罗马诗人和希腊诗人作品中所特有的美，没有任何类似于上帝或者女神的奢华夸张的东西”，所以最后以“叙事诗”来理解《花笺记》的文体：“《花笺记》属于叙事诗，像大多数中国诗歌一样篇幅是可以任意长度的。叙事诗的体例，使中国诗人可以在其中尽情地发挥而不是沉湎在平庸的文字推敲之中。”他还注意到“《花笺记》整个故事的线索并没有因为形式规定而受到丝毫影响”（Preface, V）。在中国，《花笺记》虽然被称为“歌本小说”，但人们一般不将其看作长篇小说。^① 汤姆斯将《花笺记》视为“叙事诗”，且强调其“可以任意长度”，实际上是将其理解为“诗体小说”（metrical novel）了。“诗体小说”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小说，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常见体裁。与一般叙事诗相比，它们篇幅更长，能描绘人物性格，抒发强烈感情，有完整的情节结构。事实上，汤姆斯《花笺记》译本出版后，英国报刊《东方先驱报》就发现：“作为一种‘诗体小说’，这部作品绝非不屑于进入最熟悉的细节，例如，女士们如何搽胭脂，如何责骂女仆，如何在卧室里聊天，或品茶；当男主人公外出旅行时，我们也会听说他的‘行装’，当他去访问时，会了解到他的宴会和饮品。简而言之，除了没有粗俗或机智之外，《中国求爱诗》，可以说有点像《唐璜》。”^② 《唐璜》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著名诗人拜伦创作的诗体小说，大胆而独创地运用了诗句形式，描写了一系列精彩的场面和片段；而《花笺记》同样以诗句的形式，展现了男女的恋爱与婚姻，出现了诸如花园、庭院等生活场景，涉及科举考试、番兵入侵、皇帝征婚等诸多社会生活，二者在题材、内容和体裁方面，的确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汤姆斯把《花笺记》当作叙事诗来理解，意在引导西方读者认识其“诗歌”和“小说”的双重性质。雷慕莎（Jean P. A. Rémusat, 1788—1832）将这个译本称为“叙事诗”（‘poème narratif’），又称其为“诗体小说”（de roman en vers），^③ 显然是受汤姆斯对《花笺记》的文体裁定的影响。

综上，汤姆斯英译《花笺记》对原作文体进行了选择性调整，突出其诗歌和叙事特征，而有意忽略其唱本性质，这虽然会造成原作韵味的某种流失，但降低了翻译和理解中国诗歌的难度，从而为西方人了解中国诗歌创造了条件。英国《评论月刊》评论指出：“虽然汤姆斯先生的译本确实没有凸显出原作的诗歌价值。但如果注意不到他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忠实且易于理解的译本，对他来说，极为不公。”^④

二、题材参照：从才子佳人小说到求爱小说

汤姆斯《花笺记》译名中的“Courtship”意思是“求爱”，既概括了原作的题材，又标记了译作的文类。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期，英国盛行以男女爱情为主要内容的“求爱小说”（Courtship Novel）。1740年出版的塞缪尔·理查生《帕梅拉》（*Pamela*）是英国第一部求爱小说，以道德满足感作为小说主题，因此其另一个名字为“美德的报偿”（*Virtue Rewarded*）。^⑤ 此后，以浪漫求爱加道德说教为主要特征的求爱小说在英国大为流行。据统计，“求爱小说”是18世纪流行持续时间最长的文类，从1740年直到1820年余波仍在。^⑥ 这一时段的“求爱小说”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1740—1780年间主要强调一种关于“贞洁”的超越性原则（the transcendent principle of chastity），而1780—1820年间则强调一种关于“风俗”的根本而内在的观念（the fundamentally immanent notion of manners）。前者关乎宗教或道德教化下的男女贞洁品德，而后者则指向启蒙时代以降的一种观念：民族的风俗与其民族精神密切相关。^⑦ “求爱小说”由“宗教”向“启蒙”的转变，与英国圣公会大主教珀西（Thomas Percy，

① 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中国文学研究》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31页。

② Chinese Courtship, *The Oriental Herald, and Journal of General Literature*, London: Printed for the Editor, vol.IX, April to June 1826, p.18.

③ Abel-Rémusat, “Hwa-Tsian: 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 *Journal des savans*, Feb 1826, pp.67-68.

④ *The Monthly Review*, London: Printed for Hurst, Robinson, And CO, vol.1, January to April 1826, p.542.

⑤ 朱卫红：《贞洁·美德·报偿——论〈帕梅拉〉的贞洁观》，《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⑥ Franco Moretti, *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 London: Verso, 2005, p.19, p.23.

⑦ Katherine Sobba Green, *The Courtship Novel, 1740-1820: A Feminized Genre*,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1.

1729—1811)的汉学研究有关。1761年,珀西将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职员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的《好逑传》译本修改并以“A Pleasing History”为名在伦敦出版。珀西认为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是一本具有严格道德倾向的书:它宣扬道德,抵制道德腐化”,认为其在英国翻译并出版能一转社会风气:“正当海淫海盗的虚构作品充斥国内的时代,向国人展示一下中国作者在作品中如何恪守礼教和道德,对我们是有益的。”^①珀西对《好逑传》的翻译,还通过注释介绍了中国的诸多领域:如宗教制度、政治制度、饮食风尚、道德礼仪等,甚至还加上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使得这部翻译作品像是一部研究中国风土人情的汉学著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严肃的、尽管有缺陷的、试图翻译和理解中国的尝试,是英国浪漫主义汉学的一个开创性作品”。^②由汤姆斯负责排印的马礼逊《华英字典》(1815—1823)附带的《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一文中提及了帕西英译本《好逑传》,但将书名由“A Pleasing History”误题为“Happy Courtship”,^③显然他是根据对《好逑传》内容和类型的理解来命名的。汤姆斯翻译《花笺记》,将其文类设定为“Courtship”,并试图通过爱情故事来反映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俗,可能是受启于珀西和马礼逊。^④

《花笺记》是一部典型的以青年男女恋爱为题材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英国求爱小说相似,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明末至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注重对“佳话”式浪漫传奇爱情的抒写,以作为对晚明陷入淫滥的艳情小说的反拨;第二阶段是清雍正、乾隆年间,作品反映的生活面有所拓宽,世情方面的描写有所增加,才子佳人由才美型向胆识型发展。《花笺记》虽然成书于第一阶段,但在不断增益的过程中,人物形象和作品主题皆融合了第一、二阶段作品的特点,带有与求爱小说相似的浪漫求爱+道德说教的色彩。它共分五卷。前三卷叙述了吴江才子梁芳洲与杨瑶仙一见钟情,继而通过花笺题诗、花园相会而与瑶仙私定终身,带有《西厢记》偷香窃玉与私期密约的色彩,肯定了才子佳人的合理情欲对传统道德的冲击作用,具有鲜明的浪漫特征;后二卷写梁生不得已接受父亲安排的与刘玉卿的婚姻、赴京赶考、请命出征、历经磨难,最后凯旋,奉旨迎娶瑶仙与玉卿,而瑶仙主动礼让、刘玉卿苦志守节,通过义夫节妇体现了传统忠孝和贞节道德观对情欲的规约,具有明显的古典爱情色彩。总而言之,《花笺记》融合了中国古代爱情小说中浪漫与古典两个基本类型,融“才子佳人与义夫节妇”于一体,反映了明末清初中国人的爱情婚姻观念和广阔的社会生活。

鉴于《花笺记》与英国求爱小说在题材和主题上的相似性,汤姆斯有意识地参照求爱小说的主题模式来塑造人物形象。例如,在遇到梁生之前,杨瑶仙一直严守礼教,曾对碧月表示:“深闺不惹游仙客,有谁能见月中仙。自古流传多少邪风月,败坏纲常播万年。”原文使用了“游仙客”“月中仙”等富有暗示意义的典故,但译文却使用了“secluded”“rambling”“vicious”(P54)等道德针砭色彩明显的词汇,明显是在宣扬道德、抵制腐化。面对亦沧的大胆表白,瑶仙回应说:“婚姻自有高堂在,点该儿女乱开言。礼法所拘难动乱,一由父母二由天。”其译文:“As to affairs relative to marriage, my honored parents being alive; It is unnecessary for their daughter to talk confusedly about it. The usages, through custom that are binding, cannot be dispensed with; In the first place I must obtain the will of my parents, and in the next that of heaven.”(P87)译文既忠实准确地译出了父母与礼法对中国女性爱情婚姻的约束,也反映了译者希望借助家庭和风俗力量来进行道德养成的态度。这样的主题,与早期求爱小说的道德主题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另一方面,瑶仙最终还是被梁生的执着和痴情所感动,突破了原先坚守的礼制规约,私自与梁生立下了花笺誓言。熟悉第二个阶段求爱小说中启蒙主题的西方读者自然心领神会。《花笺记》另一女主

① James Willism, Thomas Percy, *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London: Liz Press, 1761, Preface, pp.1-2.

② Peter J.Kitson, *Forging Romantic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7.

③ Robert Morrison, *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 Containing a Sketch of Chinese Chronology, Geography, Government, Religion & Customs*,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 P.Thoms, 1817, p.120.

④ 姚达兑:《数字人文与世界文学:重释“歌德与世界文学”一案》,《澳门理工学报》2020年第3期。

人公刘玉卿，展现了比杨瑶仙更为传统的道德观。她出场即宣称“贞洁世间人叹羨，贪淫丧德败人伦”，汤姆斯译文自然地将女性的个人贞洁与社会道德人伦联系起来：“那些保持美德的人是受人尊敬的，而淫荡损害了美德，违背社会的纽带。”（P196）在第五十一回，刘玉卿面对父母逼婚，决心以死证名节，汤姆斯译文对原文做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原文“今日死做黄泉客，追郎地府诉因亚。”汤姆斯译作：“我将结束我的生命，去拜访哈迪斯。我什么时候才能在我丈夫的府邸向他吐露心声呢？”（P209）哈迪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冥王，是宙斯与得墨忒耳之女珀耳塞福涅的配偶神。在这里，汤姆斯借用了哈迪斯作为“冥王”和“配偶神”的形象，向西方读者巧妙地传达了刘玉卿从一而终的贞洁观念，暗示了英国求爱小说中“宗教或道德教化下的贞洁观念”。

一位西方书评人在读了汤译《花笺记》后指出：“当人们谈论我们所不甚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事情时，我们感到没有适当的标准来估计他们所描绘的事物的正确性……但是，就爱情而言，情况就不同了。时间和地点对他们没有影响，爱情不受改变的影响。”^①由此可见，汤姆斯将《花笺记》的题材由才子佳人标记为求爱小说，并着力突出两位女性的道德形象，在保留了原作韵味的同时，为英国求爱小说提供了一个“爱情+道德”的东方模板，也为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花笺记》提供了一个参照标准。

三、审美重构：自然意象的浪漫主义建构

在中国文学语境中，人们对《花笺记》的评价主要集中在道德主题、心理刻画、文字之妙和声情效果上，而对其中的自然描写并没有十分留意。但是，在汤姆斯看来：“这部作品充满了对中国花园美景的描写以及关于花的隐喻，能够为喜爱田园诗的读者带来乐趣。”（Preface, VI）在译本中，汤姆斯表现出与中国人迥异的审美趣味，或者说对原作的审美进行了重构。

首先，汤姆斯译本对原作中的意象进行了情感化构建。如原文“对花自叹”（PP89—91）唱段，梁生借对花叹息表达对瑶仙求之不得、缠绵相思之情，既以花喻人（“花娇曾似姐容颜”“花颜恰似姐罗裳”“见花怀念姐容颜”），又以人喻花（“水中摇曳似娇娘”），更以花自况（“眼中流泪似花红”），最后以花之难摘比喻美人难求（“咫尺波涛难入手，扁舟难渡采花郎”），可谓是花人一体。整段文字中还出现了石榴、白莲、木樨、牡丹等众多富有隐喻意味的花朵，让人联想到女主人公的高贵品质。中国文人常常根据树木花草的习性、形态、生长季节等赋予其种种美好寓意，因而花草意象成为一个个不言自明的文化意象。《对花自叹》中的花人互喻，体现的是典型的天人合一的东方式自然审美观。对于汤姆斯来说，是难以将如此复杂的意蕴通过简短诗句传达出来的。因此，他主要通过点明意象的情感功能和象征意味来构建和传达诗意。如原文“花在眼前娇不见，悠悠春恨挂心中”，汤姆斯译为“Though I stand before the flowers, I am unable to see that lovely creature; Alas! I repine at Spring, and regret that my heart is fixed on her.”（P90）译文将“悠悠春恨”具象化为情感强烈的叹息声（Alas），并以“一个美丽可爱的姑娘”（lovely creature）作为“自叹”的对象，以“春恨”将相思具象化。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尔立治（现在一般译为“柯勒律治”）指出，“（意象）只有在受到了一种主导的激情的制约之后；或受到了由这种激情所引起的联想或意象的制约之后”，才能“变成独创性天才的证据”。^②汤姆斯正是在激情的主导下，对原文意象进行了独创性建构。这自然符合英国浪漫主义文学重视激情的审美习惯。

其次，汤姆斯还对原作中的意象进行了跨文化的处境化重构。如他将原文中“借问桃源边处系”中的“桃源”译为“仙女的花园”（the garden of the nymphs, P91）就是一例。“桃源”的字面意义指开满桃花的地方，经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情境化构建后，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作品中“理想世界”的象征。“nymph”通常指古希腊罗马神话中自然幻化的精灵，常以美丽的仙女形象自由地穿梭于山林水泽之间，

^① *The Oriental Herald, and Journal of General Literature*, London: Printed for the Editor, and Sold by all booksellers, vol. IX, April to June 1826, p.17.

^② [英] 柯尔立治：《文学生涯》，《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刘若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77页。

作为西方诗人对“理想爱情”的投射对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汤姆斯以“nymph”指代瑶仙，又用源自西方神话的“精灵飞舞的花园”意象来对译“桃源”，既可以引发西方读者对瑶仙美丽的西方仙女形象的浪漫想象，同时又能帮助他们体会男女主人公求而不得的无奈和悲伤。又如“月中香”意象，本指“月中桂枝”，暗示读书能蟾宫折桂、科场及第。汤姆斯注释道，“月中香”即橄榄枝的芳香，“它使人想起罗马的桂冠，它们为诗人和演说家所追求，在公开比赛中被授予”。（P30）中国的桂花和西方的橄榄枝本不是一回事，西方诗人为宫廷所供养与中国文人的科场及第也并不相同，但是汤姆斯通过意象的重构，实现了跨文化的重构，从而打通了源文本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为其进入英国文化场域创造了条件。

再次，汤姆斯对原作中的园林美景描写进行了浪漫主义的意境审美重构。如原作“棋边相会”描写了男女主角首次邂逅的场景，以梁生的视角带领读者欣赏花园景观，但人物隐身幕后。此处的园林风景，既是男女主人公首次相见的实际场所，也是男女主人公的内心投射，文中的风景、人物、心理浑然一体、天人合一，呈现一种静谧的意境之美。但是，在汤姆斯的译文中，男主人公没有隐身。他先是靠近窗前（approached the window），接着穿过曲栏（perceived a railed path），进入花园（entering the garden），穿过红桥（cross the red bridge）（P14），积极主动地通过自己的体验，去感受和领略自然之美。显然，译者使用了一种动态思维在审视原作中天人合一的自然美景。这与浪漫主义作家坚信“对于启蒙时代哲学家认为是静态的事物应当采用一种动态思维”^①的观念是一致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描写自然时，常常将实际的感官体验和想象中的画面或是关于过去体验的联想结合起来，通过对细微事物的描写，抒发自身情感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彰显自身意志或是映射某种社会现象，自然描写带有强烈的主体性。汤姆斯译文鲜明地体现了上述特征，显然是对原文进行了适应或者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重构。

最后，汤姆斯还对原文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哲学重构。如“主婢看月”中，瑶仙和婢女芸香、碧月赏月，感慨“人生亦似垂丝柳，中年就似立秋天。秋过身衰和叶败，形容枯槁有谁怜”。这一段话用“垂丝柳”来表达时光流逝的哀伤，发出了物是人非之感，对自然和人类的关系进行了感性思考。汤姆斯将碧月之语翻译为：“The western wind, having of late blown for several days, I perceive they are blighted, and are stripped of their blooming hue. I think mankind in general, resemble those delicate willows, For on attaining manhood their autumn commences. When autumn is passed, the human trunk becomes weak and casts its leaves, Who has compassion on it when it appears withered and decayed?”（P78）前三句使用了“I perceive”“I think”两个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句子结构，表达了强烈的思辨色彩；后两句译文将人类和树木置于广阔时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追问，引导读者从自然变化感悟人类社会的变迁，体现了浪漫主义自然观。因此，《东方先驱报》书评人对瑶仙主仆二人“像哲学家一样的说教”表示了赞赏，认为“这些自然的情感融入了所有民族的诗歌中；它们的表达本身就是原创的”。（PP21—22）其实，原文只是表达了一种常见的、中国式天人感应的自然观，但是译文却赋予了其浪漫主义自然观哲学色彩。

综上，汤姆斯译文对《花笺记》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审美重构和再创造。在原作中，无论对自然意象还是风景的描写，诗人常常力求物我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审美统一。但是，在汤姆斯的译文中，主人公通过自己的感官去感受自然，自然是主体之外的存在。受到浪漫主义“人与自然”议题的影响，汤姆斯对原文中的“风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操控与改写，使之符合英国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审美标准。汤姆斯自信那些喜欢田园诗的读者一定会喜爱诗中对中国花园的描写和对花的隐喻，道理就在于此。

四、文本旅行：《花笺记》翻译与“世界文学”生成

汤姆斯坚信，《花笺记》中的爱情题材、贞洁观念、人物形象以及有趣情节可以“让读者关注而别无所求”。（Preface，V-VI）事实上，汤姆斯英译爱情题材的叙事诗《花笺记》，不仅改变了中国诗歌在

^① [法]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邱寅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88页。

西方无人问津的状况，而且引发了《花笺记》在世界范围内的“文本旅行”。

首先，汤姆斯对《花笺记》的首次翻译，使之成功跨越原有的文化与审美场域，为西方读者阅读和接受。汤姆斯一方面“希望在正文和注解中传达出原作的韵味”，从而让读者“大大加深对东方文学的这个独特分枝的认识”，（Preface，Ⅷ）另一方面则是将广东“木鱼书”转换为英国“诗体小说”，将“才子佳人小说”调适为“求爱小说”，在审美上将中国的景物描写重构为浪漫主义自然审美，使之顺利融入英国本土文学。如此一来，汤姆斯英译的《花笺记》既有东方文学的韵味，又有受英国文学“同化”的特征，成为具有源语文化和译入文化的双重特点的“世界文学”作品。但是，《东方先驱报》在评论英国人该如何理解英译《花笺记》时指出：“我们应该彻底理解并正确评价现在在伦敦盛行的观念和模式，而不是以前在孟菲斯或巴比伦盛行的那些观念和模式，或者是目前在伊斯法罕或北京流行的观念和模式。”^①这里所说的“伦敦盛行的观念和模式”，就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的文学标准；而“北京流行的观念和模式”，是指中国固有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审美观念和写作模式。换言之，经由汤姆斯的翻译，《花笺记》进入了英国文化场域，在阅读与流通中获得了文化和审美意义增殖，从而超越自身原有的审美文化意义而具有了某种“世界性”。

如果说汤姆斯的翻译使《花笺记》呈现出“世界文学”的某种特质，那么歌德则是通过阅读和借鉴汤姆斯译本，形成了“世界文学”观念和创作模式。歌德1827年1月29日从德国魏玛图书馆借出了汤译《花笺记》并进行了长达两周的阅读。关于《花笺记》的文体，歌德时而称其为“中国的长篇小说”，^②时而称其为“中国长诗”，^③这明显是受到汤姆斯的影响。关于《花笺记》的主题和审美，歌德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二是“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即外部的自然是始终与人物生活在一起的”。^④这也与汤姆斯对《花笺记》的题材和审美重构有关。不仅如此，歌德还将《花笺记》与法国一流诗人彼埃尔·让·德·贝朗瑞对比，认为“中国诗人的题材完全涉及道德与礼仪，而法国现在的一流诗人的题材却正相反。”不久，歌德还借助汤姆斯的英译本创造性地转译出四首中国诗。^⑤通过阅读和转译《花笺记》中的诗歌，歌德认识到了翻译外国文学的重要性。他认为，译者“以普遍的精神贸易中的中介身份在努力，以促进相互交流为己任。即使有人会说翻译不能完全达意，但它是而且一直会是人间所有事业中最重要、最令人尊敬的业务之一”。^⑥同时，歌德在阅读《花笺记》中领略到了东方文学的魅力，形成了“世界文学”的观念。他指出：“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民族文学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快来临了。”同时也强调：“我们在高度重视外国文学的同时，也不应该拘守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碰到好的文学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⑦1830年，歌德模仿《花笺记》的诗歌创作了一组《中德四季晨昏吟咏》（14首）。德国学者卫礼贤指出：“歌德在这十几首诗里所受《花笺记》的冲动，是很不平静的。他把由那本书里所得的冲动，放在脑海里融化组织过。他接受冲动的态度是活的，不是死的。因为他能够活现这些冲动，深深钻进它的幕后所以他的思想能够和中国的真精神，直接的深深吻合。”^⑧总而言之，歌德通过阅读汤姆斯译本，了解到了中国文学的“可取之处”，逐步突破狭隘的民族文学观念而形成了“世界文学”观念，并尝试探索一个立足民族文学，又汲取“外域文化滋养，创造一种更有生

① *The Oriental Herald, and Journal of General Literature*, London: Printed for the Editor, and Sold by all booksellers, vol. IX, April to June, 1826, p.17.

② [德] 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19-221页。

③ Leslie O'Bell, "Chinese Novels, Scholarly Errors and Goethe's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of the English Goethe Society*, vol.87, no.2, 2018, pp.64-80.

④ [德] 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第219-221页。

⑤ 谭渊：《文学翻译与世界文学——再论歌德笔下的“中国女诗人”》，《外语教育》2009年。

⑥ "Goethe an Carlyle",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20 July 1827, Bd.42, S.270.

⑦ [德] 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第219-221页。

⑧ 薛汕校订：《花笺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第3页。

命力，更适应新的历史生态条件的新文化”^①的“世界文学”创作模式。

再次，汤姆斯英译《花笺记》，引发了后来者对《花笺记》的阅读和翻译兴趣，开启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本旅行。在汤姆斯译本出版之后，《花笺记》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广泛关注，英国多家报刊刊发了书评，著名汉学家雷慕莎则发表了法文书评。不久，《花笺记》相继出现了众多语种的译本。如1836年德国人辜尔兹将其翻译成德文，随后又出现了1865年施莱格尔（G.Schlegel）的荷兰文译本、1867—1868年的湛约翰（John Chalmers）英译本、1868年的包令（John Bowring）英译本、1871年的丹麦文（V.Schmidt）译本、1876年的法文选译本（Leon De Rosny）以及18世纪末的众多越南语《花笺传》译本等。如施莱格尔的荷兰文译本为避免原作的格律形式带来的僵硬风格，采用了西方常见的叙述形式，赞扬男女主人公“并没有在这个故事中寻找绝望的爱、杀人的嫉妒或可怕的遭遇”；^②湛约翰的英译本将难登大雅之堂的粤语木鱼歌改造成英语世界中高雅简练的抑扬格诗篇，为《花笺记》赋予了猎奇、浪漫想象之上更为严肃的文学价值；^③包令译本则以散体形式将原文改写成了一部浪漫主义小说，显现人类性格的相似之处以及气候、教育、文明、法律和宗教习俗对人类性格的改变；1928年，美国作家约瑟夫·刘易斯·弗林奇（Joseph Lewis French）根据汤姆斯《花笺记》英文译本而改译了《花笺大意》，将其改写为对中国贵族男子的礼赞文本。^④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文本旅行，即“文本从一个文化场域被迁移至另一个文化场域，或者从彼时的文化场域转移至此时的文化场域，此后该出发文本被另一种语言形式转化成目的地的通行文本。”^⑤《花笺记》的每次翻译都在跨越国家和语言文化边界，产生意义增殖，最终被认为是对19世纪欧洲作家最有影响的中国小说之一。

最后，《花笺记》西行之旅所获得的意义增殖，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社会对《花笺记》的接受。20世纪初期，郑振铎、柳存仁、陈铨等著名学者在海外图书馆重新“发现”了在国内几乎销声匿迹的《花笺记》，引发学术界对此书的再度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陈汝衡、薛汕分别出版了校订本，20世纪90年代梁培炽出版了广参海外藏本的会校会评本，学界对于《花笺记》的评价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郑振铎在法国读到《花笺记》时评论道：“《花笺记》……专写梁生与杨女的反复相思，仿佛各种言情小说中都没有这里写得那末深刻痛切，那末恳挚动人；在这里，这两个青年的恋爱心理，真被写得很活泼，很细腻。”^⑥陈汝衡则指出：“他们多少都带些感伤气氛，这种太多的感伤主义，可以说是书中的缺点，也可以说是中国型的浪漫主义。”^⑦这样的评价从话语到评价标准，强调了其中的情感描写，已经异于钟戴仓的传统评点，明显受到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显然，《花笺记》从中国走向世界而又回到中国，其审美价值在环球文本旅行中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综上所述，汤姆斯对《花笺记》的翻译，经过了文体协商、主题调适和审美重构，成功跨越文化边界进入了新的文化场域，通过文本旅行经历了审美和意义增殖，从而成为一部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作品。

责任编辑：崔承君

① 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② G. Schlegel, *Hoa tsien ki of Geschiedenis van het gebloemde briefpapier*, Batavia: Lang & Co, 1865, V.

③ 陈庆：《“影响的焦虑”与诗学转向：以湛约翰〈花笺记〉英译本为例》，《外国语文研究》2022年第2期。

④ French J. L, *Lotus and Chrysanthemum: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Poetry*, New York: Horace Liveright, 1928, p.117.

⑤ 胡安江：《文本旅行与翻译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⑥ 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中国文学研究》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32页。

⑦ 薛汕：《书曲散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Main Abstracts

The Dialectics of Historical Space from Abstract Generality to Concrete Universalit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iu Huaiyu 32

One of the philosophical and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the concep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ts roots, however,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German dialectical tradition's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stract and the concrete, as well a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universals and particulars. The philosophical ess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fundamentally a matter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 Yet, it is also an epistemological concern that dialectically captures social reality, that is, a matter of transitioning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As a concept embodying concrete universality, the Chinese path, in the realm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is manifested as the issue of uneven development arising from the leapfrog fus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versal regularities of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diversity of specific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philosophy, it pertains to the concrete totality or the systemic dialectics concerning the contradiction,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s and the whole of the social organism in a simultaneous manner.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forms of civilization, it is about achieving mutual learning among different form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reby ascending to a new level of universality. Running through all of these is the core issue of how to form a vision of the dialectics of historical space in a reflective and purposeful manner, with concrete universality, in the process of subsuming the historical logical stipulations of abstract generality.

Hyle, Qualia and Body

Zhang Haojun and Li Yonghui 48

Husserl's concept of "hyle" has been controversial since it was put forward, and even Husserl himself was not satisfied with it. As an epistemological concept in the phenomenological sense, we cannot find it in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and intuition. In analytic philosophy, another concept similar to it, "qualia", also suffers from similar criticisms. The fate of both of them reveals that the discussion of any "like" experience requires the body intervention in this role. When Gallagher related qualities, qualia and Merleau-Ponty's concept of body, the embryonic form of a new cognitive model of generative phenomenology appeared. This paper continues Gallagher's thinking,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erception model of "quality-body-quali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quality and qualia.

Public Law Approach to Risk Prevention i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 Markets: A Case Study of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

Qin Tianbao and Yao Yuan 67

As a "man-made market",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 involves complex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market operations, and presents notable complexities and uncertainties in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goals. These risks mainly include credibility risk, transparency risk, and activity risk, which accumulate progressively in market operations. Given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se risks, it is neither feasible nor necessary to completely eliminate them; instead, they should be managed within a reasonable scope. Therefore, adopting a risk allocation approach is an effective risk prevention strategy, and a standardized risk allocation model is an appropriate choice. This model emphasizes that public authority should play a central role in risk allocation, guiding market participants to act according to established standards, ensuring that the risks accepted by the market remain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and facilitating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and management of risks among different market participants, thus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Within this framework, specific institutional measures can be introduced at the supply, demand, and regulatory levels, such as establishing carbon credit definition standards, enhancing the standardized guidance of buyer behavior, and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processes and standardized contract terms in trading agreements, thereby jointly constructing a complete risk prevention system. This public law model not only applies to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 bu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feasible pathways for risk management in othe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markets.

The Trend and Policy of RMB Exchange Rate During China's Economic Catch-Up

Zheng Chaoyu 92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creates the economic catch-up miracle in Chinese-style moderation. The catch-up accounting of relative national inco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growth, inflation and exchange rate,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t historic contribution and key realistic impact of RMB's real appreciation and depreciation to China's economic catch-up.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RMB exchange rate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U-shaped curve predicted by dynamic PPP theory, and has fulfilled its equilibrating appreciation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he future tendency of RMB exchange rate mainly depends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fluctuation pattern of which sensitively responds to the non-synchroniz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 Therefore,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should be equilibrium orientated, to keep RMB exchange rate equilibrated and stable through rapid economic growth, meanwhile, accelerate economic catch-up through the continuous appreciation of RMB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but avoiding short-sighted policy choices such as preventing RMB depreciation through interest rate increase or expanding net export through RMB depreciation.

How Does the E-Commerce Affect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libaba's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dex

Cai Yuezhou, Wang Jianguo and Liu Shenglong 100

County-level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penetration of E-commerce into county areas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Based on Alibaba's county-level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dex and other county-level statistical dat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on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E-commerce development h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Instrumental regression and robust analysis further verify this conclusion. Mediation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commerce can enhance the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by enlarging commodity sales, fostering firm start-up and encouraging firm innovatio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is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for central counties, inland counties, mountainous counties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ounties, which means that the E-commerce could promote the urban-rural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Translation Dispute Over 夷 and Barbarian: Repositioning Sino-British Rel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s

Wan Li 138

Before the 1860s, British residents in China engaged in a half-century-long "translation dispute" over whether the Chinese character 夷 and the English term barbarian were equivalent.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relied on Chinese classical texts to 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meanings and usage of 夷, seeking to support their respective arguments. Before the First Opium War, Britain's pro-war faction framed the equivalence of the two terms to construct a "national humiliation narrative", ultimately aiming to advocate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use of force against China. Prior to the Second Opium War, British officials and sinologists in China sought to reform the Sino-barbarian ideology to achieve their long-standing goal of placing the British Empire on equal footing with China. Sinophiles such as P. P. Thoms denied the said equivalence, advocating for maintaining pre-Opium War conventions in Sino-British interactions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Although the dispute ostensibly revolved around the equivalence, its essence lay in Britain's effort to redefine Sino-British relations after a century of engagement.

Peter Perring Thomas's *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 and Its Significance as World Literature

Chen Enwei 171

In 1824, Peter Perring Thomas translated *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 into English for the first time. He adjusted the style of the original work from wooden fish to the western narrative poem, and the subject matter from the novel of talented scholars and beautiful women to the popular British courtship novel (Courtship Novel), and reconstructe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cenery in it in a romantic way, making it roughly in line with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of British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Through Thomas' translation and manipulation, *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 successfully crossed cultural boundaries and entered a new cultural field, which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Goethe's World Literature concept and creative model, but also continued to experience the proliferation of meaning and text travel in subsequent multilingual translations, and finally became a classic with World Literature significance.